

导 言

一

19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发表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对美国黑人具有伟大意义的日子,在美国黑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杂志《乌木》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一幅肖像作为1963年9月期的封面,并作如下说明:“在纪念《解放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之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位抗议运动之父值得任何出版物用他的肖像作封面,并定会使之增色不少。他生为奴隶,在年轻时奔向自由,把漫长而富有成果的一生献给了为所有黑人争取自由的事业。作为一个热烈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他是第一个‘自由乘客’,第一个‘静坐示威’的人。他认为,只有所有的黑人都获得自由和平等,他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1]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道格拉斯一生的真实写照,准确地反映了他与黑人解放运动的关系。这也是美国黑人能够给予他们的领袖的最高奖赏,他为黑人同胞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他永远活在美国黑人的心中。

自从1619年第一批黑奴踏上北美海岸时起,黑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第一批黑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做终身奴隶,他们也并不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黑人奴隶制下的奴隶,其中的人——也许是大多数——同白人契约奴一样,在服役若干年后获得了自由。但从1640年起,弗吉尼亚率先行动,以法庭

判决的形式把黑人契约奴变成终身奴隶，剥夺黑奴的公民和人身权利，黑人从此事实上成为白人财产的一部分，不再具有人格。

1660—1662 年间，大多数殖民地都以法庭判决或颁布特殊的法规，将黑人契约奴转化为终身奴隶。到 18 世纪黑人奴隶制度已经在北美普遍建立起来。在 1861—1865 年内战之前，黑人就一直生活在奴隶制的非人的枷锁镣铐之中。内战后，奴隶制度被摧毁，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规定了黑人被解放后的公民权和选举权，在激进派重建时期，黑人也曾经一度获得了这些权利。但是，在 1877 年妥协后，白人至上主义获胜，黑人刚刚获得的权利也一步一步地被剥夺，南部形成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黑人又被降低到与奴隶无任何区别的境地。一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在种族主义及奴隶制度的奴役下，在黑人来到美国这个大陆后三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的黑人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如果你问一个白人小孩是什么血统时，他会毫不犹豫，甚至于有些骄傲地回答：“我是英国、荷兰、爱尔兰血统！”如果你问一个黑人小孩是什么血统时，他会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是。”但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期，对于“你是什么血统”这个问题，许多黑人小孩会用“我是黑种人”来加以回答了。

美国黑人并不是心甘情愿被奴役的民族，他们有着热爱自由的传统。无论是在非洲被虏掠为奴的时候，还是在被运送到殖民地以后，他们一直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以反抗奴役、强迫归顺、残暴和不人道的待遇，并争取自身的自由、平等、公民权利和人的尊严。暴动和逃亡等都是他们常用的方法。只不过由于主、客观上的原因，他们未能够找到摆脱奴役的途径。

正当黑人奴隶似乎处于绝望之际，一部分白人人道主义者和自然权利论拥护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在 18 世纪对美国黑人奴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并在独立战争期间组建起废奴主义协会，开展

有组织的废除奴隶制度的斗争。正是由于他们的推动，在独立战争后，北部各地区先后废止了奴隶制度，国会还规定 1808 年后禁止同国外的奴隶贸易。废奴主义者认为此法案将使南方的奴隶制度最终灭亡，因为它斩断了奴隶的来源。此后，废奴主义运动进入一段相对的沉寂期。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南方的奴隶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棉花王国的兴起而起死回生，兴旺发达起来。废奴主义的任务远未完成。

到 19 世纪 30 年代初，随着新的废奴主义组织——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等的出现，废奴运动才重新高涨，并由此敲响了奴隶制度灭亡的丧钟。在整个废奴运动之中，对通过什么途径去消灭奴隶制、解放黑人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主张。主要的有三派：一派是所谓道德说教派，主张以教育和道德说服促使奴隶主自发地释放奴隶；另一派则主张除了道德说服之外，还应采取现有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手段，其中主要是政治行动去促使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来废除奴隶制。这一派被称为合法主义改革派；第三派则主张直接的武力行动，直接打击奴隶主，摧毁奴隶制度。这一派被称为物质抵抗派，也称暴力派。30 年代，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为代表的道德说教派占据废奴运动的主导地位，40 年代以后，以第一代全国性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合法主义改革派取代了道德说教派而执掌废奴运动的牛耳，直到废奴运动胜利。道格拉斯开创了黑人自己争取解放的新阶段。以约翰·布朗为代表的暴力派虽然在 50 年代末期因为发动哈泼斯渡口武装斗争而引起震动和广泛注意，但是却从未在黑人解放运动中起主导作用。

1861 年内战爆发后，以道格拉斯为主的合法主义改革派抓住这次历史提供的难得机遇，想方设法变内战为废奴战争，使之成为黑人解放事业的转折点。道格拉斯为了推动林肯政府为解放黑人而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林肯颁发《解放宣言》及国会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以后，道格拉斯又领导了黑人争取公民权和选

举权的斗争。

在重建以 1877 年妥协告终后，北部资产阶级金融寡头与南部前奴隶主阶级和解，出卖了黑人的事业。白人至上主义在南方重新抬头，并很快取得统治地位。面对这股强大的逆流，道格拉斯无能为力。尽管如此，道格拉斯为黑人解放定下的战略原则并没有失去效力。继道格拉斯之后的一代又一代黑人领袖无不继承了他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去领导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这一战略战术始终占据着黑人解放运动的主流。第二代全国性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针对重建失败后的黑人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经济权利的现实，决定先从白人不太反对的经济方面入手，给予黑人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想借此改变黑人的经济面貌，从而赢得白人的尊敬，最终获得完整的公民权。为此，从 1881 年起，布克·T·华盛顿开展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塔斯克基运动。针对塔斯克基运动忽视政治权利和民权的缺陷，年轻一代的黑人在 W·E·B·杜波依斯领导下，于 1905 年开展了所谓尼亚加拉运动，提出了争取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全面自由、平等的目标。这也是道格拉斯一贯倡导的目标。这一目标经过黑人几十年的努力和奋争，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基本得以实现，取得了丰硕成果。重建失败后建立起来的种族隔离制被摧毁，黑人的选举权得到保障，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法律障碍被废除。道格拉斯为黑人解放所确立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再度获胜。

正是由于道格拉斯为美国黑人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他如今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伟人之一。在首都华盛顿，有一座桥被命名为道格拉斯桥以纪念他，道格拉斯在华盛顿的故居被内政部接收，并被定为国家文物遗迹，美国邮政局还发行了一种印有道格拉斯头像、面值为 25 美分的邮票，在他长眠的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有一尊他的雕像。

二

美国学术界对道格拉斯的研究始于 1891 年，这一年出版了弗雷德里克·梅·哈兰德著述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有色人演说家》。1893 年，霍华德大学拉丁文教授詹姆斯·M·格利高里又出版了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演说家》。这两本书收录了道格拉斯演说的许多精彩片段，对其演说技巧进行了探讨。但是，在此之后半个世纪之内，在其他黑人领袖及废奴主义者日渐受到重视的时候，道格拉斯却遭到忽视。1932 年 E·戴维斯·华盛顿出版了一卷本《布克·华盛顿演说集》，卡特·G·伍德逊 1942 年出版了《弗朗西斯·J·格里姆凯》的四卷本文集。直到 20 世纪中的 1948 年，本杰明·夸尔斯出版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才打开了这一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宝库。

研究道格拉斯也有一些特殊的困难。由于 1872 年道格拉斯在罗切斯特的房子遭遇无名大火，他在内战前的手稿、书信、讲话稿差不多都化为灰烬，他主编的《北极星》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道格拉斯月刊》的唯一全集也被大火烧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林肯大学的菲力普·S·方纳教授知难而上，在道格拉斯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收集散失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道格拉斯的文章、通信，方纳教授历经几十年的辛劳，在国内外的图书馆、历史学会的帮助下，终于在 1950—1955 年间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1971 年，他又在此基础上补充出版了第五卷。此外，1964 年方纳还出版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1976 年他编辑出版了《道格拉斯论女权》。这些著作作为研究道格拉斯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在方纳教授以后，对道格拉斯的研究在美国史学界受到重视。1915 年杜波依斯在《危机》杂志中说道格拉斯是“美国历史上最

伟大的人”时，可以说是曲高和寡，应者寥寥。现在，即便是正统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 1840—1895 年间半个多世纪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黑人。凡是涉及美国黑人史的地方，没有不涉及道格拉斯，没有不收入他的文章的。耶鲁大学从 1979 年开始出版长达十四卷的《道格拉斯文集》。它们由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J·布拉辛丁主编。1980 年，迪金森·J·普雷斯頓出版了《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州的岁月》，对其早年生活作了详尽的考查，提出了许多在道格拉斯自述中没有的新材料。1984 年，沃尔多·E·小马丁出版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将道格拉斯的思想与美国主流思想进行了比较，称他为杰斐逊民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此外，在 60 年代，道格拉斯的三本自传也得以再版。《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1891 年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述》（1845 年版）、《我的奴隶和自由生涯》（1855 年版）分别在 1962、1968、1969 年得到再版。这三本自传虽然主观性强一点，但也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史料。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后，对道格拉斯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出现了好几本关于他的专著，其中包括道格拉斯·T·米勒著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自由的权利》（1988 年出版），戴维·W·布莱特所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内战：保持对千禧年的信心》（1989 年出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本人的言论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新文学与历史随笔》（1990 年出版），威廉·S·麦克菲尼著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991 年出版）、《道格拉斯自传》合订本（1994 年出版），等等。

中国史学界对道格拉斯的研究只不过是涉及美国黑人史的地方才提到他，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甚至于论文也只有刘祚昌教授发表在《历史学》杂志 1979 年第三期的《道格拉斯和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一文。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

综观中美学术界的研究，虽然两国学者对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但都仅仅局限于废奴运动时期，没有把道格拉斯放到迄今为止的整个黑人解放运动的历程中去理解。而且，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承认道格拉斯为美国黑人所作的贡献，应当加以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没有参加布朗起义，没有跟随暴力派跑是他严重的缺点，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他的思想阻碍了黑人解放的进一步发展，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观点与极左思维的革命至上论、暴力革命论一个调子，缺乏事实根据。因此，对道格拉斯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

本书意在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采用实证的方法，重新认识道格拉斯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事实证明，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史上，指导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是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而不是暴力革命思想或其他思想。

注释：

[1]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Philip S.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4），前言，第6页。

第一章 时代的召唤

奴隶制度是一种野蛮的、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给黑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伤害，也严重毒化了白人的社会道德，使盎格鲁-萨克逊人天生优越、非洲人天生低下的假定得到发展，并形成完备的白人至上主义理论。自 1619 年一艘荷兰商船第一次把 20 个非洲黑人运抵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河口，并把他们卖给种植园主当奴隶起，黑人便开始了在北美被奴役和反奴役的悲惨生活。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后，他们才有机会摆脱苦海。

奴隶制度与基督教倡导的博爱精神和 17、18 世纪的自然权利论都是格格不入的，在 18 世纪它就遭到这两股力量的攻击，废奴主义运动就此发轫，并在 19 世纪 30 年代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在废奴主义运动思想的感召下，天生就是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并没有因为周遭的严酷环境而泯灭对自由的渴望。他经过精心策划与斗争后，终于设法逃离奴隶制度的魔掌，来到自由的北方。他不因自己获得自由而满足，不等休息，他便投入到为自己同胞争取解放的斗争。他明智地选择了加入废奴运动。在废奴主义运动的斗争锤炼中，道格拉斯很快成长起来，并脱颖而出，成为黑人众望所归的领袖。

第一节 黑人沦为奴隶的过程

一 北美最早的黑人——契约奴

英国在北美成功建立殖民地是在 1607 年。此前的 1583 年和 1584—1587 年，它曾两次试图建立移民区，但均以失败告终。到 1607 年，由大商人组成的伦敦公司运送 120 个移民，在詹姆斯河口登陆，建立詹姆斯城。这就奠定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基础。到 1732 年，在北美的大西洋与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共建立了 13 个殖民地。北美地区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作物生长，是英国的工业原料和粮食供给地。北部地区的土壤以石砾居多，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作物以玉米、牧草、马铃薯为主。不过，北部地区海岸曲折，优良港湾多，接近世界著名大渔场——纽芬兰渔场，森林和矿产资源丰富，为发展渔业、造船业和手工制造业提供了优越条件。中部殖民地土壤沙石较少，适于种植小麦、大麦、玉米、亚麻，果木业和畜牧业也很繁盛。每年输出大量面粉，故有“面包殖民地”之称。南部殖民地气候温和，平原广阔，土壤肥沃，雨量充沛，适宜种植烟草、蓝靛、大米和甘蔗。这些农作物可以大面积种植，产品运到欧洲销售，利润可观，为英国殖民者的主要财源。

在早期移民到美国的人中，黑人是仅次于英国人之后的第二大种群。在美国，黑人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奴隶。虽然自 1517 年巴托罗米奥·德·拉斯·卡萨斯主教通过许可西班牙人向美洲输入非洲奴隶以鼓励向新大陆移民时，新大陆贩卖人口的贸易就正式开始了。但首批来北美洲的 20 个黑人却是在 1619 年 8 月下旬的某一天，由一艘来弗吉尼亚出售人口的荷兰快速帆船捎来的。由于这起偶然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买卖，英国的殖民地开始和这项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纠缠在一起。^[1]也许有人认为困扰美国至今的黑白种族

问题在那时便已形成，其实不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后来所谓的奴隶制才在美国形成。这些非洲人从法律上讲并不是奴隶，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受契约束缚的仆人而已，无论是短期还是终身服役，他们都不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在 1623 年和 1624 年的两次人口统计中，他们是被列为仆人的。迟至 1651 年，有一些工作期满的黑人还分到了土地，就同契约期满的白人差不多。在弗吉尼亚于 1607 年建立殖民地之后的 50 年内，它有很多黑人契约仆人，而且据文献记载，那里的自由黑人也在不断增多，形成一个小小的自由黑人阶层。^[2]直到 1660 年，在弗吉尼亚的法律文件里还没有奴隶制的内容。不过从一开始，黑人奴仆所得到的待遇就没有白人奴仆得到的好，这种不同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歧视，黑人奴仆在这种歧视中，有一些慢慢由服役制发展到事实上的终身奴隶制。黑人和白人得到不同的待遇的现象，有学者把它归因于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英国佣工确切地了解服役的情况，因此在契约规定的期限一满，就提出自由的要求。而非洲的奴仆，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说英语困难，又不懂英文，因此不能坚决要求自由。他们也求不到自由，除非某些有良心的人自愿释放他们。“非洲奴仆既然不能要求自己的权利，而且又没有人来捍卫他们的自由权利，他们就年复一年地服役下去，而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他们服役终身。”^[3]这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偏见促成了奴隶制。人们的这种种族偏见产生于 17 世纪初期社会上人们对黑人的普遍歧视，这比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奴隶制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法律上出现奴隶制时，人们的种族偏见早就形成了，正是从这种偏见中产生出了奴隶制。因此英国殖民地出现的奴隶制法只是加剧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歧视，并使这种歧视永久化。由于黑人在许多方面与英国白人不一样，17 世纪的人们不大可能让黑人享受与他们完全平等的权利。即使像爱尔兰人，虽然既是白人，又是基督徒、欧洲人，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圈子外的人”，有些甚至

被称为奴隶。何况非洲人都是异教徒，而当时的“基督徒”是受人尊敬的头衔。再加上非洲人是黑色皮肤，他们的文化也不相同，这更引起人们的歧视。黑人被当作国际奴隶买卖中的商品被运到英国统治下的美洲，也无形中使英国人产生了优越感。若干世纪以来，白人一直保存着传统的象征主义的看法，即白色象征善良、纯洁和美丽，而黑色象征罪恶、腐朽和丑陋。在奴隶制建立之前，这种象征意义并不是恶意的，但在黑人奴隶制度建立以后，黑色与黑人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低贱的代名词。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是后来的黑人奴隶制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奴隶贸易与美洲黑人奴隶制

欧洲人把自己称为文明人，而把非洲人说成是野蛮人并没有什么道理。较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非洲人把自己的文化发展成一种与欧洲人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从其复杂结构和活力来看，非洲文化并不亚于欧洲文化。⁴¹

非洲人生活在稳定的社会结构里，在他们的家族、氏族、部族之间，有一种牢固的社会联系。非洲的领袖们有的是强有力的、领导着幅员广阔的王国的国王，有的仅仅是一个地区的酋长。但是不管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他们总是以传统的习俗进行统治。在祭司和巫师的帮助下，非洲人崇拜土地和森林之神，驱除妖魔，黑人中的手艺人用青铜、木料、象牙等精巧地制作成面具和小雕像供举行宗教仪式使用。非洲人唱节奏很强的歌谣，击鼓伴奏，用他们自己发明的各种乐器演奏。有些乐器像我们今天的木琴、竖琴、小提琴和长笛。为了庆贺子女出生，庆祝结婚，纪念死者，或为了保证一个好收成，他们跳有宗教意味的舞蹈。在欧洲人闯入之前，阿拉伯人从北部侵入非洲，建立了对某些部族的统治，使一些非洲人信奉伊斯兰教。

在欧洲人来到的时候，非洲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很不幸是

蓄奴的。不过这种奴隶制与后来英国人在北美发展到极致的黑人财产奴隶制是不一样的。非洲的奴隶制远比后来北美的财产奴隶制更为人道。这些奴隶一般来自部族间的战争俘虏，罪犯或欠债人有的也成为奴隶。这情形跟中世纪的欧洲差不多。由于这种奴隶归非洲人自己所有，非洲主人常常把他们当作家庭的一员或可以信赖的侍从，待遇并不苛刻，远不似后来的美洲黑人奴隶制那样残酷，有时还因为他们对主人的忠诚而被主人释放。也像中世纪欧洲一样，奴隶的子女不能出售，但依附于土地。非洲的奴隶制并不是为了利润而存在的，父辈的奴隶身份也未必会延及其子女。^[5]

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才使非洲的奴隶制演变成一种更加残暴的制度，这些奴隶贩子把利润、种族主义瘟疫以及崇拜武力的狂热观念带到了非洲。欧洲奴隶贩子起初多是采取掠夺黑人变卖为奴的方式。他们在非洲西海岸组织“猎捕队”，偷袭村庄，绑架黑人。但是，这种方式引起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有的奴隶贩子被击毙，代价极高，而且在海岸人口减少以后，采取这种掠夺人口的方式更加不易。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一条好途径——从非洲酋长或奴隶贩子那里购买。他们发觉从酋长或当地的奴隶贩子那里购买现成的奴隶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代价较少利润较高；另一方面，这种方式还可以提供稳定的、似乎是取之不尽的奴隶资源，因为那些贪婪的酋长或奴隶贩子为了牟利，总是想方设法多弄些奴隶，甚至不惜向邻邦寻衅，挑起战争，其目的无他，只是为了掠夺人口。结果是村庄被焚毁，家庭和部落以及好几百年的传统遭到破坏。这种弱点也是人类的共性，并非非洲人所独有。欧洲奴隶贩子也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并且还以火器、金钱和各种物品引诱当地酋长或奴隶贩子这样做。必要时欧洲人还提供具体的指导。当地酋长或奴隶贩子获胜后，他们就把战争中的俘虏先关进拥挤不堪的畜栏里，之后再把他们编排成长长的队伍，手脚都戴上沉重的铁链，送到外国奴隶贩子出没的港口，以待出售。在从西非内地运往海港的途中，奴隶们

的手足往往被磨得皮开肉绽，伤口糜烂。有的奴隶精疲力竭、中暑倒地时，则遭到奴隶贩子的毒打、枪刺，甚至被割断喉咙。儿童一旦跟不上队伍，就被打得脑浆迸裂。到了海岸以后，奴隶便被关进贩奴商所设堡垒的地牢。牢内阴暗潮湿，蚊蝇滋生。为了防止逃跑，还把奴隶拴在木桩上。许多奴隶未及装船便不堪虐待而失去了性命。在装船前，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合格者被打上烙印，由地牢的唯一出口处直接被赶进船舱。18世纪末，奴隶贩子在西非海岸所设的堡垒共有40座。黑人奴隶成为奴隶贩子发财的“乌金”。

最早从事非洲奴隶贸易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因为从罗马时代起，奴隶制度已在伊比利亚半岛延续下来，所以葡萄牙人对把奴隶卖给西班牙人或自己的同胞并不感到内疚。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从非洲贩奴到西印度群岛及南美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出售，获利甚丰。于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买卖就开始兴隆起来。开始，葡萄牙人尚能维持垄断，但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丹麦、瑞典、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商人相继进入这个市场。起初，荷兰人最为成功，他们在17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控制了海洋，占据了西非海岸的港口。到1680年，英国人则取代荷兰人，成为奴隶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强国。

国际奴隶贸易是一项残酷的事业。从非洲到美洲要航行一到三个月。当时的贩奴船都是单桅小船，最大的不过百吨。要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把更多的奴隶运到美洲，奴隶贩子只好尽量减少每个奴隶所占有的空间。男奴只占六英尺长、一英尺四英寸宽的舱位，有的船上下舱板之间只有十八英寸。因此，奴隶所占的空间仅仅够他躺下或用手、膝盖触地慢慢爬行去领取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口粮和水。奴隶们常常由于船舱内的炎热和狭窄而变得甚至昏迷，或染上天花、坏血病。许多人死去了，另外一些人或者跳海自杀，或者在铤而走险的反叛中失去了性命。1680—1688年间，英国皇家非洲

公司从非洲共运出奴隶 6 万人，而死于海上的就达 1.4 万人。在从非洲捕掠黑人到运至美洲的整个过程中，每活着运到美洲一人，即死去五六人。从 1441 年葡萄牙人开始从非洲掠夺黑人奴隶运到本国起，到 19 世纪中叶的 400 年间，非洲因奴隶贸易而损失人口几达一亿。^[1]

国际奴隶贸易为北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黑人奴隶，这是黑人奴隶制在北美得以建立和延续、乃至兴旺发达的物质前提。

三 北美黑人奴隶制的建立

英国殖民者在掠夺了大量土地以后，为了开发其丰富的资源，极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越多越好，越便宜越好。刚开始的时候，很自然，他们想到了现成的劳力——土著印第安人。他们曾经试图奴役印第安人来解决劳力问题，但没有成功。大多数印第安人宁愿战斗而死或向西迁徙，也不愿替英国殖民者干活。印第安人当时还处在原始公社社会，除易洛魁等部落在使用简单工具进行农作物种植外，其他大多数都是游牧部落。他们无法适应种植园中强制性的劳动纪律和生活方式，他们自由自在惯了，而且他们也容易感染欧洲人带来的一些疾病，以至死亡，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农田劳动几乎使印第安人灭绝。凡是使用印第安人奴隶的地方，都无利可图，即使有利可图，对于 17 世纪美洲殖民地蓬勃发展的经济来说，印第安人的数量也严重不足。17 世纪初始，北美印第安人人数大约 20 万人。此外，早期欧洲人在北美的一项重要收入来自同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如果把印第安人都变成奴隶就会威胁到这一贸易的存在。如果不想因为劳动力的不足而延缓新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发掘其他劳力资源。因而寻找大量称心如意的劳动力就成为英国和西班牙等殖民者的当务之急。

虽然非洲黑人早在 1501 年就出现在新大陆，在欧洲的非洲人数量也很大，但欧洲殖民主义者起初并不认为他们可以解决新大陆

的劳动力问题。他们最先依靠的是欧洲本地的贫穷白人。在殖民地时代，由于劳动力的极度缺乏，契约奴的使用很普遍。大抵在 17 世纪，北美殖民地不分南北，普遍使用契约奴。1700 年，在弗吉尼亚十多万人口中，有一半是契约奴。契约奴分为“自愿契约奴”和“强制契约奴”两种。所谓自愿契约奴，即欧洲一些贫穷的人们在移民北美之前，因负不起旅费，便与公司、船主或资本家订立契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答应在抵达美洲后，无偿地替雇主工作一段时间，以抵偿旅费。英国在圈地运动等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造就了大量的穷人和无业游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些穷人和无业游民期望到新大陆去发财致富，但他们却付不起旅费，当契约奴就成为一种选择。所谓强制契约奴则是被拐卖的人口或是被英国法庭判决为契约奴来美的政治犯、宗教犯、刑事犯及其他罪犯。自愿契约奴服务期限一般要短于强制契约奴。在 1650 年前，契约奴一般要服务 7 到 10 年，之后一般为 4 年。无论是自愿契约奴，还是强制契约奴，他们在期满之后，都可获得自由，并得到少量土地（一般为 50 英亩），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资料。例如，在弗吉尼亚，一个童工契约奴服役期满时可以得到 50 英亩的土地、种子、牛及工具之类。不过，他在恢复自由后的七年内要将自己耕地生产的农作物的一半交给旧主人，而成为其佃农，之后也只能获得对其中一半土地的完全所有权。^[7]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弗吉尼亚使用印第安人和契约仆人总满足不了殖民地对劳力的需求。契约奴的使用也越来越成问题。首先，在英国，由于来源不足，有的人竟然袭击英国的监狱；到处还出现了拐骗、绑架孩子、妇女和醉汉的事件；在殖民地，契约劳工的条款常常成为有关各方感到愤怒的根源。这些劳工不仅对契约期满才能离开的规定感到恼怒，而且许多工人甚至还控告他们的主人和船长非法扣押他们。他们中许多人逃走了，因为有的逃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了，他们一旦逃走，要逮捕他们就越来越困难，花钱也

越来越多。英国人终于认识到白人契约奴解决不了殖民地的劳动力问题。其次，从经济的角度着想，种植园主也不看好白人契约奴。使用一名契约奴，仅旅费就需 6—10 镑，且抵美后，还需供给生活费用；契约奴工作时间又太短，在他们获得自由时还得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不如使用终身奴隶来得划算。17 世纪对白人佣工和黑人终身奴隶的财产估算可以反映出这两者的差别。首先，凡是黑人终身奴隶即使是儿童也比白人佣工值钱。在 1643 年弗吉尼亚一份财产目录里写到：一名还应服役 8 年的 22 岁的白人佣工身价相当于 1000 磅烟草，而一名“黑人男孩”的身价却相当于 3000 磅；一名还剩 7 年期限的白人男孩的身价为 700 磅，而一名 8 岁黑人女孩却值 2000 磅。在另一份 1655 年的财产目录上，两名剩下 4 年服役期限的男佣工共值 1300 磅，一名只剩一年服役期限的女佣工值 800 磅，两名黑人男孩各值 4000 磅，一名黑人女孩甚至可值 5500 磅。⁸¹1645 年，有人在写给约翰·温斯洛普的一封信中也反映出这种情绪。信中有一段说：“只有弄到足够的奴隶替我们干活，我们才能发达起来，否则即使到了我们子孙的时代，这个广袤的大陆上也不会有足够的人……佣工索价很高，因此留不住。你想必明白，我们花在 20 名摩尔人（非洲黑人）身上的钱也比花在一名英国佣工身上的钱来得便宜。”¹⁹¹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白人契约工人变成终身奴隶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契约工人的白人，同母国都有一定的联系，使其终身为奴会在英国等地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这种前景也会阻止人们前往新大陆。二是白人契约工人同其他白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肤色，长期奴役其中的一部分人会在白人社会中导致严重的社会、宗教和心理问题。

既然白人和印第安人都不能作为理想的劳动力，到这时，北美殖民地才考虑黑人的“终身劳役”问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弗吉尼亚首先认识到邻近

的加勒比海岛屿早已认识到的一点：既然使用黑人不会遇到像雇用白人那样多的困难，不会像雇用白人那样引起严重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心理问题，何必雇用白人呢？黑人不容易逃走，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他们同母国相距遥远，没有帮助他们的天然同盟者，也无法把他们的苦难转达给能影响这种劳力输出的任何政治权力中心；可以不受惩罚地用纪律来约束他们，甚至可以施加刑罚，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在道义和精神上低人一等；而且他们显然是取之不尽的。为了加速砍伐森林，种植更多的烟草、蓝靛等作物，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弗吉尼亚需要的正是黑人这样的劳动力。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也有充足的机会从加勒比海地区的百慕大和新普罗维登斯群岛的英国移民那里学习歧视黑人的做法。早在 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这些殖民地就给黑人规定了歧视性的或纯粹奴隶的地位。例如在 1603 年，百慕大议会通过一项法律限制“黑人的无礼行为”，规定黑人不得随意行动或经商，并不准黑人携带武器。西加勒比海地区的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清教徒经常掠夺西班牙殖民地的黑人奴隶，然后将他们出售或留在自己的种植园使用。根据当时的史学家理查德·里贡的记载，加勒比海的另一个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把黑人完全变成了奴隶。^[10]

把黑人从仆役变成奴隶是一些弗吉尼亚人的梦想，许多弗吉尼亚人事实上已经在这样做了，所需的只是获得立法机关的批准。早在 1640 年，当两个逃跑的白种仆人和一个黑种仆人被重新捕获后，虽然这三个人都挨了 30 鞭子，但是，法院判决两个白种仆人为其主人多干一年活，期满以后他们还需为弗吉尼亚殖民地再服役三年；同时却判决那个叫约翰·庞奇的黑人“在当地或其他地方为上述主人或接受转让的另一位主人服役终身”。^[11]黑人受到的惩罚显然是最重的，他从前只不过是一名佣工，但此后他就要沦为终身奴隶了。因此，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以后的第一代人中，非洲人的劳役已经在向非洲人的奴隶制转化了。17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庭

纪录为当时确实存在着奴隶制提供更有力的证据。例如在 1646 年，一名黑人妇女和一名黑人男孩被卖给斯蒂芬·查尔顿，供他自己“及其继承人永远使用”。1652 年一名黑人女孩“连同其未来的子孙永远”卖给了 H·阿姆斯特丹杰及其继承人。苏西·艾莫斯曾调查过两名黑人的情况，这两名黑人于 1635 年被带到弗吉尼亚东海岸出售。20 年后的 1656 年，主人的遗孀在遗嘱中把一名黑人的孩子和另外那名黑人及其子女留给她的继承人。这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因为期限已过了 20 年，这显然是世袭的关系。^[12]不过，虽然黑人奴隶制或者说是种族歧视在那时已经事实上存在，但尚处于不稳定发展阶段。

1660 年以后，殖民地议会把一些已发展成为习惯的做法变成了法律。1660 年，弗吉尼亚制定的一项法令承认来自基督教国家、定期服役的佣工和来自其他地方、不定期服役的奴仆的区别。1664 年，马里兰的一条法律规定黑人奴仆必须终身服役，所有黑奴子女也必须终身服役。1670 年，弗吉尼亚的一项法律宣称：由海路来的所有非基督徒奴仆必须终身服役。在这些年代里的其他法律还规定，奴隶即使获得了洗礼，也不意味着当然获得了自由权。1667 年弗吉尼亚的一条法律规定，“受了洗礼并不能改变这个人的奴隶或自由民身份”。^[13]于是，奴隶主认为他们可以输入非洲野蛮人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从而证明把他们当奴隶占有的行为是正当的。这反映了殖民者的虚伪本质。

在奴隶制度确立的过程中，由于经常发生有关黑人的法律地位的争执，就有必要在法律上对此作出专门规定。当时因为种族通婚或性关系而产生大量的混血儿，这就出现了子女的身份问题。1662 年弗吉尼亚宣布，凡是白种男子与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都承袭母亲的身份。1664 年，马里兰规定黑人必须服终身役，其子女承袭父亲的身份，但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保护白人的利益，要么为白人男子提供向黑人妇女发泄兽欲的方便而不承

担责任或阻止白人男子娶黑人女子，要么“制止具有自由身份的妇女下嫁给奴隶”。这里的自由妇女显然是指白人妇女，这条法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许多生来就是自由的英国妇女忘记了自己的自由身份，竟然与黑奴结婚，使我们的民族蒙受耻辱”。^[4]

像加勒比海地区的做法一样，对黑人奴隶的行为和社会规范，法律也做出了专门规定。1659年，马里兰制定了有关逃亡奴隶的归还暨归还后如何处理的法律。不久，又制定了禁止奴隶经营盗来的物品和酒类的法律，以及惩处犯有谋杀、纵火、偷窃、和白人交往、傲慢无礼以及未经许可到处走动等不法行为的自由黑人和奴隶的法律。惩处的措施从打烙印和鞭挞直到死刑。这些法律的执行是很严格的，虽然其中也不乏宽大的处理。其他殖民地也相继制定了类似的法律。如1755年，佐治亚的奴隶法规定，禁止7个以上的黑人在没有白人陪同的情况下外出，从星期六傍晚到星期一早晨这段时间里，即使已经获准拥有火器的奴隶也不能随身携带它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教黑人读书写字，等等。

法律上把黑人规定为财产是在1669年。那一年弗吉尼亚的法律采用比较隐晦曲折的方法把黑人说成是财产，规定如果主人在惩罚奴隶时失手把他打死，主人不负责任，因为谁也不会故意毁坏自己的财产。法律上明确把黑人定为财产是很久以后的事了。1690年，南卡罗来纳把黑奴说成是不动产，1740年又说成是动产；1705年，弗吉尼亚宣布奴隶是不动产，但加了很多例外情况。1750年，南方各殖民地的法律把奴隶最后规定为动产。

奴隶制虽然遍及整个北美英属殖民地，但各个地区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这样说，除了南部殖民地外，其他地方的奴隶制并没有完全成功，那是对奴隶的约束要少一些。例如，在中部殖民地的宾夕法尼亚，因为教友派教徒反对奴隶制，而教友派教徒在该地区占据优势地位，人们多多少少把黑人当作人来尊重，黑人和白人的交往渠道也没有完全封闭；学校和教堂成为黑人生活的一部分；

黑人的婚俗习惯一般得到尊重，黑人的家庭比较稳定，不像大部分英国殖民地的黑人家庭那样经常被拆散。在新英格兰殖民地，那里的黑人彼此之间以及同印第安人之间，仍然保持着自由往来，某些自由黑人的住所成为他们聚会的场地，他们在那里跳舞、打牌、讲故事。这些活动使他们在哪儿度过了许多充满激情和欢乐的时刻；黑人甚至可以经常学习读书写字；而且他们也有很多机会接触白人，每当建筑房屋或教堂、削苹果皮或剥玉米皮时，至少总会有一部分奴隶参加。因此，在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人们的反奴隶制意识发展得比较早，这种意识在独立战争时期变得更加明确。

美国奴隶制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混合体，但以商品经济为主，产品主要供应市场。所以，奴隶制经济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南部奴隶主实际上是奴隶主型的资本家，或资本家型的奴隶主。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奴隶制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殖民地时期，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美国从手工工场向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其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曾予以高度评价：“同机器、信用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15]不过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日趋严重，双方在关税、市场、西部领地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斗争愈演愈烈。“在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的过程中，奴隶制也相应地从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促进作用变为资本主义前进的障碍。”^[16]

奴隶制形成以后，买卖黑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输入黑人奴隶的数目直线上升。当时从事奴隶贸易的纯利润在 33% 或以上。例如，1750 年，新英格兰商人在非洲以 100 加仑甜酒换一个男奴，

80 加仑换一个女奴，65 加仑换一个童奴。当时 100 加仑甜酒值 10 英镑。但在西印度群岛，一个男奴可以卖 21 英镑，一个女奴可以卖 18 英镑，一个童奴可以卖 14 英镑。所获利润为本金的一至两倍。巴尔的摩一条贩奴船“爱神号”，建造费为 3 万美元，第一次贩奴就净赚 20 万美元。有时航行一次的利润竟高达投资额的 10 倍。^[17] 欧美商人争相经营这项罪恶的活动，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商人和船主活跃于大西洋两岸，进行所谓的“三角贸易”，将自非洲输入的黑奴大多卖给了南部种植园，1771 年，殖民地从事黑奴买卖的船只达到 60—70 只。三角贸易即英国或者欧洲的贩奴商从欧洲装载用以“换取”奴隶的物品，前往非洲，再从非洲把换得的黑奴运往西印度群岛、巴西和北美，然后在这里把他们出售，再用这笔钱购买原料产品运返欧洲。如此周而复始。北美新英格兰的奴隶贩子则载运大豆、木材、马、桶箍、制桶板、牛乳制品、面粉以及奴隶食用的劣等食品，到西印度群岛换取甜酒，驶往非洲，在非洲换回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出售，之后，把取得的硬币、糖浆、糖、染料木、姜、胡椒等以及一部分未出售的奴隶带回北美销售。如此往返。新英格兰商人也把糖浆制成甜酒，直接到非洲去“换取”奴隶。在三角贸易中，英国的利物浦、法国的南特、北美的新港和查尔斯顿成为国际奴隶贸易的巨大中转站。这些中转站靠贩卖黑奴而繁荣起来。1783—1793 年，英国的利物浦贩运黑奴的总值达 1500 万英镑，净赚 1200 万英镑。^[18]

殖民地的业主们鼓励黑人奴隶输入。例如，早在 1663 年，南卡罗来纳规定给带来黑奴的最早移民提供土地。第一年，每带一个男性黑奴可得 20 英亩，每带一个女性黑奴可得 10 英亩。在以后的年代里，对输入黑奴的物资刺激有所减少。在 1660 年以前，北美殖民地黑人人数并不多，1650 年黑人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3%。到 1671 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 5%，1751 年更上升到 24%，而到 1756 年时黑人奴隶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 40%。1724 年，南卡罗来

纳的黑人数超过了白人，为 2:1。^[19]1700 年至 1760 年，黑人人数由 2 万人增加到 30 万人。^[20]在弗吉尼亚，1625 年黑人人数不过 23 人，直到 17 世纪中叶，也只有 300 人。1672 年英国为了垄断从非洲向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为了提高奴隶贸易的利润，成立了皇家非洲公司，并一再下令英属北美殖民地扩大奴隶输入，扩大烟草和水稻种植面积。此后，装运奴隶的船只才加速进入这个殖民地。到 17 世纪末叶，输入黑奴的数量达到每年 1000 人以上。18 世纪黑人人口以有些弗吉尼亚人认为惊人的速度增长。在 1708 年，黑人人口是 1.2 万人，而白人人口是 1.8 万人。到 1756 年，黑人为 12.156 万人，白人为 17.3316 万人，在许多地方，黑人数量甚至超过了白人。^[21]

奴隶制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产生的，并没有事先的计划，但是，在它产生以后，随着法律的健全和人们习惯的固定，它却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愈来愈错综复杂，越来越难以摆脱。美国的奴隶制度到了 19 世纪得到进一步的扩展，达到完备的程度，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战的爆发，至今仍然存在的黑白种族紧张关系与此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奴隶制的存在实际上否定了美国人宣扬的平等原则，正如 1845 年英国一家报纸评论的那样，奴隶制的美国“好比是一棵看起来美丽茂盛的花卉得了烂根病。……奴隶制有可能使这个当代的伟大共和国失去其榜样的意义而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教训”。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加特·穆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自称他们的一切制度都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但是还保留着黑人奴隶制。……”^[22]

第二节 奴隶制度的罪恶和黑人的反抗

一 奴隶制度下黑人的呻吟

在奴隶制度下，黑人成为残暴的牺牲品。“作为野蛮行为和人

问苦难的渊藪，女人卖淫和男人淫逸的场所，作为婚姻的嘲笑和家庭生活的破坏，作为理性的丧失，精神的死亡，奴隶制的罪恶在当时是无以复加了。”^[23]

在施行奴隶制的各地区都制定了黑人奴隶法典。黑人奴隶法典涉及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说来，他们被当作奴隶主的财产，而不是人，法律保护这种财产所有权，使奴隶处于服从地位。奴隶法典规定，奴隶在法庭上没有地位：他不能够作为起诉的一方，除非对方也是一个奴隶或者是一个自由黑人；他不能在法庭上提供证词，他的誓言没有约束力，他没有权利缔结合同；一般说来不能拥有财产；一个奴隶不能打一个白人，即便为了自卫也不行，而杀死一个奴隶，即使是蓄意的，也会被判无罪。法典也禁止强奸女奴隶，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但是，白人大多对此置若罔闻，反映出他们的虚伪。总之，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24]

在奴隶法典下，行动、求知、恋爱、立志都没有黑人的份。奴隶不经允许不得离开种植园，任何一个白人发现未经许可外出的奴隶，都可以把他抓起来并交给地方官员。在密西西比州，奴隶不能吹号，他们不能做买卖、贸易，不能到白人家里去，也不能到黑人家里去，他不能在自己家里款待这些人。没有白人在场，他们不得集会，也不得接收、拥有任何被认定是激发暴乱的煽动性材料。教奴隶认字是违法的；奴隶也没有恋爱、婚姻的权利，因为法律不允许奴隶订立契约。主人在这方面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默许奴隶私遁，或允许他们举行一定的结婚仪式，但是，他也可以随便地拆开一对夫妻。总之，黑奴必须老老实实地听从奴隶主的摆布，不要有个人意志。

对女奴隶和家庭的摧残是奴隶制的最大罪恶之一。奴隶主常把女奴隶当成他们发泄兽欲的对象。不管她们结婚与否，白人男子总是经常强迫她们与自己同居并怀孕。在新奥尔良，年青白人男子总

是与黑人妇女保持非法同居关系。而众多的同居关系都是白人强奸的结果，女方如果反抗，常常遭到凶残的毒打。许多女奴隶把她们反抗白人强奸时所招致的伤疤一直带到坟墓。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小时候曾经亲眼看到过他的主人毒打他的姨妈赫斯特的情景。赫斯特身材匀称，仪态大方，主人安东尼很喜欢她。但是，有一天晚上，主人想要她，她却和一个黑人奴隶幽会去了。安东尼恼羞成怒，把赫斯特双手交叉吊起来，腰部以上全部剥光，用一根粗大的牛皮鞭子抽打她，直到鲜血直流。安东尼边打边骂她，说她是一个“下贱的婊子”。^[25]

奴隶主和其他白人男子作恶的结果产生出大量的混血儿，由于孩子的身份依母亲的地位而定，这些孩子都是奴隶，这就出现了奴隶主既是主人又是父亲的特殊情况。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父亲对自己的奴隶孩子是不会尽什么义务的，就是他想尽点力，他也必须面对他那恼怒的妻子和整个社会的反对。奴隶母亲也很难对自己的孩子尽多少责任。道格拉斯就是由他的外婆带大的，因为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与他分开了。他很少见到母亲，对其他兄弟姐妹也相当陌生。道格拉斯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有人说他的主人安东尼就是他的父亲，反正是一个白人。这绝不是稀有的情况，因为工头和其他白人也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奴。在 1850 年 320 万奴隶总人口中，有 24.6 万名混血儿，到 1860 年 390 万奴隶总人口中，则有 41.1 万名混血儿。^[26]实际数字比这还要大，因为普查人员只把那些外表上看起来是混血儿的计算在内。

奴隶制对女性的践踏还在于奴隶主把女奴当作生崽的机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外婆就因为生育多而受到主人的嘉奖。她每生一个奴隶孩子，安东尼就给她 2.4 美元。1809 年安东尼的账簿上记载他总共为她的 11 个女儿付了 26.5 美元。^[27]安东尼还特许她专门生孩子，不用做田间活。对那些没有生育的女奴，奴隶主则强迫他们不停地与一些健壮的黑奴同居。“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

果这些妇女与其第一个‘丈夫’同居一两年没有生孩子，那么种植园主就会强迫她们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甚至更多的‘丈夫’，或者说是‘同床者’。”^[28]这是约翰·布甲克尔在对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制进行描述时所写下的一段话。她们中的多产女人很受奴隶主的器重，美国人对这种财产也很“尊崇”。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答案是：钱的魅力。由于各种植园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各地对奴隶劳工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繁殖奴隶而转手倒卖就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繁殖奴隶而致富的生意在马里兰、弗吉尼亚等地十分盛行，奴隶主把多余的奴隶卖给南部腹地的奴隶贩子，谋取暴利，由此致富的人不在少数。

正如缅因州温斯罗普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章程指出的那样，奴隶制通过一整套制度，如否定奴隶婚姻的合法，摧残父母和家庭的责任感，剥夺母亲哄自己孩子睡觉的权利，纵容各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违反上帝和自然法则等，从而导致“智识的浪费、情感的扭曲、感情的伤害、灵魂的剥夺”。^[29]

奴隶制剥夺了黑人的劳动，它依靠的是暴力。奴隶制下的奴隶干活是因为他们害怕不干活就会受惩罚，而奴隶主也认为不给奴隶惩罚他们是不会干活的。阿肯色州一个奴隶主曾写道：“我有什么就说什么。试图劝说一个黑鬼去工作简直就像明珠暗投一样。必须强迫他去工作，并时常给他提醒，要是他完不成任务，他就会受到惩罚。”^[30]奴隶主想出许多办法来惩罚不听话的奴隶，如不给列在“惩罚”名单的黑奴星期日特别午餐吃；马里兰一个种植园主竟让一个黑奴把他没有拣干净的烟叶上的虫子吃下去；一个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让一个男奴隶做“女人干的活”来羞辱他，如洗衣服或穿上女人的衣裙，戴上红帽子，站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台架上示众；还有的在星期天把不听话的黑奴关在私家或公共监狱里。奴隶主认为这种惩罚比其他方法更能触及黑奴“觉悟”；还有的给黑奴带上木枷；铁镣则给逃跑的黑奴用。对屡教不改者，奴隶主或者干脆把

他卖掉，让他与其亲人、朋友隔离开来，永无见面的机会。〔31〕

“有监工的种植园是残酷、野蛮暴行集中的地方。”〔32〕严厉的工头和残忍的监工经常使用鞭子抽打他们。这些人一方面羡慕奴隶主的生活，另一方面把自己不幸的经济状态归结为奴隶制，因之，他们把一腔怨气发泄在奴隶的身上。他可以随意将奴隶的小小眼神，半句话，一个姿势都曲解为傲慢无礼而加以惩罚。奴隶绝不能回嘴，绝对不能因为冤枉而替自己辩护。因为奴隶主有句口号：“宁愿让一个奴隶挨鞭子，也不能因为监工犯了过错而在奴隶面前摊派他的不是。”〔33〕

马里兰州塔波特县的奥斯汀·高尔是监工中的典型代表，他极其残忍、狡猾，对奴隶他从来不用口，只用鞭子来解决问题。在主人面前他又奴性十足，摇尾乞怜。他丝毫没有一点人性。高尔有一次鞭打一个叫但姆贝的奴隶，他才打了几鞭，但姆贝不想挨打，就跑到河边跳进水里，不肯上来。高尔说他只喊三声，到第三声但姆贝还不上来，他就开枪把他打死。结果叫了几声，但姆贝还是没动地方。高尔二话没说，立即举起步枪，对准但姆贝就是一枪。可怜的但姆贝倒了下去，尸体漂了上来浮在水面。高尔杀人后，整个庄园的人都感到恐怖，连主人劳埃上校也过问了此事。但最终他被说服了。高尔说像但姆贝这样的桀骜不驯的奴隶，如果不给点颜色，他就会给整个庄园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这样下去，会使奴隶得到自由，而白人却沦为奴隶。这个回答令主人很满意。他让高尔继续做监工，甚至提升到总监工的位置。一桩当着奴隶的面犯下的恐怖凶杀案就这样逃过了法律的惩罚。

实际上，在马里兰州的塔波特县，白人杀死一个奴隶或任何黑人，在法庭和社会眼里都不算犯罪。据道格拉斯回忆，圣迈克尔斯的托马斯·莱曼就杀死过两个奴隶，其中一个是他用斧子劈开脑袋杀死的；吉尔斯·黑克夫人用棍子打断了道格拉斯妻子的表姐——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的鼻梁和胸骨，杀害了她；劳埃上校隔壁种植

园的比尔·德邦莱用步枪打死了上校家一个摸牡蛎时不慎越出了地界的老人等等。这些罪行都没有受到惩处，以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花半分钱就能要一个黑鬼的命，再花半分钱就能把他埋了”。^[34]其他各州情形也一样。密西西比州一个奴隶主竟因怀疑他的一个奴隶偷窃，便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抽打了一千多鞭。很多奴隶都是因为不堪虐待才逃亡的。奴隶无法防备他的主人偶尔表现出来的疯狂的、任性的残忍癖或者间或突然发作的暴怒。

奴隶主如果有理智的话，他会很在乎他的奴隶财产受损失的。在城里的奴隶主还受到社会舆论和良心的监督，这样情况下的奴隶待遇要好一些。但他们不占奴隶的主体。1850年在城镇的奴隶只有40万，其余280万是在农场和种植园劳动。其中大部分约180万是在棉花种植园劳动。^[35]所以种植园里奴隶的生活才具有典型意义。

奴隶劳动时间很长，生活条件却很差。在监工无情的驱使下，很多奴隶不仅从日出工作到日落，而且常常在天黑很久还在田间劳动。尤其是在收获季节，种植园主为减少因暴雨造成的损失，急于把庄稼收回，总是尽量延长劳动时间。1830年在密西西比州14个奴隶有一天每人平均摘棉323磅。一般成人奴隶估计最好成绩一天可摘棉150磅。^[36]在路易斯安那甘蔗种植园，奴隶在收获季节每天劳动18—20个小时是很常见的事。^[37]

奴隶们住的地方很简陋，大多是没有窗户的棚屋，无法抵御暴风雪和寒冷的天气，许多小屋没有床，奴隶们不得不裹着毯子或被褥子睡在只铺着稻草和玉米皮的地上。吃的东西主要是咸猪肉和玉米面包，仅够维持生命但单调乏味。奴隶们的衣服少得可怜，通常只穿一种被称为“黑人裳”的粗布衣服，鞋子通常只在冬天到来才发下来。黑奴小孩在冬天也没有鞋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小时候就因此脚冻裂一个大口子，几乎可以塞入一只钢笔过去。奴隶制的辩护士说他们为奴隶提供了温暖而又有保证的生活完全是自欺欺

人。美国人之所以固执地坚持这种满意的幻想，可以用这一事实加以解释：奴隶制和一个民族遭到贬低是个道德问题，最好不要去触动它。^[38]

二 奴隶制对自由黑人的影响

奴隶制的罪恶不仅体现在奴隶身上，而且也反映在自由黑人身上，他们成为奴隶制的间接受害者。这种损害直到奴隶制被废除以后都还长久存在着，成为黑人彻底解放的最大障碍。其表现是由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产生的对黑人的歧视。

在一个黑人奴隶制被允许存在的社会里，自由黑人不会有任何地位，他们也只配当贱民，当劣等公民。自由黑人在北美殖民地时代就一直存在。不过，那时他们人数较少，也没有什么影响，通过独立战争，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解放了奴隶，也有一些黑人从南方逃出来，到了北方获得自由。南方的自由黑人有的是好几代获得自由的黑人的后代；有的是被他们的主人以遗嘱方式解放的；有的则是通过白人或黑人恩主花钱买得自由；有的则是他们自己在非雇佣时间挣得的钱赎回他们的自由；偶尔也有个别奴隶主或政府为表彰奴隶的功绩而解放他们，如使佐治亚的议会大厦避免遭受大火的那个奴隶在 1834 年获得了自由。^[39]

黑人通过不同方式获得自由使自由黑人的数量不断增长。特别是自由黑人家庭稳定以后，多生孩子成为自由黑人增加的主要因素，自由黑人母亲生的孩子是自由人，一些白人母亲与黑人的结合生的孩子也是自由人。1790 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自由黑人有 5.9 万人，其中 2.7 万余人在北部诸州，3.2 万人在南部。第二个十年后，他们增加了近 82%，再过十年又增加 71%。1830 年美国有 31.9 万名自由黑人，到 1860 年上升到 48.9 万人，其中 26 万人住在南部，22.6 万人住在其他地区。马里兰拥有的自由黑人在全国各州中占第一位，1860 年达 8.39 万人，只比它的奴隶人数略少

一点，紧靠其后的是弗吉尼亚，有 5.8 万人。^[40]

大批自由黑人的存在和增加使奴隶主如坐针毡，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奴隶制是一个威胁，奴隶制显然违反了《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在南方，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以白人无可争辩地控制黑人为基础，自由黑人无论在理论上享有什么权利，也不能成为例外。为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发动一场诽谤黑人的运动。白人至上主义理论于是便得到宣扬。在这场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南卡罗来纳的卡尔霍恩和布莱索等人。

卡尔霍恩及其追随者认为，人并不是生而平等，自由也不是一种天赋固有的权利，而是一种并非一切都配得上的最高奖赏。个人和人种必须用事实证明他们有资格享有这种特权和奖赏。而黑人“处于人类天平的最低点”。黑人即使是人，也是最低等的人。黑人不仅是一个“被苦役贬低，油灯烟熏黑的白人”，而且是精神和肉体都完全低等的人。他们甚至说黑人不是亚当的后代，而是另一个低等的种族。黑人不配也永远别想与白人取得平等，哪怕是大致平等。因此，白人对黑人的统治是上帝的旨意，即使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黑人也应该处于完全屈从的地位。^[41]

这种种族优越论调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映，是根本经不住推敲的，但却严重毒化了白人的道德，导致对黑人的偏见加深，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黑人天生卑劣的理论作为颂扬奴隶制的一块万丈丰碑，压在世世代代的黑人身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奴隶制造成了黑人软弱无能的状态，这种状态反过来又被人利用来证明黑人是劣等民族。事实上黑人的卑劣性是被训练出来的，可是这种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品质被当成其天性，使人误以为这个民族不可救药。某些自由黑人成功的例子本来就足以推翻这种荒唐的循环推理法，但人们又认为这样的例子太少，只能被看成是例外情况，不足以代表全体。甚至到了今天，歧视黑人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因为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的成果使之有所收敛。当年某些人使用过的循环推理法

现在还有影响，使许多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的本质和潜在能力仍然认识不清。

赞成奴隶制的鼓吹者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的代言人。他们梦想使南方变成一个希腊似的民主体制：摆脱卑贱劳动的杰出公民会实践公民道德并修习艺术。这个梦想注定会被 19 世纪美国其他地方的严酷现实所粉碎，新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正在不断积聚，这种时代趋势是谁也抗拒不了的。但是在当时，依然有很多白人相信，奴隶制是控制劣等民族、防止其成为社会负担、维持白种人的纯洁性和优越地位的一种手段。那些不拥有奴隶的白人既把奴隶制当作自己同白人特权阶级相联系的标志，也把它看成是黑人在社会和法律上从属于整个白人阶级的标志。无论在战前还是战时南部邦联的军队之中，南方人（其中大部分不占有奴隶）团结在捍卫奴隶制的旗帜下，显示出极大的坚韧性和激情，这种情况如果排除种族因素，单纯用种植园的利润来解释，是讲不清楚的。他们为了奴隶制而不惜牺牲一切是因为这种制度无疑能使黑人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从而使他们自己能保持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尽管棉花使南部繁荣起来，但并不意味着南部地区的人个个都成了奴隶主。南部地区绝大多数白人都不占有奴隶。因此他们与奴隶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说毫无关系。1860 年，南方有白人家庭 160 万户，其中只有 38.4 万户拥有总数达 400 万的奴隶。传说中的奴隶主总是住深宅大院，花木扶疏，奴仆成行，一呼百应。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只是风毛麟角。1860 年 20% 的奴隶主家里只有一名奴隶；2/3 的奴隶主家里的奴隶不超过 20 名；并且 99% 的奴隶主家里的奴隶不超过 100 名。根据 1860 年的人口统计，占有 500 或 500 名奴隶以上的奴隶主家庭只是极少数，在整个南方也只有 14 家“百万富翁”才享有这种殊荣。⁴²

许多南方人的经济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多少，但他们却对奴隶恨之入骨。即使那些由于经济或道义方面的原因而厌恶奴隶制的人，

也往往考虑到奴隶制具有控制黑人的效力而对奴隶制保持沉默。南部一位贫穷白人向从北部来的一位客人解释说：“我不想看到黑人自由，这些人懒得要命。他们要是获得自由，就会到处闲逛，还自以为和我们不相上下呢。……”他对黑白通婚的前景感到恐惧：“你怎么能允许一个黑鬼碰你的女儿呢？当然不能！这就是我不愿让他们自由的原因。但老实告诉你，我又觉得让他们继续当奴隶似乎也不对。这就是我的想法。”^[43]

因此，一方面是黑人能产生利润，另一方面是白人对黑人有一种恐惧心理，这两方面的因素把南方白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全然不顾那些人道主义者的反应，而死死抱住奴隶制度不放。很多白人，而且是许多不拥有奴隶的白人反而比奴隶主更起劲地维护奴隶制，更为积极地加强对自由黑人的限制，力图使他们与奴隶的水平不相上下，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南方，自由黑人受到那些限制奴隶自由活动的类似法规的限制。很多州禁止自由黑人进入。弗吉尼亚、田纳西、佐治亚和密西西比等好几个州都要求自由的黑人进行登记，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其他州还要求黑人找白人做自己的监护人。所有南方各州都要求他们携带通行证，如果一个自由黑人被发现未带自由民证件，人们应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奴隶，并根据《逃亡奴隶法》使他重新为奴。

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州禁止黑人携带武器，只有少数被认为行为无可指责的自由黑人被准许拥有或携带武器，许可证每年发一次。到 1835 年，南方几乎各州都剥夺了自由黑人集会的自由，如果没有一个尊敬的牧师在场，他们就不能举行宗教仪式，他们的慈善团体和类似组织也被禁止集会。在马里兰就明确规定，自由黑人不能组成“学术团体、秘密社团、消防队或文学、戏剧、社会道德或慈善性质的协会”。自由黑人与奴隶的接触也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对职业也有限制。1805 年马里兰规定，自由黑人未经许可不得贩卖玉米、小麦和烟草，1829 年佐治亚宣布雇佣自由黑

人当排字工人为非法，1831 年北卡罗来纳要求白人黑人商人领许可证，南卡罗来纳禁止自由黑人当雇员，许多州禁止自由黑人出售酒精类饮料。^[44]阿肯色州走得更远，它在 1859 年甚至要求所有的自由黑人要么离开，要么重新沦为奴隶。

北部的自由黑人受到的法律限制比南方的自由黑人要少，但他们也根本得不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除了在新英格兰外，他们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纽约州在 1823 年通过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而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州分别在 1838 年和 1851 年，否认黑人男子的投票权。种族隔离制在北方和南方都得到发展。“黑人发觉他们完全被制度化地与白人分开了，他们要么被排除在火车、公共马车、轮船之外，要么被局限于‘黑人区’内；在剧院和讲演厅里，他们即便被允许坐在那里，也是单独在偏远的角落里；他们不能进入大多数的旅馆、饭店和疗养地，但作为仆人进去则可以；在白人教堂做礼拜时，他们只能坐在‘黑人席’上，领取圣餐也需等白人领过之后。而且，他们常常在隔离学校接受教育，在隔离监狱受到监禁，在隔离医院得到护理，在隔离公墓被埋葬。”^[45]

三 奴隶制对南部白人的影响

在奴隶制的统治下，受害最深者当然是黑人。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地区的白人的日子就好过。南部大多数人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但是，这些勤劳、独立、笃信上帝的南方农民人数虽然众多，却不足以与奴隶主阶级相抗衡；奴隶主人数虽少，却通过占有奴隶的劳动，控制了整个南方的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由于这个原因，南部的文明朝着适应奴隶制需要的方向发展。

奴隶主能占优越地位一是因为他们占有了最肥沃的土地。奴隶主出得起高价钱，可以有效地排挤自耕农，从而把那些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有人对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的 300 家农场进行过调查，

发现每英亩土地的价格随着农场规模的大小而变化。在面积为 1—50 英亩的农场，每亩土地价格为 7.2 美元；面积为 501—1000 英亩的农场，每亩的价格为 19.81 美元。两者相差一倍还多。奴隶主能占优势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中拥有土地的人的比例高于没有奴隶的白人中拥有土地的人的比例。1860 年，佐治亚州的“黑色地带”92% 的奴隶主拥有土地，而在没有奴隶的白人中，拥有土地的只有 58%。即使是在田纳西东部一带一般人认为是没有奴隶的白人占优势的地区，也是 95% 的奴隶主拥有土地，而没有奴隶的农民则只有 55% 拥有土地。^[46]

那些住在南方但远离种植园的人也同样受到奴隶制的影响，如城市工人。南方的劳动组织不如北方发达，这与奴隶制有相当大的关系。理查德·莫里斯指出，南方的“法庭公开敌视罢工工人”，因为许多南部官员认为“罢工与反奴隶制宣传一样，都是为了攻击他们的‘特殊’制度”。^[47]即使在官方影响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罢工也很难成功，因为工厂主随时可以雇用奴隶来代替工人，从而使罢工失败。1847 年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就发生过这种事。

没有奴隶的人在某些方面还起到了维护奴隶制的作用，成为奴隶制的帮凶。监视奴隶的巡逻队通常都是由白耕农组成的。法律规定所有危害奴隶制的南方人都会受到重罚，或被罚款，或被处死。南方各州都把发表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引起奴隶叛乱或产生不满情绪的文章或言论定为重罪，一名白人如与他人的奴隶发生亲善行为，也会受到重罚。

在这种处处维护奴隶制的情况下，南方人牺牲了思想自由，有时为了维持这个制度的一致性，还会采取强迫或流血的手段。19 世纪 30 年代时，各邮局的局长有权没收邮件中的废奴主义文学作品。在 1830—1860 年间，南部经常发生袭击和骚扰废奴主义者或反对奴隶制的印刷厂厂长和演讲人的事件。住在南方的北方人受到怀疑，有两名来自北方的教师住在南卡罗来纳，当局要求他们离

开，理由是他们出生在北方。当地一家报纸辩解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具有废奴主义或图谋暴乱的思想，但他们出生在北方，头脑里必然充满着与我们的制度敌对的思想。因此他们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也是值得怀疑的。”^[48] 密西西比大学的校长巴纳德虽然出生在北方，却是一位亲奴隶制的教育家，但由于生错了地方而受到怀疑，被迫离开南部。

一些出生在南部的人也难逃厄运。田纳西大学一位大学生因为阅读废奴主义文学作品，结果被发现，挨了 20 下的鞭打；19 世纪 50 年代一位弗吉尼亚男子由于反对奴隶制而被人扒光衣服并被绑在树上毒打，直到他答应变卖所有家产并离开弗吉尼亚为止。这种情况甚至也发生在任何一个被怀疑有反对奴隶制或其他非正统思想的人身上。在维护奴隶制社会的名义下，南部变成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交流思想的自由的社会。

四 黑人的反抗

黑人并不是一个甘心被奴役的民族，他们进行了自发的、英勇而顽强的反抗，怠工、罢工、逃跑、自杀、杀死暴虐的奴隶主等都是他们采取的方法。在整个奴隶制时期，总共有二百多次奴隶暴动。在自非洲内陆到海岸的途中，在风高浪急的大西洋上，在北美残暴的种植园里，到处都有黑人的英勇反抗。在 17 世纪末的时候，几内亚海岸埃尔米拉堡附近的一艘荷兰贩奴船上就发生了一起奴隶暴动事件，黑人们用一个铁锚砸开手脚上的镣铐，冲上船舱，打伤了水手。要不是法国船只和一艘英国船只碰巧路过而赶来帮忙，黑人肯定会控制这艘船。在这次事件中，共有 20 人被杀害。1730 年，贩奴船“小乔治号”载 96 名黑人由非洲起航。入海六天后，黑人砸断镣铐，举行起义，将船长和水手关进船舱，调转船头，驶回非洲，全部逃逸。1732 年，一艘从几内亚开往布里斯托的贩奴船上的黑人“发起暴动，杀死所有的船员，并砍下了船长的

头、双脚和双手”。^[49]1769年1月，停泊于西非纽卡拉巴尔的利物浦贩奴船“南希号”上的132个奴隶起义，岸上的黑人闻声赶来支援。1750—1788年，利物浦商人为了节省开支，减少了水手的人数，船上黑人起义的次数更多。据记载，1700—1845年，英美贩奴船上就发生了55起奴隶起义。^[50]

在黑人奴隶的反抗斗争中，黑人妇女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黑人妇女比黑人男子有着更多的行动自由：一是为了照顾她们的孩子，贩奴商允许黑人小孩在甲板上活动；二是为了方便从船长到厨师帮手的白人可以随时发泄他们的兽欲。行动更为自由的妇女常常被挑选为传递最佳进攻时间的联络人。谢拉·莱昂内（Sierra Leone）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妇女。

在殖民地，奴隶制得到法律初步承认后不到两年，弗吉尼亚的黑人就明显地表示不满情绪，并开始策划叛乱，反对他们的主人。1687年，当人们正在举行一个葬礼的时候，北部狭窄地带的一批奴隶谋划暴动，但这个计划未曾实现就暴露了。谣言不断传来，不同规模的暴动密谋被揭露出来。没有谋划叛乱的地方也普遍存在着不服从和违法的行为。到1694年，弗吉尼亚的奴隶已难以驾驭，以至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埋怨奴隶法规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这部法规那时已经制定得非常严密，足以对付奴隶的大部分活动；同弗吉尼亚一样，在马里兰，黑人对自己身为奴隶的身份感到愤怒，曾经发生过好几起奴隶杀死自己的主人的事件，黑人厨师毒死他们主人的事情也不止一起。1742年，有7个黑人因杀死他们的主人而被处死。还有其他一些黑人犯有纵火、偷窃财产、虐待牲畜等破坏罪；在南卡罗来纳，早在1711年就有谣传说黑人不听驾驭了。在1720年，和查尔斯顿附近的一次叛乱有关的几个奴隶被活活烧死，其余则被放逐。在以后几年里还发生过其他一些叛乱或叛乱的谣传。1739年，据查尔斯顿以西24英里的地方发生了有名的斯通叛乱。叛乱使整个地区骚动起来。奴隶们在杀死一个仓库的两名卫兵

并拿到武器后展开了全面斗争，企图摧毁那个地区的奴隶制。这次叛乱终被扑灭，但是经过了几天才解决。在叛乱中，有 30 个白人和 44 个黑人丧生，被俘 40 人。但有 10 人逃到了西属佛罗里达。在 18 世纪后期，还发生过另外一些暴动：佐治亚的奴隶没有发动暴乱，但他们仍然以逃亡佛罗里达和进行一些破坏活动来抗拒对他们的奴役；在新泽西，1734 年，东泽西县数百名黑人奴隶密谋起义，并拟逃往印第安人区，但因事泄未成功；在纽约，黑人公然蔑视政府当局，不服从法律。1712 年，纽约黑人难以控制的愤怒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有组织的叛乱。以枪支和匕首武装起来的 23（一说 25）名奴隶在一个果园聚集，放火烧了一个奴隶主的庄园，并同白人发生混战，结果有 9 个白人被杀，6 人受伤。随后，法庭对被控告的黑人进行审判，判处 21 人有罪并被处死。将近 30 年后，在 1740 年，由于黑人投毒造成水源污染，引起极大恐慌。在 1741 年，谣传将发生一场规模更大的叛乱。在一系列纵火案后，流传着这样一些谣言：黑人和贫穷白人正秘密策划破坏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并夺取这个城市的控制权。该市为逮捕阴谋分子不惜悬赏重金，近 200 个白人和黑人被捕或被告发。至少有 100 名黑人被判有罪，其中 18 人被绞死，13 人被活活烧死，70 人被流放。4 个白人，包括两名妇女也被绞死。以后虽然没有再发生大的叛乱，但到独立战争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经济上来看，使人沦为奴隶都是不可取的；新英格兰的奴隶制虽然并不严酷，而且人数一直比较少，但很多奴隶仍以逃亡表示对这一制度的不满和憎恨，其他一些人则袭击他们的主人，甚至把他们杀死。还有一些人密谋反叛。1658 年，哈特福德的一些黑人和印第安人决定谋取自身自由，破坏了主人好几栋房屋。18 世纪，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发生过多起密谋反叛事件。1723 年，波士顿局势如此严重，以至该市市政委员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防范措施，禁止奴隶夜晚上街，禁止他们“闲逛或鬼鬼祟祟聚在一

起”。^[51]

在独立战争期间，黑人奴隶的反抗更加活跃。他们首先是乘机大量逃跑。据不完全统计，13个殖民地从1775年至1783年间，逃亡的奴隶至少有10万人，占奴隶总数的1/5。佐治亚的1.5万名奴隶跑了75%，南卡罗来纳的11万奴隶有2.5万人逃跑，弗吉尼亚单在1783年就有3万名奴隶跑掉。^[52]

其次，奴隶也举行密谋、起义。例如，1775年，南卡罗来纳的皮特、波福特和克拉文三县的奴隶策划起义，但事泄失败。1776年宾夕法尼亚的巴克县和新泽西的特里屯县都发生了奴隶暴动。1780年，在纽约的奥尔巴尼，几名奴隶被判有阴谋叛乱和纵火罪。

第三，黑人还采取合法手段，利用独立战争中流行的“天赋人权”和“没有代表就不能征税”等原则和口号来维护、争取自己的权益。1777年1月13日，数名奴隶向马萨诸塞议会提交请愿信，要求恢复人身自由，他们就利用了“天赋人权”的原则。信中说：“在这个自由和基督教化的国土上，许多黑人被屈服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的这份请愿书仅说明，向你们请愿的人认识到，他们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享有获得自由的天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是造物主平等地赐予所有的人，不是以任何契约或协定可以废除的。一种残暴的权势之手，从他们亲爱的朋友中把他们拉走，有些人甚至从他们的慈祥的父母怀抱中被抢走。在违反自然法则和国际法的情况下，他们被从一个繁庶快乐的国土（非洲）夺走。在违反人类善良情感的情况下，如像牲畜一样，他们被带到这里（美国）卖掉，终身被贬为奴。……像你们的请愿者这样，一切赖以维系生活的社会权利被剥夺了的奴隶生活，其恶劣程度是生不如死的。……我们连续向州议会呈递请愿书，而且耐心地期待了很长时间，但一无所获。令人惊异的是：目前美国和英国所遇到的不愉快的困难（独立战争）中遵循的每一个原则，胜过千言万语，都是为请愿

人提供辩护的。因此，我们请求诸位及时慎重考虑我们的请愿书，使州议会通过法案，恢复我们的人类的自然权利。”^[53]

1779年，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等州也有黑人给州议会呈递请愿书，申明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在康涅狄格黑人呈送的请愿书中，黑人庄严宣告：“理性和（上帝的）启示都认为我们是上帝创造的，与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属同一血脉，同一亲缘；我们自认为与我们的主人有同样的资质，什么也不能使我们相信或怀疑这样一种论点：我们必须为他们服务，而不是相反。我们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多，我们就越加相信我们自由的权利……我们永远不会相信我们生来就是做奴隶的。”^[54]这种以理性、上帝的启示及其思考为基础的权利要求，否认白人为他们设定的天生为奴的框框，反映了黑人的觉醒。

1780年3月，7个黑人给马萨诸塞州议会呈递请愿书，要求免税。他们写到：“我们几个居住在达特茅斯城的穷苦的黑人和混血人谨提出申请如下：我们主要是非洲的血统。由于长期的奴役和严酷的奴隶制，我们跟我们的白人邻居不同，不能享受由我们所创造的利益，我们从父母继承财产的权利也给剥夺了。……最近违反这个国家的通常的习俗和惯例，对我们征收人头税，对于我们的辛勤劳动所得的、并用以养活我们自己家庭的小额财产，也要征收捐税。……在选举向我们征税的那些人时，不允许我们投票或施加影响，可是我们许多人为了保卫共同的事业而愉快地投入战场。……”^[55]

不过，在殖民地时期及独立战争期间，黑人和黑人奴隶的反抗多半是自发的，分散的或个别的，即使有一些密谋是有组织的，规模也很小，并且也因为计划不周详，缺乏组织、动员其他黑人奴隶的工作，鲜有能举事成功的。有一些密谋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一些黑人奴隶为了保护他们的主人免受伤害而告密，泄漏叛乱计划，从而导致行动流产。

第三节 废奴主义运动

一 废奴运动的发端

奴隶制度的残酷与惨无人道同基督教倡导的博爱精神和理性主义者的自然权利论都是格格不入的。在 18 世纪，奴隶制度便遭到这两种力量的攻击。1700 年，塞缪尔·休厄尔法官发表反奴隶制度的小册子《约瑟被卖记》，抨击奴隶贸易，反对奴隶制，要求给奴隶自由。以约瑟为例，休厄尔法官把约瑟的经历与人贩子联系起来，继而又把入贩子与奴隶主联系起来。他甚至超越一个清教徒对奴隶的不朽灵魂与道德福祉的关心，斩钉截铁地宣称：所有的人同为亚当后裔，都是他的共同的继承人，都有得到自由与其他舒适生活的平等权利。^[56]这是新英格兰对奴隶制本身发起的最直接的最早攻击之一。

到了 18 世纪中叶，反奴隶制度情绪在教会中逐渐占上风，贵格会领袖约翰·伍尔曼和安东尼·贝尼泽特等成为反奴隶制的英雄，在大西洋两岸都享有声誉。其他著名的宗教人士还有新英格兰的牧师塞缪尔·霍普金斯、埃兹拉·斯泰尔斯和杰里米·贝尔纳普。1754 年，伍尔曼发表《对黑人奴役的几点思考》，在英、美引起轰动，没有别的哪一份反奴隶制文件比这一份传播得更为广泛。在伍尔曼的作品中，虽然他的反奴隶制的理由主要是宗教上的，但是他也否认把肤色的不同作为奴隶制的正当理由。他认为“人的肤色并不能为他的权利和平等增点什么”。他还认为，黑人并不天生就比白人低下，如果教育得当，他们与其他民族是一样的。^[57]他的这一论点被安东尼·贝尼泽特所继承和发展。贝尼泽特成为殖民地最积极、最成功的鼓吹黑人权利的教会人士。

理性主义人士在反对奴隶制方面也不亚于教会。托马斯·杰斐逊本人是个奴隶主，但他又是个自然权利论者，他深信奴隶制是错

误的，并希望它最终被废除。早在 1769 年他就曾敦促弗吉尼亚议会解放奴隶。在《独立宣言》第一稿中，他形容奴隶贸易为一场反对人类天性的残酷战争，违反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最神圣的权利。杰斐逊写道：

“（英王乔治三世）一直残酷地向人性开战，他侵犯一个从未冒犯过他的远方民族个人最神圣的生活与自由权利，抓捕他们并将其运送到另一半球去充当奴隶，或者使其在运往该地途中悲惨地死去。这种本系异教徒权贵们之耻辱的征战，却成了笃信基督之大不列颠国王的战事，坚决地要保持开放一个买卖人口的市场，他滥用他的否决权力，镇压一切以禁止或限制这种万恶商业交易为目标的立法尝试。”^[58]可惜这一条文在正式文本中被删除了。后来，杰斐逊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谴责奴役非洲人的条款由于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的反对而被删除。这两个州从来没有打算停止进口奴隶，相反还希望继续进行。我想我们的北方兄弟也认为谴责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他们那里尽管拥有奴隶的人很少，但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从事买卖奴隶的贸易。”不过，《独立宣言》的最后定稿本身对早期的反奴隶制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其中的天赋人权的信念就是与奴隶制度格格不入的。

1764 年，波士顿的詹姆斯·奥蒂斯在名为“英属殖民地据称和确证的权利”小册子中谴责奴隶制度，肯定了黑人对自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纳撒尼尔·阿普里顿在 1767 年也写道，因为人对“自由的天然权利”，他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8 年后，托马斯·潘恩发表了“美洲的非洲人奴隶制”一文，认为奴隶制比“谋杀、抢劫、淫荡、野蛮”更不道德，应该坚决予以废除。

《独立宣言》给了反奴隶制的人们最好理论武器。有一个署名为“黑人”的记者这样问道：“是不是当黑人享有天然权利时，这些权利便不复存在？”“美国人内心的爱国主义与叛国是不是可以和谐共存呢？”^[59]

1775年，贵格会的安东尼·贝尼泽特与托马斯·潘恩等人联合一起在费城组织了宾夕法尼亚州促进废奴和救援被囚禁自由黑人协会，从此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奴隶制活动。在革命期间，这个组织不怎么活跃。但在178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当选为协会主席后，这个组织便活跃起来，充满生机。其他地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1785年纽约州解放奴隶协会成立，由约翰·杰伊任主席。到1792年，从马萨诸塞到弗吉尼亚，每个州都成立了反奴隶制协会。1794年，促进与改善非洲人境况的年会开始举行，这是各个协会的一个松散联合会，此后35年一直从未间断。各个协会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废奴，如向州立法会议请愿，鼓励学校的黑人教育，发表反奴隶制的文章，帮助处于1793年逃奴法威胁的自由黑人，抗议非洲的奴隶贸易和帮助逃奴逃跑等等。

在独立战争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奴隶们自己在亚伯萨拉姆·琼斯、普林斯·霍尔、威廉·卡夫等人领导下也卷入到斗争中。他们指出奴隶制与《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不相符合的，他们要求自己在革命中应得的报酬：自由。因为黑人自己曾经为这种争取自由的斗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战争期间除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外，其他州均征召过自由黑人和黑人奴隶入伍。在革命军里，黑人不光担任传令兵和勤杂工，而且和白人士兵并肩作战。在服役的5000名黑人士兵中，绝大部分人战斗在与白人混合的团里。^[60]如果打着反奴役旗号的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新兴的国家自己却是黑人民族的压迫者的话，那就很矛盾了。黑人自己也组织起来抵制奴隶贸易。在新英格兰，他们甚至向立法机构请愿要求解放，如早在1773年1月，由“许多奴隶组成的团体要求马萨诸塞州议会把他们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61]桑博·弗利曼、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切斯特·乔伊呈给汤普森市市议会的请愿书中说，他们受到反奴隶制的平等正义力量的鼓励，不得不期待该议会能在以往已经作出的摆脱奴隶制的努力基础上，对黑人奴隶的悲惨

处境加以认真考虑，“并使我们从中得到解放，作为人，我们对此享有天赋的权利”。^[62]

在 18 世纪末，奴隶制似乎是一种正在逐渐消亡的制度。在宗教和理性的基础上，过步的思想舆论已在北方和南方谴责这一制度。南方和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并未产生分歧。在北方，由于各种反奴隶制组织的鼓动，人道主义思想广为传播，同时也由于经济上奴隶劳动已不占重要地位，在这种有弊无利的情况下，各州终于普遍废除了奴隶制。1783 年，马萨诸塞州法院判决奴隶制违反 1780 年宪法，因为其中有“人人生而平等”的字眼；新英格兰各州在随后的两年内相继废除了奴隶制，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奴隶制也一样难逃厄运。宾夕法尼亚在 1780 年采取逐步解放的措施，纽约州在 1799 年，新泽西在 1804 年相继步其后尘。

在南方，反对奴隶制的观点由于很多地区的证据表明奴隶制已变得无利可图而得到加强。很多奴隶主在他们的遗嘱中留下释放奴隶的遗言，逐步解放奴隶的方案在马里兰、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议会也得到讨论，但没有成功。不过南部的形势似乎也令人乐观，如果假以时日，这些地方也有机会废除奴隶制。因为南部的奴隶制不仅遭到开国元勋如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等南部领导人的反对，使用黑人奴隶的种植园所产的农作物烟草的经济价值到 18 世纪末由于市场不稳和地力耗尽也越来越低，于是他们改种小麦和其他农作物。对于这样多样化的农业来说，奴隶劳动力是很不适应的。许多大地主发现他们处于类似乔治·华盛顿的困境中。华盛顿拥有的奴隶比他有效使用的要多的多，但是他又有顾虑，除了在家庭中使用外，他反对出卖奴隶。这就为早日结束奴隶制增添了新的希望。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自由思想和经济利益这两方面的因素沿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人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信念与奴隶制并存的反常现象将很快就会结束，这也是多数人希望看到的情形。

在联邦一级，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也取得一些进展。1787年国会通过《西北法令》，禁止在俄亥俄以北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或强制性劳役。这是战后反奴隶制运动的顶点。国会还通过法令规定，在1808年1月1日后禁止从外国进口奴隶。

在1808年后，反奴隶制运动沉寂了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改革派人士认为，禁止奴隶贸易是关键性的胜利，奴隶制会逐渐消亡。但这种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因为随着自然增殖，奴隶人口会继续增加，同时非法奴隶贸易也没有完全禁绝。另外，出人意料的是，18世纪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解放，而在19世纪却有利于蓄奴了，这主要是由于棉花王国的兴起。

在美国，如同在英国一样，历史的进程由于省力机器的发明而得以改变。1768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和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正式投入使用，掀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浪潮。此后工业革命从英国蔓延到大西洋两岸。1784年，英国棉纺机第一次进入法国，1791年，塞缪尔·斯莱特在罗德岛建成第一座美国棉纺厂。不过，在19世纪末期以前，这场革命的中心始终在英国，18世纪最后30年棉纺织业“从一个很小的行业扩展到英国工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63]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完成以前50个人在相同时间内完成纺纱或织布的工作。其直接的结果是刺激了对原棉的需求。从1800—1860年，英国的棉花消费量从5200万磅猛增到10亿磅以上，即增加了17.23倍，几乎平均每年增加5%。因为英国本身并不产棉花，所以只得靠进口。英国进口的棉花在1775年总计不过500万磅，1790年为3144.8万磅，到1800年，已上升到5601万磅。^[64]1790年以前，这些货源主要来自地中海国家、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美国在棉花贸易中根本没有份，棉花本来也不是一种重要的美国农作物。虽然棉花在南部种植园也被广泛种植，以用于家庭纺织，但通常种植的是短纤维棉，并且不容易脱籽，因而在销售上几乎无利可图。

大约在 1786 年，在佐治亚海岸的种植园开始试种在巴哈马得到的棉种。这种棉花被叫做“海岛棉”，其纤维长且棉籽光滑，因而容易脱籽。棉籽可以用西印度群岛制造的一种轧滚式轧棉机剥离。虽然这种棉花纤维较细易断，需要细心处理，但海岛棉仍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在英国售价很高。从 1790 年到 1801 年期间，海岛棉种植面积急剧扩大。然而，只有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沿海气候条件特殊的地区才能种植，在广大的内陆高地海岛棉无法生长，不过那里倒是很适合短纤维棉的种植。南部种植园主真心希望能有哪一个技工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够把短纤维棉也很容易地脱籽，使他们的棉花能在英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1792 年，佐治亚州甚至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轧棉机发明的相关问题。但种种试验均告失败。

南部种植园主的愿望终于在来自康涅狄格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身上实现了。这个刚刚从耶鲁毕业的学生名叫伊莱·惠特尼，他本来想到南方谋一个教职，但发觉已没有空缺，于是他接受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手下的军需官纳撒尼尔·格林将军的遗孀的邀请，到她的佐治亚种植园做客。在那里他了解到短纤维棉的问题，并开始做实验，终于在 1793 年完成了其著名发明。他把很多像豪猪刺一样的金属尖钉钉在一个木制圆筒上，使圆筒沿着靠近钉有板条的棉花箱侧面旋转。金属尖钉挑起棉绒，留下棉籽。另外一个旋转刷把尖钉上的棉绒打下，轧棉机的基本原理就这样被他发现了。惠特尼本来希望把他的发明申请专利，并收取轧棉机的使用费而致富，但这种机器太容易被技工仿制了，无法垄断，因而他也就未能因此致富。

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即使用人工操作，每天也可以轧棉 50 磅，使用水力，则可以轧棉 1 万磅。这使得南部各州，主要是在佐治亚西部、南卡罗来纳以及西部新开发的地区，都扩大棉花种植，种棉成为有利可图的事。到 1810 年，短纤维棉的出口已达海岛棉的

10倍。

由于产棉区气候不利于健康，要靠奴隶的劳动。在灼热的阳光下耕地、种植、间苗、除草和采摘等活，如果白人不得不干的话，他们也可以干，但他们更愿意让黑人去干。另外，这种劳动单调沉闷，基本上是简单劳动，可以由在少数监工指挥下干活的一队队奴隶令人满意地完成。

南部对奴隶制问题再不能漠不关心了。产棉区白不必说，那些非产棉区也是如此。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和北卡罗来纳等地很少或根本不种棉花，它们只在烟草、小麦和大麻等种植园使用奴隶，这时对奴隶制的兴趣也陡然大增，因为它们发现可以把多余的奴隶卖给各植棉州，从中牟利。它们就因此成为输出奴隶的基地。南部各州由于情感和经济的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保护奴隶制就成了保护一项重要利益，整个南部诸州为了这一重要利益而团结在一起。奴隶制在南部死灰复燃，而且比以前烧得更旺。种植园主一心一意想尽快获利，把种植园和奴隶当成了摇钱树。

甚至在 1808 年以前，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国内奴隶贸易就已经很兴旺了。像南卡罗来纳这样一些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的州，却允许它们的公民从其他州购买奴隶，因而大大促进了州际奴隶贸易的发展，这种州际奴隶买卖逐渐成为赚钱的行当，结果奴隶的财产价值提高。在内战前，奴隶价格虽然有涨有落，时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根据 C·菲利普斯的研究，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奴隶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到战争结束时下降才终止。18 世纪末，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田工的价格大约是 300—500 美元。1790 年代中期至 1812 年，奴隶价格逐渐攀升，如 1808—1810 年间新奥尔良的奴价高达 900 美元，两年后因为第二次美英战争爆发，又降到 300 美元，但战争结束后很快回涨，在查尔斯顿为 900 美元，在新奥尔良升到 1100 美元。以后略有回落。1830—1837 年，奴价第三次上扬，一个田工售价在 1000—1200 美元之间，之后又出现回落，到

1845 年时平均只有 600 美元。南北战争前，由于奴隶劳动力严重短缺，奴价最后一次上涨，到 1860 年涨至 1200—1800 美元之间不等，平均为 1500 美元。^[65]这使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反奴隶制的思想感情在 19 世纪以后遭到很大破坏。

1808 年官方禁止从非洲贩运黑人奴隶以后，国内奴隶买卖就更有利可图了。经营这一贸易的机构纷纷建立，替代或补充非洲人口贸易的制度。国内奴隶贸易成为全国性的一项经济活动，巴尔的摩、华盛顿、里士满、诺福克和查尔斯顿是老州中主要的贸易中心，而蒙哥马利、孟菲斯和新奥尔良则是新地区的贸易市场。虽然华盛顿不是最大的奴隶市场，但在 1850 年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贸易之前，它一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奴隶市场。上南部和下南部各城市都设有为奴隶贸易服务的奴隶棚、牢房和其他必要设施。各报社也以各种方式与贩奴商合作，它们不仅为他们提供广告手段，而且还经常接受他们的订单，充当买方与卖方的中间人。报纸上的奴隶出售或出租及其需求广告几乎每天都有。以下仅仅是从那时的报刊上选择的几个例子。1838 年 12 月 27 日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文摘报》的出租广告说：“60 名黑人，男女都有，有意在 1839 年出租。需要者请与 H·亨德伦联系。”1838 年 5 月 19 日的南卡罗来纳《哥伦比亚望远镜报》刊登这样一则需求广告：“需要雇用 12 到 15 名黑人女孩，年龄在 10 到 14 岁之间。他们的被雇用时间为两到三年。E.H.&J·菲希尔。^[66]

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是最大的出口基地。在这两个地方，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商人或他们的代表奔走乡间，到处搜寻他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到棉花王国种植园的奴隶。像马里兰州的伍尔福克、桑德斯和奥利弗公司以及弗吉尼亚的富兰克林和阿姆菲尔德公司，它们所经营的奴隶生意十分兴隆。这些贩奴巨商每年能把几千名奴隶从不需要他们的地方贩运到迫切需要他们的另一个地方去，因此，公司职员无不大发其财。为增加奴隶的来

源，许多奴隶主有计划地繁殖奴隶。奴隶女孩一般在 14 岁时均已被迫做了母亲，这样到她 20 岁时，就有可能已生育了 5 个孩子。对于多产的母亲，奴隶主会给与奖金或自由，因为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就值 200 美元。道格拉斯的祖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奴隶繁殖使弗吉尼亚在 1832 年的时候，可以每年输出 6000 名奴隶。托马斯·迪尤把弗吉尼亚称之为“繁殖黑人的州”一点也不过分。^[67]

美国从 1791 年到 1795 年间平均每年只生产棉花 520 万磅，而到 1811 年与 1815 年间年均生产量即达 8000 万磅，1831 年至 1835 年间增至 3.98 亿余磅，1851 年到 1855 年间更增至 12.94 亿余磅。植棉区也由佐治亚、南卡罗来纳等地扩展到西部新发展区密西西比（1817 年 12 月 10 日建州）、路易斯安那（1812 年 4 月 30 日建州）、亚拉巴马（1819 年 12 月 14 日建州）等地，1820 年，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生产了全国一半的棉花，但到 1850 年，亚拉巴马的产量已跃居第一，佐治亚退居次席，密西西比第三，南卡罗来纳第四。^[68]

棉花主要是一种为出口而生产的作物，尽管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美国工业革命也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但是，到 1859 年，美国生产的棉花只有 1/5 用于美国，一半多的棉花销往英国，其他则销往欧洲大陆。棉花出口额显著增加，占美国出口总额的分量也在增加。1849 年 6 月 30 日至 1850 年 6 月 30 日，美国棉花出口占全国出口量的 1/2，达 7198.4616 万美元。1860 年，美国出口总额为 33357.6 万美元，其中棉花占了 19180.7 万美元。^[69]棉花最终成为南部各类作物中的首要农作物，并在美国出口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南部获得“棉花王国”的称号。这一称号由于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M·哈蒙德 1858 年在美国参议院的著名讲演而传播开来。哈蒙德狂妄地宣称：“人们不敢向棉花开战，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开战，因为棉花就是王（cotton is king）。”^[70]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奴隶制已在棉花种植园取得稳定的地位，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位于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梅森—迪克逊线成为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分界线，南北由此分道扬镳，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给国家和整个南部的未来投下了阴影。

南部原来并不为奴隶制做辩护，只是把它当作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以默认罢了，而且在道德上还觉得它是一种罪恶。但是，在棉花王国兴起的时候，南部奴隶主的代言人不再为奴隶制道歉，他们声称奴隶制与国家的繁荣息息相关，对白人和黑人都有好处。奴隶制不是民主的对立物，而是它的条件。卡尔霍恩从一开始就定下这样一条公理：除非社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依靠他人的劳动过活，任何富裕和文明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他举英国和美国为例说，在英国有了阶级意识，在美国北部各州有了选举权和白人工资劳动者，正在威胁富裕和文明。英国的宪章运动和美国的工会主义证明，凡是有劳工自由的地方，都不可能保持社会安定。欧洲和美国北部重建奴隶制为时已晚，唯独美国南部很幸运，天意送来一个被上帝注明心智和形体低劣、专为给上帝的选民充当伐木工和提水人而创造出的种族。作为回报，仁慈的主人供给奴隶们一切合理的需要，使他们免于经常缠绕白人无产阶级的那种对苦难和贫困的恐惧。主人们由于摆脱了体力劳动和卑微的竞争，便会达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所梦想的那种智慧上和精神上的高超卓越。“南部很多人一度认为，奴隶制是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桩祸害。这种愚蠢的想法和错觉现已消失。我们现在对它有了正确的认识，将它看做是在世界上建立各种自由制度的最安全和最稳定的基础。”^[71]

到这时，18世纪成立的许多自愿释奴组织此时已得不到公众的支持，许多州还禁止释奴组织活动。1816年弗吉尼亚的乔治·波利牧师就因发表“《圣经》与奴隶制的不可协调”一文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而被逐出该州，他只好到北方去施展抱负。^[72]虽然到1829年，来自各州和地方的代表一起组成了“全美废奴组织代表

大会”，但他们的影响实际很小。

激进废奴运动沉寂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的出现。它混淆了奴隶制的根本问题，分散了反奴隶制的力量。它主要是一场由南部贵格会支持的、小规模解放奴隶的运动，主张逐步给自愿释放奴隶的奴隶主补偿的方法和把自由黑人向非洲移民的办法来解决奴隶制问题。这种把黑人送出美国的想法早在 1714 年就出现了，据说是新泽西的一个居民提出建议，把黑人送回非洲。后来这一想法并未消失，一直延续下来。在独立战争刚刚结束时，塞缪尔·霍普金斯和埃德拉·斯泰尔斯牧师就讨论了实现这种设想的可能性。1777 年，弗吉尼亚立法会议在托马斯·杰斐逊的领导下，讨论了一个逐渐解放奴隶并把奴隶输送出境的计划。好几个解放奴隶组织，如康涅狄格解放协会曾把移植自由黑人作为自己的目标。1815 年，保罗·卡夫自己出钱把 38 个黑人送回非洲，从而把移植黑人付诸实践。它表明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的，同时也说明有一些自由黑人确实愿意离开美国。

卡夫的行动激发起人们对移植黑人的巨大热情。1816 年 12 月 28 日美国自由有色人移民协会在美国众议院大厅正式成立。在协会的领导机构中南部人占据主导地位，其中著名的人士有安德鲁·杰克逊、亨利·克莱和布什罗德·华盛顿。他们给了协会很高的声望。出于对黑人的偏见，当时很多反奴隶制的人士，包括后来成为激进废奴主义的人士如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阿瑟·塔潘和刘易斯·塔潘以及格里特·史密斯都支持这个协会，认为它提供了解决奴隶制的最好办法。

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在州和联邦的支持下，很快制定了在非洲建立一个黑人殖民区和教育公众支持这一方案的计划。它还派出代理人筹集资金，并说服自由黑人移居利比里亚一块购得的土地，其首府以总统门罗的名字命名。不久，这个协会就为租用和运输黑人的船只筹得数千美元。到 1832 年，已有十几个州议会认可这一协

会，甚至包括马里兰、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等蓄奴州。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和其他一些地方还建立了地方性的移民协会。

但是，移民协会的活动并不成功。1822年，第一批自由黑人在非洲西海岸的利比里亚建立殖民地。尽管到1833年，北部已有97个地方殖民分会，南部有136个，但协会总共才殖民2885人。^[73]这主要是因为自由黑人拒绝被赶出家园，他们也不愿因为自己移民而让自己的同胞留下由奴隶制蹂躏。黑人懂得移民协会对解放黑奴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在于把闹事的黑人运出这个国家，以此加强他们对还在奴隶制下的那些人的控制。^[74]

在移民协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里士满和费城的自由黑人就宣布反对以遣返的名义所进行的殖民活动。到1831年，黑人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大会宣言中宣布：“本大会以我们卑微的意见特别提醒那个可敬的组织（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注意，……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这个白诩为自由的土地上，以非基督的行为追求使奴隶制永久化的道路，作为为这个制度的建立而流过血的公民和人，我们将以动情的方式请求他们停止，如果我们必须成为他们哲学的牺牲品，我们宁愿死在国内……”^[75]

除了黑人的反对之外，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也无法弄到足够资金和交通工具来迁移所有几十万自由黑人，更不必说安置他们的费用了。运输和维持几十万人的生活费用，即使不要几十亿也要好几百万美元；而且支持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多，也使它没有成功的机会。此外，移民协会的支持者其想法也千差万别，他们很难制定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计划。有些人倡导移民是希望结束奴隶制，使黑人重返故土；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确信黑人的确不适应西方文明，他们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要好一些；还有的人认为拓殖非洲是把基督文明传播到非洲去的机会；奴隶主则想撵走自由黑人，使奴隶制更加牢靠，因为自由黑人的存在对奴隶制是一个威胁，奴隶主对奴隶制的辩解的一个根据是说黑人是低劣民族，生来只适合做奴

隶，而白人黑人的存在实际上是对此进行了否定。这种同床异梦的动机组合，注定移民计划必然失败。虽然作为一项事业，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前期，但它致力于把黑人移出美国的希望却是完完全全告吹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输送出去的黑人总共不到 1.5 万人，其中大部分——将近 1.2 万人是由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做工作而迁出的。

二 激进废奴运动的复活

废奴运动沉寂局面终于被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三件事所打破，预示着一场新的反奴隶制运动高潮的来临。这三件事是戴维·沃克出版的《呼吁书》、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出版的《解放者》报和特纳起义。

沃克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自由黑人，1785 年出生，后来移居波士顿，以出售旧衣服为生。1829 年 9 月，他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沃克向全世界有色人种公民，特别向美国有色人种公民发出呼吁——四节分论加一篇序言》。这篇论文是在美国印发的对奴隶制最有力的谴责之一。他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把白人奴隶主称为天然敌人，号召黑人们起来扔掉奴隶制的枷锁：

“我们是人！！我问你：我们是人吗？当初我们的造物主就把我们造成像我们现在这样和粪土一般的奴隶吗？他们不是和我们一样都是走向死亡的虫豸吗？我们怎么能对一伙我们说不上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谦恭柔顺，我从未想过……美国对我们来说与对白人相比，更像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用自己的血和泪使它富饶起来。整个美国最大的财富都来源于我们的血和泪。而他们却把我们从我用自己的鲜血挣来的财产和家园中赶出去。”^[76]

沃克的呼吁用《独立宣言》为结束语，号召黑人起来反抗主人的压迫，必要时使用武力。沃克对黑人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对白人发出警告说：“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们必须、也必将获得自由。你

们尽管使出一切本领来让我们继续处于悲惨、不幸的地位，谋求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孙发财致富，但上帝将会把我们从你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如果我们不得不通过反抗获得自由，那么等待你们的将是灾难，灾难。”^[77]

读到这位黑人的呼吁，全国都为之震惊，奴隶制问题再一次引人关注。沃克本人把自由看得比死更为重要，他在呼吁书中还特别提到，如果谁奴役他、谋害他的话，“我并不把生命看得对于我有多宝贵”，他写道，“我随时准备献身”。1830年6月28日，在这份呼吁书第三版印行后不久，沃克被发现死在其商店的门廊里。^[78]

沃克武力抵抗思想的追随者就是我们所称的暴力派或物质抵抗派。这一思想后来被特纳和布朗先后付诸实践，极大地震撼了美国社会，加剧了亲奴隶制与反奴隶制人们之间的对立，动摇了奴隶制统治的基础。

不过，沃克的暴力革命思想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在这次废奴运动初期影响更大的思想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所倡导的道德说教。1831年1月1日，加里森在波士顿出版《解放者》周报，宣布不给主人补偿而立即废除南部奴隶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因为在1827年黑人的《自由报》已提出了这一主张，但他是第一个为这一目标发动一场有组织运动的人。加里森曾给20年代的废奴派人士伦迪的报纸《普遍解放的时代精神》做过助手，正是在这种工作中，加里森对奴隶制问题开始感兴趣。最初他只是从宗教上来考虑的，认为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在目睹奴隶制的残酷后，他变成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曾因对一位住在新奥尔良运送奴隶的船长说了几句大不敬的话而被关押了七个星期，这无疑加深了他对奴隶制的仇恨。后来，他不满伦迪的逐步解放和给予奴隶主补偿的主张，对殖民黑人的主张也由支持转为反对。最后，他便离开伦迪转而自己单独办报。

在《解放者》创刊号上他援引《独立宣言》的话，声称黑人和

白人同样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认为立即和无条件解放是解决奴隶制的唯一办法。他用激烈的言词向奴隶制提出挑战，用辛辣的语言为这场新的运动定下了调子。他说：

“我赞同美国独立宣言所主张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将为我国的被奴役人们的立即解放而斗争。1829年7月4日，在公园街教堂所作的一次关于奴隶制度的演讲中，我曾考虑不周地赞成了广为流传但却是有害的逐步废弃奴隶制度的主张。借此机会，我要完全地、毫不含糊地收回自己的那一主张，并以此公开请求上帝、我的祖国和我的可怜的奴隶弟兄们的宽恕，宽恕我曾经表达了如此怯懦、不义和荒谬的思想感情。就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于1829年9月在巴尔的摩《普遍解放的时代精神》报上发表。现在我的良心得到了安慰。

“我知道，许多人反对我用这种严厉的言词。但是，我这样严厉不是事出有因吗？我决心直言不讳地说出真理，我决心毫不妥协地坚持正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论是思考、演讲或写作，都不愿搞中庸之道。绝不！绝不！人家的房子着火了，你能叫他慢慢报警吗？老婆落在了强奸犯手里，你能叫丈夫从容去救吗？婴儿掉进火里，你能叫母亲分几步把婴儿抱出来吗？请别劝我在当今这个事业上奉行中庸之道。我是认真的。我不会模棱两可，我不会宽恕，我不会后退半步。我将被大家所了解。……”^[79]

这样，加里森便成了非暴力激进废奴主义运动最雄辩的代言人。在许多人的眼里，加里森成了废奴主义者的化身，南部对他的激烈言词很感愤怒。有人甚至把他与特纳起义联在一起。实际上他与此毫无瓜葛。1831年9月的纳特·特纳起义更加剧了亲奴隶制力量与反奴隶制力量之间的对立。1831年10月31日，费城激进的黑人改革家詹姆斯·富顿欣喜地写道：特纳起义将加强反奴隶制的

力量，“把奴隶制的罪恶更明朗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震颤的时代，每天都有来自国内外的为自由而浴血斗争的消息。向前，向前成为口号！”^[80]

为了把自己的原则付诸实施，加里森开始了组织建设的工作。1832年他在波士顿组织了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第二年在费城又成立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协会重申了《独立宣言》所确认的原则后，公开声明的目标是要使所有的公民都相信，“上帝把蓄奴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立刻释放奴隶而且不驱赶他们出国，是各有关人士的责任，既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又符合大家的最高利益”。^[81]协会还宣称，它也将致力于改变对黑人的歧视，促进黑人自身素质的提高。“通过鼓励有色人种改善其智力、道德和宗教信仰状况，通过去除公众偏见，来提高有色人种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境况，从而使他们得以按其才、德与白人平等地分享公民和宗教信仰的权利。”不过，协会坚决反对被压迫黑人以暴力来维护他们的权利。^[82]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工作进展顺利。在成立后不久，加里森就与英国的乔治·汤普森、丹尼尔·奥康纳、托马斯·克拉克逊以及其他废奴主义者携起手来，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取得国际反奴隶制人士的关注。在国内，加里森也争取了许多热心的男男女女，其中著名的有温德尔·菲利浦斯、阿瑟·塔潘和刘易斯·塔潘兄弟、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斯蒂芬·福斯特、西奥多·D·韦尔德、伊莱贾·洛夫乔伊、格里特·史密斯、西奥多·帕克、卢克丽霞·莫特、格里姆凯姐妹以及其他知名人士。黑人在其中也享有领导权，成立委员会有好几个黑人，在“陈情宣言”上签名的62个人中有3个黑人，执委会中有马萨诸塞州的詹姆斯·G·巴巴多斯，纽约的彼得·威廉姆斯，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帕维斯、詹姆斯·麦克鲁姆、约翰·B·沃什和亚伯拉罕·D·肖德。

美国废奴主义人士以他们的虔诚、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废奴事业而工作，他们或通过演讲、募捐集会、请愿，或通过出版报

纸期刊，或通过散发传单、小册子和漫画等方式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以唤醒美国人的良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废奴主义势力稳步增长。1834年，只有60个分支协会，1835年5月就增至200个，1836年5月达527个，1837年7月跃升到1000个，1838年为1350个，到1840年更达到2000个的高峰，成员达20万人。^[83]

反奴隶制活动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南方各州的立法机构不仅在南方禁止反奴隶制宣传，还要求北方各州政权采取类似的措施。南方邮局局长拒绝分发通过邮局寄来的“煽动性”文学刊物。邮政总长也默认了这一举动。南部在国会的代表则竭尽所能，阻挠任何反对奴隶制的请愿或建议在国会通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代表平克尼更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所谓的“平克尼钳口法”，并于1836年5月26日在奴隶主的操纵下，以117票对68票获得通过，公然向美国民主和人权制度进行挑战。该提案声称，任何向国会递送的请愿书既不许宣读，也不许印发。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众议院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无奈孤掌难鸣。北方一些知名人士还率领暴徒冲击废奴运动的集会，威胁要处死废奴派的领袖。伊莱贾·洛夫乔伊就是被捣毁他的印刷所的一群暴徒杀害的。不过废奴派和广大人民不畏强暴，对这一法案进行了坚决斗争，持续八年，仅在1838年1月，就有300万人签名的60万份请愿书涌向国会。^[84]这条不得人心的法案终于在1844年12月3日被国会废除。

反对任何形式的反奴隶制宣传的情况在北部也同样存在。弗蒙特圣公会的约翰·霍普金斯主教反对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因为他深信，黑人当奴隶的处境比做自由人好。对同情黑人事业的人，他们也不放过。在康涅狄格州，一个教友派女教师在加里森和刘易斯·塔潘等废奴主义者帮助下建立一所黑人女子学校，市民们便砸碎学校的窗户，辱骂教师，还以违反禁止教育非该州居民的黑人这条州法律为由使她被逮捕了。

不过，迫害不仅未能扼杀废奴运动，反而使更多的人投身到废

奴的行列。温德尔·菲利普斯这位波士顿的名门之后就是在看到加里森被游街后才毅然决定支持反奴隶制事业；格里特·史密斯也是因纽约尤蒂卡的一次释奴集会冲散而愤然投入反奴事业的；萨蒙·P·蔡斯则是在看到辛辛那提的暴徒砸毁詹姆斯·G·伯尼的报馆后才变成废奴主义者的。“钳口法”的实施使更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他们的请愿权受到威胁，因此，“钳口法”反而把一些不是很支持反奴隶制事业的人推到反奴隶制事业同盟者的队伍。

美国反奴隶制事业顶住了敌人的攻击，却无法制止内部的分裂。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一场新的反奴隶制运动集体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只是在运动初期，为了对抗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的活动，他们才在相信“渐进主义”无效性这一共同点上团结一致，以开创废奴运动新局面的。但随着运动深入，隐含其中的矛盾便暴露出来，终致无法再在一起工作。1840年，由于对加里森的不满以及策略上的分歧，废奴主义队伍出现分裂，反对者另外组织了“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他们主张政治行动解决奴隶制问题，同时，他们也不放弃道德说教。这一派成为政治行动派。

分裂后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加里森领导下则继续坚持用道德说教作为解决奴隶制的方针，他们继续通过演讲、报纸、书籍和小册子进行宣传鼓动，反对政治行动。由于加里森谈论国事时极端化，指责美国宪法是“同死神签订的契约，与地狱达成的协议”，要求解散联邦，使得其追随者也难以接受。结果他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少，1840年后他的影响仅限于新英格兰。

这次分裂无疑削弱了废奴运动的力量，使运动的元气大伤，但另一方面，由于运动的主体由单纯的宣传鼓动转向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为40年代的反奴隶制斗争开创了新局面，从整体上提高了运动的水平。^[85]

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则积极参加政治行动，他们在1840年和1844年大选中组成自由党，推选詹姆斯·G·伯尼为总统候选

人。虽然竞选失败，但却为以后共和党的胜利提供了借鉴。

废奴主义运动除了要消灭南方奴隶制外，还致力于消除北方的种族成见，这种成见丝毫不亚于南方。尽管有一些人强烈反对，但一些州公立学校还是向黑人敞开了大门，还有一些州建立了慈善性质的特殊学校。鲍登学院和奥伯林学院率先接纳黑人学生。在反奴隶制集会上，黑人也有了公开讲话的机会。

废奴运动是一场以激进中小资产阶级为领导的、以立即废除奴隶制为宗旨的群众性改革运动，也是一场强大的宗教运动，是席卷欧洲和美国北部的规模更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个运动在许多方面同和平运动、妇女权利运动、禁酒运动以及其他同时发展起来的改革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持续猛烈地冲击奴隶制达 30 年之久，为奴隶制的最终覆灭和黑人的解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从法律上宣布废除奴隶制要等政治行动的条件成熟才行。但废奴主义者并没有静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们尽可能使更多的奴隶得到解放，“地下铁路”成为他们最热心的工作，1850 年的逃奴法在北部根本得不到执行，反奴隶制的群众经常从联邦官员手里把黑人抢出来，逃亡奴隶得到人身自由法的保护。南部奴隶主对此十分恼怒，却也无可奈何。他们加快了脱离联邦的步伐，而北部则在朝政治废奴的方向前进，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将团结在共和党的周围，与南部奴隶主一决雌雄。

第四节 从奴隶到自由

一 出生之谜

废奴运动给了处在奴隶制度下的人们以希望之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是在这一线光芒的指引下，摆脱奴隶制的桎梏，获得自由的。

道格拉斯的出生至今仍然还是一个谜。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发

现，跟白人小孩不同，大多数黑人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他自己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生日犯愁。他只能根据主人的谈话，大概地猜出他可能出生在 1817 年，因为“1835 年时，我听主人谈过，我大约 17 岁”。^[86]1845 年，道格拉斯写道：“即使在童年，对自己的身世缺乏了解便已经使我闷闷不乐。白人的孩子都讲得出他们几岁，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这个权利就应该被剥夺。我是不许向主人问这些事的。在他看来，奴隶提这种问题不合适、不规矩，这就是不安分的证据。”^[87]以后他一直寻求这个答案，直到 1880 年，他返回塔波特县与老主人托马斯·奥德重逢时，他仍念念不忘提这一问题。奥德十分肯定他的生日是在 1818 年 2 月的某一天，但道格拉斯仍不相信，他认定自己应该比这大一些。不过，根据普雷斯頓的研究，道格拉斯的生日应该是 1818 年 2 月，而不是通常所说的 1817 年 2 月。因为普雷斯頓从道格拉斯的主人安东尼家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记载其家庭所有奴隶出生的文书，上面写道：“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哈丽特之子，1818 年 2 月生。”^[88]这是唯一一份对道格拉斯生日有文字记载的材料。

不仅对自己的出生，就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道格拉斯一辈子也没弄明白。年轻时，他听奴隶们私下说，他的主人艾伦·安东尼就是他的父亲，他当时将信将疑，但长大后他对此越来越怀疑，这从他的几本自传中可以看出。1845 年他在《道格拉斯自述》中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白人。每逢人家谈到我出身时都这么说，大家都悄悄地说我的主人就是我的父亲，不过这究竟是否事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是根本无从知悉的。”^[89]在 1855 年第二本自传《我的奴隶和自由生涯》中，他除了重复上面的传说外，特地加上：“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的。”不过他对父亲是白人这一点确信无疑，“我的父亲是一个白人，或者说差不多是个白人”。在另一段文字里，他说：“我有盎格鲁—萨克逊父辈血统。”1881 年他出版第三部自传《弗雷德

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却把他父亲与安东尼有关的传说全部略去，只是说：“对于我父亲，我一无所知。”从他对安东尼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混血儿在他心中所引发的痛苦。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有一个白人父亲的惩罚是沉重的。”他说：“一个奴役自己骨肉的人是不能指望他会很高尚的。”^[90]混血儿奴隶是对既是父亲又是主人的奴隶主最活生生的控诉。对奴隶主——父亲这个人来讲，混血儿奴隶是他宁愿忘掉的罪行，对这个奴隶来讲，被父亲——奴隶主抛弃是痛苦的。以道格拉斯为例，被白人奴隶主——父亲抛弃既使他强化了自己的黑人种族意识，同时又发展了他对白人大众，尤其是像他的精神导师加里森那样的父亲般的人物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道格拉斯的母亲是安东尼家的女奴哈丽特·贝利，她是一对黑人夫妇的女儿。贝利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 1764 年 6 月，在东海岸成为马里兰州一部分那一天起便住在那里，达半个多世纪。到道格拉斯这一代已是第五代了。迟至 18 世纪末东海岸的奴隶都是家庭式的而不是庄园式的，典型的奴隶主一辈子只拥有一个男奴和一个女奴以及他们的子女，偶尔也外加几个他们的亲戚。这也是贝利家族得以延续下来的原因。贝利家族有很强的家族自豪感，他们的根深蒂固地扎在东海岸的土地上，他们的文化价值观都是美国式的，而不是非洲式的。道格拉斯长大后反对将黑人移出美国，从他自己家族中就可以找到渊源。

哈丽特生于 1792 年 2 月 28 日，一生育有 6 个子女，道格拉斯排行第四。哈丽特长相姣好，个子高挑，比例匀称，皮肤黝黑而有光泽，在奴隶当中举止相当稳重端庄。据说，她还能读书，这在奴隶当中实属罕见，就连当时许多白人妇女也不能做到这一点。道格拉斯对此很骄傲，他后来说他母亲是“特卡荷伊所有奴隶和有色人中唯一能拥有那种优势的人”。^[91]道格拉斯认为自己是从小从她那里，而不是白人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知识的热爱和智慧”，这成为他日

后争取黑白平等与男女平等的一个依据。^[92]

道格拉斯对母亲的印象并不深刻，因为他很小就与母亲分开了。当时有一个习惯，奴隶的孩子在刚刚断奶，即不满周岁时必须与其母亲分开。道格拉斯是由外婆带大的，哈丽特则被租给 12 英里外一家奴隶主干活。道格拉斯只记得在夜里见过她几次，因为她只能在干完地里活后步行 12 英里来看自己的儿子，而且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回去干活，否则就得挨一顿鞭子。每当道格拉斯醒来时她早已离去。1826 年的某一天，哈丽特死于特卡荷伊的克里克农庄。对她的死，道格拉斯只是很久以后才听说，并且就像是听到一个陌生人死讯一样并不悲伤。长大后，他才懂得母亲的爱心，虽然他未能得到她的多少爱，但那不是她的错，是奴隶制阻碍了她的爱心。道格拉斯回忆说：“她忍着艰辛来看我，足以证明她有一颗慈母心，那是奴隶制的冷漠都压制不住的母爱。”^[93]

奴隶制使道格拉斯过早地失去了家庭的爱。他说：“环宇之内，没有什么比得上奴隶制对家庭之爱的摧残。它使我的兄弟姐妹同我形同路人；它也使生养我的母亲成了一个谜；在我父亲身上则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我来到这个世界就不明不白。”^[94]

二 道格拉斯的早年生活

道格拉斯的早年是与外婆柏西·贝利一起度过的。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奴隶身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无论是在小圆木屋里玩耍，还是在林间捉松鼠、从井里提水、看水磨转动它那笨重的轮子，亦或是用大头针做的钩在水塘里钓鱼、在水磨里抓东西吃，所有这些都让人怀念。道格拉斯后来回忆说：“我真希望自己有可能永远是一个小孩。”^[95]

然而，这种舒适而宁静的生活很快给打破了。根据传统，由柏西带大的孩子一到六岁左右就得送往主人艾伦·安东尼家去。安东尼本人有三个农庄，30 个奴隶，他把农庄和奴隶都交给一个监工

管理，他自己则做东海岸最大的种植园——劳埃种植园的总监工。道格拉斯是在 1824 年夏被带到劳埃种植园的。那一天到庄园后，外婆骗他说她有事要离开，让他独自在庄园呆一会，等她办完事再来接他。结果却一去不返。与外婆的分离给道格拉斯幼小心灵留下了长久的创伤，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疼他的外婆会弃他不管。他只是后来才懂得，在奴隶制下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外婆在保护自己孩子方面是多么无能为力。“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奴隶制的现实。”^[96]对与外婆的分离，道格拉斯后来回忆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被欺骗过。在我与外婆的分离中，除了痛苦之外，还夹杂着一丝怨恨。”他强调说，这件事对别人也许不算什么，对他却是印象深刻，因为他的外婆只是说带他到劳埃种植园玩，但却把他留在了那里，他感到受到了欺骗，他非常相信与敬爱他的外婆，正是她的温柔呵护使他完全没有孤儿的感觉，她的爱补偿了他所缺乏的母爱。道格拉斯与外婆分离的创伤刺激了他对自己奴隶身份的理解与认识，也增加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并导致他最终奔向自由。他的成长加快了。道格拉斯对女权的认识与追求，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对无权的外婆和母亲的母系情结。这种痛苦促使他献身他的种族解放、女性解放及一般的社会改革运动。^[97]

在劳埃种植园，道格拉斯与别的奴隶孩子一样，主要干些晚上喂牛、打扫庭院、跑跑腿等简单的家务劳动。也许道格拉斯真是他的亲生子，总之，安东尼对道格拉斯还是较为关照的，道格拉斯记得，他常常像“父亲一样地轻轻牵着我的手、拍拍我的头，用一种柔和的口吻与我说话，还把我叫做印第安人小男孩”。^[98]他的女儿卢克丽霞对道格拉斯也很好，道格拉斯经常去她的窗户附近唱歌，而卢克丽霞也常常给他东西吃。安东尼虽然偶尔也打他，但绝对没有虐待过他。“在我老主人的家里，……我个人的经历同任何残忍或者令人震惊的事没有任何联系。”^[99]

道格拉斯与劳埃家的关系也不错。在这段时期，他被挑选出来

与上校的最小的儿子、12岁的丹尼尔为伴。他们之间既是主仆又是同伴。他们在一起玩耍、捕鸟、猎兔，自由谈论各种话题。道格拉斯模仿能力极强，不久他就开始从丹尼尔那里学会了用白人的说话习惯说话，就像丹尼尔也偶尔用一两句黑人俚语一样。他良好的措词后来曾令许多白人感到惊奇，实际上，这并不偶然，从他儿时伙伴丹尼尔身上他就在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了。同丹尼尔在一起的生活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同时也使他朦胧地感到白人的优闲富足与奴隶辛劳贫穷之间的强烈反差，这从他们不同的衣着饮食可以鲜明地看出来。

在劳埃种植园呆了 18 个月后，道格拉斯于 1826 年被卢克丽霞丈夫的兄弟、住在巴尔的摩的休·奥德要去与其儿子汤姆作伴，随后的七年他就是在巴尔的摩度过的。女主人索菲亚是一对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的女儿，他们相信奴隶制度是一种违反天理、人性和自然法则的罪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样的教导下长大的。索菲亚本人在结婚前还曾做过织工，所以她同东海岸那些一出生就接受“淑女”教育的傲慢传统没有关系，那些“淑女”总相信自己比别人优越，对黑人更是如此。道格拉斯是索菲亚接触的唯一黑人，她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她并不把奴隶直勾勾看她的脸当作一种僭越无礼行为。道格拉斯第一次见她时，依照庄园习惯低着头，她就对他说：“抬起头来，孩子，别害怕！”她让自己的儿子汤姆叫他的昵称“弗雷迪”。她让他坐在桌子旁吃饭，睡自己单独的小房间。道格拉斯第一次从这里感受到了一丝平等的气息，他回忆说，“我……不久就把她当作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奴隶主太太了。……她没少用她温柔的双手照顾这个奴隶男孩，安慰他，使他意识到，尽管自己没有母亲，但并不是没有朋友。”^[100]这种朋友般的感情在道格拉斯结识的那些巴尔的摩白人小伙伴中也浓浓地存在着。

然而这种平等友好的气氛不久却叫一件事给破坏了。事情是这

样的。道格拉斯看到女主人读《圣经》，并被她美妙的朗诵声所打动，便央求索菲亚教自己识字，以便自己也能像她那样读《圣经》。她痛快地答应了。她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便告诉了丈夫，不曾想，休·奥德很震怒，要求索菲亚停止这种非法的举动。他还向妻子解释说，“要是你给黑鬼一寸，他就会进一尺，黑鬼除了懂得服从主人，别的是不必知道的。学习只会惯坏世界上最好的黑鬼”，因为“如果你教会他怎样读，他就会想知道怎样写，这完成之后，他自己就会跑掉了”。这段话给了道格拉斯意外的收获，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所听过的许多明确反对奴隶制的第一课”。^[101]

从此以后，索菲亚对道格拉斯的态度大变，不仅不再教他识字，而且禁止他看书读报。她简直成了他学习的敌人。从这件事中，道格拉斯看出奴隶制度对人性的损害是多么严重。从即使在耳闻目睹许多暴行的劳埃种植园一直受到的善待中，道格拉斯已体验到白人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人性，然而奴隶制却不准这种人性表现出来。后来谈到索菲亚，他总是说：“上天并没有使男人和女人成为奴隶，或者成为奴隶主。只有长期不断的训练才能完善一个人的品质。天性使我们成为朋友，但奴隶制使我们成为敌人。”^[102]

但是，休·奥德夫妇的阻碍反而使道格拉斯激起更大的学习热情。休·奥德的话是对的，教给“我”字母已给了“我”一寸，现在，“我”要等到机会得到一尺。^[103]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上学的小伙伴、船厂的木工都是他的老师。当时同他交往的白人小伙伴大都较穷，道格拉斯口袋里便常装上一些面包，用它作为交换，让那些小伙伴教他识字，或乐于参加由他发起的比赛游戏，即看谁能在拼写方面超过他，这是他提高自己拼写的方法之一。此外，他口袋里总是装一本韦伯斯特拼读课本，一有空就拿出来学习。他还在自己的小房间用一个面粉桶做了一个简易书桌，在上面练习写字。他收集小汤姆用过的练习本，在其空隙处描摹小汤姆的作业。道格拉斯后来的写字风格很像小汤姆。他也在简易书桌上抄写卫理公会的

颂词和其他书籍。这样虽然很难，但到他 14 岁时，他读写都很好了。他还学会了基本算术，包括乘法等。

他知道得越多，他就越不满意自己的奴隶身份。休预言的那种“知识使一个孩子不适合做奴隶”的情况出现了。道格拉斯后来回忆说：“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从奴隶制通向自由的便捷道路。”这条道路便是知识。他逐渐认识到，只有不断强化的无知才能使一个人安于被奴役。^[104]在他 13 岁的时候，他得到一本《哥伦比亚演说家》，这本书加深了他对奴隶制的仇恨和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一本由一名马萨诸塞反对奴隶制的牧师在 1797 年编辑的。从书中谢里丹、皮特和福克斯等人对奴隶制的大胆谴责和对人权的有力维护中，道格拉斯看到了自己获取自由的前景。他也从中明白自由和平等乃是人的基本权利，他的种族和别的种族是平等的，自尊和人格是不容剥夺的。这本书不仅强化了他争取个人自由的迫切愿望，而且也加深了作为奴隶不知自由何时来临的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真有点嫉妒我的奴隶伙伴的无知和麻木……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头野兽，一只小鸟，或别的什么，只要不当奴隶就行。”^[105]不过，这种痛苦也从反面刺激了他学习的更大热情，他要学会为自己写自由的通行证。从这本书中，道格拉斯还学会了雄辩术，他以后的演讲风格如手势和富有戏剧性的停顿等都是从这中间学到的。道格拉斯能成为废奴运动和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首先应该归功于《哥伦比亚演说家》。

在巴尔的摩期间，道格拉斯信奉了基督教。在宗教的影响下，他知道“所有人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都是上帝的罪人”，既然如此，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他们就是平等的。道格拉斯这个时候便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后来说：“我看到人间新的光明，我爱所有的人类，奴隶主也不例外；虽然我比以前更憎恨奴隶制，但我最关心的是让这个世界改变过来。”^[106]

三 桀骜不驯的田间奴隶

当道格拉斯正憧憬怎样才能获得自由的前景时，他失去了一次机会，因为从巴尔的摩是很容易逃往北方自由州的——这一知识早在他七岁左右时就知道，那时他的一位姨妈和姨父逃到了北方自由州而获得了自由。而他也打算逃往北方，只是觉得自己太小因而下不了决心。

1833年，由于托马斯与休为照顾一个女奴的事吵了一架，道格拉斯的家庭奴仆生活就结束了。托马斯认为，休无偿地使用道格拉斯，就应该照顾自己的一个有残疾的女奴韩妮，但是休却把韩妮退了回去。作为报复，托马斯把道格拉斯也要了回去。因此道格拉斯恋恋不舍地在3月又回到了东海岸的圣米切尔。这时，卢克丽霞已经病逝，托马斯在那儿又结了婚，罗拉·汉布里顿取代了卢克丽霞的位置。

在城里生活惯了的道格拉斯自然不合托马斯的口味，而道格拉斯从书本上已经知道了奴隶制的所有罪恶，他从相对自由的城市生活一下重又落到种植园那种严酷状态，只会使他更加认识奴隶制的本质。在圣米切尔他毫不掩饰对厨房所提供的食物的不满，他还拒绝称呼托马斯为“主人”，而代之以“船长”（托马斯做过安乐尼家的船长）。这一切都惹恼了托马斯夫妇。更使托马斯不能容忍的是，道格拉斯居然办了一所主日学校，教有色人孩子识字。他担心这样发展下去，道格拉斯就会成为纳特·特纳第二了。于是第二个星期天，托马斯便领人捣毁了学校，警告道格拉斯“小心点”。这还不算，为了摧毁道格拉斯的精神，他把道格拉斯送到了有一个有“驯奴师”之称的爱德华·科维那里，准备让他花一年时间调教道格拉斯。

科维果然不负所望。1834年1月1日，也就是道格拉斯到来的第三天，他便给道格拉斯来了一个下马威。大清早他让道格拉斯去树林里装一车木柴回来，科维故意派给道格拉斯一对野性未驯的牛。道格拉斯以前从未赶过车，自然笨手笨脚。结果如科维料想的

那样，牛受惊了，碾坏了林子的木门。道格拉斯险些把性命丢掉了。过了一天，道格拉斯才把木柴拉回来。科维对所发生的事不仅不表示同情，反而责备道格拉斯在磨洋工，有意毁坏山门。他把道格拉斯带到一棵大桉树前，用斧子砍下三棵大树枝，用小刀把它们削得整整齐齐，然后命令道格拉斯脱下衣服。道格拉斯没有听从。科维就自己动手，他像猛虎一样恶狠狠地扑上来，扯下道格拉斯的衣服并鞭打他，直到抽坏所有的树枝。道格拉斯背上肿起的鞭痕有小指粗，好几个星期才消退，但疤痕却长久地留下了，成为此后道格拉斯控诉奴隶主的罪证。^[107]这是道格拉斯在奴隶制度下生活以来第一次尝到鞭打的滋味，但决不是最后一次。

在科维手下的头六个月，道格拉斯像动物一样超负荷地劳动，累得精疲力竭，却还要忍受着饥饿和几乎每天都有的鞭打。曾经有一度他的“身体和灵魂”都被压垮了。“我的自然灵性被压服了，我的智慧呆滞了；读书的安排没有了，曾经在我眼中闪耀的快乐消失了。”^[108]他有时也想把自己的生命同科维一起了结，但又因为恐惧和希望而下不了手。他有时就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反正世上，也不只自己一个奴隶，再说自己还小，说不定我当奴隶的不幸反而会增加我做自由人的幸福呢。”^[109]

但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奋起反抗。1834年8月最热的一天，道格拉斯同三个黑奴一起扬麦子，道格拉斯负责将麦子运到扇麦机前。到下午三点时，道格拉斯累垮了。他只觉得两眼冒金星，头一阵剧痛。开始他还忍着，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他就倒了下去。于是扇麦机停了下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谁也不能同时干两个人的活。科维见状，也不分青红皂白，对准倒在地下的道格拉斯的腰部就是一脚，还用胡桃木的板子在道格拉斯的头上打了一个很大的口子。道格拉斯逃回托马斯家请求主人予以保护。托马斯虽然对科维的暴行也感到震惊，但他害怕失去整整一年的工钱，就命令道格拉斯又回到科维家去。科维见他回来，决心制服这个不

服管教的奴隶。于是，他乘道格拉斯喂马料的时候抓住道格拉斯的双脚，把他拖到地上，准备用绳子把他捆起来。但道格拉斯反抗了。他狠狠地掐住科维的喉咙，同时设法站了起来。他们在一起扭打了近两个钟头。最后科维只好放了他，并且从此以后四个月，再也没有打过道格拉斯。

这次反抗成功给道格拉斯以后的生活以极大影响。他在评论这次事件时说：“这次打架在我生活中是个转折点，它唤回了已离我而去的自信心，并再次灌输给我一种争取自由的决心。”^[110]

四 奔向自由

1835年1月，道格拉斯又被雇佣给邻近一个名叫威廉·弗里兰的奴隶主。这里境况好多了，他有了比科维心肠好的主人，有足够的饮食，工作也适中，他甚至能为四十多个奴隶开办一所秘密的主日学校。但好意、食物和一些休闲时间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了。当他在科维那里挨打时，他关心的是自我生存，但现在思考的是自由；他得寸就得进尺。他后来说：“如果一个奴隶有一个坏主人，他的愿望是得到一个较好的；他得到较好的后，他就会盼望得到最好的；当他得到最好的以后，他就会企图成为他自己的主人。”^[111]

1836年，当弗里兰再次雇他时，道格拉斯就决心逃走了。他不想一个人走，决定带上四个最要好、可靠的同胞一起走。他们为每人写了一张通行证，假称他们的主人准许他们去巴尔的摩过复活节。他们计划从托马斯的岳父那里偷一条独木舟渡过切萨皮克湾，沿北极星方向逃奔自由。但在行动之前有人泄了密，结果道格拉斯作为密谋的组织者被关进了塔波特县监狱。争取自由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也由于主人托马斯的努力，道格拉斯终于被释放。因为邻居们反对把道格拉斯这样的煽动分子留在当地，托马斯决定把道格拉斯再次送给休·奥德，还答应在道格拉斯25岁

时释放他。

这样，从 1836 年夏到 1838 年，道格拉斯就在巴尔的摩的船厂工作，开始当学徒，后来做了熟练的船缝填充工。开始时，道格拉斯为休干活，把所挣的钱全部交给休，到 1838 年 5 月，道格拉斯搬出去住，自己买了衣服和工具，自己与雇主订合同，只需在星期六把 3 美元送到休那里就可以了。这样，道格拉斯基本上过着一种半自由人的生活。

工作之余的晚上，道格拉斯常常去找他认识的那些自由黑人。其中的一些有知识黑人教给他文学、地理和算术知识。他还参加了自由黑人组织——东巴尔的摩协进会的活动，在这里他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安·默里，她是一个自由黑人。他们相爱并准备结婚。

与安·默里的相识更加强了道格拉斯获取自由的欲望。现在自由不仅是为他自己了，自由将使他能够作为人而不是财产与他心爱的女人结婚。安理解他的心情，鼓励他逃跑。

1838 年夏天与休的一次争吵加快了道格拉斯逃跑的步伐。起因是有一个星期六晚上，道格拉斯因急着与朋友一起去参加离巴尔的摩市 20 英里外的一次野营，故未能在这一天将 3 美元交给休，而是在星期一补交的。休为此大发雷霆。他吼道：“你这个混蛋，你自己做主了。你再不能和时间了，否则下次我该听到你逃跑的消息了。”^[112]他让道格拉斯搬回家来住。

由于担心被卖掉，道格拉斯决定放弃在巴尔的摩的一切，逃到北方去。就在吵架后不久，即 8 月 12 日，他决定在 9 月 3 日逃跑。为麻痹休，在这三个星期里，道格拉斯拼命找活干，尽可能多挣点钱，一是多给休一点，好让他高兴，二是为自己多挣点路费。在逃跑之前，他一共攒了 17 美元，加上安的积蓄，这样才凑齐了所需的费用。^[113]

为了逃跑更加顺利，道格拉斯还从一位名叫斯坦利的退休黑人水手那里借了一套水手服和文书——“海员护身符”，说明持有人

是一个白山水手，拥有美国国旗下的一切权利。

一切准备就绪后，9月3日，道格拉斯顺利搭上了开往费城的火车，当天下午便到了费城，第二天便到了纽约，从此投入自由的怀抱。

在以帮助黑人逃奴为宗旨、有黑人和白人参加的民间组织——纽约治安委员会帮助下，道格拉斯在1838年9月15日与前来与他相会的安结了婚。两天后他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1841年他在那里参加了废奴运动，成为加里森派的演讲员；1845年至1847年到过英国，其间他从休那里赎买了人身自由；1848年成为美国黑人大会主席；1851年后又成为政治废奴派领袖。在对政治废奴主义思想进行改造的基础上，道格拉斯提出自己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使之成为整个黑人解放的指导思想，占据黑人解放运动的主流。道格拉斯成为他那个时代黑人最主要的发言人，直到1895年去世为止。

在美国内战期间，道格拉斯提出变内战为废奴战争，同时他也要求平等对待参加联邦军队的黑人士兵。在1865年至1895年期间，他不遗余力地为黑人平等权利、争取黑人彻底解放而奋斗。1877年至1881年，他担任过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执行官，1881年至1886年，又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书记官，1889年至1891年任美国驻圣多明各代办和驻海地公使。

道格拉斯不仅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美国黑人的解放事业，而且竭其所能为美国黑人寻求到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他的思想和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指导原则。

注释：

[1]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页。

[2]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66页。

[3]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中译本,上册),第19页。

[4] 同上书,第17页。

[5] 文森特·哈丁著:《有一条河》(Vincent Harding, *There is a river*,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1981),第6页。

[6]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21页。

[7] 黄绍湘著:《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5页。另见凯瑟琳·科曼著:《美国工业史》(Katharine Coman,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18),第42页。

[8]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9] 同上书,第37页。

[10] 同上书,第33页。

[1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66—67页。

[12]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第35页。

[13] 文森特·哈丁著:《有一条河》,第27页。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67页。

[14]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第3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页。

[16] 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17]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19页。

[18] 同上书,第16页。

[19] 黄绍湘著:《美国史纲》,第136—137页;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第30页。

[20] 赫伯特·M·莫雷斯著:《争取美国自由的斗争》(Herbert M. Morais,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 Freedom*, New York, 1944),第101页。

- [2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67 页。
- [22]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第 181 页。
- [23]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9 页。
- [24]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黑人的重建》（W. E. B. 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35），第 11 页。
- [25]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道格拉斯自述》（中译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14 页。
- [26]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181 页。
- [27]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Dickson J. Preston, *Young Frederick Douglass*, Baltimore, 1980），第 19 页。
- [28] 艾伦·温斯顿、弗兰克·奥托·加泰尔合著：《美国黑人奴隶制》（Allen Weinstein and Frank Otto Gatell,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68），第 42 页。
- [29] 菲力普·S·方纳编：《道格拉斯论女权》（Philip S. 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on Women's Rights*, West Port, Connecticut, 1976），第 4 页。
- [30] 肯尼思·M·斯坦普著：《特殊制度》（Kenneth M. Stampp,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New York, 1956），第 172 页。
- [31] 同上书，第 172—173 页。
- [32]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170 页。
- [33]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道格拉斯自述》（中译本），第 26 页。
- [34] 同上书，第 30 页。
- [35]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167 页。
- [36] 同上书，第 168—169 页。
- [37] 艾伦·内文斯著：《联邦的考验》（Allan Nevins, *The Ordeal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47），第一卷，第 432 页。
- [38]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 页。
- [39]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192 页。
- [40]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茨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中译本·上册），第 242—243 页。

- [41] 梅里亚姆著:《美国政治学说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23—130 页。
- [42]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第 184 页。
- [43] 同上书,第 188 页。
- [4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194 页。
- [45] C·范恩·伍德沃德著:《奴隶制的奇怪历程》(C. Vann Woodward,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New York, 1966),第 13—15 页。
- [46]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第 197 页。
- [47] 同上书,第 198 页。
- [48] 同上书,第 203 页。
- [49] 文森特·哈丁著:《有一条河》,第 14 页。
- [50]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30 页。
- [5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78 页。
- [52]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47 页。
- [53] 赫伯特·阿普蒂克:《美国黑人文献史》,1951 年纽约版,第 10 页。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48 页。
- [54] 文森特·哈丁著:《有一条河》,第 43 页。
- [55] 赫伯特·阿普蒂克:《美国黑人文献史》,第 15 页。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49—50 页。
- [56] 菲力普·S·方纳著:《美国黑人史》(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s*, Westport, Conn., 1975),第 281 页。
- [57] 菲力普·S·方纳著:《美国黑人史》,第 288 页。
- [58]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 12—13 页。
- [59]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Philip S. 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4),第 28—29 页。
- [60]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 14 页。
- [6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113 页。
- [62]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 26 页。
- [63] 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144 页。
- [64] 何顺果著:《美国“棉花王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 页。

[65] U·菲利普斯:《旧南部的生活和劳动》,第 178 页。转引自何顺果著:《美国“棉花王国”史》,第 125—126 页。

[66] J·R·波尔著:《奴隶制、种族与美国内战》(J.R.Pole, *Slavery, Race and Civil War in America*,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74),第 110—112 页。

[67]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154 页。

[68] 哈罗德·安德伍德·福克纳著:《美国经济史》(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54) 第 202 页。

[69] 艾伦·内文斯著:《联邦的严峻考验》(Allan Nevins, *The Ordeal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47, V01.1),第 466 页。

[70]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台北 1987 年版,第十册,第 345 页。

[71]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合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30 页。

[72] 路易斯·菲勒著:《反对奴隶制的十字军》(Louis Filler, *The Crusade Against Slavery*, New York, 1960),第 17 页。

[73]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30 页。

[74]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中译本·上册),第 386 页。

[75]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31 页。

[76]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219 页。

[77] 文森特·哈丁著:《有一条河》,第 75 页。

[78]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 89 页。

[79]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中译本·上册)第 386 页。另见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Jeanne Grant, *Black Protest*, Greenwich, Conn., 1968),第 71—72 页。

[80]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31—32 页。

[81]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中译本·上册),第 387 页。

- [82]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 73 页。
- [83]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38 页。
- [84] 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第 325 页。
- [85] 同上书，第 324 页。
- [86]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道格拉斯自述》（中译本），第 9 页。
- [87] 同上书，第 8 页。
- [88]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第 31 页。
- [89]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道格拉斯自述》（中译本），第 9 页。
- [90]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Waldo E. Martin, *The Mind of Frederick Douglass*, London, 1984），第 4 页。
- [91]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第 63 页。
- [92]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5 页。
- [93]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第 4 页。
- [94]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5 页。
- [95]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第 37 页。
- [96]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Frederick Douglass, 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2），第 32 页。
- [97]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6 页。
- [98]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第 30 页。
- [99] 同上。
- [100]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7 页。
- [101] 同上。
- [102]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第 87 页。

[103]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第 83 页。

[104]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8 页。

[105] 同上书，第 9 页。

[106]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第 90 页。

[107] 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五卷（Philip S. Fone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Vol.5, New York, 1971），第 388 页。

[108]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12 页。

[109]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道格拉斯自述》（中译本），第 67 页。

[110] 同上书，第 67—73 页。

[111]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0 页。

[112] 同上书，第 22 页。

[113]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第 152 页。

第二章 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中的主导作用

对黑人奴隶制问题，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包括黑人自己在内的美国人都在探寻解决的办法。开始，他们采取密谋、逃亡、起义等方法，虽然也拯救了一部分奴隶出苦海，但对整个奴隶制触动不大，因为这些活动均未超出组织分散或者没有组织的藩篱。直到废奴运动出现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黑人解放运动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废除奴隶制，争取黑人的彻底解放是道格拉斯的最大心愿，也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因此，在他自己刚刚摆脱奴隶制度的枷锁后，他便开始了为黑人解放而奋斗的漫漫历程。为了找到一条适合黑人发展的解放道路，道格拉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当道格拉斯参加废奴运动的时候，在废奴主义中已形成三种不同的废奴主张，即道德说教派、政治行动派和暴力革命派。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已经作了简要的概述和介绍。是从这三种主张中选择一项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还是另外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呢？道格拉斯面临着抉择。刚开始的时候，他加入了加里森派。对这一派的道德说教主张也囫圇吞枣地全盘接受了下来。但在实践中，他认识到道德说教是不能自动使奴隶获得解放的，把它作为黑人解放的唯一有效方法只能是空想，必须采取行动；第三派的主张虽然从理论上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在当时这只能是鲁莽的冒险。因此，道格拉斯在第二派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一套主张，即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手段，主要是政治行动来促进废奴及黑人的解放。这一主张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在黑人解放运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称之为合法主义改革派，以区别于旧的政治行动派。合法主义改革派思想与旧有的政治行动派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旧的政治行动派主要想靠单纯组建废奴主义政党，通过竞选上台执掌权力以后再采取废除奴隶制等措施，来达到黑人解放的目的，而合法主义改革派则不仅限于此，它主张利用一切机会，团结一切人，凡是能促进黑人解放的合法手段它都支持。比如，对妇女问题，它比旧的政治行动派开明；它还主张利用现有主要政党，先支持它上台，然后去影响它，改造它，借助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旧的政治行动派所没有的。道格拉斯在理论上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废奴主义的主张，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扭转了黑人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逐渐确立了其领导地位，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第一节 美国早期黑人解放斗争综述

一、独立战争与黑人

对于美国独立战争，黑人曾寄予无限美好的期望，也曾给予过积极的协助，做出过他们自己的贡献。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在1775—1783年间美国独立战争中，有5000名黑人曾经在大陆军部队中服役。当时大陆军总共有30万人，约有8000到1万名黑人服务，当正式士兵的只有5000名。在各地区中，参加大陆军的黑人人数量最多的数新英格兰地区，其次是弗吉尼亚。马萨诸塞部队中有572个黑人，弗吉尼亚部队中有250人，康涅狄格第三团第二连有49人。

为了鼓励黑人参军，新罕布什尔规定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的津

贴相等。据估计，新罕布什尔的适龄黑人青年都参了军。纽约规定，凡在大陆军中服役三年的奴隶即可获得自由。在独立战争结束前，许多州都已承认黑人奴隶在服役完毕时均可获得自由。黑人入伍后多与白人混合编队，并肩作战。几乎每次大小战役均有黑人参加。事实上从独立战争一开始，黑人就投入了战斗。在 1775 年 4 月的列克星顿战役中，参加战斗的就有黑人彼得·萨莱姆、卡托·斯塔德曼、卡托·布德曼、卡夫·惠特摩尔、卡托·乌德、庞普·布莱德曼等。在 51 名伤亡人员中，有黑人普林斯·伊斯特布洛克，他骁勇善战，是第一个冲向敌人的战士。^[1]

黑人的英勇战斗、不畏牺牲的精神和气概感动了许多白人军官。马萨诸塞的 14 个军官在写给该州议会的信中说：“在……上尉阿姆斯的连队中，有一个叫做伊莱姆·蒲尔的黑人。他在最近的一次查尔斯顿战役中，不仅表现为一个优秀的士兵，且不亚于一个老练的军官。……上述黑人是一个勇敢善战的军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而可贵的人物应予嘉奖。”另一个驻扎在波士顿的团级军官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些黑人。一般来说，他们同其他战士一样行动敏捷，吃苦耐劳。其中好些人证明是勇敢的。”一位退役军人哈里斯后来回忆说起 1776 年长岛战役中的黑人部队时称赞说：“他们接连三天打退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英军反扑，这样才使我们的军队未被俘虏。”^[2]

黑人主要是当步兵。在大陆军海军创立之初，就有黑人参加。大陆会议最早建立的四艘战舰中，两艘上有黑人服役。在北部建立的海军中，黑人多充当水手，但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海军中，黑人往往充当驾驶员。大陆军 50 艘舰船上的黑人水手，大部分来自新英格兰，且多为自由黑人，也有部分奴隶。除大陆军的海军外，私人装备的掠捕船上也有不少黑人。新英格兰的武装私掠船上，平均每艘上有两、三个黑人。

黑人为美国的建立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黑人都享受到了这次战争的成果——自由和平等。独立战争结束时，有一些为大陆军服役的黑奴得到自由，他们的家属也有一部分得到释放。但是对于那些为了自由而到英军那边打仗，或只是逃跑了，或逃到英军那一边的黑奴，主人则要求重新占有，乔治·华盛顿就曾请求纽约的一位朋友帮忙找回他自己的—些逃亡奴隶。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奴隶制在北部被废除，而在南部却被保留下来，并且得到了宪法和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对于奴隶制在美国西部广阔的边疆区的命运，1787年的《西北法令》只规定在俄亥俄西北一带禁止奴隶制，而对其他地方是否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则未表明态度。该法第六款还规定，凡逃往该地区的奴隶，均需归还原主。这一规定是依据宪法第四条第二项行事的。宪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劳役者逃往他州时，不得因他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该项劳役，而应因服役州之要求将其人交出。”^[3]宪法的创始人致力于维护“政府应依赖于对财产所有权的控制”这样的主张。对南方的创始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占有奴隶，犹如对北方的创始人来说这意味着占有工商业一样。为保护奴隶这项财产，这部宪法保留了奴隶制度。直至75年后，1787年在费城制定的这条法律才被废除。

二 早期黑人解放斗争形式

独立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摆脱了英国的奴役，但黑人在这个新国家中的地位却依旧，奴隶制依然在南部合法地存在，并有可能朝西部扩展。美国黑人对此非常失望。他们在刚刚参与打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赢得美国的自由独立的解放战争以后，又开始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在这一时期的黑人解放斗争中，密谋、起义、逃亡等都是他们采取的最直接、最常用的方法。

密谋是黑人进行起义的前奏和准备，这是奴隶对自己地位不满的最激烈、最不顾后果的一种反应方式。黑人希望由此一劳永逸地

解决奴隶制问题。密谋和起义必然带来奴隶主和奴隶的流血。黑人接受流血，把它作为自由的代价。从奴隶制建立之初，造反或密谋造反就一直与之相伴。这也是奴隶主在尝到甜头后必须尝受的苦头。在黑人解放斗争史上，黑人的密谋不计其数。从佐治亚格林县的一个奴隶写给北卡罗来纳州马丁县的另一个奴隶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对黑人奴隶的密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封信写于 1810 年 3 月。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以极大的自由和愉快的心情获悉你所取得的伟大进展，以及你在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上前进的决心。我希望你将继续抱定这样的决心干下去。在我们这一地区，我们已经把这种思想几乎传遍了我们在的这部分国土，同时确定了我们着手办事的日子。你可千万不能误了那一天，那是 4 月 22 日。在夜半时开始，先从你自己家里动手，拿起你最先杀掉的人的武器，这些东西可以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因为我们需要自由，而且一定能得到自由，因为我们为这块残酷的国土服役得够长久了。传递消息要尽可能地保持秘密，千万记住要让谨慎细心的人去送消息。万一事泄，也不要误了那一天行动，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无论如何都能得到胜利。”^[4]

从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黑人那种对奴隶制的愤恨心情以及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砸碎奴隶制的枷锁、获得自由的必胜信念。它反映了黑人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是黑人起义或其他反抗行动的基础。

把密谋付诸实践的行动之一便是起义。进入 19 世纪，黑人奴隶有组织有计划的起义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1800 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黑奴起义。领导者为加布里埃尔·普罗瑟（1775—1880 年），一个干田间活的奴隶。他和其妻子及两个兄弟从春天起就开始准备这次起义。8 月 30 日夜里，他领导一大队用棍棒、小刀和枪武装起来的黑人，企图向里士满进军。起义失败了，因为有两个黑人告密者把消息透露给了白人，而且猛烈的

暴风雨淹没了通往城市的道路和桥梁。虽然没有白人被杀，但威胁是强大的，也是很严重的。加布里埃尔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他的密谋。有人估计有 1000 人，他自己声称有 1 万人。当局进行了大逮捕，州长门罗调用联邦军队和地方民团进行镇压，并对加布里埃尔和至少 35 个同谋者处以绞刑。奴隶们视死如归的态度使白人不寒而栗。在法庭上，当有一个人问一个奴隶有什么话要说的时侯，这位奴隶平静地回答：“我要说的和华盛顿将军如果被英国军官捕获并受审时要说的话一样。为了使我的同胞们获得自由，我冒了生命危险，现在我愿意为他们的事业而牺牲。我请求你们做件好事，立即把我处决。我知道你们已经预先决定要处死我，那么，为什么还要搞这种假审判呢？”^[5]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鼓舞了黑人奴隶的斗志，预示着在 19 世纪奴隶制的厄运将要到来。

1816 年初，弗吉尼亚的斯波特锡尔瓦尼亚、路易萨、奥兰治等县的黑人奴隶准备起义，由于机密泄露，36 个奴隶被捕，6 人被绞死，6000 人被卖出本州。起义组织者之一是一个白人，名叫乔治·帕克斯莱（约 1781—1816 年），他曾想组织一批人来营救被捕的奴隶，没有成功，后亦被捕。他利用妻子暗中送的一只蜡烛和一根钢丝，越狱成功。当局悬赏 1000 美元捉拿他，终未得逞。

在北卡罗来纳，许多奴隶被鞭打、烙印、耳朵被割，至少有 15 名奴隶因被指控卷入造反密谋而被绞死。

在南卡罗来纳，1822 年发生了一次类似的事件。登马克·维齐（1767—1822 年），一个已赎回自己自由的杰出黑人，他本来已经是查尔斯顿地区的一个成功的木匠，但他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决心为他的同胞做点什么。为此，他沉思了好几年。从美国、法国和圣多明各革命中得到启发、鼓舞，并受到当时的密苏里论战的影响，维齐和他的伙伴开始秘密工作，大力宣传人人平等的思想，吸收查尔斯顿附近种植园里的奴隶，准备了 250 把长矛头和刺刀，以及

300 把短剑，记下每一个藏有武器的仓库。维齐还写信给圣多明各，请那里的黑人予以援助。他们计划突然起义，从五六个方向进攻查尔斯顿，夺取查尔斯顿的两个武器库，并控制整个城市。日期定在 7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因为 7 月里有很多白人要离开去外地游玩。像加布里埃尔的密谋反叛一样，白人当局又一次通过黑人告密者知道了正要发生的事，从 5 月开始就进行大搜捕。维齐不得不将起义日子提前到 6 月，但计划再度泄密。至少有 139 名黑人被捕，其中 47 人被判罪。在大逮捕和秘密审讯之后，维齐和另外 34 名起义者于 7 月 3 日被处以绞刑，43 人被驱逐出境。另有 4 名白人工人因参与起事而被监禁。事后，当局惊恐万状之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防范措施。白山黑人，尤其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被禁止进入这个港口，因为南卡罗来纳当局害怕来自那里的黑人支持该州的黑人斗争。当地黑人的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一个刚成立不久的黑人美以美教会强制解散了。

在这以后的 10 年，整个南方都担心奴隶的反叛。反奴隶制运动的重新抬头及像戴维·沃克的《呼吁》这种煽动性小册子的出版，使南方人更加紧张。这种紧张在 1831 年特纳起义时达到顶点。

特纳起义是南方发生的最严重的叛乱，地点在弗吉尼亚的南汉普顿县。1831 年，一个名叫纳特·特纳（1800—1831 年）的奴隶自信上帝已委派他处死邪恶的压迫者。他和 7 名同伙突然起事，首先杀死特纳自己的主人和这个家里的其他 4 个正在熟睡的家庭成员，然后乘夜晚迅速转移到其他不怀疑他们的人家，先后杀死了 60 名白种男人、妇女和儿童。其他奴隶参加了反叛，约共有 70 人。

白人当局终于得知此事，迅速召集民兵并招募自愿人员队伍。他们在四十小时内粉碎了叛乱，当场杀死至少 120 人，逮捕数百人。平定叛乱后，白人实行了白色恐怖统治，很多黑人没有经过逮捕或审讯就被屠杀，在经过法律诉讼程序之后，有 19 人被送上绞架。纳特·特纳躲避敌人搜捕达两个月之久，但最终还是被抓住，

并被审判处死。

这次起义强烈地震撼了奴隶制度，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在这次事件以后，附近的奴隶主惶恐不安，到处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景象。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马里兰，甚至首都华盛顿都采取了戒备措施。总统下令从门罗要塞调集六门大炮放在首都兵工厂门前，以便从这里控制波托马克河。与奴隶有关的法规得到更加严厉的执行。奴隶法规规定，对造反或策划反抗的奴隶处以死刑。没有通行证的奴隶不得离开他们的种植园，不得集会，除非有白人在场。奴隶不能拥有武器、马匹、牛角或鼓。他们不能买威士忌也不能给白人吃药。除了马里兰、田纳西和肯塔基外，别的地方没有人教他们读书、写字。在熄灯之后，奴隶不得离开其住所，白人民兵团队整夜在农村巡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法律一般不会实施，奴隶们可以集合起来上教堂做礼拜或跳舞，在乡间散步，他们的女主人经常教他们读书、写字，道格拉斯就是其女主人教会他读书写字的。巡逻是一件很没趣的事，平常也很少能严格执行。但是由于实际发生的反叛或从未发生的关于反叛即将来临的谣传满天飞，遂使整个地区陷入周期性的恐慌之中。这时就会采取镇压措施，大张旗鼓的巡逻要一直持续到骚乱平息下去。奴隶主妄图用恐怖手段维持奴隶主的反动统治。

黑人奴隶不仅在奴隶主庄园多次进行密谋和暴动，而且在被贩运途中也不断发动起义。例如，1826年9月，一只贩奴船载着75名奴隶沿着密西西比河下行，当到达肯塔基州列克星顿以南时，奴隶们砸断锁链，杀死看守，准备逃往印第安纳，但不幸被镇压。同年，29名奴隶在贩奴船“德卡图尔号”上举事，杀死船长和大副，命令另一个白人将船开往海地。后来虽被截获，驶抵纽约，但除一个奴隶被捕外，其余全部逃脱。1840年，里士满贩奴船“克利奥尔号”运输134名黑人奴隶到新奥尔良，奴隶们在中途暴动，将船开往已经解放奴隶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美国政府要求交还这批奴

隶，但没有得逞。奴隶们全部获得自由。

美国早期的黑人奴隶起义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表现了黑人一贯的不畏强暴、不甘心被奴役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致使奴隶主阶级经常处于一种忧虑不安的状态。但是，在 19 世纪上半期，黑人反叛成功的希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些起义不是没有组织，就是组织不得力，更重要的是没有群众基础。比如，维齐虽然进行了组织，但他只在田间奴隶中活动，对能够起旦应外合作用的家庭奴隶，他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黑人奴隶的确存在着等级分化。地位最高的是家用奴隶，但他们是少数，田间奴隶占绝大多数，是黑人奴隶的主体，并最有利可图。处在中间的是那些学会了几门诸如木匠、铁匠或理发师之类的手艺的奴隶，他们经常被主人出租给别人使用。1820 年，在南部城市的总人口中，黑人占 2%；1860 年时，在工厂做工或从事铁路修筑等非农业劳动的黑人约 50 万人。^[6] 虽然如此，黑人在面对奴隶制这一共同敌人时，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于这样一批天然的同盟军，维齐不去争取，是错误的。至于特纳，他根本就不做什么准备，天真地以为只要他振臂一呼，黑奴就会蜂拥而至。此外，他还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起义日期的制定，他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而是根据天象，在 8 月 21 日举事前，他就是因为在 8 月 13 日见到太阳上出现一种特别的青绿色才做出起义决定的。他的起义决定则来自神灵。“我听到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随后我听到神灵对我说：我应当起来做好准备，用我的敌人的武器杀死他们……”^[7] 这种没有组织或组织涣散的起义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自然不可能动摇有组织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不仅加布里埃尔、维齐、特纳给他们本人和他们的伙伴带来死亡，而且还引起白人对无辜的黑人采取恐怖主义的行动和镇压。叛乱收紧了而不是放松了对奴隶的束缚。此后 30 年，新的巡逻制度和管制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任何堪与维齐或特纳起义相比的奴隶暴动。

除了上述还算是有点组织的暴力反抗外，个别的黑人奴隶也有用暴力打击奴隶主的。1840年，田纳西州有一个名叫雅各的少年奴隶，有一天当他在玩耍的时候，被其主人罗伯特·布拉德福德看见，主人认为这是雅各的工作时间，应当工作。雅各和主人吵了起来，并说他讨厌布拉德福德做自己的主人。布拉德福德听后大怒，扬言要鞭打雅各并卖掉他。当他要鞭打雅各的时候，“雅各夺过鞭子……把它折断，然后跑掉了”。雅各过了一两天后返回，但仍然拒绝接受鞭打。布拉德福德就把雅各的两个兄弟招来，要他们在自己行使主人权利的时候，帮忙把雅各按住。雅各听说后，找到一把大杀猪刀，磨得异常锋利，以应不测。当这两个兄弟抓住雅各，并把他摔倒在地的时候，雅各突然从衬衣里掏出尖刀，跳起来刺向布拉德福德。他边刺边喊：“该死的，清账了！”布拉德福德不久就因伤势过重而死去。雅各逃到另外一个州，但几个月后还是被抓住并被送回到田纳西受审。法院虽然认定是布拉德福德的挑衅引发了雅各的过激行为，但法庭还是判处雅各绞刑，因为“法律不能认可以暴力对付主人的挑衅为合法行为”^[8]。

把密谋付诸行动的第三种主要方式便是逃亡。奴隶逃跑是一个普遍现象，逃亡既有集体行动，也有个别行动的。只要有机会，黑人奴隶都会选择逃跑。这种行为是黑人对自由向往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正如1850年逃出奴隶制魔掌的亨利·布兰特所说：“我心中总是浮现出一种念头：我要自由，也必定能够获得自由。没有人教我这些，它们都是很自然地涌进我的头脑里的。最后，我发觉如果我终身被人驱使着生活的话，我的处境会特别糟糕。我一想到这些，我就恨白人。终于我对自己说，这不行，我得离开，否则我会杀人的。”^[9]

几乎每份报纸都刊登几则寻找逃亡奴隶的告示，有时这种告示占好几栏。以下是几则典型的告示：“一个名叫哈丽特的非常漂亮的混血儿女孩，大约13岁，黑色直头发和黑眼睛，在本月7日

(星期日),从已故威廉·邓巴的森林种植园潜逃。这个女孩最近到了新奥尔良,据了解,她曾在那儿会见一个她声称是她父亲的男子,这个男子现在或不久前住在密西西比州,在卡法拉亚河口以北不远的地方。这个女孩的潜逃很可能是经过事先策划的。”^[10]“黑人逃奴豪恩和其妻子格莉丝。豪恩左脚带有钢圈,格莉丝左腿戴有钢圈钢链。”¹¹。

各州都帮助找回这些奴隶,但收效甚微。有一些是永远找不回来的。奴隶逃亡的方向一是山林、沼泽或印第安人地区等奴隶主力量达不到或力量薄弱的地方;二是在废奴主义组织的帮助下,通过“地下铁路”,逃往加拿大。

在“地下铁路”成为反奴隶制的有效方法之前,奴隶们自己就逃亡森林、沼泽和偏远的印第安人地区。男的、女的、小孩、单身的、成对的或成群结队的都有。他们的逃跑使那些企图保持种植园严格秩序的奴隶主大伤脑筋,有的人逃跑一次不行,就寻找下一次机会,北卡罗来纳州一女奴从她主人那里逃跑不下 16 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她那么勇敢。逃跑的奴隶很难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逃跑无疑是黑人反抗奴隶制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黑人自发地持续反抗的主要手段。1815 年,从佐治亚州逃出来的一千多名黑人奴隶,就来到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地区,聚集在西佛罗里达阿巴拉契柯拉河畔,并同他们一起占领了一个以前是英军岗哨的堡垒。后来联邦政府派兵镇压,黑人和印第安人在那里成功抵抗联邦军队达七年之久。在南卡罗来纳的康巴希和阿什波两条河流的沼泽地带,1816 年左右也聚集了一批逃亡奴隶。他们以此为中心,利用其海岸地势和河流错综复杂、敌人不易接近的优势,经常神出鬼没地出来骚扰奴隶主,造成极大的声势,以至于州长不得不建议议会派兵征剿。

在黑人逃亡斗争中,最为成功、也最有影响者当属著名的“地下铁路”运动。关于“地下铁路”的取名,有好几种说法。有一种

似乎是有道理的说法为：一名叫泰斯·戴维兹的奴隶，于 1831 年从肯塔基的主人家逃出来，渡过了俄亥俄河。主人虽然紧追不舍，但一过河，奴隶就无影无踪了。他感到莫名其妙，说那个奴隶准是通过一条“地下铁路”逃跑了。^[12]“地下铁路”于是得名并流传开来。这一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也许从有奴隶逃跑时就有人帮助他们了。有组织的反抗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曾抱怨费城的教友派协会帮助解放一个从亚历山大逃出来的奴隶。1804 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哥伦比亚市的人们集体庇护一个女奴，1815 年，俄亥俄州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到 1819 年，人们用各种方式鼓励奴隶逃出北卡罗来纳。在激进的废奴主义运动到来之前，“地下铁路”已经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秘密组织了。“地下铁路”从 30 年代广泛发展，到内战前夕已经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具有相当规模的运动。“地下铁路”由经理人（逃亡运动组织者）、车站（供逃亡奴隶食宿、隐蔽的地方）、乘务员（向导）、乘客（逃亡奴隶）等构成。它的路线纵横交错，在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等州都有许多路线通往加拿大。有记载可查的为地下铁路工作的人员共有三千多人。^[13]人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更多的将永远是隐姓埋名的工作人员没有被记载下来而成为幕后英雄。

“地下铁路”运动的工作方式多种多样，因地制宜。为躲避追捕，逃亡奴隶一般是昼伏夜行，靠北极星、俄亥俄河或者其他河流的支流或山脉来辨别方向，并且尽可能涉水泅渡以甩掉警犬。有的还从主人那里搞来马匹，或干脆乘火车。逃亡奴隶一般都进行化装，如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或皮肤较白者扮做奴隶主，黑的则扮做奴仆。总之，奴隶们发挥他们的智慧，充分地利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径。例如，有一个叫亨利·博克斯·布朗的奴隶甚至还把自己钉在带有食物和水的大箱子里，由捷运公司从里士满装船运到费城；有一次，28 个奴隶以送葬为名集体逃跑了。

“地下铁路”站与站之间距离一般为从 10 到 20 英里不等，自

天奴隶们可以在车站休息、吃饭，到第二天晚上再往前逃。“地下铁路”之间的联系一般用暗语。如 1859 年有个向导给下一个站长的信中说：“你将从明晚的邮件中收到两卷用黑绳绑在一起的《压制不住的冲突》。读后请往下传，多谢。”^[14]

奴隶在决定逃跑前，一般都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准备时间视具体情况长短不一，逃跑过程也不尽相同；有的很顺利，有的则历经曲折。1853 年，一个叫威廉·斯蒂尔的黑人奴隶在从里士满逃到自由的过程中，准备时间就用了 9 个月，但还是费尽周折。决定逃跑以后，他先躲藏在里士满位于富兰克林大街与第七大街交界处他母亲一个商人朋友家的厨房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被转移到彼得堡一位被称为“白山之友”的著名有色人那里，由于听到一个阴谋，他又被转道曼彻斯特送回里士满，重新回到他母亲那个商人朋友家。在这里从 8 月 16 日一直呆到 9 月 12 日，直到那一天才被“乘务员”带上“里士满城市号”汽轮，踏上通往白山的道路。^[15]

“地下铁路”的工作资金主要来自于教友派和类似团体的募捐。慈善家和“地下铁路”的“乘务员”及有关“铁路官员”也拿出自己的积蓄。比如，哈丽特·塔布曼每当她手头的资金用完的时候，她就请几个月的假，受雇于人家作家仆，以便筹款把奴隶带往白山的天地。

“地下铁路”的整个历程充满了许多奋不顾身、英勇无畏的动人事迹。“地下铁路”最大胆的白人“乘务员”当推约翰·费尔菲尔德。他虽然出生于弗吉尼亚一个奴隶主家庭，却不愿同奴隶制发生任何联系。他决定到北部去生活，在去之前，他帮助他的一个奴隶朋友逃亡加拿大。有关他的事迹就这样传开了。他也就这样成了“地下铁路”的一名“乘务员”。他在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和肯塔基把自己打扮成奴隶主、贩卖黑人的商人、兜售鸡蛋和家禽的小贩，以取得奴隶主的信任。他把每一个角色都扮

得惟妙惟肖，因此很少有人怀疑他与奴隶的逃亡有丝毫的联系。不是由他直接带到加拿大的奴隶，他就交给利瓦伊·科芬，由科芬安排其余的路程。他在工作中倍尝餐风露宿之苦，有一次还遭到枪击，但他没有退缩。直到 1860 年去世，他一直在为奴隶的自由而献身。

在“地下铁路”中也有很多黑人负责人。伊莱贾·安德森被称为俄亥俄西北部“地下铁路”的总指挥，从 1850 年到七年之后他死在肯塔基州的监狱里时为止，他一直热心帮助奴隶逃跑。到 1855 年，他已经把一千多名奴隶引向自由。约翰·梅森本人是一个逃奴，他在 19 个月里，曾把 265 个奴隶带到加拿大，交给一个黑人传教士。有一次梅森被抓住并被卖为奴隶，但他再次逃跑成功，并继续为“地下铁路”工作。他总共把约 1300 名奴隶送到了自由地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逃到自由的北方后，也一度成为“地下铁路”的工作人员，并把他自己的家当做一个“地下铁路”的车站。

在这些黑人负责人中，有一位最杰出的女英雄特别值得一提，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塔布曼（1810—1913 年）。虽然塔布曼自己身体孱弱，经常伴有头晕症，但是，她不仅自己在 1849 年从奴隶制度下逃了出来，还把包括自己的妹妹、两个孩子以及年老的双亲都接了出来。她曾经南下 19 次，解放了三百多个奴隶。她喜欢在星期六出发，这样在奴隶主星期一登报刊登奴隶逃跑的消息前，她已经走得比较远了。1850 年的《逃奴缉捕法》通过以后，她总是把奴隶一直带到加拿大。她在费城、纽约、波士顿等她经常运送逃奴的地方颇有名气。奴隶主曾悬赏 4 万美元捉拿她，奴隶们都称她为自己的救世主“摩西”。

“地下铁路”是黑人解放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充分显示了美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它以最激烈的方式突出废奴主义者摧毁奴隶制的决心。在联邦暂时无力的情况下，自由黑人和一部分白人以

一种似乎是狂热的激情有组织地对南部这一如此重要的制度进行着破坏。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受蹂躏者会得到机会，气馁者会看到希望。“地下铁路”对增强北部反奴隶制的力量、提高黑人和白人的觉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地下铁路”的这种秘密斗争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奴隶制问题。从 1810—1850 年，通过“地下铁路”逃跑的黑人奴隶总共有十多万人，^[16]从 1830—1860 年，平均每年有二千多人，而仍被关在奴隶制牢笼里的奴隶有好几百万，相比之下，逃走的奴隶少得可怜。^[17]

黑人其他一些解放斗争形式还有组织黑人自己独立的教会、反对移民、黑人大会运动等。1816 年，非洲人监理公会教会在费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告成立，以反对白人教会对黑人的歧视，理查德·艾伦为其主教；黑人浸礼会教徒则在波士顿、费城、纽约等城市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教堂。黑人教会是美国第一个生气勃勃的黑人机构，它为其成员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和道德训导，并培养了牧师和主要的俗人司仪的领导能力。为黑人解放斗争提供了后备的领导力量。

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成立后不久，南部的一些自由黑人表示愿意移民，这些自由黑人对于进行一场看来毫无希望的斗争感到厌倦。北部的自由黑人则反对这样做。1817 年，费城 3000 名黑人在理查德·艾伦的领导下集会，表示反对拓殖，并力促“仁慈善良的费城居民”拒绝这一方案。巴尔的摩、波士顿、纽约、哈特福德、纽黑文、匹兹堡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召开了会议。纽约的黑人把支持移民的人称为“持错误观点的人”，康涅狄格州莱姆城的黑人则把移民描写为“开明人士赞助的最荒唐的规划之一”。黑人领袖马丁·德拉尼尤其敌视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他把该组织描绘为“性质上是反基督的，在伪装的同情心中包藏着厌恶人类之意”。他把该组织的领袖痛斥为“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们搞了一个明显是“黑人的死敌”的组织。他说向外移民的动机主要是把黑人从美国

驱逐出去。为了这个目的，在非洲建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不是独立的——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嘲弄对象——是关于政府的一幕滑稽剧”。^[18]

在废奴运动中，代表自由黑人进行反奴隶制斗争的是黑人大会运动。1817年1月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和费城举行的两次黑人会议是有组织黑人运动的开端。这两次会议是为了反对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发起的往非洲移植自由黑人的计划。1830年，第一次可以勉强称得上是全国性的黑人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这次会议有来自三个自由州和两个蓄奴州的30名代表参加，历时五天。会议讨论了自由黑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代表们一致反对往非洲遣送自由黑人的计划，要求无条件地释放黑人奴隶。黑人大会运动坚决反对奴隶制，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它还千方百计保护逃奴，反对种族隔离，争取黑人的选举权，并为黑人的就业和职业教育创造条件。

1837年前，会议是定期召开的，以后则不定期举行。黑人大会是黑人全国性政治组织的先驱，黑人大会运动一直持续到内战和重建时期。内战前的重要会议有1830年费城会议、1840年哈特福德（康涅狄格）会议、1843年布法罗（纽约）会议、1847年特罗伊（纽约）会议、1848年克利夫兰会议、1853年罗切斯特（纽约）会议、1854年克利夫兰会议、1855年费城会议。黑人代表大会不是一种常设机构，休会期间，各州或各地举行地方性会议。地方性会议与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直接关联，但地方性会议的活动家往往是全国会议的领导成员。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黑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协调运动的方向。黑人大会运动刚开始也有白人代表参加，到30年代末，白人代表日益减少，讨论的问题也转向以黑人的问题为主。参加会议的有牧师、教师、学生、地下铁路工作人员、作家、社会活动家、报纸从业人员等。著名的人士有亨利·海兰·加尼特、索琼纳·特鲁斯、戴维·沃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威廉·威尔斯·布朗等。道格拉斯在1848年当选黑人大会主席，从

此成为黑人的代言人。1869年真正意义上的黑人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道格拉斯被选为大会永久主席。

黑人组织独立的教会，召开全国黑人代表大会，并开展反对移民的运动等政治行动，标志着黑人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对反对白人的政治偏见，提高黑人的形象和自信心有极大的好处。从此黑人不仅仅是在白人的帮助下被动地进行有组织的废奴运动等解放斗争，而是积极主动地为自身的平等、自由而奋斗，不仅仅是解放奴隶，而且也要为自由黑人争取与白人平等的权利。自由黑人会议运动对于黑人解放斗争的未来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等白人废奴主义者领导的废奴运动中，黑人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像我们在第一章废奴运动那一节中提到过的在发起废奴运动组织成立的“陈情宣言”上签字的3个黑人和执委会中的詹姆斯·G·巴巴多斯等6个黑人。许多黑人担任了各级组织的特派员和宣讲员，进行宣传。他们往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形象地历数奴隶制的罪恶，卓有成效地启发了公众对奴隶制度的觉悟和认识，起到了白人废奴主义者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美国废奴运动史上著名的黑人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哈丽雅特·塔布曼、索琼纳·特鲁斯、马丁·德拉尼、亨利·海兰·加尼特、戴维·沃克、塞缪尔·柯尼什等。废奴运动中的黑人不仅反对奴隶制，而且反对北部社会甚至白人废奴主义者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黑人废奴主义者的突出代表，由于他的贡献，1847年，他被选为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的主席。北部各城市为援助逃亡奴隶而成立的治安委员会，领导职务也有多个由黑人担任，如纽约和费城这两个最有名的委员会，其领导人分别是黑人废奴主义者戴维·鲁格尔斯和罗伯特·珀维斯。

有一些黑人奴隶通过唱歌来表达自己的对奴隶制的不满，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希望之乡有一个人的野营布道会》、《上帝，看看天国以外吧》、《因为我的灵魂要去耶稣诞生的地方》和《天国，天

国，人人都谈论天国，但谁也没有上天国去》等，是奴隶希望来世解除痛苦而唱的少数几首歌曲。奴隶们还经常磨洋工；在地里或拍卖台上装病；破坏农具，残忍地使用牲口，有意毁坏农作物；纵火焚烧谷仓、住宅和森林，以至巡逻队员常常不敢离开自己的家门，害怕奴隶来报复，放火烧毁自己的家产；还有的奴隶自伤致残或自杀。奴隶们砍掉自己的脚趾、双手或用其他方式使自己残废以便使自己不能当作劳动力使用，从而用自己的生命写就一份份对奴隶制的抗议书。有一个肯塔基奴隶木匠得知自己将被卖到河流下游地区时，就砍掉了自己的一只手和另一只手的手指。有的奴隶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杀死，为的是不让他们长大后当奴隶。这些反抗代价都很高，也是比较消极的反抗形式。

以上所有这些黑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都对美国黑人奴隶制起了打击作用，动摇了它的基础。不过，这些斗争由于本身的一些致命的弱点，如缺乏组织协调、没有群众基础等原因，都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奴隶制。这个任务是由 30 年代兴起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运动来完成的。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逃出奴隶制的牢笼之后很快加入这一由加里森倡导的激进废奴运动，并在其中锻炼成长。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一步，是非常明智、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多亏这一正确选择，美国黑人才幸运地拥有道格拉斯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道格拉斯为了自身的自由，可以一跑了之，比如说逃到加拿大去过安稳的生活，就像他从南部逃到北部那样；但为了他的黑人同胞获得自由，他不能这样做，无论是他一个人逃跑，还是带领一部分人逃跑，都不明智。密谋或武装起义也不明智，因为无论是当时黑人的思想状况还是组织状况，也无论是白人群众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为这样的斗争留有余地。他也可以继续致力于“地下铁路”的工作，但这种秘密斗争方式并不适合解放所有黑人，况且以这种方式解救的黑人奴隶也不可能全部都逃到加拿大，毕竟黑人总共有几百

万，他们多数实际上还是必须立足于美国来生活。这一工作的效力是有限的。

由于历史的缘故，道格拉斯最早是加入了加里森的派别，但当他认识到这一派别的局限时，他转向了政治行动派，并对之进行改造，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适应时代的需要。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中提出了黑人解放的新思路：合法主义改革思想。这一思想适应了当时美国的客观环境，不仅为当时的黑人解放斗争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也为以后的黑人解放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因为如此，他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逐渐占据了黑人解放运动的主流，成为其指导思想。黑人群众在他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的指导下，先是取得了废除奴隶制斗争的胜利，接着在与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的斗争中，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进展，朝着黑人彻底解放的目标不断迈进。

第二节 在加里森的阵营里

一 加里森主义

加里森及其追随者忠于道德说教的主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被统称为加里森主义。他们在理论上强调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武器是达到目标的唯一道德的方法。温德尔·菲利浦斯说，废奴的战争将不是一场狂野的征战，而是一场圣战，一场不是用世俗之火，而是用“取自上帝武库中的强有力武器如祷告、信念、上帝的教导”等进行的神圣战争。“那些忠于道德努力的人才是真正的战士……我们是在和上帝一起工作，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中”。^[19] 加里森也说：“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战争，而不是人的战争，胜利将不是由数量上的优势取胜，不是由物质力量或权力，而是由真理的精神和无上权威来取胜。”^[20]

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加里森及其追随者反对奴隶进行以牙

还牙的武力抵抗、反对政治行动、谴责联邦和宪法、反对教会、主张妇女在废奴运动中拥有平等的领导权等。

加里森认为以恶制恶的武力反抗是有罪的，即使是自卫也不行。1833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根据加里森的意见而写的《组织大纲》中就写道：“本协会决不采取任何措施去支持被压迫者用武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利。”^[21]

1844年该协会仍然重申：“不要去流血——不要伤害任何压迫阶级的任何人或集团——不要鼓励奴隶造反——不要借助武力和武装反抗法律——不要使用任何物质的武器！”“不——我们的战争必须是不流血的，除非是我们自己去流血——因为我们的目标如同我们的主基督一样，不是去毁掉别人的生命，而是要拯救他们——是要用善战胜恶——要通过为真理而受难取胜——要用真理的力量使被奴役的人们得到自由。”^[22]

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过分强调教育鼓励的道德说教威力，这一立场导致一些废奴主义者相信，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是可以被说服自愿释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有些奴隶主在道德说教的感召下，的确自愿将自己的奴隶予以解放。但是，这种对道德潜力的夸大不仅会弱化群众性的政治斗争，而且也不利于废奴运动的深入发展。

对于政治行动，加里森开始是赞成的，但后来从这一立场上后退了。在一篇致“马萨诸塞州废奴主义者”的信中，他曾倡导过用选票箱来进行反对奴隶制的政治行动。他说：“不要远离选票箱。去分散那些奴隶主候选人的选票，使你们自己的要求得到体现。你们分散的选票会被认为对那些政党（指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党）的候选人是不利的；因此，你们可以对他们起到有效的警戒作用，让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提名你们真心支持的候选人。”不过，加里森坚决反对由废奴主义者单独组成政党，他认为这对废奴事业如果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危险的。他这样解释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政党，为职权和薪水的争斗将会使我们的动机受到怀疑，对我们的正直是个威胁。如果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政党，那么党的每一个成员必须投同一个候选人的票，而不管他在公共事务上的看法与候选人有多么的不同。同时，经验也表明，在一个自由政府下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强大政党。”^[23]

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很多废奴主义者认识到道德说教本身是不能促使奴隶获得解放的，关于请愿权的斗争使废奴主义者受到鼓舞，他们期望通过政治行动，有必要甚至组织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来废除奴隶制。这使正统的加里森派感到不安。为了压制政治行动派的成长，加里森研究了美国宪法。他把宪法解释成为一份亲奴隶制的文献，这样，政治行动的基础便不复存在。

他认为，由于宪法给予奴隶制以“庄严的认可”，所以它就成了“一部与死亡签订的合同，与地狱缔结的条约”。他列举出宪法中有条文允许奴隶贸易在 20 年内合法化的规定；允许奴隶主在国会中扩大他们代表权的 3/5 的规定；允许联邦军事力量镇压奴隶暴动，加强奴隶逃亡法的实施。这些都构成一种罪恶的三个部分，使宪法打上了悲惨的妥协烙印。而且这些条文也代表了作者们的本意。在宪法范围内废奴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奴隶制度成为国家的基本生活制度，任何像在竞选官职或担任官职时所表示的要恪守、保卫宪法的人只会是分担奴隶主的罪恶。一位加里森主义者认为，“废奴主义者不能尽责地给予或发誓给予宪法以支持。他们不能这样同时既支持上帝又支持恶魔”。^[24]

从对宪法作出亲奴隶制的解释出发，加里森也谴责联邦，主张解散依据宪法而建立起来的联邦。他在 1844 年写道：

“美国人民有 300 万被碾压在美国联邦下面！他们被当作奴隶——像商品一样被交换——像货物和财产一样被注册！而政府根本不给予他们以保护——政府是他们的敌人——政府使他们处于奴隶状态！他们躺在那里流血——我们躺在他们身边——我们分担着

他们的痛苦与悲伤——抽在他们身上的鞭子也抽在我们身上，他们身上的镣铐也紧紧拴在我们的四肢上，他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把他们碾压在地上的联邦也在碾压着我们，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推翻它！把他们限制在毫无希望的奴役状态下的宪法是我们不能发誓去支持的！我们的箴言是：“不与奴隶主共此联邦”，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如此。”^[25]

加里森派认为奴隶主不仅控制了国家，而且也控制了有组织的教会，因此他们提出的“不与奴隶主共此联邦”也包括“不与奴隶主共处同一教会”的意思在内。他们反对有组织的教会，不想同它们发生任何联系。加里森认为：“美国的教士和教会总的说来是一个巨大的小偷兄弟会，尽管他们干的是一种最高级的偷窃——那就是偷人。”“教会这一宗派组织”是一个集“小偷、抢劫犯、海盗和杀人犯于一身的人的联合”。加里森本人不仅谴责教会是“奴隶制度的坚强堡垒”，而且对《圣经》的神圣性也进行攻击。他说，把《圣经》作为圣书是有害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作为坚定的反基督安息日的人，他还认为教会把每星期的第一天拿来用作宗教目的是“教士权术”，是教士出于自私的阴谋。菲利浦斯也积极鼓吹反对教会，甚至以教会的反对者为荣。他曾不无骄傲地说：“如果我死在奴隶被解放之前，请为我撰写如下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位捍卫人类奴隶制的教会的异教徒——一位以阴谋反对人类权利的政府的叛逆。”^[26]

加里森主义者反对宪法和《圣经》的神圣地位实际上是不明智的，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准备好要放弃他们先辈用鲜血换来的联邦，另外，大多数的美国人也是基督徒，他们对加里森攻击《圣经》是不会高兴的，这样即使他们同情奴隶的处境，也难使他们追随加里森主义。

由于加里森把反对奴隶制的战争看成是一场道义战争，而妇女通常都是美德与道义的化身，因此，他们积极支持妇女在废奴运动

中平等的领导权，以争取妇女这支道德的力量。

加里森主义在废奴运动早期，也就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成为整个废奴运动的指导思想，在 1840 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分裂以后，从该组织分裂出去另组的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主张政治行动，与加里森分道扬镳，这一派的力量在 40 和 50 年代越来越占上风，成为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力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来到北方时，所接触的第一个废奴主义组织就是加里森派的组织，他成了加里森主义者。

二 道格拉斯加入废奴运动

道格拉斯来到北部之前很早就听说过废奴主义者及他们为结束奴隶制所做的工作。他在大约 13 岁就已通过偷听主人们的谈话而得知废奴主义者的存在。那时正值纳特·特纳起义造成南部奴隶主极度紧张、风声鹤唳的时候。但什么是废奴主义以及废奴主义者是些什么人，他那时是不清楚的。然而，通过细心的观察，他发现，“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或别的什么，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奴隶主的痛恨和咒骂”。而且，凡是提到废奴主义者的地方，都要提到奴隶制。他还从主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奴隶主把奴隶奔向自由或奴隶对主人及其财产犯下的罪行都归咎于废奴主义者的迷惑。好奇的道格拉斯觉得有必要继续探讨一下什么是废奴主义者，因为他们似乎对奴隶友好而对主人不友好。^[27]

大约在 1836 年时，道格拉斯得到一份《巴尔的摩美国人报》，他这时候才明白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之间的关系。报道说，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宾夕法尼亚州贵格会教徒的请愿书，要求废除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请愿书上说：“我们相信，对人类来说，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全国性的道德罪恶。因此我们请求国会对此慎重考虑，通过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消灭奴隶贸易的法律，国会对此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消息像闪电一样使道格拉斯感到惊喜，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和奴隶伙伴们并不是孤立的。“从这些话中，我看到了希望，想到奴隶主的卑劣行为并未逃脱世人的眼睛，我心里就特别满意。”^[28]

对废奴主义者一词的认识及其目标的了解使道格拉斯更加向往自由。废奴主义者也许会废除奴隶制这个前景使他欣喜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格拉斯对废奴主义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他最神往的还是基本的意义：废除奴隶制。

不过，在 1838 年来到新贝德福德之前，道格拉斯对废奴主义者的活动还不甚了了。来到新英格兰四个月以后，他得到一份由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主编的《解放者》周报，他为其中的内容所深深吸引，尽管他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他还是经常订阅。每个星期他都贪婪地阅读这份报纸，研究它的原则和哲学。6 年后，道格拉斯回忆说：“该刊成为我的肉食和饮料，我心中的火被点燃了。它对处于奴役中的同胞充满的同情——对奴隶主的严厉指责——对奴隶制度的起劲揭露——对奴隶制支持者的强有力的攻击，都在我心中激起狂喜的颤动，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29]

道格拉斯当然不满足于坐在家里面对报纸而激动，他开始参加新贝德福德由黑人举行的废奴主义集会。报纸上第一次提到道格拉斯是在 1839 年 3 月 29 日出版的《解放者》周报上。3 月 12 日，新贝德福德的居民在基督教堂举行了一次反殖民大会，道格拉斯作为发言人之一，赞成通过决议谴责奴隶制，把加里森当作“值得我们支持与信赖”的人，他还用下面的话来谴责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的活动：

“我们是美国公民，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然固有的公正权利；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放纵的不可容忍的阴谋也不能诱使我们迁出或把我们赶出我们的故土。”^[30]

和其他黑人一样，道格拉斯把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向非洲的任

何殖民都看成是一种阴谋。道格拉斯认为，“个人可以移民，民族则永远不能”。他坚持：“我们生长在这个共和国，我看不出在她身上，甚至在美国人民身上有什么东西迫使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如果单个人或一群黑人想移民到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道格拉斯认为，他或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即使道格拉斯本人并不认为这样做妥当。因此，道格拉斯反复强调：“我们就在这里，也将呆在这里。这样做对我们自己，对美国人民都是有利的。”^[31]

在这以后，道格拉斯越来越多地卷入新贝德福德地区黑人的废奴主义活动。在约翰·贝利家举行的每两周一次的聚会他都准时参加，讨论反奴隶制的原则和所发生的事件。在新贝德福德的废奴主义者中，道格拉斯逐渐获得了领导地位。在1841年6月30日，他主持一次会议谴责马里兰移民协会“威胁用武力把该州的自由有色人赶出”的叫嚣，呼吁马里兰州的黑人抵抗威胁。会议还谴责了因为抵抗新贝德福德与楠塔基特之间的轮船实施种族隔离而遭攻击的戴维·鲁格尔斯事件。

1841年8月9日，道格拉斯参加了布里斯托尔反奴隶制协会在新贝德福德举行的年会。24岁的道格拉斯第一次聆听了加里森的演说。加里森的演说给道格拉斯以深刻印象，他从这位《解放者》周报编辑的身上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道格拉斯晚年写道：“也许是因为我曾经为奴，也许是我对奴隶制的强烈憎恨，总之，加里森的演说给了我永久难忘的印象。”道格拉斯也加入了大会讨论队伍，他给加里森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加里森在随后的《解放者》周报对大会的报道中说：“从新贝德福德来了几个有才干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从前是奴隶，他的发言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32]

第二天，道格拉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旅行。与加里森和其他40个废奴主义者一起，他参加了在楠塔基特召开的一次会议。8月12日上午，在雅典娜大厅，新贝德福德的废奴主义者威廉·C·科芬

让道格拉斯在会上发言。道格拉斯非常局促不安来到讲台叙述他当奴隶的经历。加里森对他的讲述非常满意，在随后他自己的演讲中多次引用了道格拉斯的言词。末了，他还问听众：“我们是在听一个东西，一件财产，还是一个人在演讲啊？”“一个人，一个人！”五百多人齐声回答。然后他又问他们是否允许把道格拉斯重新送回到奴隶制下时，台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不！”他又问：“你们愿意把他像亲兄弟一样来救助和保护吗？”“愿意！”台下听众热烈地回答，几乎要把雅典娜大厅的墙壁和大房顶震破。

到晚上，道格拉斯又作了一次讲演。听众们都为他的雄辩所折服。在《全国废奴旗帜报》的记者的报道中，对道格拉斯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新近从奴隶制下逃出来的一个人演讲特别有威力。他的雄辩可以把坚硬的心穿透，使冷酷的心溶化。我们为奴隶而祈祷的人都屏住呼吸，生怕打断他。加里森先生说他的演讲堪与帕特里克·亨利媲美。真令人奇怪，不知他是怎样使他的故事讲得这样富有力量。在晚上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又被邀演讲，听众怀着尊敬、怜悯和复杂心情倾听了他的演讲……”

“之后，加里森站了起来，他发表了一篇比我听过的演说都要雄辩的演说。他赞颂了刚刚讲过话的这位逃亡奴隶，谴责了把这个人碾压在地的制度。”^[33]

在休会前，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协会的总负责人约翰·A·科林斯要求道格拉斯成为该组织的演说家。道格拉斯怀疑自己的才能，但还是勉强地应承下来，不过他只同意为协会工作 3 个月。他将与史蒂芬·S·福斯特一起去演讲，也为《解放者》周报和《废奴旗帜报》筹集款项。他的工资是一年 450 美元。

道格拉斯回到新贝德福德时心里想，他作为废奴主义工作人员的作用恐怕不会超过 3 个月。事实证明他是太低估了自己，他很快就会发现，这只是他的新的伟大事业的开始而已。他在加里森的阵

营里一呆就是 10 年，而不是他所认为的 3 个月。

三 道格拉斯的早期废奴思想

参加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活动后，道格拉斯开始主要担任协会的演讲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人们听，揭露奴隶制的罪恶，唤起人们的同情与关注。他的演讲风格幽默生动，语言辛辣热烈，极富感染力。当时的奴隶主大肆美化奴隶制，诋毁黑人，很多人被蒙蔽，道格拉斯的出现就有了特殊的意义，给废奴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温德尔·菲尔蒲斯对他极为欣赏，他在给伦敦的伊丽莎白·皮斯的信中说：“你要是见到他，请记住我的忠告，你看到的是我们这里最能说会道的有色人。”^[34]

1841 年至 1845 年期间，道格拉斯跟随约翰·A·科林斯走村串乡 3500 英里进行旅行演讲，1845 年到 1847 年又到英国宣传废奴运动，到处受到欢迎。他成了大西洋两岸的明星，甚至连美国南部的许多黑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在开始演讲生涯时，道格拉斯遵循科林斯等人的教导，只讲事实而不加评论，但慢慢地他就不满足于此了，他不时地也讲一些废奴哲学方面的问题。他的废奴思想就这样形成了。

道格拉斯早期的废奴思想与观点主要受自于加里森派的影响。在加里森阵营的 10 年里道格拉斯基本上接受了加里森的所有原则和主张，当然他也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对之进行了阐释。道格拉斯主要强调以下几点：道德说教优于政治行动；奴隶制度与反黑人偏见的天然联系；对宪法作亲奴隶制解释；取消亲奴隶制的教会，取消联邦；反安息日主义——主张每天都是安息日；女权与黑人奴隶权利的同一性等。关于道德说教的优越性，道格拉斯是这样阐述的。他说：“很明显，我们国家的奴隶制只能在创造有利于废除它的公共舆论时才能完结。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开展对公众的思想启蒙，揭露奴隶制的本质，加强与之相对的公正和人道的伟

大原则。”^[35]

道格拉斯认为，知识将成为黑人解放的指向标。“我认为，所有美国人需要的是知识，他们如果与我一样对奴隶制了解的话，他们就会赶快行动去废除它了。”^[36]

对黑人天生低下，生来就该做奴隶的说法，道格拉斯用自己的经历作了反驳。他说：“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仍旧定居在奴隶制的魔掌下生活，也不作任何通向自由的努力，现在污辱我为可怜的逃奴的有知识的绅士就很有可能把它列为黑人已适应奴隶制，而不适合自由的证据！”^[37]

宪法是亲奴隶制的，道格拉斯对此毫不怀疑，无论是宪法条文本身，还是它的实践都是如此。宪法中计算黑人人口的 $3/5$ 的方法和逃奴法的规定实际上是认可了奴隶制。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系列加强奴隶制的措施也都是在宪法的名义下进行的。在一篇评论中，道格拉斯写道：

“宪法要求其治下的每个地区把逃奴归还给奴役他们的主人家里，如果奴隶起来争取自由，就开枪把他打倒，以上这些足以证明宪法是一份同死亡签订的契约。

“我们将继续谴责我们的宪法和政府，把它们看成是针对 300 万被奴役、被残忍对待的人们的最凶恶、最血腥的阴谋，这是我们在看待宪法和联邦时最起码的看法。”^[38]

道格拉斯认为：“对奴隶制的进攻必须从它的堡垒开始——从宪法的妥协部分开始，除非奴隶制被废除，解散联邦的呼唤就不会停止。要么解散联邦，要么让这个有罪的国家在奴隶的血泊中沉沦下去。”^[39]

在谈到美墨战争时，道格拉斯说：“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相信，只有解散联邦，新英格兰才能得到拯救。从现在起三年内，由于接纳蓄奴的得克萨斯州，美国政府的活动中心将由华盛顿转移到西部，越来越多的州就会发现，掠夺墨西哥更方便了……联邦必须解

散，否则，新英格兰将会被国家奴隶主的权力所吞噬。”^[40]

对于妇女权利与奴隶权利的同一性，道格拉斯有深刻认识。道格拉斯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对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有着坚定的信仰，《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和代议制政府等原则对他影响很大，这也是他女权改革思想的理论依据。道格拉斯的女权改革思想，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权利无性别。

道格拉斯认为，既然《独立宣言》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那么男女应该完全平等。作为公正与道德的主体，妇女应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与男子取得同样的地位。由于道格拉斯把政治权利当作其他权利的保证和基础，他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就多以政治权利为例证来加以阐明，政治权利中又尤以妇女的选举权为甚，这也是 19 世纪妇女权利运动的核心。道格拉斯认为：“所有男子行使的政治权利，同样也适合于妇女。”^[41]“权利无性别”在《北极星》创刊之际就作为一种口号响亮而鲜明地提了出来，这是对道格拉斯女权改革思想的高度概括。

根据《独立宣言》的原则，政府“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取得合法权力”，妇女必须在政府中有代表权，那么为什么不征得妇女的同意就统治她们呢？妇女们交了税却没有代表权。在被控违法时却不考虑她们的性别了，而是用她们在制定时没有发言权的法律来制裁她们，并且由没有与她们地位相同的妇女参加的陪审团来审理。只要承认妇女对她生活下的政府有忠诚的责任，那么她就有权参加选举。^[42]道格拉斯认为，把妇女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不仅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天然原则，而且是依靠了体力上的优势。这就导致“因为男子在体力上比妇女强，就有权使她成为自己意志的奴隶”。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男子至上主义的主要基础。^[43]其他人能不能代表妇女呢？当然不能。男子只能代表他自己。“妇女选举权运动所依据的一个伟大原则是：妇女是妇女，她是她自己，而不是其他

任何人。她的自我同男子的自我一样，是完整的、绝对的、无可置疑的。”^[44]就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而这种自己代表自己是权利的真正基础。妇女代表她自己，这是最简单、最保险的代表形式。“过去奴隶主代表了奴隶，其他富有的农场主代表了穷人。我们国家的男人声称他们代表了妇女，但美国的自由原则是：每个阶级及每个人都应当只代表他自己。征税权和代表权是一致的。”^[45]

既然别人不能代表她，那么，“妇女就同男子一样有权参加有关人类福祉的一切活动，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改革团体、教育机关，也无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各个州，都是如此。这就像中午的阳光一样明亮可见”。^[46]“如果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和幸福，他必须拥有财产，在制定他必须遵守的法律上有发言权，应该被鼓励参加政府、开发其智力、完成其社会义务的光荣责任，那么这同样适合于妇女。”“我们鼓吹妇女的权利，并不是因为她是安琪儿，而是因为她是妇女，拥有同样的需要，也同男子一样暴露在同样的邪恶面前。保护男子的必要措施，也是保护妇女的必要措施。”^[47]不管她行不行使这一权利，都不能把这权利给剥夺。

妇女不仅应该同男子一样在一切方面平等，而且她也有这个能力和资格。道格拉斯认为：“妇女天生的能力和潜能一点也不比男人差，这是她在所有方面权利的基础，其中包括参与制定政策规定、控制她生活在其中并须对之忠诚的政府的行为。除非能证明妇女在道德、体力和智力等方面不能行使选举权，就不能自然阻止她行使职权。”^[48]

妇女天生的美德会促进政治的纯洁，她们在候选人问题上有发言权是政治进步的表现。道格拉斯认为：“当妇女通过新闻界和自己的个人影响形成对要由人民授权才能担当官职的候选人有影响的时候，那就是政治进步到了一个新阶段。”^[49]

反之，剥夺妇女的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就会导致自由和进步事业的倒退。“一个只由男子统治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政

府，就像只有一只翅膀的鸟一样，只能在地上扑腾，而无法展翅翱翔在蓝天，飞得最高、最好。”“剥夺它治下的一半人的智慧和潜能的政府只能是跛子政府”，^[50]也就失去了妇女的道德支持，而且妇女作为一种和平的力量，天生厌恶战争，是和平的保证。^[51]政府失去她们的支持，也使得这个世界更加混乱，充满战争和罪恶，是政治的一种倒退。

第二，权利无种族。

道格拉斯总是把女权运动与黑人解放运动看成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所以他的女权改革思想也是不分种族的，他把妇女权利的取得看成是对黑人权利的一种促进，都是人类权利的体现。

道格拉斯认为，妇女权利只是人权原则的更广泛应用而已，这个斗争如果不同所有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相联——无论这种奴隶制是种族的，还是性别的，还是肤色的——它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并不是因为男人或女人才组建政府的，而是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是道德的人。”^[52]道格拉斯认为，除共同的人性外，在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方面，无其他资格可言。共和国安稳的唯一办法是把选举权给予所有的人，无论肤色与性别。只有把性别和种族的歧视去除，共和国政府才能在“形式与事实上成为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53]

不能因为妇女的权利被剥夺，就说剥夺黑人的权利合理，甚至以黑人权利为代价来换取妇女的权利。1865年1月25日，道格拉斯在谈到妇女的问题时说：“我们能因为有些人（指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就说明剥夺黑人的这种权利合理吗？我主张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选举权，我的心和我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把选举权扩展到妇女的运动。但这个问题基于另外的根据，而不是基于我们的权利。”^[54]这另外的根据就是人道主义，普遍的人类之爱，自由平等的原则。道格拉斯在论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时曾说过：“我们站

在人类自由的瞭望塔上，凡是提高整个人类家庭所有成员德行的运动，无论多么低下，我们都不能置身度外。”^[55]在谈到 1852 年的全国女权大会时，道格拉斯评论说：“这次光荣的大会做了许多益事，不仅对妇女权利而言。”早在 1854 年，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斯通小姐曾去南方访问，为了不得罪南方奴隶主，她在讲话中只呼吁妇女的权利，而没有提到黑人奴隶的权利，道格拉斯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不管妇女的事业如何，斯通小姐的确放弃了一次极好的机会来反对一种最违背自然、最野蛮的偏见，一种违背自由和人道的原则。”^[56]

妇女把她们的权利同黑人的权利割裂开来，对她们自己的事业也没什么好处，也是没有道理的。针对女权运动领导人的一些错误言论，道格拉斯指出：“妇女选举权的鼓吹者对黑人选举权的攻击，与她们所发出的不经同意的统治是不公正的统治的誓言相违背，说白人妇女因为比黑人受教育程度高就应该拥有选举权，实际上表达了她们的贵族感情。”^[57]

道格拉斯的“权利无种族和权利无性别”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互为依存。妇女的权利是人的权利的一部分，既不能以性别来划分，也不能以种族来区别，离开了这两者，都是道格拉斯所不能接受的。他的女权思想正是建立在这种人道主义原则之上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时代，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未能达到这一高度，他们要么只强调妇女的权利，要么只突出黑人的权利。只有道格拉斯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既团结了妇女这个黑人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又促进了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

总之，道格拉斯在 1851 年之前的废奴思想与加里森主义者是一脉相承的，他所做的工作是宣传并加以解释，使其更为合理，更能为其他人所了解、所接受。随着道格拉斯思想的成熟，尤其是自 1847 年他从英国朋友那里得到捐赠创办《北极星》报，更加独立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起，道格拉斯就与加里森派渐渐拉开了距

离，对政治行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还在英国的时候，道格拉斯与从加里森派分裂出来的“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接上了关系，并接受该组织的邀请，在它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自由言论被允许，而我可以用来揭露血腥的奴隶制度的任何集会上发表意见”。¹⁵⁸

此举与正统的加里森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尽管道格拉斯声明他接受演讲邀请并不等于他接受了该组织的原则，但是，加里森派对他是不满意的。

在道格拉斯 1847 年回到美国后，加里森派极力阻止他办报。因此，道格拉斯便搬家到纽约的罗切斯特居住。这里是政治废奴主义的热土，道格拉斯在这里受到他的政治废奴主义同事如格里特·史密斯、威廉·古德尔、塞缪尔·休厄尔、莱桑德·斯普纳等人的包围，他们对道格拉斯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道格拉斯开始重新估价道德说教的价值。他越来越认识到道德说教的局限性，开始向政治行动的方向转变。他认为，在现行制度下通过一切合法手段，主要是通过政治改革去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度来争取黑人的彻底解放。这一转变导致了在 1851 年他与加里森派的决裂。

第三节 道格拉斯与加里森阵营的分歧

道格拉斯在转变成合法的政治废奴派的过程中，随着他对政治行动作用的重新估价，自然而然带来对宪法、联邦和教会等问题的重新估价，这些都构成他与加里森派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他们在 1851 年最后决裂。

道格拉斯与加里森派分歧的发生首先在于能否把政治行动作为反奴隶制度的战略。

在前文已经说过，道格拉斯是从加里森那里接受废奴主义理论

和指导的，他开始也追随加里森派反对把政治行动作为废奴主义的战略，而只把道德说教作为唯一的有效战略。谈到这一点，道格拉斯后来承认，“在这一问题上，我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不仅是因为他们知识比我多，而且也因为我自己找不出这些观点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地方”。^[59]

但是，随着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中的日益成熟，他开始逐步独立思考这一问题。1843年8月，激进废奴主义政党——白山党的政治废奴纲领得到了布法罗黑人代表大会的支持，只有道格拉斯和雷蒙两人投票反对。这件事给了道格拉斯极大的震动，他开始严肃地审视政治行动的前景。

1845年至1847年期间，道格拉斯到英国作废奴旅行访问。在英国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讲坛宣传废奴主张，争取英国各界对废奴运动事业的最大支持。道格拉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道格拉斯同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伦敦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利用其讲坛来宣传废奴主义却使加里森派大为不悦。这样，道格拉斯便与加里森派发生了冲突，同时也让他经受了一次种族主义偏见的痛苦经历。

在出发前，温德尔·菲利普斯就预先警告道格拉斯不要与“伦敦委员会”保持联系，他担心道格拉斯会受到伦敦委员会的废奴思想影响。查普曼也给她英国的废奴主义朋友理查德·G·韦伯写信表示，她恐怕道格拉斯会被“伦敦委员会”收买过去。她要求韦伯劝说道格拉斯远离他们的有害影响。

对于与伦敦委员会联系的问题，道格拉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废奴主义者应该利用一切讲坛来促进废奴主义，他事后给加里森写信说，他接受伦敦委员会的演讲要求并不等于也接受了他们的政治信仰。但是加里森派对他不信任，甚至，对他的人格也进行无端的指责。查普曼在给韦伯的信中说，由于道格拉斯旅行同伴詹姆斯·布法姆富有，而他贫穷，所以他容易陷入伦敦委员会的金钱诱

惑中去。而韦伯也与之一唱一和，“证实”她的这种指责和猜测。

韦伯夫妇在给查普曼的回信中说，道格拉斯在英国获得的空前成功腐蚀了他，而且由于出售《自传》给他带来大量金钱，他现在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他们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流露出对道格拉斯的鄙视，说他是“某种被改造过来的野兽，……不能用我们文明的规则来评判他”。

虽然道格拉斯那时还不知道韦伯夫妇对自己的成见有多深，但是，他却知道查普曼对自己的看法，因为韦伯把她的信给他看过。道格拉斯对此非常沮丧和生气。他写信给查普曼：“你背弃了对我作为一个人与废奴主义者的信任，也与我加入废奴事业以来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道格拉斯特别憎恨她关于他与詹姆斯·布法姆的议论，他拒绝她在道德方面的监护，认为这是误导。他痛苦地责备她：“如果我因为恶而不是因为善而受到我亲爱的朋友的监视，我要说，把我从朋友手中拯救出来，我要照顾我的敌人。”^[60]

英国废奴之旅极大地改变了道格拉斯，开阔了他的眼界。尤其是在那一时期，由艾伦·理查森牵头，英国废奴主义朋友募得 150 英镑（约 710 美元），在 1846 年替道格拉斯从休·奥德那里赎买了自由。虽然这一举动招致了许多批评，因为它似乎承认了奴隶主对奴隶拥有主权。但是，对道格拉斯来讲，自由这样珍贵，他必须赢得它。只有当他赢得自由后，他才能作为人类社会的平等一员行动，并为反奴隶制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因为这使他可以免受逃奴法的追捕。事实上，他这次到英国，除了宣讲废奴主义之外，也是情势所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危险。

从英国归来后，他搬到罗切斯特去住，他开始思考政治行动能否作为废奴运动的策略的问题，美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迫使他不得不思考。

道格拉斯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作为一个对世事敏感，勤于思考的人，他不能不受到这些改革的影响。19 世纪上半

叶有两个特点：人为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奋斗不已；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去改革社会。为达到改革的目的，有些人走空想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些人走基督教无政府主义道路。奴隶制的罪恶、酗酒、大男子主义和死刑等，都有人起来反对。改革的力量来自整个知识界、宗教界、自然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理性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等。这几种力量从不同的方面推动改革。宗教所关注的是唤醒教徒，使他们不再忽视贫困和苦难；自然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则想驱除人间坏的法律和环境，因为他们认为坏的法律和环境是万恶之源；理性主义者则从维护《独立宣言》的原则出发，来衡量各种社会机构，看看他们为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方面做得怎么样。一旦人们熟知的《独立宣言》原则受到侵犯，美国的政治哲学家们便起来呼吁改革；浪漫主义鼓励和信赖人们的善良本性。

许多 19 世纪的美国人，尤其是（但不完全是）那些有炽烈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命运，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而且也关系到全人类。在美国适宜的环境中，不论男女都会显露出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会过着与上帝的宇宙万物相协调一致的生活，会铲除社会的不平；他们将会创造一个正直的男男女女的理想社会，领导这样一个社会的领袖的动机将是大公无私的、仁慈善良的。如果实现这样的目标，美国将成为全世界的楷模，否则将是对神圣托付的背叛。美国的社会改革家在描述他们所希望的社会时写道：“这个社会将是一个人民勤劳，物质富裕，充满智慧，有高度的道德文明和充满诗意般生活的社会；在这个国家里，万众一心，人人自由，教会也不严酷；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无知和愚昧，没有贫困和犯罪，是一个没有压迫的国家；而且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各国之间没有战争来消耗自己的劳动果实，没有妨碍人类福利的限制性政策。”^[61]这一至善论的目标对美国的改革家来讲，不仅能够实现，而且能够比较迅速地，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实现。有一位改革家解释说，在美国存在着“大量促进进步的因素，有英雄可以用武之

地，相对而言，不像其他地方阻碍重重，难以改革”。其他国家，为了推翻不公正的制度，也许不得不诉诸暴力，但是在美国，“人们更加满怀信心期望的是，通过采取道德和理智的手段来实现改革这一更好的途径”。^[62]

19世纪的改革首先在宗教领域展开，然后才延至社会方面。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人大部分都信仰宗教，而且非常虔诚，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宗教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自从18世纪大觉醒运动和乔纳森·爱德华兹勇敢地捍卫正教以来，清教的某些教义——预定论、婴孩永受惩罚论和人类堕落论等，已经被一种较为自由的神学所摒弃，或者至少为其所修正。这种新的神学用充满了爱的慈善的上帝代替了加尔文的愤怒的上帝。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教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从大觉醒运动中分化出来的神体一位论就相信人们通过基督教教义的熏陶，可以达到尽善尽美。该派代表人物是波士顿的一个牧师威廉·埃得里·钱宁（1789—1843年）。钱宁强调了每个人对自己良心的基本责任，帮助把自由主义神体一位论教派的信条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上帝是无限宽大、仁爱 and 慈悲的”，宗教的实质是“崇敬仁慈”。他相信预定说和加尔文派的上帝将“会形成一种悲观无望、令人生畏和奴性十足的宗教，并导致信徒用吹毛求疵、怨恨和迫害代替温和亲切而公正无私的博爱”。钱宁支持人道主义改革，他说：“因为我已认识到，在共同的圣父面前，人人本质上是平等的，……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伟大的天性，神圣的形象和广博的才能。”^[63]神体一位论教派推崇钱宁为他们最理想的领袖，因为他把它的理性主义和宽容与人道主义的热情和对人类福祉的积极关心协调起来了。

同神体一位论一样，超验主义者也抛弃了加尔文教义，相信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的，上帝是仁慈的。它对美国社会的缺陷采取一种积极批评的态度，它也相信一切事物都会善终的观念，每个人都应

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相信人生的目的“是进行改革；对人类已经创造的事物再创造；谴责谎言；模仿伟大的自然来恢复真和善；因为拥抱着我们所有人类的大自然，没有一刻沉睡在过去的古老的环境里；而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她自己，每天早晨给我们带来一天，她的每一次脉搏都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64]

19世纪20年代新一轮的奋兴运动更是第一次把拯救灵魂的愿望同积极从事社会改革的兴趣结合了起来。那些相信千禧年将在基督复临之前到来的信徒，感到迫切需要进行至善至美的改革，作为上帝最终统治人间和最后审判作准备的必要步骤。

宗教从两个不同的，但是平行的方面促进了改革。首先，超验主义者赞扬人的神性，号召每一个人在追求公正和正义时要相信自己的良心。梭罗写道：“尊重法律，不如尊重公正之可取，我唯一有权承担的义务是无论何时，我认为怎样做正确，就怎么干。”其次，福音派、新教奋兴派，正如他们大多数在美国传教团体中所做的那样，把善行看做圣洁和皈依过程的表现，把改革看做教会的主要职责。奋兴派领袖查尔斯·芬尼写道：“除了真理还有什么能改造人类呢？如果教会和牧师不传播真理，还有谁来传播真理呢？认为基督教徒可以保持中立和袖手旁观而又可得到上帝的赞赏，可以享受上帝赐福的思想，要打消掉。”^[65]

在宗教精神和宗教人士的推动下，19世纪上半期的改革运动蓬勃展开。比如，在对待罪犯和神经错乱者的待遇方面，改革家们提出了较为开明的罪犯教育方法，敦促社会对罪犯采取以改造为主，而不是重在惩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些州，特别是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接受了罪犯是环境而不是性格的某种缺陷造成的观点。青少年罪犯被送往教养院或收容所，用更适合青少年的教育去改造他们，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与年长的罪犯混合地关在一起，以避免年长罪犯向他们传授作案技巧或密谋对付监狱看守等腐蚀性影响；男女犯人分开关押；不许犯人喝含有酒精的饮料；一些古老

的司法残余，如债务监禁、鞭打、当众处决也被废除。后来死刑也受到批判，1837年在缅因州，1842年在弗蒙特州，死刑被废除。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也提出了类似的提案，但未获通过。

精神病患者也得到更多关怀，在一些人道主义热心人士如波士顿的女教师多萝西亚·迪克斯的倡导下，州立精神病院纷纷建立，对精神病患者开始进行试验治疗。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过去，由于对精神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所知甚少，精神病患者要么由其家属照顾，要么被关进监狱和济贫院，境况凄惨。因此，社会讨厌这些不幸的人，认为精神病患者是自己出错，自食其果，人们所关心的是精神病患者只要不造成公害就行。1841年，多萝西亚·迪克斯首先发动对她所在州的精神病患者的状况进行调查。两年后，她向州议会提供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反映真实情况的请愿书。她在其中写道：“日前关在本州境内的囚笼、密室、地窖、牛栏、畜厩之中的神经错乱者的状况，真是惨不忍睹！他们脚镣手铐，赤身露体，还被鞭笞棍打，迫使就范。”^[66]她在1887年去世之前，一直在孜孜不倦、耐心地为唤醒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的注意而进行工作，并且由于她的情真意切，又掌握着事实，所以成就很大。到19世纪50年代，已有28个州设立了精神病院。尽管迪克斯小姐和其他人道主义者积极游说，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很久，把精神病患者关进收容所的做法才得以废除。

对罪犯、贫民和神经错乱者的关心，与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即禁酒，紧紧联系在一起。19世纪初，美国人普遍酗酒成风。在1818年，有人做过调查，纽约市有营业执照的低级酒吧共1900家，没有营业执照的少说也有600家。费城也做了类似的调查，发现5岁的小孩拿着几分钱到街角的杂货铺买酒喝。酗酒之风并非只在城市里刮。农民的地窖里藏着大量的甜酒和威士忌，不仅自己喝，来帮忙的雇工也喝。洗礼、葬礼，每个社交场合都离不开酒；

无论是国会制定一项法律，还是在边疆修筑篱笆，每办一件事，参与者无不喝得醉醺醺的。人们普遍认为酗酒不仅是造成城市工人贫困不堪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那些不幸状况的根本原因。宗教界人士认为，酗酒不仅是一种坏习惯，而且是一种罪孽。莱曼·比彻说：“那是火的河流……在大地上滚滚而来，破坏了不可或缺的空气，扩散着死亡的气氛。”^[67]

因此，禁酒不仅使罪人可以改过自新，而且还可以推进整个社会改革计划。1826年美国便成立了美国禁酒运动促进会，后改为美国禁酒联合会。在它的推动下，1851年，缅因州率先通过了禁止和出售酒类的第一项州法律；在不到10年时间里，又有北部和西部12个州仿效缅因州的榜样，但是这些法律大部分只不过实施了几年。达到高潮之际的禁酒运动就像是宗教上的一次奋兴运动。不过，虽然禁酒运动时间较短，但禁酒运动本身没有失败，因为在1830年以后的20年间，酒类的人均消费量有了明显下降。

禁酒等改革运动带来了女权运动。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妇女地位十分低下，与男子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用布莱克·斯通的话说便是“丈夫与妻子应视为一体，而丈夫是全权代表”。^[68]

比如，在夫妻家庭生活中，法律规定，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结婚时带来的财产或婚后继承的财产都归丈夫所有。妻子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时，没有权力订契约、签合同、立遗嘱或打官司。离婚的情况极为罕见，但一旦离婚，无论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孩子归父亲抚养。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法律规定妇女没有选举权，不得担任公职，除少数富裕家庭女子可以在女子学校学习礼仪之外，学校的大门对女子是关闭着的，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连在公共场合讲话或去教堂作祈祷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萨拉·格里姆凯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凯就曾因为在北部参加废奴运动时，面对“杂乱”的听众——即男女混杂的听众——发表演说而受到谴责。1840年包括伊丽莎白·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在内的一

群妇女作为代表去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全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但遭到拒绝，没有给予她们参加会议的权利。不仅如此，妇女还得忍受性的双重道德标准，婚前发生两性关系或婚后私通，对有地位的妇女是绝对禁止的，但对男子，如果不是可以宽恕的话，也是可以容忍的。总之，在当时美国男子的眼里，妇女是受保护的对象。她们在身体上、智力上和感情上都不宜参与公共事务或从事专门职业。妇女的职责主要在于履行其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超越她们的职责，就是破坏柔顺服从、虔诚贞洁的品德，而这些品德，根据妇女杂志的言论和男子的认识，是真正的女性特征。^[69]

对妇女参加改革运动的限制，反而激起了一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成为这一时代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比如，妇女废奴主义者常常把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合二为一，使其成为一种双重的运动，安吉丽娜·格里姆凯解释说：“调查奴隶的权利，使我对自己的权利有了更清楚的了解。”^[70]很多妇女把自己对丈夫的这种屈从地位就看成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她们公开倡导通过离婚来结束不幸婚姻，提倡节制生育和承认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主权。1848年，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了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会上代表们通过了山斯坦顿夫人起草的一项声明，声明对《独立宣言》作出解释，并宣告“人人生而平等”。声明具体列举了妇女的不满以后，要求“立即承认妇女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71]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对女权运动表示支持。

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还包括教育改革、和平运动及公有社会运动等。在19世纪早期，除马萨诸塞州外，穷人家的孩子呆在家里、教会学校或慈善学校中接受初等教育，而富人家的孩子是在私立学校或从家庭教师那里接受初等教育。由于缺乏公共资助，而且大部分教学工作者都是由一些把教学看做临时工作、没有经过训练的年轻人，所以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人民大众都处于半文言状态。

育改革的目的是发动由政府用税收来资助的免费公共教育运动。这种改革的理论是，教育是“人类生活状况的最有效的平衡器——社会机器的平衡轮……这比消除穷人对富人的敌意更为可取；它可以防止贫穷”，给人以上进的机会；对一个以成年人选举权的政治制度来说，群众教育是必不可少的。^[72]1830年以后的20年，为建立初等教育的公共责任制度，改革家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和平运动主要是针对拿破仑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的惨象，改革家们希望找到一些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致力于世界和平，使干戈扰攘和沉沦的世界实现和解并得到拯救。1812年战争后不久出现了地方和平会，1828年联合组成美国和平协会，其创始人为缅因州的威廉·莱德船长，他同时也是该组织《和平先驱》杂志的主编。他在1840年出版了《论国际大会》的小册子，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解释国际法，并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法庭予以实施。大多数倡导和平的改革家对于为侵略和自卫两种目的而使用暴力是加以区别的，并且谴责前者。极端和平主义则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到50年代，随着美国南北地区冲突的加剧，这一运动渐渐失去影响。

公有社会运动也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实验。苏格兰空想主义者、纺织工厂厂主和慈善家罗伯特·欧文希望通过合作劳动和财产集体所有来消除贫穷和犯罪，并在1825年到印第安纳州的新协和建立一个非宗教公有社会企业，来实践他的理想，但不到两年，新协和在经济上失败了。1836年，由至善论者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他的家乡佛蒙特州的帕特尼所建立的圣经共产主义者联合会则成功得多。1847年他因宣扬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杂婚，为邻居所不容，便迁到纽约州中部，成立奥奈达社团。尽管外界对其内部的性生活状况持敌视态度，但该社团仍然发展到300名成员，经济繁荣，有一个很大的农场和几个制造企业，建立了一

种模范教育制度。该社团一直延续到 1879 年。法国的查尔斯·傅立叶则主张建立法朗吉，在这一组织里人们共同劳动，集体消费，但仍保留私有制。产品按劳动、才能和资本的比例分配。傅立叶思想为超验主义者及其他至善论者所接受。其实验基地最著名的是 1841—1847 年间存在于波士顿附近的布鲁克农庄，由乔治·里普利建立。改革家们希望由此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代替现有的竞争性的虚假的秩序，而“创造出一个自由、有知识和有教养的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可以过上“比在我们这个竞争性社会制度的压迫之下所过的生活更简朴，更健康”。^[73]当然，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实现过。

在改革洪流的冲击下，道格拉斯不仅自己投身其中，对所有改革运动表示过支持，而且《独立宣言》的原则日益深入他的内心，他成了一个杰斐逊民主思想的崇拜者，一个至善论者。道格拉斯的思想日益成熟，他也更趋向于独立思考问题。他发现，虽然废奴是他的主要事业，但各种反压迫的斗争很难截然分开。在 1846 年 2 月 26 日，他写信给加里森：虽然他越来越把自己当作被剥夺、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中的一员，但他很难让自己对人类大家庭的任何苦难和错误都无动于衷，他不仅是一个美国奴隶，而且是一个个人，因此，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整个人类兄弟的福利作出贡献。

1848 年 6 月 14 日和 15 日，道格拉斯首次参加全国自由党在布法罗举行的总统选举年秘密大会。他对这次大会的议程印象深刻，尤其是对格里特·史密斯宣读的一封信名为“致北部各州有色人的信”更是难忘。史密斯在信中要求他们“证明在工作、经济、禁酒和教育中比白人更能干，以此驳斥黑人只适合做奴隶的陈词滥调”。大会对妇女选举权和十小时工作日的支持也给道格拉斯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月后，他又参加了自由土壤党的成立大会，该党主张把奴隶制限制在它现有的疆界内，反对把奴隶制扩展到新的领地。道格拉斯对此很感兴趣。不过他仍然忠于加里森主义，反对把

政治行动作为废奴主义战略。

尽管道格拉斯在口头上声称他仍然坚持加里森的道德说教战略，但在实际上他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行动派的活动，这本身就表明他已越来越意识到政治行动也许可以帮助废奴主义事业，实用的想法对他越来越有吸引力，那就是不论什么战略，只要能促进废奴运动，就应该得到所有废奴主义者的支持。但是一个时期他徘徊在道德说教派与政治行动派之间。当黑人废奴主义者塞缪尔·R·沃德问及纽约的黑人选民在 1848 年总统选举中是否应该支持自由土壤党候选人马丁·范布伦时，道格拉斯响亮地回答说“不！”但是他又说，他们投票的话，他建议他们投票支持主张立即无条件废除奴隶制的自由党及其候选人格里特·史密斯。但一个星期后，他却重申“我们投票选举是违反我们的废奴原则的”。^[74]道格拉斯的这种矛盾立场反映了此时他在重新评估道德说教和政治行动作为废奴战略时的复杂心情，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人一个肯定的答复了，因为此时他自己也在左右为难。

促使道格拉斯最后肯定政治行动可行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1846 年出现的威尔莫但书。道格拉斯相信威尔莫但书是全国人民伟大原则的体现，只要耐心地努力，终有一天会永远消灭人类奴役的制度。威尔莫但书规定在从墨西哥夺取的土地上禁止奴隶制度，第一次把反对奴隶制扩展到领地的问题提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这是自由土壤党原则的一大胜利。道格拉斯明白仅仅禁止奴隶制扩张是远远不够的，但它仍然是反奴隶制的一大突破。他写道：“它有助于把问题提到全国人民面前，加深他们对奴隶制的仇恨，打破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和睦，这一点长期阻碍着奴隶反抗残酷主人的起义。”^[75]

威尔莫但书虽然在众议院多次获得通过，但都遭参议院否决，最后还是以 1850 年的妥协告终，出现所谓“居民主权”原则，由新领地当地居民来决定奴隶制的废存问题，这无形之中把 1820 年

的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的分界线也废了，奴隶制可以说又取得了一次胜利。从这一事件中，道格拉斯敏锐地感到，彻底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有可能在国会展开，全国的注意力都将集中在那里。

从此以后，他对政治行动的信心在增长，1851年他的《北极星》报与自由党的报纸合并，改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政治废奴主义者格里特·史密斯成为这一报刊的财政支持者。这一事件标志着道格拉斯与政治行动派的正式结盟。道格拉斯很快成了合法政治行动派的代表人物。

道格拉斯在转向赞成政治行动的同时也在考虑宪法究竟是亲奴隶制的还是反奴隶制的这一问题。在1849年2月那一期的《北极星》上，他告诉一位打算与之争论的罗切斯特居民说：“美国宪法如果严格按其字面意义来看，无论哪一条都是反奴隶制的。”那位居民听了很高兴，这样争论就不必要了。不过，道格拉斯仍然认为，美国建国以来的实践使宪法成了奴隶主手中的工具，他不能据此去投票或发誓支持它。^[76]尽管如此，道格拉斯已经不像正统加里森主义者那样把它看成不折不扣的亲奴隶制文献了。

道格拉斯这一立场引起政治废奴主义者的喝彩和加里森主义者的担心。为了缓和同加里森派的矛盾，道格拉斯在1849年3月16日还特意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作出解释。他说，宪法“只有在按其字面意思解释，而不考虑其制定者和采纳者们的意见，也不考虑我国自从采纳这部宪法以来一贯的、普遍而坚定的实践时，才不是一件亲奴隶制度的工具”。不过在道格拉斯的心中，他还是倾向于把它看做是反奴隶制的工具的。他曾对格里特·史密斯说，如果史密斯能让他信服，宪法是反奴隶制的有效工具，那么他将“愿意愉快地、热心地”把它当作自己反奴隶制的哲学。道格拉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道德说教虽然有助于唤起美国人民的良知，加深对奴隶制的痛恨和对黑人的同情，但它并不是反奴隶制度的唯一有效方法。

面对加里森派骂他是异端的批评，道格拉斯回答说：“真正的坚定不在于现在与以前观点一致，而在于坦诚的原则，在于告诫我们采纳或抛弃现在是正确或错误的东西。”^[77]对于过去正确的东西，他仍然要坚持，比如，他后来虽然变成了政治行动派，但他仍然支持妇女平等权思想，这是加里森主义在他身上的延续，而政治废奴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与加里森主义是有分歧的，他们不赞成加里森派给予妇女在废奴运动中的平等的领导权。

1851年，道格拉斯完成了他的大转变，宣布他现在认为宪法是一份反奴隶制的文献，根据这部宪法采取政治行动废除奴隶制是可行的。这里道格拉斯就不管宪法制定者的实际打算如何及其宪法实际施行了，这两点正是支撑加里森派对宪法作出亲奴隶制解释的依据。道格拉斯只是从“理性和道德上揣测那些宪法制定者们的打算”。按照这一思路，不仅奴隶制是一种与宪法相违背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制度”，而且宪法的每一条都赋予各州废除奴隶制的权力。道格拉斯推断说建国之父们都把奴隶制看成是一种罪恶，相信它会灭亡，所以才有1808年禁止国外奴隶贸易的规定，这说明宪法制定者的愿望是好的，而不是坏的，他们不可能在宪法中去保护奴隶制。用来证明宪法是亲奴隶制的条款并没有清楚地提及奴隶制度，也没有清楚地说是用来保护它的。与此相反，宪法中倒是有很多地方是反奴隶制度的，如第四条修正案中“人人具有人身安全保障的权利”；第一条第九款禁止中止“人身保护和褫夺公权”；第四条第四款“保障每一州共和政体”等等。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制定必要而适当的法律”，以保证联邦权力的实施，按照道格拉斯的观点，这一条实际上给了政府废除奴隶制的权力。^[78]

尽管道格拉斯尽了最大努力对这些条款作出反奴隶制的解释，但即使如此，宪法中的这些条款也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它们所涉及的都是些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奴隶制并没有直接关系，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相反，倒是加里森主义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因

为宪法在文字上同奴隶制的确有更直接的关系，当然经过了一点掩饰，没有直接点名。

在对宪法作出反奴隶制的解释后，道格拉斯自然转向放弃解散联邦的主张。这也是他与加里森发生分歧的地方。

道格拉斯认为，“不与奴隶主共处同一联邦”只是一种“消极的反奴隶制”的方式，因为按照这一逻辑就是“解散联邦，让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以他们的方式去斗争”，由于奴隶主阶级在数量、教育、军事力量和组织上的优势，如果假设北部一旦不在联邦内，奴隶们只能在没有“武装、没有统一行动”的情况下自己去争取自由。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北部对南部黑人的责任，使奴隶的事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听任奴隶主对他们任意宰割。它也正好道出了鼓吹奴隶制的人们的期望。认为奴隶在没有北部的情况下会发展得更好、解放得更快，是极其荒谬的。肢解联邦就等于放弃解放。道格拉斯认为，全国对奴隶制的责任，也意味着废除奴隶制也必须采取全国行动，自由州应该促成这一点的实现。因此，虽然从对奴隶制的憎恶上看，肢解联邦在感情上很痛快，但却不是一种明智的行动准则，“给责任的道路没有洒下什么光明”。对道格拉斯来说，全国不仅有责任恢复奴隶“失去的权利”，而且这种道德责任在联邦内比在联邦外完成得更好。^[79]应该用“不同奴隶制共处同一联邦”来代替“不同奴隶主共处同一联邦”的口号，在联邦内消灭奴隶制。

教会是美国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开展有效的政治行动，教会的力量不可忽视。道格拉斯从现实主义政治出发软化了原先对教会的攻击。这是他与加里森主义的另一个分歧。

道格拉斯认为，教会和宗教也可以作为反奴隶制的有效工具。他反对不加区别地把有组织的教会都当作奴隶制的堡垒，应该把反奴隶制与亲奴隶制教会区别开来，并与前者一起工作。他尤其反对加里森主义的反安息主义。^[80]

道格拉斯认为应该团结一切反奴隶制的事业的同情者，虽然美

国教会中大多数都是支持奴隶主的候选人，把反对奴隶制的人士称为“危险的激进分子”，但是教会中也日益增强着反奴隶制的情绪，例如 1845 年，南部的浸礼派在主教、牧师能否拥有奴隶的辩论中失败，被迫组成他们自己的教会。作为黑人领袖，道格拉斯有必要脱离加里森派对待教会的顽固态度，与教会中的反奴派别合作。

道格拉斯与加里森主义始终存在的一个分歧是他反对不抵抗的主张。

道格拉斯认为，在面对压迫者的暴力时，奴隶可以行使自己反抗的权利，必要时可使用武力。1850 年时，道格拉斯针对《逃奴法》带来的对逃奴或自由黑人的疯狂追捕指出，由于这些人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敌人，杀死他们是无罪的，因为在上帝眼里，这就像杀死一个扑向婴儿的凶恶的豺狼一样。他告诉黑人武装自己准备反击。“每一个有色人在睡觉时枕头下都要放一把手枪，把子弹推上随时备用。逃奴一到达北方城市就应该被武装起来，并教育他们，对那些企图剥夺自由的人射击是没有罪的。”^[81]这种行为不仅正当，而且还是反对黑人低下论的一个重要证明。如果黑人自己不在这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那么他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资格是值得怀疑的。

所有以上的分歧聚在一起，终于在 1851 年 5 月来了一个总爆发。在这一年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锡拉丘兹会议上，道格拉斯公开提出了赞成把政治行动作为废奴战略的观点，这样，他同加里森的分歧表面化。加里森及其追随者对道格拉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骂他为“叛徒”与“该死的敌人”联合，蜕变成一个政治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试图平息他们的愤怒，避免与之分裂，但没有成功。1853 年 9 月 23 日，加里森写道：“与道格拉斯的决裂似乎已成定局，我对此很悲哀，但这是不可避免的。”^[82]

必须指出的是，除了他们的政治分歧外，加里森派的种族主义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待道格拉斯种族

主义态度加速了道格拉斯的独立思考和政治成熟。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在与加里森派的分歧和斗争中，道格拉斯的思想的几个核心部分慢慢形成了：（1）坚持合法的原则，要在宪法范围内行动；（2）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教会、妇女以及其他同情黑人事业的团体和人士；（3）要积极展开斗争，不能等待，不能屈从。

第四节 反对北部的种族歧视

· 反对加里森派歧视黑人的斗争

道格拉斯与加里森等白人废奴主义者频频发生冲突，除了在解放黑人的策略认识上逐渐产生分歧这一原因之外，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种族偏见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黑人所处的低下地位，道格拉斯从一来到北方就已从白人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中得到感受，并且一再重复这一感受。例如，1838年道格拉斯来到新贝德福德，找工作养家糊口，但他发现那里的白人填船缝工对他并不欢迎，这与他在巴尔的摩船厂见过的白种工人对黑种工人的歧视并没有什么两样；1841年8月10日，道格拉斯第一次与加里森等废奴主义者乘船到楠塔基特旅行，“电报”号船长要求黑人乘客乘坐单独舱位，否则就不开船；1847年道格拉斯在英国搭乘从冈比亚开往波士顿的轮船回国时发现自己订好的舱位给了别人，还被告知除非自己愿意单独吃饭，放弃已付过款的舱位，否则就不准登船；1850年，道格拉斯与白人朋友们在纽约街头并肩行走时遭到一伙暴徒袭击，其中一个趁道格拉斯不防备，偷偷窜到道格拉斯的后面，在他反应过来之前照他的面部狠狠打了一拳。暴徒的袭击原因很简单，道格拉斯与白人在纽约街头行走不是作为奴仆，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人，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愤怒。这样的事道格拉斯经历得太多了。

使道格拉斯感到痛心的是，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不仅在一般白人身上存在，就是在废奴主义者身上也严重存在。虽然这些人与普通白人群众的思想境界不一样，但他们仍然不准各把黑人当作与他们平等的一员，一个平等的人来看。比如，在两大全国性废奴组织中，无论是加里森派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还是政治行动派的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都几乎没有让黑人晋升到显要位置。另外，白人废奴主义者对道格拉斯在思想上独立思考所作出的几乎是污辱性的反应，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深深失望和遗憾，而且，也是不想让道格拉斯——一个黑人去说出他自己的思想。争论中的焦点，并不在于道格拉斯的思想不忠和不纯，而是在于他想要成为他的种族的发言人。^[83]

在废奴运动中，道格拉斯的导师们对他日益表现的独立性感到不安，他们不时地给他以忠告，让他更多地只是叙述和谴责奴隶制的罪恶，理论问题由他们来做。他们说他要是对废奴主义原则有什么议论的话，就会损害他作为前奴隶转化来的废奴主义者的权威。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斯蒂芬·福斯特告诉他：“道格拉斯，如果你继续那样做，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以前是一个奴隶。”柯林斯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告诉道格拉斯：“成为你自己，讲你自己的经历。”他还建议道格拉斯：“最好用一些种植园的语言，你显得很有学问并不好。”^[84]

虽然道格拉斯后来承认这些人在动机上也许是好的，当时公众也的确在怀疑道格拉斯的身份。但是，加里森派把道格拉斯的作用限制在一种陪衬位置上，除了担心公众的反应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种族偏见，他们不想把道格拉斯当作平等的一员加以接受，他们以一种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道格拉斯。诚然，加里森废奴主义者是致力于消除种族等级的社会障碍的，1833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纲领也包括了解放黑人自由和提高他们地位的内容，但是把他们的地位提高到什么程度，白人废奴主义者心里是很清楚的，

即黑人不论怎样总是比自己低劣。因此，他们只是在理论上同意提高黑人的目标，在实践上，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打算去实行的。但道格拉斯对此是非常重要的，他把他们对黑人邻居的态度看做是检验他们对黑人解放和种族平等承诺的真正标准，那些认为废奴主义只适用于南方的人只是假的废奴主义者。废除奴隶制是必要的，但只有消除种族主义后，胜利才算完整。^[85]

当然在某些方面，白人废奴主义者也在身体力行地促进黑人地位的提高。例如，曾经有一次，在一次演讲旅行中，温德尔·菲尔蒲斯听说道格拉斯被迫坐一辆专为黑人准备的肮脏的邮车时，他在一帮“文明人”的睥视之下毅然上前来到道格拉斯旁边，与他一起登上邮车，并对他说：“道格拉斯，如果你不能与我一起乘车，我可以和你一起乘车。”^[86]另外，像菲尔蒲斯这样的人有时宁肯挨饿，也不肯在道格拉斯被拒绝的餐厅就餐。这些行动同朱莉亚·格里菲思姐妹和道格拉斯手挽手在纽约街头行走的举动一样，是对当时的种族偏见的有力控诉，给道格拉斯以极大鼓舞和安慰，在当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对于各种种族偏见行为的本质，道格拉斯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他曾经总结说：“我们成为受迫害的民族，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有色人，而仅仅因为黑色多年来与由于奴役和奴隶制度造成的低下联在了一起。”^[87]他举例说，自己与白人妇女走在一起的时候，就遭到那些贫穷白人的攻击，而一些白人女士和她们的黑人奴仆骑马穿过大街时，却引得这些贫穷白人阵阵羡慕眼光。

道格拉斯认为，这种对黑人种族的偏见是邪恶的，既违反自然，又不合理性，“是我们所有社会灾难和不幸的秘密所在。由于它，我们被迫害、被掠夺和被压迫。它不仅把我们礼堂、旅馆、汽轮舱位、选举箱、学校、娱乐场所、教堂，从几乎每一个体面的职业，甚至从……高贵的墓地中排除在外。正是这种几乎是用雷电武装起来的狠毒的偏见，把任何胆敢寻求他自己和他种族的真正提

高的黑人劈死。在我们的境况发生根本好转之前，我们一定要应付并克服这种偏见”。^[88]

因此，在一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道格拉斯在反对南方奴隶制度的同时，也在北部开始了反对种族偏见，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的斗争。

二 道格拉斯与女权——废奴主义者的斗争

道格拉斯虽然帮助了标志女权运动诞生的 1848 年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会议的成功召开，但到 50 年代后，道格拉斯与女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就冲突不断。冲突的根源在于女权——废奴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种族偏见。在内战爆发前，道格拉斯反对女权——废奴主义的种族偏见的斗争主要有两轮。

第一轮发生在 1854 年，这次冲突的中心在于：妇女事业是不是高于黑人的事业，妇女是不是在一切方面比黑人优越？对这一问题，妇女运动领导人的态度是肯定的，而道格拉斯则予以坚决否定。这一年初，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女权运动的领导人斯通到南部旅行，她为了不得罪南部奴隶主，采取了一条保险的路线，只鼓吹妇女的权利，对黑人的权利却只字不提。甚至连奴隶妇女的权利也不提。道格拉斯非常厌恶这种同奴隶主的妥协，自然，他也不能赞同她关于妇女权利（白人妇女）高于黑人的观点。^[89]1854 年 2 月，斯通到费城音乐基金会堂演讲又遭到道格拉斯猛烈抨击，因为黑人被禁止进入那个会堂。他说：“当她了解到有色人被排除在音乐基金会堂外的時候，斯通小姐应该清楚她自己实际上也被排除在外了。……作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一个可敬的妇女，她应该对此有所表示的。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都行。要是她离开讲台，说，收回你的钱吧，我不能在这排除（黑人）的地方演讲，那么，她一定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他们的尊敬价值连城。”^[90]道格拉斯把斯通去演讲看做是不明智地去迎合种族主义，为了白人妇女的利益而牺牲黑

人的利益。

同样在 1854 年 2 月，道格拉斯还同另一个著名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C·斯坦顿发生了冲突。起因是在 2 月 14—15 日于塞尼卡福尔斯举行的女权大会通过了由斯坦顿给纽约州议会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这样写到：“我们（白人妇女）在道德、品质和智识上，在一切方面，都同骄傲的白人男子相等；但是，根据你们的法律，我们却与白痴、犯人以及黑人归为一类。”道格拉斯对这种区分是不能接受的。他说：“我们愿意让妇女与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包括选举权。我们还准备为之奋斗，但我们不能认为，即使在语言上，她们比我们更好。”^[91]

1854 年的冲突更使道格拉斯相信：反对种族主义比反对性别主义更重要。他认为种族主义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使黑人降到非人的地位，而性别主义只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压迫形式。这种思想在当时的黑人中间，甚至在许多白人女权主义者（主要是白人男子）中间也严重存在。这实际上反映出那时男子至上的偏见。道格拉斯认为，黑人男子遭排斥是一种“邪恶”，而妇女遭排斥只是一种“错误”。他强调说：“妇女被排斥并不是基于她低下或由于憎恶；相反，一种与恶意完全相反的东西使她遭排斥。这是一种错误，一种可以用光明与真理克服的错误。黑人男子被排斥则不是这种情况，是出自一种使之低下的恶意的决心。这不证自明。”^[92]

道格拉斯进一步分析了财产奴隶制（即黑人奴隶制）与性别奴隶制的差异。他说，如果奴隶制仅仅意味着对选举权的否定，则“所有妇女都是奴隶，因为她们在全球都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严格地讲，他不喜欢用“奴隶制”一词来指代性别压迫，因为“奴隶制是一种必须被当作不同于此的东西，应当是一种一个人可以把另一个人当作财产，可以随意摧毁他天性中任何较高级的品质，剥夺他的身体和灵魂的东西”。

道格拉斯还相信，男女之间爱与信任的天然联系使种族优越论

与男子优越论不可同日而语，不能进行严格的类比。与种族主义不同，性别主义并不是建立在恨与任意虐待基础上的。跟妇女不一样，“奴隶……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只是市场上的商品”。^[93]

道格拉斯的这种观点遭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如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等人的激烈反对。她们认为道格拉斯是在随意缩小男子优越论的邪恶，男子在有史以来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就是男子一直把妇女当作“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地拥有和滥用。

道格拉斯把性别主义当作一种错误，而把种族主义当作一种卑下的邪恶形式是不恰当的，也违背了他自己的平等主义思想。“他显然没有看到男子优越论与种族优越论都是极端不公正。尽管他对黑人和白人的实际生活所作的比较分析无可挑剔，但他对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所作的道德上的比较从概念上就是错误的，虽然黑人，尤其是奴隶制度下的黑人比白人妇女经受了更多的邪恶敌意与压迫。”^[94]这也反映出道格拉斯本人在潜意识里存在或多或少的男子优越论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

道格拉斯与女权主义领导人之间的第二轮大冲突发生在 1859 年。这轮争论的中心是妇女权利能不能以黑人的事业为代价？其起因是斯通为了争取民主党对女权运动的支持，曾邀请民主党领袖斯蒂芬·A·道格拉斯去参加 1859 年 9 月 12 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妇女代表大会。斯蒂芬·A·道格拉斯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曾与林肯就美国奴隶制问题展开过论战。尽管斯蒂芬·A·道格拉斯没有接受邀请，但这件事仍让道格拉斯非常愤怒。他指责斯通说：“露西·斯通经常为了追名逐利的强烈愿望而拿她的反奴隶制原则作交易。”她的这种“仁慈的奉承”反映了她的机会主义，她把一个憎恨黑人的魁首请到妇女大会的座席上，很难说她是在为反奴隶制的事业作贡献。^[95]女权主义领导人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护。斯坦顿夫人就认为，虽然自由妇女所受的压迫与“黑人奴隶所受的压迫不一样”，但“套在她身上的枷锁是一样的”。斯通也对指责她专为妇女权利

而鼓吹违背了废奴主义原则予以辩解。她说，“我在成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之前首先是一个妇女，我必须为我们妇女说话。”^[96]

道格拉斯不同意斯通的辩护中有关黑人妇女所受的不公正与白人妇女所受的是一样的说法。道格拉斯认为，在白人废奴——女权主义者中，这一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偏见和高度的迟钝所致。不先提奴隶制及其下面的黑人妇女，而讨论妇女的压迫是错误的。道格拉斯的这一立场得到一些更有远见的废奴——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妇女本身深深卷入废奴运动一事就已经说明她们对身处奴隶制下的同胞姐妹的深切同情。伊丽莎白·钱德勒在比较了大量自由妇女和奴隶制度下的妇女的状况后，要求她那更幸运的白人姐妹们同情并帮助比她们较为不幸的黑人姐妹。^[97]

在道格拉斯及其他进步黑人的思想中，黑人的解放也要求对黑人妇女的苦难予以特别的关注，他们支持男女平等。1854年，道格拉斯曾提议建立黑人工业学校，他主张把黑人妇女也吸收进来。他认为黑人妇女可以在这里得到训练，学习与男子一样的“享受独立而体面生活的方法和手段”。著名黑人牧师亚历山大·克拉迈尔也认为：“真正的文明只有在妇女的生活被触及的时候才能达到。那时她的身上将弥漫着高尚的气息，她的良好的品味将丰富整个文化，她对美的追求将得到赞赏和发展，她的单纯而柔美的天性将发展到极致。”^[98]

道格拉斯虽然是女权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女权主义者。他的女权改革思想与他当奴隶的经历，他作为黑人种族的一员是一致的。在黑人人身获得解放之前，也即奴隶制被废除之前，他的女权思想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境界；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他的女权思想又体现出他作为一个黑人领袖的思想限度。他支持妇女解放，但他更支持他的种族的解放。道格拉斯首先是一个黑人领袖，其次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不这样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女权改革思想与其行为的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更

无法理解他与女权运动领袖发生分歧及其关系的演变。

道格拉斯与女权运动领袖之间的关系可以 1876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即 1848—1876 年间，他们之间冲突始终存在，但道格拉斯始终没有停止对女权运动的支持，即使在与女权运动的领导人意见相左时也是如此。在后期的 1876—1895 年间，他们之间则通力合作，为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共同打下了 20 世纪妇女投票权运动胜利的基础。

在道格拉斯的社会改革思想的轻重缓急中，废除黑人奴隶制和黑人的解放是首要的，废除性别奴隶制和妇女解放是次要的。当然，对妇女解放他是坚决支持的。早在 1851 年，他就表示，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黑人解放事业中并不意味着他对妇女解放斗争不闻不问，或远离这一斗争。这种优先考虑反映了他对社会上最邪恶的东西——种族主义的认识。他说：“我们身处如此苦难的时代，面临砸碎奴隶制的伟大工作，我们还要帮助不幸的、被追捕的逃奴从那些残忍的追捕者手里逃到安全地带，因此我们没有时间考虑妇女经受的不平等、不公正与苦难。”但是，他强调：“妇女的权利与男子的权利是完全相同的。”^[99]

因此，对道格拉斯来说，“妇女问题”与种族问题在某些方面是天生相连的，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又是分离的，截然不同的。有人说是妇女问题引发了 1840 年废奴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对此，道格拉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妇女问题”只是分裂的导火线而不是原因，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道德说教与政治行动这两种战略对于废奴运动到底哪一个更为有效？实际上无论是道德说教派，还是其他激进的废奴派别，都对妇女解放有着庄严的承诺，只不过道德说教派（其组织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把妇女看做平等的政治伙伴，认为其有权担任运动的领导职务，而政治废奴派（其组织为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则不把妇女当作平等的政治伙伴，认为她们的工作只是辅助性的，不能在运动中担任领导职务。对于有人

借妇女问题大做文章，道格拉斯认为，妇女问题相对于黑人奴隶制问题来讲是一个枝节问题，如果这种偏离正题的问题导致废奴运动分裂才真是一个悲剧。这个问题同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所要建立的目标毫无关系。道格拉斯建议，那些勇敢但搞错方向的妇女“为了黑人的缘故”，应把自己的抗议往后拖一拖。道格拉斯怀疑，把妇女问题与废除黑人奴隶制问题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否明智，因为前者还不是像后者那样为一般人所接受。道格拉斯设想，“妇女的斗争可以在她们自己的阵地上进行，因为反奴隶制的事业已经负荷太重，再加上妇女的事业就会走下坡路”。^[100]道格拉斯的这种思想本身有其合理的一面，从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未必能被妇女接受。

三 道格拉斯办报

道格拉斯在内战前最持久、最成功的反对偏见的举动是独立创办反奴报纸——《北极星》报。当时废奴主义组织已拥有《解放者》、《全国废奴旗帜报》等好几种报纸，不过它们大多由白人废奴主义者掌握。黑人有办报的，但都很短命，影响也小。道格拉斯办报的想法刚一出台，就遭到加里森派的反对。他们有的预言，他办报肯定会失败，有的则想让他知道，召他来是作为一个演讲员，而不是作为一个报纸编辑和出版人。塞缪尔·J·梅评论说：“我认为他（道格拉斯）把自己的职业搞错了。他会后悔的。”温德尔·菲利普斯也声称，道格拉斯是在自毁前程。他写道：“道格拉斯应该通过我们的报纸为他的种族说话，运用他的有力声音为全国组织（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扩大影响。”加里森本人则认为道格拉斯这样做是“感情冲动、缺乏理智”的行为。^[101]加里森派白人废奴主义者反对道格拉斯独立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头脑中的一种预设概念，即废奴事业是白人的事，是白人给黑人的恩赐，白人才是领导者，是黑人的救世主。

但是，道格拉斯执意自己办报。他在阐明自己办报的理由时说，黑人与白人都是平等的人，“虽然一个是白皮肤，另一个是黑皮肤，但都是平等的人。白人只有在剥夺黑人提高的途径的时候才比黑人优越；黑人只有在他们不能做白人所做的事时才是低下的。为了消除这种可耻的差别，我们必须做白人能做的一切”。黑人必须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任何白人能做的事。再不能只是白人当律师，黑人当锯木工；白人当编辑，黑人做街头清洁工；也不能再让白人充满智慧，而黑人处于无知状态：“我们必须所有行业、技能和职业上与白人兄弟比肩而立。”道格拉斯认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黑白之间的界线就会消失。他还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他的能力，在于他把他的能力适当地运用于他所做的事情上，不在于他的肤色如何。”^[102]道格拉斯相信自己办报若能成功，就会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驳斥美国流行的黑人天生低下的论调。^[103]

黑人当时办报遇到很多困难，如缺少黑人商家买广告；黑人大多太穷，无法响应筹款号召；白人没有多少人对黑人废奴主义者办的报纸感兴趣，甚至白人废奴主义者也持这种心理等等。但是，由于道格拉斯的威望和采取的正确策略和措施，报纸办得还是较为成功的。

首先，在强调黑人应该而且能够站在新闻反奴战线的前列的时候，道格拉斯没有忘记白人同盟者。他说，他决定办报纸并不是因为他“对白人废奴主义者的热心、正直或能力有什么怀疑或不欣赏”，相反，黑人在独立表达自己的废奴愿望的同时，非常强调白人同盟者的工作。“我们很显然要成为我们自己的代表和鼓动者，但这不是全部，而只是主要的任务。同时，我们不是要与我们的白人朋友分开，而是要与他们保持联系。”^[104]

道格拉斯这样做既在道义上站住了脚跟，使白人废奴主义者不好反对，这样最大限度团结了他们，同时也把黑人废奴主义者及其广大黑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加强了黑人在废奴运动中的声音。黑人

报纸——《反奴隶制号角》报的主编塞缪尔·布鲁克斯全力支持道格拉斯办好这份由黑人领袖创办的报纸。

其次，道格拉斯请白人废奴主义者、英国朋友——格里菲思小姐帮助自己理财，并帮助自己提高写作水平。1847年，道格拉斯决定办报时只有从英国带回的捐款2000美元，买机器等设备就用去大半，不到几个月便全部用完。他不得不自己垫上一部分钱来维持报纸的开支和发行。但这终非长久之策。于是他只好求助于他在英国结识的朋友——朱莉亚·格里菲思小姐。于是，格里菲思便在1848年来到罗切斯特，直到1855年回国结婚，她一直在这里帮助道格拉斯办报。她首先把报纸的财政与道格拉斯个人财政区分开来处理，避免收支混乱状态。然后，她又采取多种办法筹款，如帮助组织反奴义卖市场；1853年仅发动10美元礼物运动就筹集到1000美元；发行由黑白废奴主义者写的反奴隶制文集《自由的传记》；回英国筹款等等。格里菲思的这些措施不仅帮助道格拉斯度过了财政危机，而且扩大了道格拉斯报纸的影响，连国外朋友也来订阅道格拉斯的报纸。

格里菲思与道格拉斯的合作也树立了黑白废奴主义者合作的典范，使道格拉斯在美国国内也赢得了民心，对加里森派的白人种族偏见是一个有力的回击。本来，加里森派就不曾支持道格拉斯办报，现在居然有一个白人妇女公然与道格拉斯站在一起，这使加里森派十分恼怒。他们拿这件事大做文章，甚至不惜对格里菲思与道格拉斯的个人关系妄加揣测，无端攻击，说她是一个无耻放荡的女人，一个家庭破坏者，道格拉斯是她的牺牲品。道格拉斯在1852年不得不写信给加里森派的一个成员塞缪尔·D·波特，否认这些“可怕”的报道。加里森派的指责都是些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作者哈丽特·比彻·斯托指出，对道格拉斯和格里菲思关系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不适当的，也是“不幸的”。加里森自己最后也发表一份声明，收回以前的不实之词，说他并没

有暗示道格拉斯和格里菲思之间有什么不轨行为。〔105〕

这一插曲不仅更坚定了道格拉斯办好报纸的决心，而且也吸引了人们对这份由黑人主办的报纸的注意力。

最后，道格拉斯把握了黑人解放运动的方向，取得了政治废奴派的支持。1851年他的《北极星》报与自由党报合并，改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该报成为政治废奴派的喉舌，一直存在到1860年6月，后由于经济困难，改为《道格拉斯月报》出版，自由党领袖格里特·史密斯成为其财政支持者。这样，不仅解决了办报的稳定资金来源，而且把报纸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宣传废奴主义的主要报纸之一。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通过这一阵地，进而影响到包括自由党员在内的政治废奴主义各个派别。

各界对道格拉斯的报纸反应良好。《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霍里斯·格里利和《阿尔巴尼晚报》的索洛都认为道格拉斯完全可以跻身那个时代最有才能的人之列。罗切斯特的出版协会还邀请道格拉斯出席一个纪念富兰克林诞辰一百周年的会议。道格拉斯非常兴奋，他抓住这一个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罗切斯特出版界的先生们——知识的促进者、自由的热爱者、无知的敌人、偏见的蔑视者——祝愿你们继续作为黑人和白人的自由的智识联盟发挥道德典范作用。”〔106〕

从1848年到1860年间是道格拉斯办报最忙碌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自我提高，拓展智识的时期。在这期间，他从讨论废奴问题到探讨种族偏见的方方面面。道格拉斯使报纸成为反奴隶制度、反种族偏见的强有力的工具，同时也使之成为一个象征。对黑人来说，其他种族人民能做的事，他们也能通过自我提高和进步来做到。黑人也可以为美国文化宝库增添一份智力财富。

四 其他反偏见活动

除了办报之外，道格拉斯还参加了其他一些反偏见、反种族歧

视的斗争。最有影响的是学校的种族合一问题。1848年3月29日和30日，在纽约州的斯特本县的首府巴斯，人们为新建的砖瓦学校该不该收有色人孩子入学展开讨论。该学校是用对该城所有居民的财产所征的一项特别税建立起来的。征税时并没有考虑肤色，而现在由白人居民所签的一份请愿书则要求把有色人子弟拒之门外，还假惺惺地要为他们另建一所学校，以适合他们的身份。道格拉斯对这种行为极为气愤。他在《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白人对黑人的极大偏见，他指出，只要这种偏见存在，黑人要获得公正是不可可能的。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社区处之泰然地玩弄我们的权利，好像我们不是构成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向我们征税，却否认我们的投票权，他们拿我们的钱去建校舍，却不准我们的孩子踏进其门槛。偏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追随着我们。甚至法律也对我们不利。我们由我们的敌人来审判，法官、陪审团和律师都受到邪恶偏见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公正只会是徒有虚名而已。”¹⁰⁷他号召人们消除各种对黑人的偏见。

这一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胜利。但是道格拉斯并不气馁。这一年8月，道格拉斯再一次为消除学校种族隔离起来斗争。事情是这样的。道格拉斯有一个10岁左右的女儿上了罗切斯城一个据说是废奴主义者特蕾西小姐任校长的西沃德小学，校方把她单独放进一间监狱式的小房子，并派一个教师单独为她上课，同时不准她与其他孩子接触，就因为她是有色人。道格拉斯非常气愤地去找校长，特蕾西表示是校董会让这么做的，她也无能为力。道格拉斯同罗切斯特的塞缪尔·D·波特及其他居民一起，经过八年斗争，终于在1857年取得胜利，学校隔离制被废除，黑人小孩被允许上公立学校。

道格拉斯不仅反对白人的种族偏见，也反对黑人对这种偏见的认可。1850年5月，一个白人公民委员会在费城组办一个会议，

邀请废奴主义者、黑人牧师塞缪尔·R·沃德就宪法与奴隶制这个问题发表讲话，但只限于白人听众参加。道格拉斯对这一安排非常惊讶。他说：“要想找到比这种对奴隶制度的精神和偏见让步更可耻的事来并不容易。这是一种被那些声称憎恨和嫌恶奴隶制的人们对它的让步。抛开别的不说，这也是对人类兄弟原则的背叛——为此，自由的朋友已奋斗了二十多年——这是对可鄙的、违背基督原则的‘黑人座’制度完完全全的继承。”道格拉斯还认为，作为反对奴隶制度和压迫的坚强堡垒的沃德的到会就等于承认，“所有由我们敌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即我们不配享有平等权利和生活上的特权”。也等于承认黑人甘愿处于压迫者这种对人类平等的原则和实践的公开背叛。这个城市的有色人就这样被不负责地、令人反感地出卖了。道格拉斯认为沃德不能持中间立场，因为“他是作为自由平等的信徒来到这里的，他应该警惕地注视并勇敢地捍卫人类的自由”。他也要为费城有色人所受到的侮辱和贬黜负责。^[108]

1853年，有“黑天鹅”之称的黑人女歌星伊丽莎白·格林菲尔德小姐在纽约大都会演出。演出广告中竟然写道：“特请注意：有色人不准入内，因为没有单为他们设立座位。”道格拉斯再次出来予以谴责：“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格林菲尔德小姐竟然能容忍让自己受到这样显见的不恭待遇，因为对她种族的侮辱就等于是对她自己。面对一群为肆意贬低并使其种族丢脸而安排的观众演唱，她应该感到深深的羞耻和沮丧。……如果她幻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抛弃自尊来获取成功，那她就完全错了。如果她不那样做，这个国家倒是会有许多宽宏的人们由于她的品德给她应有的赞美和保护。”^[109]此外，道格拉斯还向她发出警告，如果她向这种憎恨黑人的人低头，那她将会在某个地方遇到不可想象的后果。格林菲尔德小姐事后为此公开道歉。

还值得一提的反偏见斗争有1860年对黑人平等投票权的要求。1860年纽约州总统选举中，黑人要有250美元不动产才能参加选

举，而其他人投票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是人就行。道格拉斯对此予以谴责，他认为剥夺黑人平等选举权而谈政府对他们的保护是可笑的。“选票箱和陪审席是紧密相联的，它们都对有色人关闭，而对其他人开放。而选票和陪审席都是人民自由公认的守护神。这个国家的白人同胞如果被剥夺这其中任何一项反对权力和压迫的工具，他们都会浴血奋战来捍卫它。”道格拉斯认为，黑人并不是要求特殊的保护，他们要求公平。“我们只要求给我们的人公平机会，在投票权和其他事务上有平等和绝对的公正。我们希望这个州的人民，无论属于哪一党派，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还是全国联盟，将会看到对我们的公正政策是唯一明智而适当的政策。”^[110]

“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在本质上是对与奴隶制相伴产生的对黑人权利的蔑视的复活”，是给那些随意侮辱有色人的人们一张崭新的许可证。对平等投票权要求的失败，道格拉斯深感痛惜，因为这一失败“将加深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对涉及到有色人利益和情感的蔑视，招致他们对有色人的残忍行为”。^[111]

平等投票权的斗争虽然失败了，却为内战以后这一斗争的继续开了一个好头，进行了一次预演。

内战前以道格拉斯为首的黑人反偏见，争取平等权的斗争还处在积蓄力量的时期，加之废除奴隶制这一更为迫切的任务还摆在面前。因此，争取黑人平等权的斗争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取得重大而全面的进展。

第五节 道格拉斯与约翰·布朗

约翰·布朗是物质抵抗派（或暴力派）的代表人物。物质抵抗派的思想早在 1829 年的沃尔克呼吁书中便已出现，但这一派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主导思想，其影响主要局限在一群人数很少的白人和一些黑人废奴主义者内部，如摩西·狄克森和亨

利·海兰·加尼特等人。在 1843 年布法罗有色人种全国大会上，加尼特就号召他的同胞兄弟姐妹们起来反对奴隶制度，“起义”将成为他们的信条。他认为，没有起义，便没有被压迫者的自由。他号召人们起来造反，但这一提议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在颂扬了奴隶暴动的领袖们之后，加尼特说：

“弟兄们，起来，起来！为你们的生活和自由而战斗。战斗的日子到了。愿举国的奴隶们都起来战斗，奴隶制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你们已受到了无以复加的压迫——你们已承受了凶虐至极的暴行。宁为自由人而死，不作奴隶而生，要记住你们有 400 万人之多！……以上帝的名义，我们要问，你们是人吗？你们祖先那种血气到哪里去了？它是不是都从你们血管里流走了呢？觉醒吧，觉醒吧……愿反抗成为你们的战斗口号！反抗！反抗！”^[112]

1844 年，狄克森牧师在辛辛那提成立了“十二骑士和泰伯女儿会”，要帮助推翻奴隶制。两年后，他又在圣路易斯组织了自由骑士团。

在抗击逃奴法的斗争中，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帕克领导的克里斯蒂安娜地区的黑人成立了战斗性的自卫组织——联防会。该组织为保护逃奴，多次同缉奴者发生武装冲突。1851 年 9 月，当奴隶主爱德华·戈萨奇率领走卒前来索取藏匿在克里斯蒂安娜的逃奴时，威廉·帕克和当地的黑人断然拒绝了缉奴者的“合法要求”。戈萨奇等人向黑人开枪。在激烈的枪战中，戈萨奇被黑人打死，其余缉奴者狼狈逃窜。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克里斯蒂安娜黑人武装抗暴事件。^[113]

在 1845 年黑人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人主张诉诸武力，它通过一个决议，要求被压迫者要么选择自由，要么选择死作为箴言，准备好为自由随时献身。宣言称：“凡是无罪而被任何政府宣布违法的人，均可不必效忠于该政府的法令；……我们建议一切受压迫者采取‘不自由毋宁死’这条格言。”^[114]

约翰·布朗是坚持物质抵抗派的思想的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白人之一，并且第一个把它付诸实践。也正是由于布朗在哈泼斯渡口一次失败的武装暴动才使得物质抵抗派在美国废奴运动史上有了值得书写的一笔。

约翰·布朗于 1800 年生于康涅狄格的一个农民家庭，但他的前半生大都住在俄亥俄州。他的父亲欧文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们家就是“地下铁路”的一个中转站。布朗在很小的时候就帮助父亲援救逃亡的黑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布朗很自然也成长为一位废奴主义者，不过他早期信奉的是加里森主义，但 1837 年伊利诺伊州的非暴力废奴主义者、报刊发行人伊莱休·洛夫乔伊被同情奴隶制的歹徒杀害，布朗就对非暴力不抵抗思想失去了信心。1839 年他率领全家人发誓要用“暴力和武器”同奴隶主战斗到底。^[115]到这时候布朗就成了一个物质抵抗派人士。

1855 年，当奴隶主与自由派人士在堪萨斯争斗时，布朗带领他的儿子和追随者组成一小股部队，奋起保卫自由的事业。他们在一天夜里对沉睡着的波塔沃托米克里克人村镇进行袭击，他命令手下人用专门为此行动而磨得锋利的大刀砍死了五个定居者，然后骑着受害者的马逃跑了。布朗自认为是上帝施行报复的工具。虽然他的受害人与拥护奴隶制的党派有联系，却没有一个是奴隶主，也没有一个曾为密苏里州人特别效力过。密苏里人实行了报复，焚毁了自由派的奥萨瓦托米城镇，虽然没有找到躲藏起来的布朗，但杀死了布朗的一个儿子。

道格拉斯与布朗的交往很久。早在 1847 年道格拉斯从英国归来之际，布朗就赶往斯普林菲尔德与之相见，这第一次会见给道格拉斯留下了强烈印象。在会见中布朗力图劝说道格拉斯并使之相信道义上的劝说和政治行动均不能解放奴隶，也不能废除奴隶制，“除非他们（指奴隶主）感觉到大棍子将要打在头上，否则劝说永远不能使他们放弃奴隶。”^[116]

布朗还力劝道格拉斯参加他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该计划打算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到南部中心地带活动，根据地是弗吉尼亚的山区。他计划先带 25 名左右的精锐士兵，先从小规模做起，供给他们武器和弹药，每 5 人一组部署在 25 英里长的战线上，然后派一些最有说服力和最有头脑的人去劝导山下的黑人参加他们的队伍。等条件具备后，他们便可以使一大批一大批的奴隶逃出来；把勇敢和身强力壮的人留在山里，通过“地下铁路”把身体软弱和胆子小的送到北部去。随着人数的增加，他的活动范围就会扩大，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上，最终成县、成州地把奴隶制度扫荡出去。布朗认为，他的计划可以从两方面削弱奴隶制，一是破坏奴隶主的财产价值，使其变得不可靠，二是保持反奴隶制的宣传的活力，迫使当局采取措施消灭奴隶制。^[117]

道格拉斯对这一计划颇感兴趣，虽然他那时还是一个道德说教派人士，但是他也相信布朗的计划也许可以促进废奴的事业，因为“人们不会买逃跑的马，也不会为某种可以自己拔腿跑掉的财产上投资”，该计划至少还可以重新唤起国家处于休眠状态的良心。^[118]

布朗及其计划给道格拉斯的思想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自从 1847 年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和约翰·布朗共度那天晚上以后，尽管我继续写文章和发表演说来抨击奴隶制度，我开始对和平废奴的方法不大指望了。这个人给了我强烈的印象，我的发言越来越带有他的色彩。”^[119]

1849 年 6 月，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甚至说：“我欢迎明天传来这样的消息：黑人奴隶在南部起义了。曾经被用来美化和装饰南部的黑色手臂散播了死亡和毁灭。”^[120]不过，道格拉斯也就到此为止了。从现实主义政治出发，他始终没有成为暴力派的实际支持者和实践者。

不过，布朗的这个计划并不是后来的武装暴动计划，它实际上只是“地下铁路”的扩大化而已。但这一计划从来没有真正实施

过。1856年在堪萨斯州作为游击队长取得对奴隶制作战胜利的功绩后，布朗修改了他的计划，决定直接打击南部奴隶制。他确信奴隶制的罪孽必须用血来偿还，他把自己看做是执行这一任务的由上帝指派的工具。他计划到南部发动武装暴动，在弗吉尼亚的山区建立一个黑人自由共和国，在那里再沿阿巴拉契亚山脉南下，号召奴隶起义，直到可恶的奴隶制的彻底被摧毁。

1856年到1859年期间，布朗穿梭往来于堪萨斯东北部地区，以及加拿大的逃奴聚居区，征募志愿人员，募集资金，并于1858年5月在加拿大的查达姆召开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部计划中的黑人共和国的宪法。格里特·史密斯、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西奥多·帕克和其他三位马萨诸塞州人还组成一个“六人小组”，帮助他在新英格兰筹款。支持布朗的废奴主义者确信道义上、政治上的行动已经失败。随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和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奴隶制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暴力的反击是对那些胜利的唯一回答。秘密“六人小组”虽然不清楚布朗进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了解和赞成他的总的意图。他们把他看做是“负有特殊使命的19世纪克伦威尔铁骑军，……继承了因克伦威尔的逝世而一度中止的英格兰清教事业——社会新生事业”。^[121]

但是，对这样的“社会新生事业”道格拉斯却坚决反对。1859年初，布朗前往罗切斯特与道格拉斯会谈，但道格拉斯不感兴趣。在暴动前的8月19日，布朗与道格拉斯在钱伯斯堡举行会谈，最后争取道格拉斯参加。布朗认为，道格拉斯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黑人领袖，一个有才能、有手腕而且有胆略的人，如果争取到他的支持，南部人口众多的黑人就会跟自己跑。布朗热情地对道格拉斯说：“跟我一道干吧，道格拉斯。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保卫你，我要你来是有特别意义的。我一发动攻击，蜂群就会飞来，我要你帮忙给他们准备一个蜂巢。”但道格拉斯拒绝参加，他认为以区区24人的部队进攻在弗吉尼亚州的哈泼斯渡口军火库是一个毫无希望的

愚蠢行为。他举出一切论点来劝布朗放弃他的鲁莽的冒险计划。他说：“在我看来，这个措施对于帮助奴隶逃跑（这是原来的计划）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还会使全国上下都反对，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无异于对合众国政府进行攻击，而且还会使全国上下都反对我们。”^[122]他预言，暴动将会陷入一架很完备的钢制捕机中去，休想取得胜利。^[123]

有人说，道格拉斯之所以不参加布朗暴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性格；二则因为他知道，也只有黑奴才知道，统治奴隶的政权有多大的力量和组织”。^[124]这两点理由都很有道理，但没有击中要害。要是按照这种解释，好像是道格拉斯只是由于害怕和胆怯才不敢去参加哈泼斯渡口武装暴动的。其实他之所以不参加布朗的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此时已是一个坚定的合法政治废奴派的代表人物，他相信要完全废除奴隶制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废奴必须在宪法范围内进行。虽然他支持布朗以前的计划，但那是以逐步而又不暴露自己为原则来吸引奴隶，而不是像哈泼斯渡口暴动这样公开与政府为敌。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原则分歧是阻碍道格拉斯参加布朗行动的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

当然，道格拉斯在任何时候都始终认为布朗起义对推翻奴隶制是有帮助的，因为他相信任何旨在推翻奴隶制的努力都是道德的，他不参加布朗的起义，只是他觉得布朗的行动不是推翻奴隶制的最佳方式，因为时机尚不成熟。他不过是从现实政治出发来考虑问题而已。在布朗起义以后，道格拉斯把布朗称为“高尚的老英雄，他用一只右手就动摇了美国的基础”。在谈到他对哈泼斯渡口暴动的立场时，他说：“把工具分给那些能使用它们的人们。让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为废除黑奴制而工作。我将帮助而不妨碍任何人。”^[125]

事实上，即使是加里森主义者，对布朗本身也称赞有加，从理论上承认黑奴的武装反抗权利。温德尔·菲利浦斯在布朗的葬礼上

说：“奴隶有反抗主人的权利吗？我不愿和这样一个民族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民族从 1776 年 7 月 4 日以来就声嘶力竭地呼喊：所有的人生而平等，自由权利不可剥夺。反抗暴政就是服从上帝。……但是约翰·布朗违反了法律。是这样的，在那边的书桌上摆着为了打破罗马法律而惨遭杀害的人们所说的富于灵感的话语。为什么你们那么恭敬地聆听这些话语呢？哈斯和威克利弗违反了法律，为什么要尊敬他们呢？如果乔治·华盛顿在 1783 年之前被捉住，他将因违反统治者的法律而死在绞架上……是的，你们说，这些人违背的是坏的法律。情况正是如此。这样说来，打破坏的法律是令人尊敬的。这种违法，历史喜爱，上帝祝福！那么，谁说奴隶法不比上述人所反抗的法律还要坏上万倍呢？无论用什么说法为他们辩护都使约翰·布朗成为圣哲。”^[126]

布朗决计不顾一切自己去干。1859 年 6 月 26 日，他率领由 17 名白人和 5 名黑人组成的队伍动身南下，在哈泼斯渡口附近隐藏下来。10 月 16 日晚上，这支队伍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毫无防备的哈泼斯渡口的军火库，并很快占领兵工厂、米福枪厂。17 日，当地居民和附近军队被动员起来，他们占领了波托马克河和谢南多厄河上的桥梁，切断了布朗的退路，把袭击者赶出了军火库、兵工厂和米福枪厂。3 个当地人（包括一名自由黑人）和几个布朗的人在战斗中死去或受重伤，其中包括布朗自己的两个儿子；7 个袭击者逃跑（两名后来被抓获）；其余人被迫退到坚固的消防站。布朗和四名受伤者再次进行了抵抗。10 月 17—18 日夜间，一支由罗伯特·E·李上校和 J·E·B·斯图尔特海军上尉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包围了消防站，以死一人的代价攻克消防站。他们杀死了至少两名袭击者，打伤了布朗并把他俘虏。

布朗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冷静、很坚定。在他的一个儿子死在旁边，另一个儿子被枪弹洞穿的情况下，他一只手按着他的垂死的儿子的脉搏，另一只手紧握米福枪，万分镇静地指挥手下的人，鼓励

他们坚定沉着，为他们的生命尽可能索取最高的代价。

布朗的解放黑奴的战争前后历经 36 个小时即告结束。17 人被打死，其中有 10 名袭击者。布朗及其他 6 名被俘的同伙最后被处以绞刑。没有一个奴隶自愿参加这次暴动。暴动失败后道格拉斯及“六人小组”的成员（除希金森外）全部都躲起来或逃到加拿大。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曾到国会作证，但无一人被起诉犯有同谋罪。

第六节 对废奴各派别的简单评价

· 哪一派代表了黑人解放的方向

以加里森为首的道德说教派，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合法主义改革派和以约翰·布朗为代表的物质抵抗派都为反奴隶制的事业做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究竟哪一派代表了废奴运动或者说黑人解放的方向呢？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史学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

对加里森道德说教派的看法，国内史学界还比较一致，即肯定他在反对奴隶制宣传鼓动方面的积极作用，承认他是反奴隶制十字军中的核心人物，但同时对他所代表的那一派的主张进行批评，说它不利于黑人的解放。《美国内战史》中这样评价加里森：“加里森是全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主要思想家及领导人，他在反对奴隶制度的宣传鼓动方面起了卓越的领导作用，并且表现了大胆而坚决的精神。但是他坚持有害的保守路线，过分强调道德的感化作用，反对暴力行动及政治行动，否定奴隶起义，提倡不抵抗主义。”^[127]又说，加里森的脱离联邦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让南方黑人处在奴隶主的任意宰割之下，这就与废奴运动最初的宗旨大相径庭了”。^[128]

《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中也说，加里森“在他早期的活动中，对奴隶制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抨击，因而使他成为一个废奴运动中的

著名人物。……但是从 30 年代到内战前废奴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时期内，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是不利于黑人革命运动的发展的”。^[129]

在美国学术界，一些史学家也认为，加里森在废奴运动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无节制的激烈言词，实际上更多地损害而不是推进了废奴的事业。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加里森通过辱骂奴隶主而引发了内战。^[130]

以上的评价是很有道理，也是很正确的。道德说教派在废奴运动开始时，对于唤醒民众对反奴隶制事业的注意，唤起民众的良心和道德责任感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废奴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期准备和基础，因为它首先是让人们关心并正视这一问题。加里森派认为只要美国人都认识到蓄奴和种族歧视是对上帝和人类的犯罪行为，就会停止犯罪，克服种族主义思想，废除奴隶制，并让所有的自由民享受平等的权利。这种依据“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拟定的目标和办法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奴隶主是不会自动放弃自己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产的。这已为历史证明。在加里森派活动最积极的时候，回答他们的是南部一些州和市出价悬赏购买加里森和其他领导人的脑袋。加里森自己在北部也遭到同情奴隶制暴徒的袭击，被涂满桐油、插上羽毛游街。在整个废奴运动期间，南部也只有少数几个白人成了废奴主义者，如肯塔基州的詹姆斯·G·伯尼和南卡罗来纳的安格里娜和萨拉·格里姆凯两姐妹，但他们也不得不移居到北部，南部根本容不下他们。为了维护奴隶制，南部奴隶主不断扩展势力，在限制他们扩展的共和党即将上台执政之际，他们在 60 年代甚至不惜发动内战，妄图建立单一和独立的奴隶制国家，更进一步证明加里森派的道德说教对奴隶主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内战爆发后，加里森本人也放弃了原来的主张，等于承认了道德说教的失败。对于道德说教，道格拉斯曾经反思说：“废奴主义者的一个巨大错误在于把美国人民假想得比他们实际上要好。

他们没有看到像奴隶制这样的罪恶，已深深扎根于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风俗和道德之中，没有发生类似社会地震的事情是不会被清除的。”^[131]不行动单靠道德上的说服是不能自动消除奴隶制的，不管是政治行动，还是暴力反抗，总之，必须行动。

有的美国史学家认为加里森的言行引发了内战，这是不公平的，既抬高了加里森派的影响和声望，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奴隶主发动内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卫奴隶制，保卫南部的生活方式。为了这一目标，奴隶主需要无限制地扩大他们的统治领域，而限制奴隶制扩张的共和党的上台执政给了奴隶主致命的一击，他们自感前途不妙，便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地发动了内战。

既然道德说教派不能代表黑人解放的方向，那么哪一个是的呢？是合法政治行动派，还是物质抵抗派呢？或是没有哪一派代表了黑人解放的方向？

国内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是布朗的物质抵抗派代表了废奴运动的正确方向。《外国历史大事集》中说：“布朗起义大大推动了北方废奴运动的发展，为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32]《美国内战史》也说：“这次起义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给废奴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133]我国学者在为《约翰·布朗》一书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更提出：“虽然哈泼斯起义失败了，但是布朗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思想却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在更大规模上得到了实现。美国人民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正是布朗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思想的胜利。”^[134]1992年出版，由余志森先生编著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一书也沿袭了这种说法：“约翰·布朗起义虽然失败，但却给废奴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要消灭奴隶制度，必须采取行动，诉诸于革命暴力。”^[135]

在美国史学界，有的史学家对布朗的评价也较高，不过，他们多半只是把他看做是一个宗教式的殉道士。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与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等人在其合著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

一书中引述爱默生的话说：“从来没有一个比那位新圣徒更纯洁或更勇敢的人，曾被对人类的爱引导着走向冲突和死亡，……他将把绞刑架变得如同十字架一样光荣。”^[136] J·布卢姆等人在《美国的历程》中说：“虽然布朗对受压迫的奴隶的友好态度是诚挚的，可是他从波塔沃托米克里克到哈泼斯渡口的行动主要出于狂热。”^[137]

对道格拉斯所代表的思想，厄尔·康拉德在《哈丽特·塔布曼》一书中作了有限探讨，认为其思想与 1860 年大选胜利的共和党的政策是相关联的。

对道格拉斯的合法政治行动派，国内学者则多持保留的否定态度。《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中一段评价最能代表这种倾向。它说：“道格拉斯在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影响也很大。但他的合法政治行动的主张，实质上就是改良主义。他的言词激烈，但行动软弱。他只反对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而不敢触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在 19 世纪上半叶黑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的言行对黑人解放运动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138] 《约翰·布朗》一书中文版前言也说：“他们的主张（指道格拉斯派的主张）也是行不通的，堪萨斯的斗争，以及 1860 年林肯当选总统后南部奴隶主发动武装叛乱，都充分说明这一点。”^[139]

我个人认为以上的评价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布朗的暴力革命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亡命徒思想，当时根本不存在着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当时美国的奴隶制处在宪法的保护之下，无论人们对它多么憎恨，它都是宪法保护下的一种特殊制度，对它的直接攻击都是对宪法的攻击，都是在与联邦公开为敌，奴隶主的力量本身够强大的，再加上联邦的力量，奴隶主的力量便会更加强大。19 世纪四五十年代联邦政权事实上也在南方奴隶主的掌握之中。普通的美国人，主要是自由州的北方，包括反对奴隶制的工人、农民宁愿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而不愿违反宪法用暴力来推翻奴隶制。美国人只是在独立革命中强调和喜爱暴力革命，在维齐和特纳起义之

前，他们对世界各地的革命也抱着乐观支持的态度，例如他们曾对法国革命寄予厚望，热情赞美。但自从两次奴隶大起义之后，他们对暴力革命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变，对国内的暴力革命更是嗤之以鼻。北部的美国人在 40 年代末团结在自由土壤党周围，1854 年以后，又团结在共和党周围，并且力量在不断壮大。只有与共和党这个现成的反奴隶制的强大组织联合，才能与奴隶主势力作斗争，最终消灭奴隶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另外，奴隶的状况也不利于武装暴动。正如林肯所说，“在合众国目前的形势下，我认为一次全面的，哪怕是非常广泛的奴隶造反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取得必不可少的一致行动。奴隶们没有迅速传递消息的工具，进行煽动的自由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也无法供应这种工具。成批的爆炸物到处都有，但是必不可少的导火线却没有，而且也无法供应。”^[140]

布朗本人也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领袖，在准备哈泼斯渡口暴动时，他未能将他的意图告诉给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有关的奴隶，他也忽视了对哈泼斯渡口地形作侦察，以确定撤退路线，他没有准备给养，也没有建立一条防线，以抵御必然招致的反攻。当他在 1859 年 10 月 16 日进攻军火库时，他们甚至没有带干粮。^[141]

在这种主客观形势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布朗决定以区区二十多人的一小支队伍向奴隶制宣战，也向合众国宣战，只能是以卵击石，是一种自杀性的盲动行为。在哈泼斯渡口袭击事件中，当地没有一个奴隶前来参加，也没有一个白人响应，袭击很快被当地的民团和联邦军队淹没在血泊之中。这也说明这种无政府的盲动之举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至于说到布朗暴力革命思想代表了废奴运动的方向，内战中黑人被解放是这一思想的实现，我认为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而出现的误解。布朗是主张暴力推翻奴隶制，而奴隶制也的确是在暴力冲突中被摧毁。但是，布朗主张的暴力是一种非法的暴力，而

事实上摧毁奴隶制的是国家联邦政府在不平定南方奴隶主叛乱时使用的合法暴力。奴隶制的被废除跟布朗的暴力革命并没有什么联系。正好相反，奴隶制的被废除是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政治行动派一贯主张符合逻辑的结果，只有道格拉斯的这一派才真正代表了美国黑人解放的方向。黑人解放的每一成果都是合法主义改革政治行动的结果。正是由于废奴主义者同一切反对奴隶制的人们的一致支持，共和党才得以上台执政。奴隶主面对一个限制自己扩展势力的共和党政府，大有灭顶之灾的感觉。为了维护奴隶制，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孤注一掷地发动叛乱。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联合其他反奴隶制力量不断向林肯政府施压，敦促它朝着废奴的方向发展。在形势的逼迫下，林肯政府终于接受了废奴的要求，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解放宣言》，废除叛乱诸州的奴隶制，内战胜利后，又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全国废除了奴隶制。合法政治行动派的思想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在重建时期，在废奴主义力量的推动下，国会又相继通过宪法第十四和十五两条修正案，授予黑人公民权和选举权，道格拉斯的黑人解放思想再一次得到实现。不仅如此，在以后的黑人解放斗争中，道格拉斯的思想仍然发挥指导作用，为后来的各代黑人领袖如布克·T·华盛顿、杜波依斯以及马丁·路德·金等继承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成为黑人彻底解放的灯塔。而布朗暴力革命的继承者如马尔科姆·埃克斯、黑人权力运动中的黑豹党等的实践也都先后失败，从而也提供了反面的佐证。

当然，不能把约翰·布朗起义一口否定。他的举动固然从效果来看，是自取灭亡，但是他的失败的举动也是不可少的，因为一则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他那种仇恨奴隶主及奴隶制度的精神是可嘉的。二则从长远效果来看，布朗的作为殉道者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内战中激励了北方广大人民的斗志，更激励了北方军队的士气。他们是高唱《约翰·布朗》之歌击败敌人的。它对于合

法主义改革政治行动派主张的实现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合法主义改革政治行动派一样，它也属于政治行动派，只不过用的是非法手段。它的出现既唤醒民众，也使统治阶级警醒，迫使其作出代价较小的政治选择，更容易接受合法主义改革政治行动派的主张。道格拉斯的思想能够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发生作用并占据主导地位，与包括布朗在内的其他派别的失败的探索也是分不开的。

二 合法主义改革思想为什么能占据主导地位

道格拉斯之所以能够取代加里森或布朗及其他废奴主义者，成为黑人解放战线的主要代言人，是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脉搏，提出了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

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南方奴隶主为了维护奴隶制，不仅在南部制定了各种限制自由的政策，而且还要求北部与之合作，一起维护奴隶制。1850 年，北部做出让步，通过了逃奴法。该法规定：任何一个奴隶，不管他逃到哪里，任何白人都可将他抓回南方或卖掉。随之出现的乱抓、滥捕就导致在北方的自由黑人人人自危，从而使许多北方人担心奴隶制会因此扩展到新领地、乃至全国，破坏他们所珍爱的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南方提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证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854 年 2 月 28 日，白山党、自由土壤党及其他一些反奴隶制的派别联合组成的共和党的出现，正是为了制止奴隶制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要求。共和党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力量的大联合。

在共和党之前，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和布朗的追随者四处活动，奔走呼号，反对奴隶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北部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刚开始他们还受到北方人的围攻，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北方虽然不再攻击废奴主义演说家，但他们也一般不愿与这样的激进分子建立联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些废奴主义者公然攻击宪法。由于奴隶主把宪法当成护身符，加里森就把宪法说成

是“与死神订立的契约，与地狱签署的合同”，布朗更要公开推翻宪法庇护的制度。这些废奴主义者这样不加掩饰地诋毁被美国人视为神圣的东西，他们也就无法说服美国人把平等原则的大旗举起来。

这些废奴主义者把道义的原则看得比宪法更重要，认为在这样的准则之下，可以不遵守与道德相抵触的法律。但是，“这样的原则实际上是靠不住的，对一个依法办事的政府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因为对各种违法的原因很难作出合理的判断”。^[142]一方面，人们为了崇高的事业，可以这样做来保护个人，抵制暴政；另一方面，有人也可以借此设立私刑，剥夺个人权利，甚至推翻政府。总之，这种原则是靠不住的。美国大多数人不支持这种想法和原则。

共和党并不是一个废奴主义政党，一般的共和党人也不是废奴主义者，参加共和党的各个派别的政治主张及经济观点看起来也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致反对奴隶制的蔓延。共和党的兴起说明它成功地做到了加里森及布朗未能做到的事情：说服美国人把平等主义的大旗扛起来。

共和党能做到这一点，源于它与加里森及布朗等废奴主义者的两点区别。首先，尽管共和党人反对奴隶制，却很少有人认为黑人应该享有社会平等权。1858年林肯与斯蒂芬·A·道格拉斯辩论时就不赞成给黑人以社会平等权，但他承认黑人与白人应该机会均等，承认《独立宣言》中关于人人在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方面的平等权利。关于这场辩论的主要论点，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会详细介绍。林肯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许多共和党人的意见。然而，奴隶制否定了机会平等这个美国人的普遍原则。为了维护美国人所珍爱的这个原则，激进的政治废奴主义者的代表——自由党的成员、自由土壤党人、北方的辉格党人、民主党内的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分子以及部分一无所知党人，终于团结起来，共同创建一个新的反

奴隶制的政党。

其次，共和党人没有超越美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提出过高的反奴隶制的要求。对加里森和布朗等废奴主义者来说，只要结束奴隶制，哪怕国破家亡，他们也在所不惜。共和党人多是保守派，他们爱护这个国家，也尊重宪法对奴隶制的保护。无论他们如何痛恨奴隶制，他们决不会为了消灭奴隶制度而不顾一切撕毁宪法。但他们尊重宪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奴隶制的蔓延听之任之，因为奴隶制毕竟是他们痛恨的一种罪恶。他们只希望在不触动宪法的情况下，在不影响南方根据宪法享有的保持奴隶制的权利的前提下，依法对其加以限制，不准其扩张到新领地上去。这样促使奴隶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自行灭亡。共和党采取这一策略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在其他一切问题上，奴隶制都有宪法作为依据，没有争论的余地，唯独在这个狭小的法律范围内还有隙可乘。于是对宪法的神圣性深信不疑的美国人在这个小小的缝隙里围绕着要奴隶制还是要自由劳动这一重大道德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143]

奴隶制是一种罪恶，也违背美国人关于自由与平等的信条，但奴隶制是宪法保护下的一种特殊制度，是美国自由肌体上的赘瘤。因为奴隶制受到宪法保护，所以这一问题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解决。这就是美国人当时的思想境界。也正是在美国人这样的思想觉悟下，共和党成功了，而加里森和布朗等却失败了。

作为合法政治废奴主义的代言人，道格拉斯比加里森和布朗等人对现实及其未来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抛弃了道德说教和暴力主义，提出了关于黑人解放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道格拉斯并不拘泥于只支持纯粹的废奴主义政党，并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当他还在加里森阵营的时候，他就支持废奴主义政党——自由党与其他反奴隶制的力量实现了联合，在 1848 年 8 月组成自由土壤党，后来更是极力促成了自由党、自由土壤党、共和党及其他反奴隶制力量的大联合；虽然他也很清楚共和党的局限性，但政治家的远见

卓识促使道格拉斯从实际出发，坚定地支持共和党。这一战略团结了大多数反奴隶制的人们，极大地增强了反奴隶的力量，使共和党赢得 1860 年大选的胜利。自此，制止奴隶制的扩张成为整个国家的任务，从而使得奴隶主为所欲为的日子结束了，并由此敲响了奴隶制的丧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共和党的兴起是同步的。作为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主要领袖，他的思想、策略就在一定时期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黑人解放运动的未来走向。他支持废奴主义政党——自由党，黑人解放运动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支持共和党，黑人解放运动的力量就转向共和党一边。在支持共和党时，他作了一些妥协，暂时放弃了立即废奴的要求，先集中力量支持共和党上台执政，借助国家的力量，斩断奴隶制的四肢——实现禁止奴隶制度扩张这个现实的目标，等待时机成熟再推动共和党政府废除奴隶制。这是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暂时利益所必需的，是深谋远虑的。由于共和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奴隶制的扩展，成立之后又立即赢得了北部人民的支持，而北方的人口比南方要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就给南方提出了一个警告：要不了多久，一个反奴隶制的政府就会出现在华盛顿。道格拉斯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道格拉斯的主张与美国人民的意愿一致，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得到了实现。1854 年 2 月 28 日，赢得一切反对奴隶制人们支持的共和党的成立，标志着道格拉斯合法主义改革思想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一战略在内战及其以后的历史中得到检验，并被证明是正确的。

注释：

[1] 本杰明·李列斯：《美国革命中的黑人》，北卡罗来纳大学，1961年，第10页。转引自《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42页。

[2] 同上书，第11—12页。转引自《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44—45页。

[3] 李剑鸣、章彤编，陈亚丽、吴金平、顾中行等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4]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1—92页。

[5]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7页。

[6]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合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4页。

[7] 文森特·哈丁著：《有一条河》（Vincent Harding, *There is a river*,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1981），第75页。

[8] 同上书，第111—112页。

[9] 同上书，第101页。

[10]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185页。

[11] J·R·波尔著：《奴隶制、种族与美国内战》（J.R.Pole, *Slavery, Race, Civil War in America*, London: George G.Harrap & Co.LTD 1974），第107页。

[12]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232页。

[13]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94页。

[1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233页。

[15] J·R·波尔著：《奴隶制、种族与美国内战》，第89—90页。

[16]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95页。

[17]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1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216页。

[19]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Philip S. 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4），第 40 页。

[20] 同上书，第 45 页。

[21] W·Z·福斯特著：《美国历史上的黑人》（W.Z. Foster, The Negro Peopl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54），第 110 页。

[22] 乔治·M·弗雷德里克森主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George M. Fredrickson, ed., William Lloyd Garrison, Englewood Cliffs, N.J., 1986），第 54 页。

[23]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40—41 页。

[24] 同上书，第 41 页。

[25] 乔治·M·弗雷德里克森主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第 53 页。

[26]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42—44 页。

[27] 约翰·J·布拉辛甘主编：《道格拉斯文集》（“An account of American slavery”，15 Jan. 1846, John J. Blassingame, Douglass Papers, series I），第 133 页。

[28]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州的岁月》（Dickson J. Preston, Young Frederick Douglass, Baltimore, 1980），第 25 页。

[29]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5 页。

[30] 同上。

[31] “道格拉斯给哈丽特·比彻·斯托的信”，1853 年 3 月 8 日（Douglass to Harriet Beecher Stowe, 8 Mar. 1853），菲力普·S·方纳主编：《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vol. 2），第二卷，第 233 页。

[32]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6 页。

[33] 同上书，第 27 页。

[34] 同上书，第 63 页。

[35] 1846 年 1 月 16 日《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 Jan. 16, 1846）。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 124 页。

[36]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2），第 226 页。

[37] 1846年6月26日《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 Jun.26, 1846)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145页。

[38] 1849年3月30日《北极星》报(The North Star, Mar.30, 1849)。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379页。

[39] “奴隶的血”,1847年11月17日《北极星》报。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347页。

[40] 1846年10月15日《全国废奴旗帜报》(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October 15, 1846)。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182页。

[41] “妇女的权利”,1848年7月28日《北极星》报(The Rights of Women, The North Star, July 28, 1848)。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Philip S.Foner ed., Frederick Douglass on Women's Rights, New York, 1976),第51页。

[42] “女权运动”,1870年10月27日《新国家时代》报(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The New National Era, October 20, 187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93页。

[43] “论妇女解放”,1888年6月2日《妇女月刊》(Emancipation of Women, The Women's Journal, June 2, 1888)。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119页。

[44] “妇女的投票权”,国会图书馆藏道格拉斯文件(Woman Suffrag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Washington, D.C.)。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137页。

[45] “妇女与选票”,1870年10月27日《新国家时代》报(Women and the Ballot, The New National Era, October 27, 187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98页。

[46] “一点思考”,1866年《妇女权利鼓吹者》第一卷(A Thought, The Women's Advocate, vol.1, January 1866)。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16页。

[47] “论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妇女权利大会”，1851年10月30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at Worcester, Mass. ,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October 30, 185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55页。

[48] “妇女投票权运动”，1870年10月20日《新国家时代》报（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he New National Era, October 20, 187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93页。

[49] “妇女与政治”，1853年2月25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Women and Politics,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February 25, 185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56页。

[50] “妇女的投票权”，国会图书馆藏道格拉斯文件（Woman Suffrag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s Division, Washington, D.C.）。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139页。

[51]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155页。

[52] “纽约州妇女权利大会”，1866年12月21日《纽约论坛报》（Equal Rights Convention for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Tribune, December 21, 1866）。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78页。

[53] “美国平等权利协会给国会的备忘录”，1866年12月22日《全国废奴旗帜报》（Memorial of the America Equal Rights Association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December 22, 1866）。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82页。

[54] “纽约州妇女权利大会”，1866年12月21日《纽约论坛报》（Equal Rights Convention for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Tribune, December 21, 1866）。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78页。

[55] “妇女的权利”，1848年7月28日《北极星》报（The Right of women, The North Star, July 28, 1848）。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50页。

[56] “锡拉丘兹妇女权利大会”，1852年12月17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The National Woman's Rights Convention at Syracus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September 17, 1852)。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 56 页。

[57] “露西·斯通在音乐基金会堂”，1854年2月17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Lucy Stone at Musical Fund Hall,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February 17, 1854）。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 69 页。

[58] “妇女权利大会”，1873年1月23日《新国家时代报》（The Woman's Rights Convention, The New National Era, January 23, 187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女权》，第 102 页。

[59]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66 页。

[60]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第 261 页。

[61]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Waldo E. Martin, Jr., The Mind of Frederick Douglass, London, 1984），第 29 页。

[62] J·布卢姆、S·摩根、L·罗斯、A·施莱辛格、K·斯坦普、V·伍德沃德合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401 页。

[63] 同上书，第 404 页。

[64] 同上书，第 407 页。

[65] 同上书，第 411 页。

[66] 同上书，第 415 页。

[67]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380—381 页。

[68] 同上书，第 391 页。

[69] J·布卢姆、S·摩根、L·罗斯等合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上册），第 414—415 页。

[70] 同上书，第 416 页。

[71] 同上书，第 419 页。

[72] 同上书，第 418 页。

[73] 同上书，第 424 页。

[74] 同上书，第 425 页。

[75] 1848年8月25日《北极星》报(The North Star, August 25, 1848)。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33页。

[76] 1848年6月16日和21日《北极星》报(The North Star, June 16 & 21, 1848)。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34页。

[77] 1849年2月9日《北极星》报(The North Star, Feb. 9, 1849)。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352—353页。

[78] “宪法与奴隶制”, 1849年3月16日《北极星》报(The Constitutional and Slavery, The North Star, Mar. 16, 1849)。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361—366页。

[79] “美国宪法是赞成奴隶制的还是反对奴隶制的?” 1851年7月24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I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or or against slavery,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24 July 185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五卷,第191—199页。

[80] “反奴隶制运动”, 1885年1月(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Jan., 1885)。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350—353页。

[81] 本杰明·夸尔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Benjamin Quarles, ed., Frederick Douglass, Englewood Cliffs, N.J., 1968),第105页。

[82]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132页。

[83]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27页。

[84] 同上书,第23页。

[85]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The Anti-Slavery Advocate and the Testimonial to Mrs. Ston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22 Jul. 1853, Philip S. Fone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vol. 5),第五卷,第286—287页。

[86]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23页。

[87] “反对肤色偏见”, 载于1850年6月13日的《北极星》报(“Prejudice Against Color,” The North Star, Jun. 13, 185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128—129页。

[88] “对原则的可耻背叛”，载于 1850 年 5 月 30 日的《北极星》报（“Shameful abandonment of Principle,” *The North Star*, May 30, 185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 122 页。

[89] “露西·斯通在费城音乐基金会堂”，载于 1854 年 2 月 17 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Lucy Stone at Musical Fund Hall, Philadelphia,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Feb. 17, 1854）。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70 页。

[90]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68 页。

[91] 1854 年 3 月 3 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Mar. 3, 1854）。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73 页。

[92] “来自俄亥俄州柏林县弗朗西斯·巴里的一封信及对巴里先生信的回复”，载于 1854 年 3 月 17 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Letter from Francis Barry, Berlin, Ohio, and reply to Mr. Barry's letter*”,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Mar. 17, 1854）。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70—73 页。

[93] “美国奴隶制评述”（“*An account of America Slavery*”, Jan. 15, 1846）。见约翰·W·布拉辛格姆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文集》（*John W. Blassingame, ed., 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New Haven, 1979*），第一卷，第 135 页。

[94]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152 页。

[95] “露西·斯通与道格拉斯参议员”，载于 1859 年 10 月《道格拉斯月报》（“*Lucy Stone and Senate Douglas*”, *Douglass' Monthly*, Oct. 1859）。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74—77 页。

[96]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153 页。

[97] 赫什：《性别奴隶制》（*Hersh, Slavery of Sex*），第 8 页。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76 页。

[98]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155页。

[99] “妇女权利大会”(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55页。

[100]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151页。

[101] 同上书,第30页。

[102] “有色人的新闻报纸”,载于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Colored News Papers,” The North Star, Jan. 8, 1848)。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291页。

[103] “致波士顿每日辉格党人”,载于1847年6月9日《解放者》周刊(“To the Boston Daily Whig,” The Liberator, Jul. 9, 1847)。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253页。

[104] “我们的报纸及其前景”,载于1847年12月3日的《北极星》报(“Our Paper and its Prospects,” The North Star, Dec. 3, 1847)。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280—281页。

[105]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44页。

[106]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Philip S. 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4),第84—85页。

[107] “编者按”,载于1848年4月17日《北极星》报(“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The North Star, Apr. 17, 1848)。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一卷,第300—303页。

[108] 1850年5月30日《北极星》报(The North Star, May 30, 185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123—125页。

[109] “呜呼,黑天鹅格林菲尔德小姐”,载于1853年4月8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The Black Swan, Alias Miss Elizabeth Greenfield,”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Apr. 8, 185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239—240页。

[110] “共和党反对予黑人投票权”,载《道格拉斯月报》(1860年10月期) (“Republican Opposition to the Rights of suffrage”, Douglass' Monthly,

Oct. 1860),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 518—520 页。

[111] “平等投票权被击败了”,载于 1860 年 12 月期《道格拉斯月报》(“Equal Suffrage Defeated,” Douglass’ Monthly, Dec. 186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 531 页。

[112]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41 页。

[113] 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7 页。

[11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230 页。

[115] 乔安妮·格兰特编:《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 页。

[116]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第 52 页。

[117]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174 页。

[118] 同上书,第 175 页。

[119]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第 52—53 页。

[120]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 50 页。

[121]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与南部重建》(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56 页。

[122]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第 64 页。

[123] 奥斯卡·舍温著:《自由的预言:温德尔·菲尔蒲斯的生平和时代》(Oscar Sherwin, Prophet of Liberty: the Life and Times of Wendell Phillips, New York, 1958),第 300 页。

[124]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第 64 页。

[125] 1859 年 11 月 11 日《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 November 11 1859)。乔安妮·格兰特编:《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 67—68 页。

[126] 乔安妮·格兰特编:《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 67 页。

[127]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2 页。

[128] 同上书,第 65 页。

[129]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112—113 页。

- [130] 非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8 页。
- [131] 同上书，第 44 页。
- [132] 张宏儒、梅伟强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第二分册·近代部分），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6 页。
- [133] 刘祚吕著：《美国内战史》，第 136 页。
- [134]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序言第 19 页。
- [135] 余志森编著：《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9 页。
- [136] 朱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合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90 页。
- [137] J·布卢姆、S·摩根、L·罗斯、A·施莱辛格、K·斯坦普、V·伍德沃德合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上册），第 537 页。
- [138]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115 页。
- [139]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序言第 18 页。
- [140]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31 页。
- [141]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与南部重建》（中译本·上册），第 156 页。
- [142]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中译本），第 208 页。
- [143] 同上书，第 211 页。

第三章 内战与道格拉斯

如果说当 1861 年 3 月 4 日林肯入主白宫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只是看到了废除奴隶制的朦胧希望，那么内战的爆发则为这种希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不过在内战初期，林肯政府的内战政策却是令人担忧、不容乐观的，因为它正式宣布为恢复联邦统一而战，而把奴隶制问题撇在一边了。敦促林肯政府采取行动废除奴隶制度，变拯救联邦的战争为既拯救联邦，又消灭奴隶制的战争，就成为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争取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道格拉斯重组了废奴派组织，与一切反对奴隶制的人们联合起来，热情地开展工作，对林肯政府既支持又斗争，既积极推动并号召黑人踊跃参军，又对林肯政府歧视黑人的行为予以坚决抵制，做到了有坦有节。这一切给林肯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1863 年 1 月 1 日林肯政府终于发表了《解放宣言》，废除叛乱诸州的奴隶制，并在随后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中废除了全国的奴隶制，从而完成了黑人人身解放的任务。这意味着道格拉斯争取黑人解放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的第一次实践成功。

第一节 选一个反奴隶制的人当总统

一、共和党的胜利

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合法主义改革政治行动派争取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选举让一个反奴隶制的人士上台当总统。1860 年 11 月总

统选举揭晓，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政治废奴派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

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是各派反奴隶制力量联合起来的产物。先是自由党成立了，这是全美国第一个废奴主义的政党；接着自由土壤党取代了自由党，成为反奴隶制度的主要政党。同时原有的主要党派——民主党和辉格党内部的反奴隶制派在堪萨斯冲突中分离出来，它们与自由土壤党等一起又组成一个反奴隶制各派力量的大联合——共和党。共和党并不是一个废奴主义政党，它只是限制奴隶制扩展到新的领地上去，对现有的奴隶制，它将听任自行灭亡。但帮助形成这个党组合的道格拉斯知道，这个党一定会成为奴隶制的死敌。因此，他支持它。1856年总统选举时，道格拉斯就支持共和党，还因此招致了一些眼光不如他远大的废奴主义者的批评。道格拉斯在回答对他的批评时解释说：“根据我们的政治哲学，我们可以有自由考虑公众的思想状况，既看到当前的成果，也看到长远的成果。我们可以有自由来问，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我们所投的票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推进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最高利益；考虑这一点后，我们可以有自由——不，这是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朝着那个方向去投票，以便在考虑过所有相关的事实以后，使我们的投票最大限度地促进那个伟大目标的实现。”^[1]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懂得在各条战线如何斗争，利用一切前进渠道的真正政治组织者的才能。这是他与旧有政治行动派不同的地方，他并不拘泥于只支持废奴主义政党。1860年总统选举时，道格拉斯仍然支持共和党也是基于同样理由。道格拉斯对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提出了批评，但也表示了理解，因为美国人民的觉悟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他说，虽然共和党纲领中没有用“废除奴隶制”，而是用“不能再有一个奴隶州”作为它的旗帜，但因为人民不愿这样，“我们只好努力工作，等待一个更为光明的日子。那时，群众经过教育就会达到在人权和社会道德较高的水平”。^[2]马克思当时也说：

“如果当时林肯把解放奴隶作为战斗口号提出，他毫无疑问会一败涂地。”^[3]

1856年和1860年两次总统选举时，提出彻底废奴主义纲领的是格里特·史密斯领导的自由党，道格拉斯开始也是支持史密斯的，但道格拉斯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在选举临近时，他发觉与其把精力浪费在支持史密斯的毫无成功希望的努力上，不如确保共和党的胜利，至少它还限制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道格拉斯在黑人及废奴派中间活动，号召他们支持林肯。道格拉斯的打算是先支持反奴隶制的共和党上台，然后把它改造成废奴主义的政党。共和党获胜后，在解释为什么要支持共和党和林肯时，道格拉斯说：“以前南部的力量不可阻挡，他们制造总统，成为共和国的主人，现在林肯的胜利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它也教育北部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显露出南部的虚弱，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通过选举可以选出一个有废奴倾向的人到总统的位置。”^[4]道格拉斯对把共和党和林肯改造成废奴主义的政党和总统是充满希望的。

二 林肯的反奴隶制思想

共和党不是一个废奴主义政党，它的候选人自然也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但是，林肯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奴隶制的人士，这一点毫无疑问。早在1837年3月，林肯在政治上初出茅庐之际便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联合另一位名叫丹·斯通的议员发表他对奴隶制的公开声明：

“他们（指林肯和斯通）认为，奴隶制是建立在不公正和错误政策上的，然而传播废奴主义却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它的祸害。

“他们认为，在宪法规定下，合众国国会无权干预各州的奴隶制。

“他们认为，在宪法规定下，合众国国会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但是除非在哥伦比亚特区人民要求下，就不应使用这

种权力。”〔5〕

这是林肯反奴隶制思想的最初表述，以后随着他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充实，但都离不开以上的基本精神。总的说来，内战前林肯的反奴隶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奴隶制是错误的、不公正的。

首先，奴隶制直接违反了《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使共和国公正形象在世人面前蒙羞。林肯为此还批驳了奴隶制的拥护者如民主党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关于《独立宣言》中并没有把黑人包括进去的观点。他说：“我认为那项著名的宣言的作者们是想把一切人都包括进去的，但他们不想宣称一切人在一切方面平等。他们并不是说一切人在肤色、身材、智力、道德成长或道德能力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相当明确地说明他们认为在哪些方面一切人是生来平等的——平等在于‘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他们是这样说的，意思也是这样。他们并不想断言当时一切人都已真正享有那种平等，因为这显然不是事实，也不想立即让一切人平等。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给予这样的恩典。他们只不过想宣布这种权利，这样，在环境许可下就能尽快实现。”〔6〕

其次，奴隶制把黑人不当作人看待，而是当作财产，与猪、马、羊等一般无二，这严重败坏了人类道德。林肯认为：“宪法中凡是暗指奴隶的地方，都称他为‘人’；凡是暗指奴隶主对他的合法权利的地方，都称为‘应得的劳役或劳力’——称为可用劳役或劳力偿付的债务。同样也可以用当时的历史证明，用这种暗指奴隶和奴隶制的方法，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把它们说出来，是有目的的，就是不想让宪法里有一种可以把人当作财产的想法。”〔7〕

再次，奴隶制破坏了自由自治的基础。林肯论证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奴隶是人；是人，而不是财产；《独立宣言》中讲到的人的事情，至少有一些对我们适用，对他们也适用。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自由宪章对我们自己适用，对奴隶也适用。为了打消这个观念而提出的论据也有意要摧毁自由治理——甚至对于白人——这一观念，并破坏自由社会的基础。”^[8]林肯还说：“如果黑人不是人，那么是人的人就可以借口自治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但是如果黑人是人，说他不能自治，岂不是把自治彻底破坏了吗？白人自己管理自己就是自治，但是，如果他管自己又管别人，这就超出了自治，这是专制。……我要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好到这种程度，能够不获得另一个人的同意就统治那个人。我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则，是美国共和主义的靠山。……”^[9]

最后，奴隶制的错误还在于它剥夺黑人的劳动。林肯认为：“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负担，而有些人（奴隶主）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压在别人（奴隶）肩上，这就造成人类巨大的、连绵不断的灾祸的根源。”^[10]“你流汗受苦，我坐享其成”这种说法“不管它是用什么形式讲出来的，是出于一心想骑在人民头上，依赖他们劳动果实的一个帝王之口，还是出于为其奴役另一个种族的且行辩解的某一种族之口，同样都是残暴的原则”。^[11]

第二，奴隶制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制度，必须限制它的扩散使其自行灭亡。

林肯认为，由于“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道德上的一个极大的错误，尽管并不要求在它存在的地方触动它，但希望在我们的选票所能及的各准州把它当作一个错误对待。我们认为，由于对我们自己尊重，对后代和创造我们的上帝负责，需要我们在我们的选票所能及的地方纠正这个错误”。^[12]

针对奴隶制的辩护士说奴隶制是建国先辈们有意创立的使之永久的制度的论调，林肯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林肯认为，美国存在奴隶制并不是因为开国先辈们有意要把美国建成半奴隶半自由，或部分奴隶部分自由的国家。林肯说：“我坚决认为，他们（指开国先辈）当时发现奴隶制已经存在了。他们并没有使它成为这样，但是

他们让它这样，因为他们当时想不出办法来摆脱它。道格拉斯法官（指民主党人斯蒂芬·A·道格拉斯）说，我们政府的缔造者们使这个国家成为部分奴隶部分自由，是出于他们的选择，他这样说是歪曲历史。不仅如此，当政府的缔造者们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来切断奴隶制根源，并采取措施限制那些没有奴隶制的新准州实行奴隶制时，我认为他们懂得，一切聪明的人也懂得，奴隶制是正在走向最后灭亡。”^[13]林肯认为应该恢复开国先辈们本来的思想，限制奴隶制的扩展，这样它最终就会灭亡。

根据这一原则，林肯主张：“一方面在确立奴隶制的地方给奴隶主以全部的控制权，一方面有权不让它超出那些范围。”因此，林肯坚决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所谓“居民主权”原则。林肯打了一个比方对此加以解释。他说：“如果我看见一条毒蛇在路上爬，随便哪一个人都会说我必须就近抓起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但是如果我发现那条蛇和我的孩子们一同睡在床上，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可能打伤孩子们，甚于打伤蛇，蛇还可能咬他们。更有甚者，如果我发现蛇和我的邻居的孩子们一同睡在床上，而又曾和邻居庄严订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插手他的孩子们的事，那我最好还是让那位先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但如果一张床刚刚铺好，孩子们就要去睡在这张床上，却有人提议把一窝小蛇和孩子们放在一起，那我应该作出什么决断，我想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吧！

“事情正是这样。新的准州就是刚刚铺好让孩子们去睡的床，国民是不是让蛇去和他们的孩子们睡在一起，要由他们自己决定。应该采用什么对策，似乎不容有什么犹豫了。”^[14]

这个对策是理所当然决不允许奴隶制这条毒蛇进入孩子们的床上——新的准州上去，不能让奴隶制继续扩大。

第三，对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林肯主张予以特殊的对待。

早在 1847 年至 1849 年他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曾建议，除了从蓄奴州来的政府官员带来的暂住的“必需的仆人”奴隶外，不得

再把新的奴隶带进哥伦比亚特区来居住。从 1850 年 1 月 1 日起，凡奴隶所生的孩子都应获得自由，都由母亲的奴隶主给予“合理的抚养和教育”，不过，他们在达到一个尚待确定的年龄以前要为此奴隶主服合理劳役。按照这两项规定，即不准带进新的奴隶到哥伦比亚特区定居，奴隶所生的子女都将成为自由人，加上特区里奴隶不可避免的自然死亡，就可以推算出一个肯定的日期，到那一天奴隶制将在哥伦比亚特区最终灭亡。他还提议应由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奴隶主“可能愿意予以解放”的奴隶的价值。他反对在哥伦比亚特区立即和无条件地禁止奴隶制的全面而彻底的废奴措施，对于他自己建议的有限和逐步的废奴措施，他也主张应由特区有资格的白人选民来投票决定，而不能由国会把它的意志强加给特区。^[15]这就是林肯的逐步有偿解放奴隶思想的最初表现，后来他这样的思想在特区得到实现，但当他想把它应用到边境州，乃至全南部时却遭到了失败。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于像林肯这样一个反对奴隶制的人当选总统非常兴奋，他给废奴主义者规定下一步的任务是：让共和党和林肯保持反奴隶制的势头，阻止其向奴隶主的要求让步，推动他们朝着完全废奴的方向前进。有朝一日，他们就会成为废奴主义的政党和总统。到那时，奴隶制的末日就要到来了。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第二节 胜利后的忧虑

· 林肯就职前后的南部政策

反奴隶制的力量联合起来终于实现了选举一个反奴隶制的人士当总统的愿望，这自然使废奴主义者感到欣慰。然而在胜利之余他们又忧虑起来：林肯会不会如他在上台之前所表示的那样，对南方奴隶制不闻不问，仅仅反对它扩张到新的领土上去呢？这是道格拉

斯等废奴主义者所担心的。林肯在就职前后及内战初期的政策证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在就职前，林肯一方面明确表示决不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1860年12月11日他在给写信征求意见的威廉·凯洛格的复信中说：“对于蓄奴制扩展决不能主张妥协，你一妥协，他们就会又爬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的一切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早晚还得从头做起，……较量是必不可免的，现在较量比将来较量好。”1861年1月他又说：“如果我们屈服，那么我们就完了，政府也完了。他们随时都会向我们来这一手。要不了一年工夫，我们就非得占领古巴作为他们留在联邦的条件不可。”但是与此同时，林肯却向南部保证不干预这些州或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制问题，不干涉州际奴隶贸易，将实施逃亡奴隶法，敦促北方废除或修改他们的人身自由法。在上页的1860年12月11日的同一封信里，他保证说：“我认为宪法关于逃亡奴隶的条款必须执行——用最温和的方式实行，决不可加以抵制。”1860年12月22日他在给后来当选南部邦联副总统的A·H·斯蒂芬斯的信中说：“南部人当真害怕共和党执政会直接、间接地干预奴隶或就奴隶的事干预他们吗？如果他们当真害怕，我向你保证——你曾经是朋友，希望现在也不致是敌人——根本不用害怕。在这方面，南部在华盛顿时代没有危险，现在同样也没有危险。”^[16]

1861年3月4日，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无视南部在2月已脱离联邦，成立邦联的事实，仍然在一开始就向南部保证政府无意干涉南部的奴隶制度，还说什么“国内某些地区”对联邦政府如此敌视，以至于妨碍了政府正常地行使职能，政府将暂时地“停止”行使这些职能活动。这实际上是在向南部伸橄榄枝。林肯还说，但是“联邦”是永恒的，脱离联邦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如能得逞，将意味着可以由少数叛逆分子任意分裂政府。林肯决心尽一切手段在所有州内严格执行联邦法律，政府将“维护、占有和

控制它的财产，并且收缴关税和进口税”。除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外，将不会发生“军事入侵事件——不会诉诸武力”。就职演说最后以和解的口吻结束：

“各位心怀不满的同胞，内战这一重大问题，不系于我的手里，而系于你们的手里。政府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不当侵略者，你们便不会而临战斗。你们没有对天发誓要毁灭政府，但是我却将作出最严肃的誓言，要‘保存、保护和保卫’它。

“我不愿结束我的讲词。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为仇敌。我们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决不可折断。那种不可思议的回忆之弦，从每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展到这片辽阔土地上每一颗充满活力的心房和家庭，它一经我们本性中的善念再度（而且一定会）加以拨动，终将重新奏出响亮的联邦之曲的。”^[17]

道格拉斯一向是个很乐观的人，他在 1847 年就满怀信心地展望奴隶制的崩溃，他也曾那样满怀信心地认为既然能把辉格党改造成共和党，也能将共和党改造成废奴主义政党。但是现在林肯的所作所为使他开始担心“共和党会不会对自由的保卫软弱无力而对奴隶制的保护却是坚强有力的”。道格拉斯在评论林肯的就职演说时失望地指出：“以前有人说我们在林肯身上可以找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勇敢和坚定，但我们却看到了皮尔斯和布坎南的延续。共和党总统已准备好与他的任何前任一样对奴隶制屈膝。”^[18]

二 内战初期林肯的战争政策

正当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失望之际，1861 年 4 月 12 日，南部邦联炮轰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堡垒，挑起了分裂国家的内战。道格拉斯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南北终于不能再妥协了，绥靖情绪消失了，政治家和商人想通过对奴隶主权力的可耻让步来换取北部的和平与繁荣已不可能。战争将使每个人在“爱国的忠诚与亲

奴隶制的叛国之间作出抉择”。^[19]道格拉斯认为废除奴隶制的大好时机就要来到了。

不过，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是太乐观了一点。在内战初期，林肯政府并不想把内战变成一场废奴战争，而只是想恢复有蓄奴制的旧联邦。林肯在 7 月 4 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重申了就职演说中的承诺，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南部各州已经存在的奴隶制”。为了消除人们对他的战争目标的误解，他还特意强调指出：“为了免得老实人对于叛乱被平定后政府将对南部诸州采取什么政策心中有所不安，本总统认为可以适当地说，那时他像过去一样，决意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指导方针，至于联邦政府对宪法赋予各州和人民的权利负有的权利和义务，他的理解和他在就职演说中表达的也许不会有所不同。”^[20]

三周后，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确认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干涉那些州的权利和已建立的制度”，而仅仅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宪法的无上权威和保存联邦”。林肯政府中大多数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他们却采取了这种奇怪的政策，一方面他们要同叛乱的奴隶主作战，另一方面却又帮助奴隶主追捕逃奴。在内战初期，边境州的一些联邦将领就根据所谓忠诚的奴隶主的要求归还逃奴，密苏里的哈勒克则发布命令不准奴隶逃到他的防区内。林肯本人对那些擅自触动奴隶制的人则予以坚决打击。1861 年 8 月 30 日，联邦西部战区司令弗里蒙特将军发布文告解放密苏里州的奴隶，林肯强行撤销了这一命令，并在 11 月 2 日解除了弗里蒙特的职务。同年 12 月，陆军部长卡梅伦把赞同解放并武装那些联邦战线内的奴隶的一节写入他致国会的报告中，林肯获悉后，便下令收回该报告，删除该节。几周后，他也被解职。1862 年 5 月，占领南大西洋沿岸岛屿和飞地的联邦司令戴维·亨特将军发布了解放“南部军区”全部奴隶的命令，从理论上讲，整个南部军区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全境、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林

肯也取消了这一命令。

林肯政府为什么采取这一政策呢？首先作为所有州的总统，林肯依然认为，宪法保证诸州的奴隶制，使自己受到约束。联邦政府进行战争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即脱离联邦是违法的，尽管邦联诸州暂时处于叛乱分子控制之下，却仍然是联邦的合法组成部分。林肯和国会确保蓄奴州的另一个原因是需要安抚边境奴隶州对联邦的忠诚。另外，还有两党对战争支持的愿望。1860年大选中，自由州中选民几乎有半数投了反林肯的票。林肯获得的支持票为1838347票，反对票为1572637票。^[21]北部民主党人是赞成蓄奴制的派别。战争政策中出现任何反蓄奴制的迹象，都可能导致北方的分裂，并得罪大多数民主党人。因此，林肯政府采取保守的内战政策，在奴隶制问题上小心谨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谨慎却导致了废奴主义者的极大忧虑和不安。

第三节 变内战为废奴战争

一 道格拉斯的战争主张

对废奴主义者来说，解放奴隶与拯救联邦是密不可分的。从内战一开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场完成美国独立战争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的战争，那就是彻底铲除美国肌体上的奴隶制这颗癌瘤。1861年5月，道格拉斯在报上提出响亮的口号：“要么全部自由，要么全部为奴！”他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文章中提出：“火必须用水来扑灭，黑暗必须用光明来取代，摧毁自由的战争必须用摧毁奴隶制来对付。因此要制止这场由奴隶主发动的野蛮的、破坏性的战争，最简单的方法是摧毁战争的根源——奴隶制本身。”道格拉斯认为：“目前应该宣布解放首都的奴隶，然后，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推进地区全部解放奴隶。”他认为：“采用温和手段的时机已经失去了。这些温和手段对奴隶主来说是

明珠暗投，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些温和手段要调和并压制的罪恶。……温和的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也是最坏的战争。”道格拉斯坚决主张在战争罪恶扩散到北方之前，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在叛国者发动战争的地方。他呼吁：“拖延战争是没有好处的，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把战争带到非洲（奴隶制的南部）去，……让奴隶和自由有色人服役，组成一支解放军，挺进南部，并在奴隶中举起解放的大旗”，既然“奴隶主都毫不犹豫地雇佣南部黑人的黑色手臂帮助建筑使萨姆特大炮成为哑巴、把星条旗扔掷地上的堡垒，他们常常吹嘘——也并非毫无道理——黑人将帮助他们反对北部，那么，北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北部应该把这部分力量拉过来为自己使用。只有宣布解放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还说：“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一个黑人团队完全可以顶两个白人团队。在这种场合，肤色比火药和炮弹更为可怕。奴隶将从这样一个团队的出现中对这场冲突的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比从一千个布道者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为着公正、人道和明智的政策考虑，必须马上征召黑人入伍来保卫他们的国家。”^[22]

道格拉斯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变内战为废奴战争，他是北方最早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之一。道格拉斯认为，只要奴隶制存在一天，就没有和平的希望。战争是奴隶制和自由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南北之间的冲突，只有变内战为废奴战争，才能确保自由和国家的永久和平。“给奴隶自由就是给国家和平、荣誉和财富。除非这项工作得到贯彻，否则，所有的和平都将是虚假的，所有的宁静都是暂时的，所有国家的荣光都会失去光泽。安全的唯一保障就是废除奴隶制——这一孕育我们国家所有动荡的根源。谁为消灭奴隶制而工作，谁就在为拯救他的国家和把人类推进到更高级更真实的生活而工作。这是一项值得为之生生死死的事业。”^[23]这里道格拉斯把废奴与拯救联邦有机地联系起来。道格拉斯担心，内战如果不明确宣布为废奴战争，在联邦政府竭其所能要使南部相信奴隶制在联邦

内比在联邦外更安全的情况下，内战就有可能在确保奴隶主的自由和牺牲黑人的自由的条件下结束。^[24]

宣布内战为废奴战争会不会影响边境州奴隶主的忠诚，并疏远北部的民主党人呢？道格拉斯认为不会，也不用为此担心。他认为边境蓄奴州把联邦看得比奴隶制更高，如果他们热爱奴隶制甚于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些人就不值得，也永远不会成为联邦真正的朋友，他们就属于那些打着朋友的幌子，却帮助敌人工作的可疑的家伙，必须予以清除。^[25]

至于北方的民主党人，道格拉斯认为大多数的都会奉守公正原则，那些少数保守的人士毕竟有限，即使这些人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虽然《纽约论坛报》抗议把这场战争变成一场毁灭奴隶制的战争，坚持认为这样做会疏远大部分目前已在支持政府的北方人，但道格拉斯仍然相信，“北部那些明眼人和真诚的人永远都经得住考验，他们一定会奉守公正原则，哪怕会得罪一些保守的人，虽然这些人的支持与合作对联邦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保守人士之中十有八九将被果断而坚决的措施所拯救而不是被压制。”他还认为：“不久前还在谴责武力的人现在已经站到了支持政府镇压叛乱的最前沿，那些为巴特勒将军镇压奴隶暴动而拍手叫好的人，现在更为他拒绝交还逃奴给其主人的做法而欢呼，而这两件事都是他在宪法名义下做出的。”^[26]

变内战为废奴战争不仅没有坏处，反而会有许多好处，道格拉斯指出，变内战为废奴战争将把黑人变成自由人，将叛乱者变成爱国者。“它将把战争提高到为进步和文明而战的高度，将使这场战争从仅仅是保持我们自治的原则中解脱出来。它将不仅把加里波和他的两千意大利勇士吸引到我们这一边来，更重要的是它将唤回我们自己的正义感，它也将赢得世界文明、人道的人们对我们正义事业的同情。”^[27]而且，“奴隶制度是叛乱军队的胃，供应叛乱军队的面包、供应他们衣着的棉花，用来武装他们的火药和子弹的钱都

来自奴隶的劳动。如果讲到对奴隶劳动如何利用的问题，人家一定会说宁愿把它抛到海里，也不愿让它用于这场罪恶。打击这一点，割断战斗的人与劳动的奴隶之间的联系，就可以马上平息这场叛乱，因为这样就毁掉了供应衣食武器的胃”。^[28]

二 道格拉斯的战争策略及实践

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为了推动林肯政府和北部尽早地变内战为废奴战争，道格拉斯准备与任何反奴隶制的人们团结起来。“任何一个准备为推翻奴隶制而工作的人，无论他是一个政治废奴派，还是非政治废奴派，一个加里森主义者还是一个格里特·史密斯主义者，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将是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我们要组织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同盟，不管以前是由于什么样的政治的、个人的原因使我们分裂、互不信任，现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让我们至少暂时忘掉分歧，打击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事业的胜利。”^[29]

针对内战后有组织的废奴运动陷于停顿的现实，道格拉斯在1861年6月就提出过警告，虽然可以预想这场武装冲突会导致奴隶制度的完全废除，但是通往自由的路决没有这样平坦。废奴主义者的作用这时就尤为重要。爱国主义本身就要求不懈的努力和行动。只有废奴主义者可以教育全国人民明白，唯有行动本身才能赢得胜利。而且，战争也为废奴主义者的事业提供了比以前从未有过的巨大机会，奴隶制不仅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而且现在又加上了叛国作乱的罪行。以前没有为废奴道德所打动的人，现在也准备为联邦而战，倾向于如果有必要，就应废除奴隶制。道格拉斯认为应该抓住这一良机。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取消反奴隶制的集会；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反奴隶制工作人员唤回家来，而是应该派出更多的人；我们不是应该让反奴隶制的报纸衰落下去，而是应该认真地工作加以扩大它们的发行量，增加其影响。”^[30]1861年11月他与

加里森派弥合分歧。在波士顿，加里森派则组成“解放同盟”，希望通过演说唤起国民对消灭奴隶制的热情，“鞭策人们及政府去解放奴隶，作为正义的措施和军事上的需要”。^[31]自此，战争开始时一度消失的有组织的废奴运动重新高涨。

虽然林肯政府和北方由于长期以来的冷漠、保守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惯性不可能一下子接受道格拉斯变内战为废奴战争的观点——他们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会慢慢接受这一正确的预测和主张，但是，道格拉斯思想中所包含的“军事必要性”的见解却得到了共和党内的废奴主义者——激进派的赞同和响应。他们一致认为，奴隶制对南部的战争尝试关系巨大，废除奴隶制对北部更为必要。尽管他们也想以道德和正义的理由解放奴隶，但他们在战争早期中都回避了这一主题。1861年11月激进派领袖查尔斯·萨姆纳写道：“你们将注意到，我提议不进行废奴战争，解放奴隶将作为严格的军事必要性的一种措施提出……而并非以博爱主义为根据。……废除奴隶制不会成为战争目标，只不过是战争的一种动力。”^[32]

蓄奴制对南部邦联的军事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邦联11个州共有奴隶350万，几乎占其总人口的40%，又占其劳动力的大部分。南部的报纸自诩说：“蓄奴制是邦联的可靠支柱，因为这使它按照白种人人口比例投入战场的兵力比北部多得多。”邦联的钢铁业、盐业等重要矿山工人，半数是奴隶。迄至1864年，邦联的两个主要兵工厂，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和塞尔马的海军工厂里，黑人占劳动力的2/3。邦联军队医院的护士，至少有半数是黑人，黑人充当厨师、仆役、马车夫、建筑工人，甚至是邦联军队的随军乐师。奴隶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军事当局从战争初期就强制他们服役，并大大早于联邦着手征集白人男子入伍。^[33]

1861年4月19日，林肯政府宣布对邦联港口实行封锁。废奴主义者认为，既然国际法承认封锁可以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那么对邦联的封锁实际就等于承认了其交战国地位，虽然林肯

极力否认这一点，但却是事实。废奴主义者抓住这一点，于是主张邦联诸州不再享有宪法的保护，应以国际法取而代之。国际法承认，没收敌方财产是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奴隶属于敌方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正是直接地用来支持叛乱，所以应该加倍予以没收。废奴主义者的这种做法未必妥当，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对联邦来说，即使不是致命的，也是危险的，那样将会使一国的内战国际化，导致其他国家的介入或干涉。事实上，当时南部以及对它的棉花严重依赖的英国是乐意看到这种结果的，英国本来都已打算承认南部与北部交战国地位，只是慑于各种形势所迫，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支持南方。不过，废奴主义者提出的以军事必要性来没收或解放奴隶的办法却是很明智，也被证明是可行的。

废奴主义者的工作很快开始取得成效。第一个根据军事必要性起来行动的是本杰明·巴特勒将军。他原来是布雷肯里奇的民主党人，现任联邦军队弗吉尼亚海岸门罗要塞的指挥官。巴特勒将军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家，从他家乡马萨诸塞州刮来的反奴隶制风潮使他转向了共和党激进派。5月23日，当3名在邦联军队防御工事服役的奴隶逃往巴特勒阵地时，他拒绝把他们归还原主，并以“战时违禁品”加以扣留没收。消息传开，到8月，投奔而麋集在巴特勒军营中的逃亡奴隶已达千名，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马上派去工作人员帮助建立学校，教育这些奴隶。

对巴特勒将军的没收法令，林肯政府予以默许，而且随着联邦军队在7月份布尔河战役中的惨败，迅速平定叛乱的幻想已经破灭。林肯政府遂决定把巴特勒将军的做法推而广之，对奴隶主采取更严厉的政策。大多数共和党人也同意采取有限的步骤去反对奴隶制，以作为取胜的手段，即使尚不把它列为战争目标。这样，在1861年8月6日林肯政府颁布了没收法令，规定没收包括奴隶在内的用于支持军事叛乱的一切财产。这一法令仅适用于当时联邦军队力所能及的少数奴隶，也并未规定要解放他们，但却是朝向废奴

主义者所期望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它标志着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所规定的战争政策开始破产。到 12 月份，由于众议院曾支持该决议案的 53 名共和党议员改变态度，因此，众议院不再确认该案，此案乃被废除。

1861 年至 1862 年春，根据没收法令，在联邦军队攻占的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岛屿没收了数万名奴隶，在田纳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军挺进地区也没收了数千名奴隶。

共和党内的废奴主义者——激进派人士在实行以“军事必要性”为由打击奴隶制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由于这些人控制着国会各主要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因此他们在内战初期的反奴隶制立法方面起着支配的作用。在参议院，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亨利·威尔逊分别担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P·黑尔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密执安州的扎卡赖亚·钱德勒领导商务委员会，俄亥俄州的杰明·韦德担任准州委员会主席兼战争指导联合委员会主席。在众议院，激进的宾夕法尼亚人加卢沙·格罗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担任两项最重要的职务——议长和岁入调查委员会主席。几名在 1862 年经常支持激进立场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也身居委员会要职，著名的有伊利诺伊州的莱曼·特朗布尔（司法委员会），以及缅因州的威廉·皮特·费森登（财政委员会）。

迄至 1862 年 1 月中旬，至少有七项涉及解放奴隶和没收叛乱者财产的各种议案，已由各委员会提出了报告。1862 年 3 月 31 日通过的陆军法规，禁止陆军军官把逃亡奴隶引渡给原奴隶主，违者受军法审判。1 月 16 日由亨利·威尔逊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立即在哥伦比亚特区解放奴隶，政府可向忠于联邦的奴隶主每释放一名奴隶补偿 300 美元的损失。法案被国会通过。4 月 16 日林肯批准生效。弗舍德里克·道格拉斯非常高兴，特向为此案获得通过起重要作用的查尔斯·萨姆纳表示敬意。6 月，国会还批准与英国缔结的

一项新条约，以便有效地制止大西洋两岸走私奴隶买卖。

尽管这些法令很重要，但对奴隶制只是稍微触动了一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没收叛乱者财产的第二道法令。该法令于 1862 年 7 月 17 日通过，它不仅重复了上一年 8 月 6 日法令的内容，而且明确地说明凡是逃入联邦战线内的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将被作为战俘，并将永远获得自由”。这就比以前更进一步，提出了黑人奴隶基于战争需要获得自由和释放的问题，这是朝向全面解放黑人战争的第一步。可以说它改变了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然而这一法令的眼前效果和长远效果都是有限的，根据这一法令规定的财产没收和奴隶解放，将取决于确定奴隶主是否曾参加叛乱的法律程序。由于林肯政府相信，战时奴隶的解放问题必须由作为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总统来处理，而他从未以这样的身份根据第二道没收法令采取行动。这一法令的实施并不理想。尽管这样，它也给林肯政府以后态度的改变以很大的推动。

林肯政府可没有像国会中的激进共和党人那样痛快地接受道格拉斯以军事必要性为由解放奴隶的思想，但是，到 1862 年春，他也渐渐相信解放奴隶的“军事必要性”了。这部分归功于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激进派的努力，部分也由于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所致。

1861 年夏至 1862 年春，废奴主义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本人就不辞辛劳，长途跋涉数千英里，向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俄亥俄及伊利诺伊等州人民作旅行讲演，批评林肯的战争政策，号召人们起来推动林肯实行解放黑人的战争政策。经过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和反奴隶制人们的艰辛努力，北部反奴隶制情绪的势头不断高涨，连波士顿一家保守派的报纸也发表评论说：“一年前，人们无论如何一想到采取这种非常手段，也许会犹豫不前。大多数人口前不想追求它，但是，我们明智地说，他们大部分对此是有所准备的。”^[34] 这种要求解放奴隶的浪

潮自然也会冲击到林肯。要求解放奴隶的请愿签名活动、集会等在北部纷纷举行，这种信息不断地传到林肯那里，其中著名的有《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霍勒斯·格里利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两千万人的呼吁》，文章抱怨联邦事业因错误地尊重南方奴隶制而受到损失，他要求林肯把战争转变成为自由的讨伐战争。林肯对这种时代的趋势不能无动于衷。1862年7月12日。林肯在召见边境州代表时坦言承认他取消亨特将军解放“南部军区”所有奴隶的命令是冒了很大风险和压力的。他说：“我取消那个命令以后，即使不是得罪了許多人，至少也使许多人不满，而這些人的支持國家是決不能失去的。事情還並沒有了結。我仍舊受到這方面的壓力，而且壓力越來越重。”^[35]

林肯政府原來只想拯救聯邦而不觸動奴隸制，但是聯邦軍隊在人數、資源等占盡優勢的情況下却在戰場上連遭敗績，說明這種有限戰爭政策根本行不通。南部既然為奴隸制而戰，它不被聯邦政府打敗並摧毀其奴隸制，它是不會自動屈服的。因此戰爭只有繼續打下去。聯邦政府要想獲勝，必須採取解放奴隸的政策，那樣才能打碎敵人進行戰爭的基礎。林肯終於被迫承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年前就已得出的結論：“反對奴隸主而不反對蓄奴制，只不過是在半心半意地工作，做起事來兩手癱瘓無力。”^[36]

在北部人民廢奴要求和戰場形勢的雙重壓力之下，林肯終於決定解放奴隸。起初，他想以一種代價較小的方法來解放奴隸並拯救聯邦。1862年3月6日，林肯在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建議通過決議，準備向任何“能夠採取漸進方式廢除奴隸制”的州提供財政援助。這一建議獲得通過。雖然這一建議是向全國作出的，但主要是針對邊境蓄奴州的，林肯指望邊境州接受這一方案，這樣便斷絕了南部指望邊境州跟自己走的幻想，那樣戰爭便會結束。但是，這項建議遭到邊境州的拒絕。林肯感到最後一張牌都打完了，只有打出聯邦強行解放奴隸這張王牌才能拯救聯邦。因此，在7月12日邊

境州代表再次拒绝林肯的自愿释放奴隶建议的当天晚上，林肯便决定发表一份自麦克累伦在 1862 年 6 月—7 月间的“七天战役”中从里士满前线被打败后就一直在考虑的解放宣言。7 月 13 日，他把这一决定私下透露给内阁成员西沃德和韦尔斯。7 月 22 日正式向内阁通报，获得内阁大部分成员的赞同，只有邮政总局局长布莱尔一人担心此举可能使民主党人在秋季大选中获胜而反对发表宣言。西沃德建议，由于联邦在军事上新近遭到的失败而使公众情绪沮丧，为避免使这个宣言被认为是政府一筹莫展的绝望之举，应当在军事胜利的支持下再向全国发表。林肯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为了使公众对解放宣言有所准备，林肯在这期间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8 月 22 日，林肯在给霍勒里·格里利的公开信——“两千万人的呼吁”的公开答复中，对解放奴隶的可能作了暗示。他说：

“我要拯救联邦。我要在宪法指引下通过最简捷的途径去拯救联邦。政府的权力恢复得越快，联邦就越接近于‘原来那个联邦’。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摧毁奴隶制否则他们就不愿去拯救联邦，这种人我也是不赞成的。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做了些事情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有些事我所以克制不做，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不利，我就尽量少做，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有利，我就尽量多做。我一旦发现错误，就努力克服，一旦发现某些新的观点是正确的，就立即采纳。

“这里只是根据我对所担任的政府职务的理解说明我的意图；对于我经常表示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获得自由这一个人愿望，我是决不会改变的。”¹³⁷

林肯在这里为他颁布解放宣言埋下伏笔：为了联邦而非解放奴隶是北方的战争目标，但为了拯救联邦而解放奴隶是可能的。

1862年9月初，联邦军队在安蒂塔姆战役中以惨重代价重创南部邦联军队。双方在战术上可以说是未分胜负，但在战略上却是北方的胜利，因为它粉碎了邦联军司令罗伯特·李进军北部，一举结束战争的梦想。在安蒂塔姆会战结束5天后，林肯便决定利用这一胜利，发表早已准备好的《预备性的解放宣言》。9月22日，这个《预备性的解放宣言》草案正式发表，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仍旧处于叛乱状态各州的奴隶，“将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宣言把解放奴隶的正当理由解释为军事需要，赞成获得自由的奴隶志愿移民，重申忠诚的蓄奴州逐步解放的立场。林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这样的安排，在某种意义上旨在不使它引起轩然大波，并使释奴手段看起来不过是赢得战争的一个条件。

废奴主义者和反奴隶制的人们对林肯的初步解放宣言不甚满意，但还是充分理解这一点。马萨诸塞州州长、激进共和党人约翰·安德鲁对宣言评价说，这是“一份拙劣的文件，然而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法令”。^[38]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发表评论说，9月22日是美国政府新的一页的开始，林肯总统的宣言是新的历史的第一章。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保存，而是摧毁奴隶制；不再是追捕逃奴，而是让他们自由；不再是阻止奴隶起来反抗他们残暴的主人，而是为这种反抗大开方便之门”。^[39]道格拉斯还认为，既然政府能够废除叛乱州的奴隶制，那么也一定会废除边境州的奴隶制。

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签署了《解放宣言》。它规定凡当时尚未被联邦军占领的邦联任何州的地区内所有的奴隶都应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和维护他们的自由。林肯以合众国总统的身份庄严宣布：

“我，亚伯拉罕·林肯，合众国总统，今依宪法授予的权力，在现今武装反叛政府时期，担任合众国政府陆海军总司令；作为剿灭

该叛乱而采取的适当和必要的军事措施，特于今天，1863年1月1日，即上述初告颁布100天后，在符合本人意旨的情况下，指明那些今日已在背叛合众国的州和州内之区域及人民如后：

“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除圣伯纳德、普莱克明斯、杰菲逊、圣约翰、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松、阿森姆松、特雷木、拉福煦、圣玛丽、圣马丁及奥尔良诸城镇教区以及新奥尔良市外）、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及弗吉尼亚（除定名为西弗吉尼亚之48个县及伯克利、阿康马克、北安普顿、伊丽沙白市、约克、安妮公主市、诺福克，其中包括诺福克及朴次茅斯两市），对上述各地以外的区域，本公告不发生效用，犹如并未颁布一样。

“有鉴于暴力及宗旨，我命令并宣布，在上述各州及区域内，所有被视作奴隶的人立获自由并予以后永保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和维护他们的自由。”^[40]

被《宣言》豁免的邦联地区还有整个山纳西州（除山纳西东部外），因为已被联邦军占领，由总统任命或由军事或民政当局管辖，实际上它们已经是联邦的一部分，所以不受《宣言》的约束，《宣言》作为军事措施，只适用于敌方领土。东田纳西之所以被豁免，是因为林肯认为，那里的白人是忠于联邦的。^[41]

《解放宣言》宣布了一个新的战争目标，美国现在是在为建立一个新联邦而奋斗，而不再是为了恢复旧联邦。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变内战为废奴战争的目标终于成为现实。

《解放宣言》在国内外都赢得一片赞扬之声。以前在国外一直存在着英国承认南部独立的问题，但《解放宣言》的发表粉碎了这一南部深深企盼的幻想，因为反奴隶制的英国显然不能承认亲奴隶制的邦联。英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亲北部的舆论转向。

《解放宣言》也终于满足了一直拖延不决的武装黑人的要求，这也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从战争一开始就极力主张的。1863年

春，洛伦佐·托马斯准将在南部设立招募黑人士兵的机构。他本人被派往密西西比河流域去开展这个机构的工作。在他的办公室下面设立了一个处理一切有关编组黑人事宜的专门机构，选派了征兵的工作人员，并在马里兰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和其他战略地点设立了征兵站。所有身体健壮的黑人都符合参军条件。忠于联邦的奴隶主如果让其奴隶当兵，可获得 300 美元补偿金，如果一个地区 30 天内征不到足够兵员数则可以不经忠于联邦的奴隶主的同意把奴隶带走。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征集黑人当兵做了积极工作。1863 年 2 月末他发表了“有色人武装起来”的号召书。他指出，南部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压迫黑人的奴隶制永久化，那么有色人有义务起来帮助联邦战胜奴隶主。这篇文章被北方各主要报纸转载，最后又被印成单行本，流传甚广。对道格拉斯而言，黑人应征加入联邦军队是天经地义的，他劝他的同胞暂时不要去管这一应征号召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相反，“行动！行动！而不是批评才是这一时刻本来应该去尽的职责。只有激励我们行动的语言才是有用的”。黑人应该珍惜这一服兵役的机会去保卫、完善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地位，阻止联邦和南部邦联之间出现对奴隶制的妥协，并且使之成为一场争取黑人解放的“高尚而完善心灵”的战争。道格拉斯不断重申这一主题：即黑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自己种族的解放和提高而辛劳。他认为，黑人自由如果由白人替他们赢得，其光泽将失去一半。^[42]

1863 年 4 月他又发表“有色人为什么要应征”的文章，他提出，有色人也是人，而不是牛或马，因此对所发生的事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只管自己的事就行。在南北之间这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之间，有色人必须作出选择，显然北方属于正义的一方，因此应给北方以支持。道格拉斯认为，在这场较量中，没有中间道路可走。黑人要么支持政府，要么站在其对立面。是人就必须有所选择，因

为人的权利属于白人，也属于黑人。如果黑人要想在战后赢得作为公民的地位，那他就必须表明自己有能力 and 责任尽一个公民的义务。服兵役另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使用武器，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从而改变自己过去由于奴隶制度带来的“缺乏人的勇气”的形象，也会提高尊严和自尊，“你将站得更直，走路更有信心，感觉更加自然，不再像过去那样易于屈服于所强加在身上的侮辱”。反对叛乱和叛国者，实际就是在保卫自己的自由、荣誉、人权和自尊。道格拉斯发出响亮的呼吁：“如果权利的标准不在肤色，那么只要是美国公民，就应该尽一个公民所应尽的一切义务。虽然黑人在过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如果现在拒绝服役，就会使过去政府的歧视合法化，也会使政府为向有色人发出的服务国家的呼吁而后悔；每一个奴隶制的拥护者和憎恨奴隶的人都把武装黑人当作他们的灾难，如果拒绝服役，就等于在帮助奴隶主；黑人必须学会使用武器，熟悉确保、捍卫和维护自己自由的工具；反驳黑人只适合当奴隶的谎言；改变人们的偏见；恢复自尊。如果有色人为保卫国家而战，那么他就会赢得尊敬；阻止国家在战后陷入与奴隶主妥协的泥淖中去。总之，这场内战成了一场解放战争，有色人应责无旁贷地拿起武器为自己的事业而战斗，并且应比白人表现得更为出色。”^[43]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担当起征兵人员的工作，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军队去，以身作则。在道格拉斯的鼓动下，自由黑人踊跃参军。到战争结束时，加入联邦军队的黑人超过 18.6 万人，其中 9.3 万人来自退出联邦的州，4 万人来自边境蓄奴州，其余将近 5.3 万人来自自由州。

在南北战争期间，黑人在各个战场上参加战斗，他们参加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米利肯湾、佛罗里达州的奥卢斯蒂和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等地的战斗以及萨凡纳的包围战。他们在阿肯色、肯塔基、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等州作过战；参加了攻陷彼得斯堡的战

役，1865年4月9日参加了占领阿波马托克斯县政府办公楼。1864年7月30日，国会由于德凯德·多尔西在彼得斯堡担任第三十九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的军旗卫士时表现英勇，发给他一枚奖章。第三十六部队的二等兵詹姆斯·加德纳，因为奋勇当先，开枪打中了一个率领南部邦联士兵作战的军官，获得了一枚奖章。第五十四马萨诸塞步兵团有4个人在攻打瓦格纳堡时表现英勇而获得吉尔摩奖章，他们的指挥官罗伯特·古尔德在此次战役中战死。吉尔摩少将发布以下命令表彰他所率领的黑人士兵的英勇事迹：

“1865年3月7日，有色人种士兵和侦察员一行共30人离开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通过马里恩县渗入内地。他们把91名黑人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捉到了4名白人俘虏，夺取了两辆运货马车，24匹马和骡子；破坏了一个制糖作坊和一个酒厂，烧毁了奥克拉瓦河上的桥梁。他们在返回时遭到一支人数达50名的骑兵队的袭击，他们击溃了骑兵，击毙30多名叛逆者……这一由一名有色人军士率领，由有色人种士兵计划和执行的讨伐行动，使英勇的参加者及其领导人赢得了声誉。”^[44]

其他各级军官如E·R·S·坎布少将、韦策尔少将和W·F·史密斯少将等也提出类似的证词。这些都表明黑人士兵竭尽全力来拯救联邦和争取本身的自由这一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另外，黑人士兵在战争中牺牲了3.8万多人。他们的死亡率比白人士兵高出近40%。如第五美国有色人种重炮兵团就有829人死亡，这是联邦军队各部队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第65有色人种步兵团，仅仅死于疾病者就有600多人。黑人的死亡率高是由于过分劳累的杂役、装备差、医疗条件差、让黑人仓促上阵，以及南部邦联军队同他们作战时采取“不宽恕政策”所致。^[45]黑人为联邦军队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联邦军队于1865年胜利之际，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也在这一年1月31日提出，12月18日被批准生效。第十三条修正案规

定，苦役或强迫劳役，除用以惩罚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之任何地方存在。依据这一修正案，合众国的奴隶制被废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黑人解放战略经受住了内战的考验，取得了胜利，黑人获得了人身自由。

第四节 黑人士兵的权利

一 黑人士兵面临的歧视

内战爆发后，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面，道格拉斯也采取适当措施，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把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的斗争转移到与战争相关的黑人征兵工作以及黑人士兵的待遇上来。道格拉斯明白，内战是争取黑人解放的一个绝好契机，他决心把内战变为废奴战争。在这一过程中，道格拉斯争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武装黑人。道格拉斯注意到，虽然在密苏里、西弗吉尼亚、得克萨斯、南部沿海地区都需要人手来保卫联邦，但联邦政府仍然拒绝黑人用他们强壮的双手和勇敢的心来保卫国家，这是对全体黑人的贬低和污辱。在联邦政府准许黑人当兵前，道格拉斯积极斗争，呼吁北方白人和联邦政府克服对黑人当兵的种族敌视和偏见，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盲目、多么缺乏理性的偏见与卑怯景观！国家大厦着火，凡是能提一桶水或拿一块砖的人都是需要的。但是照看大厦的人却对纵火的强盗有一种莫大的敬意之情，决心只用白人的手来扑灭，宁愿让大厦被烧毁也不愿用其他方法来拯救。”拒绝黑人当兵也即拒绝黑人的天性。道格拉斯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不无愤怒地诘问，“他是一个人吗？”^[46]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挥舞长剑，扣动枪机，推进和反推进，以及遵守其他规则吗？道格拉斯表示相信，如果联邦政府准许黑人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使他们感到自己也是拥有权利的人，他们将会成为遵守纪律、行为检点的模范，从各个方面增进国家的力量。道格拉斯强烈要求联邦政府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武装他们。

在《解放宣言》颁布后，联邦政府终于正式接受黑人当兵，但却给他们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对前者，道格拉斯表示欢迎，对后者，道格拉斯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发给黑人士兵的军饷上，从一开始就是有歧视的。在非正式接纳黑人士兵的 1862 年 7 月 17 日的征兵法规定，白人二等兵每月得 13 美元补贴外加 35 美元的服装费，但同一级的黑人士兵则是作为劳力付薪的，所得分别为 7 美元和 3 美元。黑人正式参军后也照此办理。

在编队上，黑人士兵被单独编队，有轻重炮兵团、步兵团和工兵团。为了把他们同白人团队区分开来，他们被称为“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但军官却由白人担任，只配有一些黑人军士协助领导。

在工作分配上，黑人部队也面临着不平等。军队中特别有害健康的工作、杂役都叫黑人去干。有些黑人部队只被派去沿着海岸线和河流修筑防御工事却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甚至不做军事训练，连他们的白人军官也啧有烦言。一位白人军官说，他宁愿扛着枪和士兵们一起去战斗，也不愿当黑人工人的监工。^[47]

黑人士兵在医疗条件、装备方面也比白人部队差。

在官职升迁上，黑人也面临着种族歧视。黑人士兵很难被擢升为军官，即使他立下军功也是如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 1863 年 3 月以来就担任征兵工作人员，为动员黑人参军作了重要工作，陆军部长斯坦顿也因其出色表现准备提升他为负责黑人征兵工作的洛伦佐·托马斯将军的副官去南部协助黑人征兵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因为道格拉斯身为黑人，而这么高的职务从未授给过黑人，所以，斯坦顿未能把委任状颁布下来，结果道格拉斯也就未能被提升为军官。

黑人士兵在联邦这边都受到歧视，在战斗中如果他落到南部邦

联军手里，其处境就更惨了。南部邦联对北方使用黑人部队非常恼火，绝大多数白种南方人把黑人士兵当作反叛的奴隶，并坚持要像对待反叛的奴隶那样对待他们。1862年12月，杰斐逊·戴维斯“总统”下令，凡是俘获的武装黑奴，均应交给他们离开的州，并按照该州的法律处理。1863年12月17日的《早上满调查者报》也疯狂叫嚷，假如黑人“被派到战场上参加作战的话，无一个人将会被当作俘虏看待。我们的军队懂得在这样的场合如何做”^[48]。

落到南部邦联军队手里的黑人士兵有的被卖为奴隶，更多的则被杀害。南部邦联陆军部长鼓励杀掉一些黑人俘虏，以做效尤，恐吓黑人当兵。1864年，一位南部邦联军官欣格勒上校告诉他的部下，俘虏了黑人士兵不必再向上级报告。不仅黑人士兵，就连指挥黑人部队的白人军官也有在被俘后被杀害的。内战中最臭名昭著的屠杀黑人的事件是皮洛堡事件。

1864年4月12日，皮洛堡落到了内森·福雷斯特将军统帅的南部邦联军队手里，他们不准那里的黑人士兵投降。守卫堡垒的黑人士兵有262名，他们有的在战斗中被打死，有的在逃跑时被打死，更多则被活埋，无一幸免。在堡垒里避难的其他黑人也惨遭厄运。由联邦参议院所作的调查报告称：“男人、妇女、甚至连小孩都被枪杀、毒打或乱刀砍死；不满十岁的儿童也被迫面对刽子手站着，由他们枪杀；有病的和受伤的人都惨死在无情的屠刀下。”同盟军军官狂叫“杀死所有黑鬼！”福雷斯特本人骑着马在散乱的受伤的黑人中间大声喊叫，说他认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我的孟菲斯黑人院里呆过”。^[49]

也有一些黑人士兵被南方当作俘虏关押起来。1863年，巴特勒将军报告说，有3000名黑人士兵当了南部邦联军队的俘虏，1864年有近1000名黑人俘虏在莫比尔为南部邦联修筑防御工程。^[50]

二 争取黑人士兵权利

针对南北双方对黑人士兵的种族歧视政策，反奴隶制度的人们和黑人无不义愤填膺，他们纷纷集会，发表文章，或递交请愿书给军事当局和林肯本人，要求给黑人士兵平等权利和待遇。道格拉斯是动员黑人参加军队的主将，对黑人士兵的平等权问题更是关心，他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不遗余力地敦促政府予以解决。

道格拉斯发表文章指出，既然都是服役，黑人士兵同样忍受着危险和牺牲，他们用敞开的胸膛，强壮的手臂和勇敢的心去迎接叛乱者的大炮，在死亡中寻求胜利，他们理应得到同样的报酬，同样的给养，同样的津贴，以及给予其他人的同样的条件。^[51]

道格拉斯对黑人士兵无论在战斗中还是在平常训练中都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和平等待遇，非常不满。所以他把自己当作为黑人士兵争取平等与公正的斗士。他还曾对一个负责组织黑人军队的军官 G·L·斯特恩斯准将说：“我对于我那长期受到欺侮的同胞，特别是对于已经参军的同胞所应尽的义务，便是控诉他们的苦难，为他们进行辩护。”道格拉斯要求给予黑人士兵适当的训练，配给称职的军官，停止继续只让黑人士兵从事有害身体健康、不愉快的、士气低落的工作、杂役及驻防等。最后，他还要求给予黑人士兵同工同酬，因功升迁的同等权利。他写道：“黑人士兵有权享受同工同酬，联邦政府在职务分配上应主要考虑他们的德行，而不是肤色。”^[52]

对联邦政府听任南部邦联军队屠杀被俘的黑人士兵，而缺乏有力的保护措施，道格拉斯非常愤怒。他指出，如果北部有两个白人士兵面临被杀害的威胁时，里士满的叛乱者恐怕会马上得到通知，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报复行动，但是当黑人士兵面临这样的威胁时，联邦政府却一句话也没有。道格拉斯还提出警告：“除非林肯运用他的权力制止对黑人士兵的血腥屠杀，否则，文明世界将把他与杰斐逊·戴维斯一样看做为这些暴行的罪魁祸首。”^[53]只有

当戴维斯懂得每屠杀一个黑人士兵，他的邦联军士兵也将被处死时，他才不敢轻举妄动。

道格拉斯不仅在报纸上，也在人民群众中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谴责，1863年7月，他还专门为此面见林肯总统，向林肯倾诉他对政府未能消除在联邦军队中服役的黑人士兵不平等待遇的关注。他提出了三点要求。（1）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应当领取同等薪饷；（2）黑人俘虏应当和白人俘虏一样得到同等保护，随时按同样条件交换，如果发生枪毙或绞死黑人俘虏的事件，就要予以报复；（3）黑人中战功卓著者应当完全和白人士兵一样给予奖励和提升。^[54]然而，林肯并没有给道格拉斯一个满意答案，他只是说黑人士兵最终将得到平等报酬，但要等一段时间，等到全国人民都看惯了黑人士兵的时候。虽然他同意黑人士兵应得到更人道的待遇，但是林肯总统还是告诉道格拉斯，说他不能对邦联士兵的残暴行为采取报复行动，因为它可能会使残暴行为不必要地升级。最后，林肯保证他一收到黑人士兵升任军官的中报就会予以批准。这可以说是道格拉斯此次首都之行唯一实质性的成果。

很多白人群众也支持黑人士兵的合理要求。例如，指挥第五十四马萨诸塞团的罗伯特·肖上校战死后，他的父亲写信给林肯总统，要求林肯采取措施保护黑人士兵。他说，“如果我儿子的服役和死亡在任何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的有色人种部队”争取平等待遇的话，“我们将认为我们的巨大损失是一个幸福”。^{55]}

值得一提的是，道格拉斯在反对黑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时，也要求黑人自己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当时许多黑人因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拒绝应征，使征兵工作遇到很大困难。没有人比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更懂得黑人参战的意义，歧视应当反对，但决不能成为参战的障碍。早在1863年2月，道格拉斯就说：“所有去参加陆海军的有色人必须迎接各种烦恼的事，也许是严厉的批评，甚至是侮辱。但任何人决不能因此而后退。我们要进行双重战争，既反对

南方的奴隶制，也反对北方的偏见……”^[56]

1863年7月6日在费城一次征兵工作会议上，道格拉斯再一次耐心做黑人的工作，说他们应当为主要原则而战，即同那种认为黑人天生低贱，应当永远被奴役、被剥夺天生平等权利的观念作斗争，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即使没有报酬也要去战斗。黑人最好去应征。道格拉斯把当兵看做是取得公民权利的最好的资格证明。

“一旦黑人身上佩有‘美国’字样的铜牌，纽扣上有一只鹰，滑膛枪扛在肩上，子弹装在口袋里，那么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他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57]许多黑人被说服了，第五十四马萨诸塞团就是在不领有歧视性的军饷的情况下开赴战场的。在道格拉斯的正确领导下，也由于广大黑白人民的共同努力，军队中的种族歧视终于被部分地取消了，陆军部队在1864年7月通过法案，实行黑白士兵同酬，第五十四马萨诸塞团过去八个月拒领的工资也按新办法加以补发；1864年，陆军副官署署长洛伦佐·托马斯发布命令：不应使派给黑人部队过重的负担，“只要求他们同白人部队合理地分担杂役”^[58]。1863年7月30日，林肯颁布一道命令说，如果南方违反战争法屠杀战俘的话，每屠杀一名联邦军战俘，北方就处死对方一名战俘，敌人如果把黑人士兵送回种植园当奴隶，联邦也把同样数目的对方俘虏处以苦役。林肯在命令中还表示，国际法不容许在对待战俘时实行肤色的差别待遇。^[59]南部邦联军队在1864年接受了把黑人按战俘处理的观点；内战结束时有75名黑人由于战功被提升为下级军官。其中巴特勒将军的非洲军团有两个团的军官全部是黑人，包括杜马少校和平奇巴克上尉。驻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独立炮兵连由福特·道格拉斯上尉和马修领导，第一百零四团有两位黑人军官：马丁·德拉尼少校和O·沃尔上尉。接受军衔的黑人军医中有第七团的亚历山大·奥古斯塔和第三十五团的约翰·德格拉斯、查尔斯·帕维斯等。获得军衔的黑人牧师有亨利·特纳、威廉·沃林、塞尔·哈里森和约翰·鲍尔斯等人。对黑人的胜利，道格拉斯

感叹万分，“公正自由或人道似乎只有通过眼泪和鲜血才能惠及到我们身上”。^[60]

黑人士兵争取平等权的斗争取得部分胜利不仅改变了他们自身的地位，而且也部分改变了人们对黑人平等权的看法。林肯在战争结束前就曾打算把选举权授给某些有知识的有色人和曾作为士兵为联邦事业服务的有色人。1864年3月13日他在给路易斯安那重建州长迈克尔·哈恩的一封标有“机密”字样的信中说：“我祝贺你作为路易斯安那第一任自由州州长而名垂青史。现在你们即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要做许多事情，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确定选举权。我提一个建议请你考虑：可不可以让一些黑人参加选举——例如那些才智出众的黑人，特别是那些在我们军队里英勇作战过的黑人。在今后的考验时刻，他们也许会有助于在自由的大家庭中保住自由之宝。”^[61]林肯在此之前一直把黑人当作天生低于白人的种族，他曾极力主张把黑人移植出去。

林肯的这一建议未被接受。在内战胜利后，选举权成为道格拉斯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的主要内容。

注释：

[1]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1856年9月12日的说明，转自厄尔·康拉德著：《哈丽雅特·塔布曼》，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5页。

[2] “芝加哥的提名”，1860年6月《道格拉斯月刊》（“The Chicago Nomination,” *Douglass' Monthly*, June, 1860）。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Philip S. Fone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Vol.2），第二卷，第48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01页。

[4]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Philip S. 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4），第187页。

[5]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 [6]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第 79—80 页。
- [7] 同上书,第 134 页。
- [8] 同上书,第 139 页。
- [9] 同上书,第 64 页。
- [10] 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61 页。
- [11]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中译本),第 108 页。
- [12] 同上书,第 139 页。
- [13] 同上书,第 106—107 页。
- [14] 同上书,第 140—141 页。
- [15] 同上书,第 53 页。
- [16] 同上书,第 147—148 页。
- [17]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美国历史文献选集》,1985 年,第 115 页。
- [18]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74 页。
- [19]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191 页。
- [20]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中译本),第 167—168 页。
- [21]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70 页。
- [22] “如何结束战争”,1861 年 5 月《道格拉斯月刊》(“How to end the war,” *Douglass' Monthly*, May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94—95 页。
- [23] “告读者与订户”,1861 年 10 月《道格拉斯月刊》(“Readers and Subscribers”, *Douglass' Monthly*, October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167 页。
- [24] “致塞缪尔·J·梅牧师”,1861 年 8 月 30 日写于罗切斯特(“To Rev. Samuel J. May,” Rochester, August 30,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158 页。
- [25] “卸下重担”,1861 年 9 月《道格拉斯月刊》(“Cast off the Mill-stone”, *Douglass' Monthly*, September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155 页。

[26] “论战争”，1861年7月《道格拉斯月刊》（“Notes on the war”，*Douglass' Monthly*, July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115页。

[27] “论战争的进程”，1861年9月《道格拉斯月刊》（“The progress of the war,” *Douglass' Monthly*, September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149页。

[28] “卸下重担”，1861年9月《道格拉斯月刊》（“Cast off the Mill stone”，*Douglass' Monthly*, September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155页。

[29]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199页。

[30]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16页。

[31] 同上书，第20页。

[32]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中译本·上册），第337页。

[33] 同上。

[34] 同上书，第343页。

[35]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中译本），第192页。

[36]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中译本·上册），第344页。

[37]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中译本），第204—205页。

[38]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中译本·上册），第345页。

[39] “致我们英国和爱尔兰的朋友”，1862年10月《道格拉斯月刊》（“Address to our readers and friend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ouglass' Monthly*, October 1862）。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280页。

[40]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116—117页。

[41]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中译本·上册），第37页。

[42] “有色人，武装起来！”1863年2月《道格拉斯月刊》（“Man of

Color, To Arms!" Douglass' Monthly, Feb., 186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318 页。

[43] “有色人为什么要应征？”1863 年 4 月《道格拉斯月刊》（“Why should a colored man enlisted?" Douglass' Monthly, April, 186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341—344 页。

[4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272 页。

[45] 同上书，第 272--273 页。

[46] “只用一只手反对叛乱”，1861 年 9 月《道格拉斯月刊》（“Fighting Rebels With Only One Hand," Douglass' Monthly, Sept., 1861）。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二卷，第 531 页。

[47]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270—271 页。

[48] 刘祚吕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01 页。

[49] 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411 页。黑人院是指奴隶贩子关押黑人以待出售的地方，福雷斯特本人曾是奴隶贩子。

[50]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271 页。

[51] “关于改进黑人征兵工作的讲话”，1863 年 8 月《道格拉斯月刊》（“Address for the Promotion of Colored Enlistment," Douglass' Monthly, Aug. 186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362 页。

[52]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35 页。

[53] “总司令与他的黑人士兵”（“The Commander - in - Chief and His Black Soldiers"）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371—372 页。

[54] 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第 319—320 页。

[55] 刘祚吕著：《美国内战史》，第 306 页。

[56]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13 页。

[57] 同上书，第 215 页。

[5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第 271 页。

[59]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第 302 页；另见艾伦·内文斯著：《联邦的考验》（Allan Nevins, *The Ordeal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47, vol.2），第 521 页。

[60] “致 G·L·斯特恩斯准将”，1863 年 8 月《道格拉斯月刊》（“To Major G.L .Stearns,” *Douglass' Monthly*, Aug.186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369 页。

[61] 林肯著：《林肯选集》（中译本），第 242 页。

第四章 重建和道格拉斯

作为黑人领导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生的使命有两点：一是反对南方的黑人奴隶制，争取废除奴隶制，获得黑人的人身解放；二是在黑人获得自由后，帮助他们消除由于奴隶制长期存在而造成的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促进黑人地位的提高，取得黑人的平等权利，获得黑人彻底解放。

内战胜利后，奴隶制被废除，道格拉斯及废奴主义的第一项使命完成。随后，道格拉斯着手进行第二项使命的工作。在事关黑人地位和命运的重建过程中，围绕平等权问题而展开的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黑人解放的战略问题再次成为废奴主义运动内部争论的焦点。南部奴隶主阶级虽然在战场上被铁与血所打倒，但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不愿让自己昔日的奴隶与自己平起平坐，总是想方设法让黑人继续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甚至连一些北方废奴主义朋友也认为，既然奴隶制被废除了，黑人得到了解放，其他诸如平等权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他们也应该让国家喘一口气。道格拉斯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历程中，道格拉斯始终坚持他自己的黑人解放战略，并再次使自己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占据黑人解放运动的主导地位。随着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两条修正案的通过，黑人获得了公民权和选举权。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道格拉斯的黑人解放战略再一次得到历史的验证。

第一节 重建及其意义

一 内战后南部的形势

从 1861 年 4 月 12 日南部叛乱分子炮轰萨姆特堡起，到 1865 年 4 月 9 日罗伯特·李将军率部投降为止，美国内战一共打了四年。这场战争摧毁了阻碍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奴隶制，使数百万黑人奴隶摆脱了悲惨的被奴役地位，同时，也结束了数十年来奴隶主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局面，自由资本主义与种植园奴隶制之间的矛盾解决了，资产阶级独揽了国家大权，采取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这次战争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但是，整个国家在精神和事实上仍处于分裂状态。从奴隶制枷锁下得到解放的黑人奴隶，除了获得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外，一无所得。在政治上，黑人还没有取得与白人的平等权利，在经济上，奴隶制虽然被废除，但种植园经济并没有被摧毁，大多数黑人没有取得土地，仍然被束缚在种植园中，有些人离开了种植园，到处流浪，却没有生活来源。这些一向身为奴隶的人，必须在不熟悉的自由环境中谋求新的生活。而奴隶主阶级虽然在战场上被联邦军队所战胜，虽然他们被迫接受了黑人奴隶制被废除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尤其对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感到恐惧，他们根本无意平等对待过去的奴隶，不想在政治上或社会中与黑人平起平坐。即使不能复辟奴隶制，他们也要变相地恢复它或者至少部分地恢复，以使昔日的奴隶继续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低下地位，在经济上则继续留在种植园，充当农业工人，受他们的摆布和剥削。因此，重建就成为战争结束后联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内战的成果能否保持，新南部将以一个什么样的新面貌出现在联邦的问题。要做好这一点，联邦政府必须制定一项政策，尽快让前南部邦联各州实现回归，完全加入联邦，同时又要照顾到新近获得解放

的黑人的利益。

关于重建，作为胜利者的北部，其内部意见分歧严重。重建首先涉及到两个问题：脱离联邦的州在其叛乱已被平定时究竟是在联邦之内还是在联邦之外？恢复联邦的事宜究竟是由总统主导还是由国会决定？这又涉及到南部脱离联邦到底是有效的还是非法的这一在战争中已经争论过的问题。如果承认它有效，南部就丧失了或被剥夺了原有的、值得联邦尊重的合法权利，北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它作为被征服的土地来对待；反之，组成邦联的前南部各州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属于联邦的各州，享有州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民主党的领导人持后一种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内战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胜利了，就应该让国家回到内战前的模样。1864 年选举中，民主党人获得了 45% 的选票，说明持这种思想的人为数不少；在共和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没有明确的目标。激进共和党人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们持前一种观点，但林肯总统却同民主党人一样持后一种观点。

另外，重建还涉及黑人未来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对于黑人未来的地位问题，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过多考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奴隶制虽已被废除，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依然认为黑人是一个“劣等民族”，白人要比他们优越得多。这种观念历史悠久，在当时一般白人中间很普遍。甚至在废奴主义者中，也只有少数人承认黑人在智力上是和白人平等的，因而在政治上也应与白人享有平等地位。在废奴主义运动兴起的新英格兰地区，也只有部分州允许黑人投票选举。1865 年，首先是康涅狄格、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否认了黑人的选举权，此后一些其他的北方州也起而效仿。第二，在政治生活中，19 世纪的美国人普遍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自由放任信条，影响了联邦政府在重建初期发挥强有力的建设性作用。除非迫不得已，美国人是宁愿让政府太强大的。^[1]第三，北部在战争以后，而

面临着如何将战时经济转移到和平的基础上来的问题。由于北部的胜利带来了北部和南部工农业新的激动人心的繁荣前景，加上正在蓬勃发展的城市和广阔的西部处处存在新的美好未来，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吸引着那些急于追求个人享受和财富，以及一心想飞黄腾达的北部人的精力与幻想。这些前景分散了人们对南部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

这样，胜利了的北方人就遇到了一切胜利者必须面临的两难局面：武装占领南部或求得和解。那个时候美国人在感情上普遍反对继续进行军事占领，大多数人也不同意一定迫使南方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根据北方人的观念来治理南部。但把南方政府交给谁呢？前叛乱者显然不值得信赖，“许多人认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依然是叛逆分子”。如果把政府交给被解放的黑人，大部分北方人又认为黑人是“劣等民族”。“即使给予被解放者以选举权，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经验，而且在南部，除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以外，黑人均占少数，他们根本无法单独进行治理。他们必须得到相当大的数量的南部白人的支持，或者依靠一支有实力的占领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不管黑人有没有选举权，面临的选择依然是两者之一：和解或军事占领。”^[2]

二 总统重建

林肯和约翰逊两位总统都曾试图与南部取得和解，使南部各分离州尽可能快地、没有痛苦地回到联邦这个大家庭中来，所使用的手段是总统特权。他们的重建方案在实施的时期被称为总统重建时期，时间从 1863 年到 1866 年。

对于重建，林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理论上来处理南部问题的。实际上，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过，在内战中，林肯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没收奴隶主的奴隶这一财产及对南部海岸进行封锁等已经把南部脱离联邦的行为看成是有效

的了，但林肯一直不愿承认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林肯也不愿把南部当做敌国来对待。林肯在 1865 年 4 月 11 日的最后一次讲话中坚决认为，南部各州究竟是在联邦之外还是在联邦之内这一问题，“作为一场争论的根据是很坏的，而且丝毫不补于事，纯粹是个有害的抽象概念。……既然他们安然回家，是否曾经出山就全然无关宏旨了”。这些州显然是“离开了它们同联邦的正当的实际关系”，现在的目标是“使它们回到正当的实际关系中来”。^[3]早在战争期间，当联邦军队占领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三州的同时，林肯委任军人州长，争取忠诚的少数公民的支持，以求建立忠于联邦的政府。对于原来支持南部邦联的人，只要他们宣誓忠于宪法和联邦，不曾自愿地拿起武器反对合众国，林肯已表示一律宽恕。1863 年 12 月 8 日，林肯以总统公告形式提出重新完全接纳南部各州回归联邦的方案大纲。它规定，任何一个州，只要在 1860 年总统选举中参加投票的公民有 1/10 已经举行忠诚宣誓，他们就可以在取消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而总统将承认它是“真正的政府”。1864 年，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已根据林肯的“百分之十方案”重新组建。林肯的宽宏大量得到南部的认同，成千上万的选民，包括一些乐得发假誓的人，都发誓说自己不曾自愿地拿起武器反对过合众国。于是，他们便被登记为选民，召开制宪会议，拟定和批准了废除奴隶制的新宪法，它们这几个州准备停当，要在联邦内重新就位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决定接纳新州，国会才是它自己的成员的资格审查者。结果，它拒绝接纳这几个重建州的代表，而且在 1864 年的总统选举中，这几个州的选举人票也不算数。国会领袖保留掌管重建进程的权力，决定执行自己的一套方案。

林肯的重建方案尤其遭到共和党内激进派的反对。所谓激进派是指那么一些人，他们决心运用全国政府的权力，来保证自由民得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要建立共和党在全国政治中的优势和国

会在联邦政府中的优势。激进派势力最初规模较小，但它的领袖都是一些令人敬畏的人物，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俄亥俄州的本杰明·韦德、密执安州的扎卡赖亚·钱德勒和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而且，在约翰逊总统后期，激进派终于完全控制了共和党。

在激进派的主张下，国会提出韦德—戴维斯法案，与总统的法案相抗衡。首先，它规定要由国会而不是总统拥有对重建进程的统辖权；其次，它也规定只有在一个州中 50% 公民举行忠于合众国的宣誓之后，该州才可以合法地重新组建。而且，只有能对过去的忠诚进行严格宣誓的公民，才可以参加投票，选举制宪会议的代表。为了不许前邦联官员在新的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该法案规定他们不得当选为制宪会议的代表；新的宪法必须剥夺他们参加投票和担任公职的资格。

林肯总统否决了韦德—戴维斯法案，但他又说他准备考虑一项较为灵活的方案。作为对总统否决的回应，国会拒绝让来自林肯重新组建的各州的代表出席。在韦德—戴维斯声明中，激进派公开指责林肯，命令他执行法律，而把制定法律的事留给国会。声明说：“总统……必须理解，国会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必须得到尊重，……如果他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他就必须使自己的权限局限于履行他的行政责任——服从和执行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使用武力镇压武装叛乱，而将政治方面进行改组的工作交由国会处理。”^[4]战争结束时，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以什么纲领来进行重建，不仅事关黑人的命运，而且事实上也关系到共和党本身的命运。因为原南部邦联各州，在失败之后，有可能在国会中获得比战前更多的议员席位。随着奴隶制的废除，意味着原来身为奴隶的，在计算国会代表权时只作 3/5 计算的黑人，今后作为自由民要按 100% 来计算。然而，由于宪法保证各州有权规定本州关于选举权的资格规定，而没有一个南部各州会把选举权

自愿送给自由民。在这种情况下，林肯总统的重建方案只会让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得到更多的南部代表席位，从而在国会中取得更大权力。共和党想把自己由一个地区性政党建成一个全国性政党，并在南部继续存在下去，保住继续执政地位，如果在重建方案中不包括对前南部邦联官员作出严格的限制、不授予自由黑人选举权，共和党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林肯总统曾希望在南部白人中间逐渐赢得对共和党的支持，但在看到路易斯安那州选举时拒绝他提出的给予那些优秀黑人选举权的建议后，他本人也动摇了。在他遇刺前不久，他大致同意陆军部长斯坦顿草拟的计划，即在建立南部各州政府时首先设立军管机构和临时州长。可惜，他还未来得及制定更为可行的重建方案，他却出师未捷身先死。

1865年4月14日晚上，趁林肯在福特剧院看戏之机，一个死心塌地为南部奴隶主事业效力的阴谋分子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将总统刺死。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为总统。当时正值国会休会。于是，约翰逊总统主持制定重建政策。

安德鲁·约翰逊同1841年的泰勒总统一样，名义上是一个政党的党魁，实际上并未真正成为这个政党的一员。他原来是分离州——田纳西州的联邦派民主党人，1864年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乃是为了强调共和党的联合精神。不曾想，林肯去世，他成了共和党的领袖。论出身，他与林肯一样卑微，早年曾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山村里当过裁缝，得到他的妻子教导才得以学会读书认字。同林肯一样，他也是美国典型的“自我造就者”，为人正直、勇敢、忠于职守，但他缺乏林肯拥有的那种应付人事的能力。对于这场战争带来的社会革命，他毫不理解其重大意义。刚开始，他还算得上是黑人民权的提倡者，但不久就与激进派对立起来，谴责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而同时却庇护南部的前奴隶主势力，对南部的违反宪法现象熟视无睹。1866年，密西西比州州长抱怨9000名黑

人部队的存在引起“从前的黑奴将被给予财产”的流言时，约翰逊总统乃上下令黑人部队在五个月内撤出该州。^[5]

约翰逊总统也是从斯坦顿方案着手研究进行重建的。1865年5月9日，他举行内阁会议，赞成给与黑人选举权，但要建立在南部各州自愿的基础上。他是一位州权主义者，认为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应该由州来做出决定。这种保守观点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他未来的重建政策的保守性。

1865年5月29日，他发表《大赦宣言》。它宣布：除了某些人外，一切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叛乱的人，只要举行忠诚宣誓，就可以恢复他们的一切权利以及在内战中被没收的财产（对奴隶的所有权除外）。不在赦免范围内的只是南部邦联政府的成员；离开联邦司法、军事、国会或民政职位而逃到南方参加叛乱的人；曾经虐待黑人战俘的人；“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军校的毕业生；南部脱离联邦时各州的州长；在海上偷袭联邦船只的人以及一切每年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并且参加叛乱的人。^[6]这个名单表明：没有被赦免的人只占叛乱分子中相当小的一部分。而且宣言还规定：总统有权赦免一切向他本人提出申请的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大赦的人便毫无限制了。在《大赦宣言》发表后，在1.5万名申请人中间，有1.35万人左右得到了总统的赦免。也就是说，凡是赦免请求，约翰逊总统总是照准不误。

同样在1865年5月29日，约翰逊总统还发表了第二个公告，概述了他对重建北卡罗来纳州的要求，而且预示着他在其他州奉行的政策。他任命一位著名的联邦主义者威廉·霍尔顿为临时州长，并责成他召开一次制宪会议，修改州宪法“以恢复该州与联邦政府合乎宪法的关系”。约翰逊规定，只有那些举行过忠诚宣誓的人才可以参加投票，选举制宪会议代表。他虽然没有把“百分之十”的方案包括进去，但他自认为是执行林肯的重建方案，他也承认了林肯在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建立起来的

政府。在他的重建方案中的宽大条件受到广泛抨击之后，约翰逊总统要求回归联邦的州必须宣布不承认它们的脱离联邦公告令，拒付南部的战债和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7]这条国会在 1865 年 1 月通过的修正案要想成为法案，需有一些前南部邦联州批准。

但是约翰逊总统始终没有修改他的方案，甚至连赦免政策也没有变，他只是私下里劝告南部领导人避免引起国会的反对。

约翰逊总统的重建纲领的实质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不但一般种植园主，而且大部分叛乱分子也享有政治权利，并且参加重建工作；第二，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约翰逊显然是想恢复种植园主的统治，使南方黑人重新落在前奴隶主的压迫之下。1865 年 5 月到 1866 年春，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在南部付诸实施，其结果是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被他赦免的人们，有的重新当选为州议会议员，有的当上了州长或其他官员，也有的被选进联邦国会，前南部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就被佐治亚州选进联邦参议院。在南方选进国会的议员中，还有 4 人是叛军将军，有 5 人是叛军上校，6 人是南部邦联的内阁成员，有 58 人是前南部邦联议会的议员。^[8]南部仍然支持他们被战败的前邦联领导人，这说明约翰逊的重建方案是失败的。

在州一级，从立宪代表会议选举开始就控制在前叛乱分子手里。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各州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情况下选出了立宪会议代表，许多叛乱首要分子占据立宪大会的席位。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前南部邦联的伪参议员和上校奥尔、前南部邦联第一任伪州长弗兰西斯·皮肯斯、前南部邦联的少将麦高恩等都被选进立宪大会。1860 年策划退出联邦运动的首要分子也有许多被选进立宪会议。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立宪会议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承认奴隶制度被废除的现实，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仍然想把被解放的黑人置于从属地位。在南卡罗来纳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临时州长就猖狂地叫喊：这

是一个只为白人而成立的白人政府，合众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判决：黑人在联邦宪法下不是美国公民。^[9]有的州则反对拒付前南部邦联的战债，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没有得到密西西比州认可，南卡罗来纳州仅仅“撤销”了它脱离联邦的公告，这实际上就是拒不承认它原来的公告是违反宪法的。

根据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而选举成立的各州立法会议和及州政府官员无一例外也都是前南部邦联的官员。这样从 1865 年到 1866 年，这些南方白人逐渐担负起管理南方人民的责任，黑人在中间毫无地位可言。因为各州立法会议虽然勉强地批准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但却各自提出了保留条件，反对给予黑人公民权和政治平等权。例如 1865 年 11 月南卡罗来纳提出的保留条件为：“国会在前奴隶的政治身份或公民地位的任何立法企图都将违反合众国宪法，或者说违反将被这个修正案改变的宪法；它既与总统在其大赦宣言中所宣布的政策相冲突，也同恢复与美国联邦重大利益所攸关的那种和谐相冲突。”亚拉巴马州在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时则声明：该修正案“并没有授权国会在本州被解放者的政治身份上进行立法”。^[10]

不仅如此，南方重建各州立法会议还制定各种法律限制黑人自由，变相地恢复奴隶制度。这些法规被称为黑人法规，与战前的奴隶法典极为相似，有的黑人法规甚至是照搬过去的奴隶法典，只是把其中的奴隶字样换成了被解放者。对于被解放者来说，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和当奴隶差不了多少。这些法规有的规定了黑人购买或租用房屋的范围；有的则对黑人流浪者制定种种严厉的惩罚措施，目的是迫使黑人无论愿意与否都得劳动。白人雇主对黑人的管制也差不多同奴隶主对黑奴的管制一样严厉。如果一个黑人离开工作，他可能被处罚金，甚至被捕入狱；除非是涉及黑人的案件，法院不允许黑人出庭作证。黑人法规也规定，黑人发表煽动性的讲话、作侮辱性姿势或有侮辱性行为、不出勤、违反戒严令和持有武器等，都

要被课以种种罚金，如果交不起罚金，他可能会被租出去干活偿付罚金。^[11] 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如三 K 党之流也乘势而起，疯狂迫害被解放的黑人。

这一切说明，南部根本没有吸取战败的教训，也不思悔改。这就激起了以道格拉斯为首的广大黑人、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激进派的愤怒。关于重建，道格拉斯早就提出，重建不仅是让南部重新回到联邦的怀抱，而且应该意味着完全改变南部的整个面貌，虽然奴隶主及拥护奴隶制的人在战场上被打败，但如果它对南部生活的束缚不用民主力量去消除的话，胜利就是不完整的。马克思也曾经指出，内战胜利后，美国下一步的任务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12] 总统重建南部的结果显然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三 国会重建

国会重建的时间大致是从 1867 年到 1877 年。总统重建的结果导致 1865—1866 年间南方不时发生种族间暴力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受害者总是黑人和同情黑人的白人。这引起北方舆论尤其是激进共和党人的关注。以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查尔斯·萨姆纳和乔治·朱利安为首的共和党激进派力主要使南部民主化，建立公共教育，保证被解放的黑人的权利等，他们赞成黑人拥有普选权，一般来说也支持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1867 年 3 月，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要求国会分配给每名被解放的黑人奴隶 40 英亩土地和一小笔钱，这些钱可以从没收南方大庄园中获得。他说：“对黑人来说，宅地比选举权更有用，尽管这两种他们都应该有。”^[13] 南卡罗来纳有人也建议给黑人提供一个机会，购买土地分配给过去的奴隶，但这个计划从未实施。有些黑人确实拥有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南卡罗来纳海岸附近的海岛上的黑人，他们在战争期间在北军的鼓励下夺取了岛上的土地。但绝大多数被解放的黑人没有土地。为了实现以上目

标，激进派希望在几年内把南部排除在联邦之外。但是，总统重建的结果与他们的设想背道而驰。而且，他们清楚地看到：在南方，支持改变南部社会的人的生命是不安全的。因此，激进的共和党人决心从总统手里接过重建南部的大旗，担当起南部民主化改革的任务。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道义责任，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不过，虽然共和党在国会占据多数议席，但激进共和党人在国会并不占多数，要推行自己的计划，还必须联合其他一些党派。随着 1866 年秋季选举的临近，为了争取北方选民的支持，同时也为了对付因总统重建而来的威胁：因为按照总统重建计划，南部代表就应该被重新接纳进国会，这样有可能导致国会中民主党代表占多数。这将危害共和党的利益。要想解除这一威胁，必须推翻总统重建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内的保守派与激进派抛开分歧，携起手来。于是，共和党激进派的影响大增。

首先，他们提出并通过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作为对约翰逊总统否决延长白山民局期限的法案和民权法案的回应。这两个法案都是为了对抗《黑人法典》以及贯彻废止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而提出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于 1866 年 6 月 13 日由国会提出，1868 年 7 月 28 日被批准生效。

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几个条款中，北方议员一致同意拒绝承担南部同盟的债务；也比较一致地否定参加叛乱的人出任重要职位的资格，以免他们重新掌权。该修正案最重要的是第一款，即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任何州，如未经适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

这一条款提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南部形形色色的黑人法典，

赋予被解放者以公民权，并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它加强了公民与联邦政府的联系，相应地削弱了州的权威。

对于黑人的投票权，该修正案并未予以明确规定：因为众议院的议席是根据人口多寡来决定的。以前黑人奴隶是以 $3/5$ 来计算的，现在则按一个人来算。如果允许他们投票，就自然会增加南部在国会的议席。这是北部所不愿看到的，但又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只好这么含糊糊糊。

这一修正案是 1866 年选举的试金石。公众对于这一修正案的态度决定着共和党激进派选举的成败。

约翰逊总统对于这一修正案极力反对，他力图说服北方的群众接受他的重建方案，并对共和党激进派领导人加以攻击和谩骂。1866 年 9 月 3 日，他在克利夫兰竟然大声叫嚷要绞死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温德尔·菲尔蒲斯。但是，1866 年选举结果打掉了他的如意算盘。民主党候选人遭到重大挫折，共和党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力量大大增强。这一结果也说明约翰逊的主张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只要根据总统重建方案而组建的南部各州议会和政府仍然存在，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就不能指望会获得通过。南部各州除田纳西外，其余各州都对该修正案投了反对票。要打破这种局面，只有采纳激进派的意见，即在南部组建新政府和给予黑人选举权。

共和党的胜利，使得国会得以不顾总统的否决，推行自己的重建方案，甚至以弹劾总统的办法迫使其就范。

1867 年 3 月 2 日，国会通过一项名为“为叛乱各州筹建较有效率的政府”的重建纲领。约翰逊总统予以否决，但国会再次以 $2/3$ 的多数予以通过，从而推翻了总统的否决，该提案遂成法律。

为了民族和解的需要和国家未来的团结，同总统重建一样，国会也是从现实出发来进行重建工作的，并没有像一些激进派要求的那样，把南部在理论上当作一个被征服的敌国土地来看待，尽管它们事实上是这样被对待的。国会重建的理论认为，南部各州依然完

整，但它们的政府就其大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效用而论，已处于一种假死状态。根据这样的解释，国会便有可能立即否定南部各州的代表权，并重建南部。

国会法案宣布南部十个州不存在合法的州政府，从而否定了总统的重建方案。它要求在普选基础上由各州的代表大会制定一部能为国会接受的新的州宪法。在被重新接纳入联邦之前期间，南部前叛乱州除田纳西外，将被划成五个军区，实行军法管制。每个军区将由一位军队将领领导，拥有管辖治安、司法和民政全权。每一位军队将领的首要任务是在其管辖的地区重新登记（证明是忠诚的）选民，登记黑人——这是一项重要改革——和剥夺根据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已被撤职的所有人员的选举权。合格的选民选出代表召开制宪会议，该会议将草拟一份文件，规定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对于“因参加叛乱而被剥夺选举权者”不予登记。虽然各制宪会议对于这一要求的解释不尽一致，但大多数州的新宪法均剥夺了前南部邦联领导人的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有些州还剥夺了曾同情过南部邦联者的选举权，这样被剥夺了选举权的白人，估计有 15 万人。重建法案还进一步宣布，一个州一旦向国会提出一部可以接受的宪法和批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国会就将接纳该州所选出的议员。^[14]

1867 年 3 月，军事统治取代了已执政一年多的各文职政府。军人实行了严厉但却公正廉洁的治理。成千上万的地方官被免去职务，让位给北方来的“毛毡提包客”或黑人；有六个州长被罢免；军事法庭代替了民事法庭；佐治亚、亚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等州议会清除了保守分子；各州的立法被弃置不用或被修改；一支有两万多人的军队在一支黑人民兵的帮助下，负责维持秩序。为安定南部社会生活，债务监禁被取消；制止了对财产抵押品取消赎回权，使农业工人有权首先留置收获物以充工资；禁止了威士忌酒的酿造；结束对黑人的歧视。

为了限制总统的权利，并保证国会的重建计划得到实施，1867年国会先后通过了一些后来颇有争议的法案。首先，国会自行规定了再次开会的日期，这就打破了由总统召集的惯例；其次，国会通过《军队指挥法》（1867年3月2日），限制了总统的军权，要求总统在发布军事命令时必须通过陆军元帅格兰特，从而实际上停止了总统统帅军队的权力，因为陆军元帅是受到保护，不得撤换或停职的；最后，国会通过了《官员任期法》（1867年3月2日），剥夺总统对官员的免职权，不许总统从政府机关罢免已经过参议院同意而被任命的联邦官员。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激进派的陆军部长斯坦顿，从而使参议院有权干预总统内阁成员的更替。这项法令打破了历来总统有权控制内阁的传统。

约翰逊总统也不甘示弱，采取了许多对策。他发布命令给南部的军事将领，限制他们的权力，而扩大他在1865年建立的地方政府的权力；他还设法解除那些认真贯彻国会新法令的军事将领，提拔那些宽容邦联官员的军官。最后，1867年8月，他试图解除陆军部长斯坦顿的职务。总统与国会的对立达到顶点。

总统的行动使共和党温和派也觉得约翰逊想破坏国会重建法令。为了打败总统，迫使其屈服于国会重建方案，共和党激进派牵头，在1868年2月决定对约翰逊进行弹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遭弹劾的案件。激进派罗列了约翰逊总统的十一条罪状，其中十条反复指责总统撤换斯坦顿一事，第十一条则从报纸上总统的言论断章取义而来，竟是指责总统是暗杀林肯的同谋犯。不过这最后一条后来被取消了。弹劾案的发生其实并非总统犯了应受弹劾的重罪，激进派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在报告里断言：总统的主要罪行是“一种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重建叛乱各州的重大阴谋”。^[15]

约翰逊最后虽以一票之差在参议院未被弹劾，但他已威信扫地，无力再破坏国会重建工作，也不能参加1868年总统选举。在总统被击败后，共和党内再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势力来反对激进派

了，国会事实上处在激进派的控制之下。南部重建工作得以按照国会的意愿继续进行。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 1869 年 2 月 26 日通过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被联邦或任何一州以种族、肤色或从前做过奴隶而被剥夺。这个修正案在 1870 年 3 月 30 日被批准生效。

1870 年 3 月和 1871 年 2 月，国会又通过两个强制执行法案，对于干涉公民行使选举权或其他民主权利的人，予以处罚，并授权总统动用军队保障这些权利。1871 年 4 月，国会还通过取消三 K 党法，授权总统镇压种族主义恐怖分子危害公民政治民主权利的暴行。1875 年的民权法保证黑人在旅馆、剧院等公共场所的平等权利，禁止将黑人排斥在陪审团之外。

这些重要法案保证了国会重建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从而保障了黑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打击了前南部奴隶主以及奴隶制残余政治势力，继承了内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原则，保证了重建的正确方向。

在 1867 年下半年，南部各州大部分在军方监督下草拟出了可以被国会接受的宪法，召开了新的议会和批准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1868 年，除三个州以外，其余各州已被重新接纳进入联邦。弗吉尼亚、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州因为在剥夺前南部邦联支持者选举权问题上争执不休，而延误了它们起草新宪法的工作。一直到 1870 年，这三个州才获得国会对其新宪法的批准，并被重新允许进入国会。佐治亚州于 1868 年已被接纳加入联邦，后因其新的州议会排斥正式选出的黑人代表而又被开除，于 1870 年重新被接纳加入联邦。不过，这一次对于重新接纳又提出了一项要求，即必须批准国会于 1869 年 2 月提出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首先获得选举权。然后南部各州黑人在军事当局的支持下，获准登记并参加投票，选举立宪大会代表，有些

黑人当选为代表。各州重新制定的州宪法一般都符合国会重建法案的要求，规定了黑人的平等权利及其他民主权利，选举权也被州宪法固定下来，“黑鬼”等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在有些州被宣布为非法等。根据新的州宪法选举组成的新政府也有许多黑人参加，议会中也是如此。各州相继建立了一些接纳黑人的公立小学，对黑人和白人进行免费教育，建立了孤儿院、养老院和残废教养所，协助无地黑人购买土地，兴办公共工程如修筑道路、建筑桥梁等。

黑人影响最大的是南卡罗来纳州，那里的第一届立法机构中有 87 名黑人，40 名白人。曾经有两个黑人担任过副州长，即 1870 年的阿朗佐·兰西尔，1872 年的理查德·格里弗斯。塞缪尔·李在 1872 年任众议院议长，后来罗伯特·埃利奥特在 1874 年又担任了这一职务。一个曾经在格拉斯哥大学和伦敦受过教育的黑人弗朗西斯·卡多佐，从 1868 年到 1872 年担任州务卿，从 1872 年到 1876 年担任州财政部长。据 A·A·泰勒说，尽管卡多佐是黑人，朋友和敌人都认为他是南卡罗来纳州最有教养的人之一。不过，虽然黑人议员人数比白人多，但黑人从来没有控制过该州。

在密西西比州，第一届重建议会中，黑人代表有 40 名，其中很多过去是奴隶。1873 年，黑人担任了三个重要职务：A·K·戴维斯任副州长，詹姆斯·希尔任州务卿，T·W·卡多佐任教育部负责人。同在南卡罗来纳州一样，总的来说，黑人在立法中起的作用很小，虽然，1872 年约翰·林奇也曾当过州众议院院长。

1868 年到 1896 年间，路易斯安那州共有 133 名黑人议员，其中 38 名是参议员，95 名是众议员。奥斯卡·邓恩、P·平奇巴克和 C·C·安托万这三位黑人担任过副州长。1873 年冬当亨利·沃莫斯被撤职时，平奇巴克当了 43 天代理州长。在这个州，黑人也是从来没有控制过公共事务。不过，他们仍然为改善政治状况作了一些努力，如奥斯卡·邓恩就曾领导过反对腐化堕落和铺张浪费的斗争。

在亚拉巴马州，黑人议员人数微不足道，不过他们协助通过了

第十四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在佐治亚州，黑人被选进了第一届重建议会，但在取得和保留议员席位上却经历了一番波折。1868年9月，这个州议会宣布所有黑人议员均不合格。差不多一年以后，当州最高法院宣布他们合格时，他们才得以重新获得自己的议员席位。黑人议员就教育、陪审制度、市政府改革和妇女选举权等问题提出了许多议案，杰斐逊·朗和 H·M·特纳力图为黑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但没有得到共同行的支持。

在佛罗里达州，重建政府的黑人在救济、教育和选举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从1872年到1874年，担任公共教育负责人的乔纳森·吉布斯领导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H·S·哈蒙则领导了争取制定一部良好的学校法的斗争，他也和其他黑人议员一起支持宅地法，并且支持那些能为公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的措施。

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议员则帮助建立了一套公立学校体制。J·W·胡德牧师是教育界一名杰出人士，他帮助起草了1868年州宪法。

在弗吉尼亚州新政府中，只有少数几位黑人担任公职，有27人参加了州议会。在这个州，黑人只是在白人各派别斗争中起平衡作用，对政府决策没有决定权。就黑人所能施加的影响而言，在山纳西、阿肯色和得克萨斯这几个州的情况和弗吉尼亚州完全一样。

从1869年到1901年间，有两名黑人还当上了联邦参议员，20名进了联邦众议员，两位参议员是海勒姆·雷维尔斯和布兰奇·布鲁斯，两人都是密西西比州的代表，其中布鲁斯是在1874年被选进参议院的，他也是被选进参议院并且任期届满的唯一黑人参议员，直到1966年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爱德华·布鲁克被选进参议院才又一次破例。布鲁斯在参议院的主要任务是在制造业、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和年金方面。作为自由民银行的小型特别委员会主席，他彻底调查了该行倒闭的原因，对赔偿自由民银行的存户提出法案。他也就支援教育和铁路建设提出了一个法案，对亚拉巴马诉讼案的杰尼

瓦判决书提出法案，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法律制定者的兴趣和责任。

在众议员任职的 20 名黑人中，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最多，共有 8 人；北卡罗来纳第二，有 4 人；亚拉巴马 3 人；佐治亚、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弗吉尼亚诸州各一人。在 1869 年第四十一届国会中，有 3 个黑人第一次参加联邦立法机构。第四十二届有 5 人参加，第四十三届和第四十四届各有 7 人参加。从担任时间长短来看，南卡罗来纳州的 J·H·雷尼和罗伯特·斯莫尔斯两人各任五届，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林奇和佛罗里达州的 J·T·沃尔斯各任三届，其他 6 人各连任两届。

国会中大多数黑人在去华盛顿之前一般都有过一些从政的经历，虽然他们主要关心民权和教育等事宜，但他们的活动决不仅限于黑人问题。许多人为改善本地环境，如建设新的公共建筑物和拨款整修河道和港口而斗争。有几个人，如佛罗里达州的沃尔斯和密西西比州的林奇，曾提出为本地产品实施保护关税。沃尔斯承认对古巴有兴趣。北卡罗来纳的海曼提出了一项救济印第安人的计划。路易斯安那的纳什曾呼吁实现区域间的和平。^[16]

四 重建的地位

1867 年至 1877 年之间国会重建取得了不少民主性的成果。随着 1866 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失败，及其随后国会对约翰逊总统展开的弹劾，重建的有效权力由总统转移到激进共和党人手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便立即获得通过。1868—1870 年之间，南部十个州均通过了民主性新宪法，废除了黑人法典，从法律上确认了黑人的政治权利。这些成果被 1870 年通过生效的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予以巩固。国会重建使黑人（黑人男子）得到运用政治手段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各州建立的黑白混合政权使黑人长期追求和争取的议政参政成为事实；新宪法还规定了宅地免税和负债不判刑的原则，这实际上废止了南部黑人偿债劳役制度；新宪法还规定所有

的人都享受免费教育。这是一项更有影响、更有价值的成就。1877年以后这种兴办公共教育的措施继续起作用，继激进派之后上台的保守派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虽然过去南方也有一些免费学校，而且还有地方性的公共教育制度，但像19世纪50年代北方那样的免费公共教育在南部展开却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的事情。由于黑人成为选民和立法者，公共教育体制才有可能确立。1868年密西西比州宪法建立了有关黑白种族的公共教育体制，并拨款建立数以百计的校舍。同年，南卡罗来纳制宪会议代表批准了建立大众教育体系的提议，并为公共学校拨款90万美元。^[17]

南部人也改变了以前的关于黑人受教育的观念，不再把它看成是浪费时间或是危险的事情，而把它当作是有益的乃至是必不可少的。这得归功于1865年成立的自由民局的努力。在1865—1867年间，在南部任何一个地方想教黑人文化的北方人都会受到攻击和暴力迫害。人们在这一时期焚烧黑人学校，就像以后三K党焚烧十字架一样。但自由民局顶住了压力，到1867年的时候，它已建立起多所黑人学校。这个局在全盛时期总共为黑人开办过4000所小学、74所师范学校、61所工业学校。1877年，在小学就读的黑人达60万人。研究自由民局历史的专家乔治·本特里认为，到了1867年的时候，南部的黑人和白人都认识到了为过去的奴隶提供公共教育的必要性了。本特里说：在这方面，自由民局确实为黑人、为南方、为整个国家立了一大功劳。^[18]

美国传教士协会在1866—1869年间为黑人建立了7所大学，其中包括菲斯克大学和亚特兰大大学，自由民局帮助黑人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霍华德大学。北方的宗教团体，如卫理公会、浸礼会、公理会等也帮助黑人建立起一批神学院、一般高等学院、师范学院等。19世纪70年代，黑人教会也参加进来。从1865—1869年，黑人教会仅在北卡罗来纳州就建立了257所黑人学校，共招生

1.56 万名学生。^[19]

教育的发展为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20]教育也是黑人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工具。重建时期的一些黑人领袖，都是一些战前的自由黑人，或有钱白人的私生子。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如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副州长的平奇巴克就是一个种植园主的儿子，他在九岁时就在辛辛那提入学；来自密西西比的两位黑人参议员布兰奇·布鲁斯和海勒姆·雷维尔斯也受过良好教育。前者的父亲是种植园主，曾受过家庭教师的培养。后者是北卡罗来纳的混血自由人的儿子，曾在伊利诺伊州的诺克斯学院就读。有些黑人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重建期间都有机会进入政界，或成为律师、商人、牧师等专业人才。教育是他们的敲门砖。

此外，自由民局还为黑人开办了 46 所医院，各州通过法律为黑人和白人建立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慈善机构。

在经济上，有些州在税收等方面进行了民主改革。在决定增加税收和发行公债的时候，有的州把税收的负担主要加在种植园主身上，免去贫苦居民的税务负担。此外，各州还注重发展南部经济，在土地问题上做出一些改革，如把土地分成 25—100 英亩的小块，售给黑人及无地者。在 1870 年代早期，弗吉尼亚的黑人就已经购买了 8 万到 10 万英亩土地。战后 10 年内，佐治亚州黑人拥有大约 40 万英亩土地，价值 130 万美元。^[21]

另外，北部在重建过程中迫于黑人的反对，不得不废除了一些歧视黑人的法律和规定。费城废除了城市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罗德艾兰州在 1866 年取消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

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没有满足黑人所坚持的“四十英亩土地加一头骡子”的合理要求，激进派所要求的分配土地的主张也并未能变成现实，黑人在经济上仍然依赖前奴隶主阶级，只不过从以前的奴隶变成了分成制下的农民。这是第一次重建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

不能怪激进派没有努力，主要应归因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人所信奉的白山放任哲学。19世纪的美国人普遍认为，公共机构没有责任通过一些扩大额外的援助和超出法律平等之外的特别优惠来提高某一群体的地位，而忽略其他群体。早在1865年10月，由E·L·戈德金主编的《国家》杂志就用如下的话语来概括北部人对南部的重建目标：“我们所寻求的只是黑人在法律上的平等，……这一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建议任他们自己去实现社会平等。”^[122]《国家》杂志所要表达的观点显然是不想消除由财富、权力、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别。就连建议设立特为帮助黑人的自由民局的自由民调查委员会也郑重声明：“所有给那些人的帮助都只是暂时的措施……他们越早独立、越早不需要外来帮助，对我们白人与他们都越好。”对南部试图用不公正与专制方式对待黑人的最好办法不是制定或组建“用来保护黑人的特别的法律或特别机构，而是加强对适用于所有人的、用来对付错误和压迫的一般法律”。委员会认为，一旦黑人被赋予基本权利，他就会“在社会的某一角落找到并拥有自己的恰当位置”。^[123]

黑人的恰当位置在哪里呢？在1870年代中期，5%的白人农场主占据着至少40%的可耕土地。所谓分成制即农民用收成的一部分来抵偿地主提供的土地、农具、牲口、住房，有时还有食物。分成制解决了当时地主缺乏现金和贷款以及黑人的生活等问题。黑人比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可以不必在监工的压迫下劳动了。但是，一方面，由于地主和商人常常互相勾结，压低黑人佃农的棉花价格；另一方面，由于内战期间，印度、巴西、埃及都向英国出售棉花，夺走了美国的市场份额。直到1878年，南部才把向英国出口棉花的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在失去市场的日子里，南部人均收入大大减少。等到市场恢复时，又由于世界棉花市场上供大于求，价格直线下降。以棉花种植为主的南方黑人佃农因此处于长期的债务之中不能自拔，渐渐失去自由，成为事实上的债务奴隶。

由于黑人在经济上没有地位，不能独立，所以南部社会结构实质上依旧和从前一样，黑白种族间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也就无从实现。

黑人尽管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进展，但他们还是无法使南部白人的敌意和偏见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南部白人深信黑人在政治上无能，因而把重建中的一切弊端、艰难和屈辱统统归罪于黑人。黑白混合政权自身缺乏政治经验，合作不力，失误不少，也确实存在贪污腐化现象，尤其是在路易斯安那、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亚拉巴马，教训特别深刻。这些都给南部种植园主的攻击提供了靶子，从而使得激进政府难以为继。虽然从当时的情况看，贪污腐化的现象非常普遍，也非激进政府所独有。在重建结束后民主党执政的佐治亚、亚拉巴马、弗吉尼亚、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纳西等州先后也发生过财政厅长或其他官员贪污公款或携带公款潜逃的案件，在重建期间著名的纽约特威德集团甚至窃取公款达 1 亿美元，格兰特政府更是以腐败而闻名史册。但是，贪污腐化给黑人带来的损害是深重的，它给黑人的形象抹了黑，使南部保守派更容易推翻激进派政府。本来南方人就不满意黑人在政治中享有和他们平等的权利，早就想把黑人赶下台，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正如历史学家弗兰西斯·辛姆金所指出的那样：“贪污腐化使人们更难以容忍这些黑人政府。”^[24]当然，即使黑人政府能做到廉洁奉公，只要政府中有黑人当官，而黑人又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南方白人依然不会对其表示拥护。黑人的贪污腐化只不过是一个绝好的借口罢了。

第二节 道格拉斯争取黑人平等权的斗争

一 与加里森派的争论

对于总统重建方案，道格拉斯非常不满。他要求给予被解放的黑人以完全的政治、公民和经济平等权。道格拉斯认为，只要有了这些权利，社会平等就会自然而然。不过，在战争期间，道格拉斯

以大局为重，没有对林肯总统的行为过多指责，他想等战争胜利以后再作打算。而且，在他做这一切之前，他还必须与他的白人废奴主义者同事先就该不该争取黑人的选举权进行斗争，解决好黑人解放的战略问题。

早在 1863 年 12 月 3 日，在美国反奴隶制协会费城年会上，许多发言人认为政府既已宣布废除奴隶制，那么，废奴主义者的工作就应该结束。那时道格拉斯便以“美国有色人的现在和未来”为题发表演说力排众议，反复强调废奴主义者的任务第一是废除奴隶制度，第二是提高黑人的地位。第二个任务在第一个任务完成后依然存在，这个任务“只有在南部黑人和北部黑人完全、彻底地被允许参与政治主体的时候才能完成”。提高黑人地位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选举权，因为在内战后，旧联邦已消失，新联邦也就应该是一个“不分黑人与白人，让所有奴隶自由，并使每个自由人都成为投票者的团结的国家”。^[25]

道格拉斯认为，选举权是“人类自由殿堂的基石”。在一个共和政体下，普遍的投票权就是法律和个人自由，就是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是拥有、买卖财产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是阻止黑人重新回到奴隶制去的唯一办法。因为南部战败后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继续捣乱，甚至会发生叛乱。道格拉斯说：“我们可以用刀剑击败南部军队，但要平息南部的仇恨则是另一回事了。”南部 400 万黑人手中的选票和武装（如果必要的话）就会成为反对南部叛乱和敌意的最有效的平衡力量，使联邦自由之路免受其敌人叛乱和污染的伤害。总之，选举权对黑人的自我保护是绝对必要的，更不用说提高了。^[26]道格拉斯认为，选举权将使黑人，无论是被解放的奴隶，还是自由黑人都能抓住控制他们命运的机会。选举权对黑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在生活中各个领域实现其潜能都息息相关。在一个自由政治社会里，没有政治权利——选举权，平等的机会是不可能的。黑人如果没有什么办法来

保卫他的权利，那么他从拍卖场和被法律宣布为财产的状态下获得自由就没有什么意义。“自由就是笑话，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便是，如果他不是某个人的奴隶，他也是社会的奴隶。”他就会处在暴徒的支配下，没有办法保卫自己。^[27]道格拉斯呼吁“立即、无条件、普遍地”给予各州黑人选举权。因为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情况下，南部各州“不友好的州立法机关会使联邦友好的立法失去效用”。^[28]

联邦政府在废奴主义者和其他反奴隶制力量的推动下，战胜了叛乱的南部邦联，摧毁了奴隶制，并以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形式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下一步的任务就应该是提高黑人地位，实现废奴主义的第二个目标了。怎样实现这一步呢？道格拉斯与加里森又发生了争执。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道格拉斯又一次表现出他的历史远见和政治敏感，采取正确策略，挫败了加里森的计划，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再次成为黑人解放运动的主流，指导黑人解放运动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道格拉斯与其他黑人领袖、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激进派一道，继续艰苦努力，使第十四和第十五两条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黑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取得黑人在政治平等权上的重大突破。

1865年5月，加里森在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年会上宣布说：“我们组织起来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因此我们把我们的组织称作反奴隶制协会。其他的工作（黑人投票权）只是附带的工作。现在，我相信奴隶制已从美国宪法中永远废除了，也从其他法律中废除了，永远不会再翻转过来。”因此，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应该被解散。他还表示相信，在重建的时候，南部会给自由人以保护，给黑人以选举权的。^[29]一些废奴主义者也相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完成，他们为此还送给加里森一笔3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他对废奴主义事业的毕生贡献。

但是，道格拉斯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即使已经有了宪法第十

三条修正案，一系列针对黑人的法规还是会使黑人的自由成为令人困惑的笑柄和陷阱，而且，道格拉斯也相信没有斗争就没有收获，黑人的选举权不会自动得到。道格拉斯写道：“如果任何一个州的立法机构明天就可以宣布黑人的证言在法庭中将不被认可的话，即使把像第十三条修正案的东西给予黑人，又有什么益处呢？那样，我们的位置又在哪儿呢？到那时，任何邪恶的人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走进一个黑人家里，随心所欲地犯罪；如果碰巧只有黑人在场，那他就可以逃脱公正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就会以新的形式存在，并且随着前奴隶主寡头重新掌权，黑人将被剥夺政治权利，那样，黑人就会被弄到与奴隶制下差不多的地位，虽然名称不叫奴隶制，但仍然是以不同面目出现的“旧魔鬼”。“奴隶制只有在黑人拥有选票时才能被真正废除。当南部立法机关有权通过法律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制造歧视时，奴隶制仍然存在那里。”^[30]因此，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应该继续存在下去。道格拉斯的观点得到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大会代表的赞同，他们抛开了加里森，在温德尔·菲利普斯领导下，继续推动黑人的解放事业。

二 与女权——废奴主义者的斗争

黑人解放与妇女解放是道格拉斯一生致力两大任务。在黑人解放运动的过程中，由于道格拉斯把黑人的解放事业放在第一位，妇女解放事业放在第二位，道格拉斯与其同盟者女权——废奴主义者之间一共发生过三轮大的冲突。前两轮都是在内战前，第二轮则是在内战后。内战后的这一轮争执是围绕黑人男子的选举权问题而展开的。在内战期间，道格拉斯与女权——废奴主义者因为都倾注于维护联邦和解放黑奴的伟大任务，无暇顾及女权改革运动。因此，双方曾一度把他们的分歧抛在一边。随着内战的结束，黑人获得人身自由，选举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在内战结束前即 1865 年 1 月 25 日，道格拉斯就黑人男子的选举权问题发表谈话，重申他

对黑人男子选举权的支持。谈到妇女投票权与黑人男子投票权的关系，道格拉斯小心地说，这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分离，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

由于道格拉斯在女权与黑人解放的轻重缓急关系上态度并未发生多大改变，所以尽管他在 1866 年与女权——废奴主义者一起组成了“平等权利协会”，为促进普遍选举权而斗争，道格拉斯还被选为其副主席，但他还是很快便与女权主义领导人围绕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发生了矛盾。尽管道格拉斯始终不渝坚定支持妇女选举权，但他首先考虑的还是其种族。为了促使共和党政府授予黑人男子选举权，道格拉斯指出，共和党要想继续执政，尤其是在南部赢得支持，它就应当给与黑人男子选举权。道格拉斯认为黑人男子选举权是通向黑人解放的一个标志。女权主义领导人安东尼和斯坦顿则认为共和党的重建应以普选权为基础。道格拉斯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黑人男子选举权是通向普选权的第一步。^[31]

道格拉斯把妇女选举权放在黑人男子选举权的后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的女权思想的局限性，那就是他本人在潜意识里也许有一种男子至上的偏见或受到了这种偏见的影响，他在没有给与妇女选举权的情况下只提出黑人男子选举权的要求，是对当时社会上男子至上的一种妥协。这也是他招致很多批评的原因之一，好像他有时似乎不太讲原则、言行也不一致。

不过，同道格拉斯有着某种男子至上的偏见一样，斯坦顿等人则有着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偏见。这也是她们废奴主义思想局限性的一面。为了同道格拉斯对抗，她们甚至准备争取民主党的支持，即使因此牺牲她们奋斗多年的黑人解放事业也在所不惜。1866 年 11 月 20 日在纽约州阿尔伯尼举行的平等权利大会上，安东尼向民主党表示歌颂，说女权运动及她们在国会的事业欠着詹姆斯·布鲁克斯的情，她把布鲁克斯当做在国会的盟友，她也拒绝使用“铜头蛇”一词来称呼民主党。布鲁克斯是亲南部的《纽约快报》的发行

人，1864年当选国会议员，属“铜头蛇”类民主党人的主要代表。道格拉斯对安东尼的论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布鲁克斯鼓吹给妇女选举权只是为危害黑人权利设下的陷阱。道格拉斯说他决不会同安东尼一起去反对共和党自由派的政策，他为她们脱离自己废奴原则感到羞耻。^[32]

以后他们为此又多次交锋。1869年2月25日，国会批准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给予黑人男子选举权。伊丽莎白·C·斯坦顿发出通知，准备在5月上旬召开平等权利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给予妇女选举权的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因为“可憎的第十五条修正案”没有给妇女投票权。斯蒂芬·福斯特抓住这一点，要求斯坦顿辞去平等权利协会主席一职，因为这违背了平等权利协会的原则。道格拉斯加入这场争论，说他对她的种族主义言词很伤心，不过他表示对她提出的第十六条修正案的建议是支持的。但是，争论并没有到此为止。1869年5月12日，在纽约市的斯特维大厅如期举行的平等权利协会代表大会上，主席斯坦顿仍然说，除非妇女被允许投票，否则不能再给男子投票权。她说她不相信自己该让无知的黑人和外国人来制定法律并让自己遵守。她说：“没有妇女愿意吃嗟来之食，不管它来自父亲、丈夫、或是兄弟，因为凡是吃嗟来之食的人总是处于她的供食者的权利和支配下。”^[33]斯通认为斯坦顿为自己的女同胞鼓吹优先权，道格拉斯为自己的种族鼓吹优先权都无可厚非，但是反对性别压迫和种族主义压迫同等重要。她指出，当道格拉斯描述南部各州的三K党的种族主义压迫时，却忽视了北方的三K党人——父亲们，他们对其孩子的监护拥有绝对的合法控制权，“任何父亲——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人”——都可以把母亲与其孩子有效地分隔开来，就像拍卖台上的奴隶拍卖商做的那样，只有堪萨斯一地的妇女有合法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这种暴虐。斯通认为妇女和黑人都是苦海中的人，她并不反对第十五条修正案，只要能脱离苦海，无论是那一方，她都感到高兴。但她

也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将使政府的基础更牢靠，比黑人的作用更大。^[34]道格拉斯对斯坦顿及其支持者在批准第十五条修正案中表现出的种族主义给予谴责。他指出，对黑人投票能力的怀疑是对黑人的诬蔑，目的是想破坏国会和公众对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支持。^[35]

对于斯坦顿提出的被解放了的黑人妇女如果没有被授予选举权，她们就会同白人妇女一样堕入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这个问题，道格拉斯回答说：“是的，是的，对黑人妇女来说的确是这样。但不因为她是妇女，而是因为她是黑人。”只要黑人男子获得了选举权，下一步就是争取普选权。^[36]在第十五条修正案通过后，道格拉斯也的确是这样做。

1869年12月25日，道格拉斯发誓一旦第十五条修正案获得通过，他就将全力献身妇女选举权的斗争。1870年3月30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后，道格拉斯马上呼吁组织一个联盟为妇女权利而奋斗。

道格拉斯试图弥合平等权利协会内部的分歧，但是，斯坦顿对他把黑人男子投票权放在妇女投票权的前面不能原谅，该会因此分裂成两个组织。一个是由斯通、布莱克韦尔和豪领导的“美国妇女投票协会”，另一个是斯坦顿和安东尼领导的“全国妇女投票协会”。道格拉斯与前者联系较为紧密，它与后者不一样，它既支持第十五条修正案，也吸收男子参加。1873年前，斯坦顿派都与道格拉斯及其同伴疏远着，以后稍微有所接近。在每次开会前，她总要嘲弄黑人，并把他当作一个拥有投票权的无知怪物加以展示。道格拉斯认为，这些攻击除了反映出她们的种族主义意识外，还基于地位和受过教育“所显示的一种贵族情结”。^[37]

1876年底，道格拉斯终于与斯坦顿派达成休战，统一起来为妇女的投票权而奋斗。不过，他们对所发生的事都很敏感，都没有为过去的事向对方道歉。1890年两个对立的妇女组织合并。对道格拉斯及其支持者来说，既然第十五条修正案已成为法律，有关黑

人男子投票权和妇女投票权谁优先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从 1876 年到他去世的 1895 年的 19 年时间里，道格拉斯为妇女投票权的斗争费尽了心血。道格拉斯与他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一道，为 20 世纪妇女投票权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 世纪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的运动，在理论上，它同情贫穷的劳动阶级妇女，无论是黑人、亚洲人、墨西哥人、上著美国人，还是白人，它都表示同情，但实际上，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妇女投票权上，忽视了姐妹们的经济要求。另外，它的种族偏见也破坏了它与黑人妇女的天然联系，尤其是黑人大多数是农民，那个时代大多数白人和黑人工人阶级妇女更感兴趣的是她的工作、工作条件、工时、工资，而不是选举权。^[38]

道格拉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黑人妇女有更多的关注，也注意到她们的经济要求，但他的女权改革思想在本质上与主宰运动的中产阶级妇女的思想是一致的。除了在 1888 年到过佐治亚、南卡罗来纳作过一次调查旅行，看到黑人农民的困境外，他缺乏对她们情况的第一手资料。道格拉斯自己收入很好，与之交往的黑人妇女也大都是生活舒适、住在城里的中产阶级妇女。所以，他在赞美索琼纳·特鲁思为黑人种族、为妇女权利方面所作的贡献时，也明显地觉得她缺乏一种令人心动的优雅。^[39]这是道格拉斯女权改革思想的局限所在。

道格拉斯女权改革思想的矛盾性和妥协性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改革的复杂性。一方面，道格拉斯在 1849 年就提出了权利无性别、权利无种族的口号，也一直要求给予妇女完全的平等权，另一方面在投票权问题上，又表现了对男子至上的偏见妥协，主张先给黑人男子投票权，这就违背了他一向主张的男女要完全平等的承诺。尽管如此，道格拉斯作为一个黑人领袖，他这样做倒也是明智的。他当然想一起争取到妇女与黑人男子的投票权，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还不可能接纳妇女投票权的时候，他只好

先作让步，先单独取得黑人男子的投票权，然后再集中精力为妇女投票权而斗争，最终达到黑人和妇女的完全解放——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三 道格拉斯与重建

在与加里森派以及女权——废奴主义者的斗争中，道格拉斯的意见占了上风，争取黑人投票权成为有组织黑人解放运动下一个目标。现在，道格拉斯有时间和精力对总统的重建方案发表意见了。他进行了积极努力，争取人民起来反对总统重建方案，支持采取更为激过的重建方案。

1866年1月2日，道格拉斯开始旅行讲演，行程数千英里，要求人民起来反对总统的重建法案，他谴责约翰逊方案是对“白山事业的背叛”。2月7日，道格拉斯到达华盛顿，面见约翰逊总统，当面向总统陈述黑人争取选举权的理由。他说：“我们是政府的臣民并被课以税务，自愿为国家服务，被征去当兵，分担国家的负担，我们要求享有这一权利是合理的。”^[40]但是约翰逊仍然坚持应由州来决定该不该给黑人选举权。

道格拉斯还顶住偏见，参加了共和党布置的1866年秋季选举工作会议。在会上，他宣讲黑人取得选举权的意义。他说，黑人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有权享有一切。黑人有权获得选举权，因为他已帮助国家镇压叛乱，既直接战斗，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帮助联邦士兵。他理应获得选举权，因为他的服务也许会再度需要。道格拉斯还用林肯会见自己的例子作为佐证。他说，亚伯拉罕·林肯曾经“毫不惭愧地邀请他去华盛顿和总统一起饮茶，如果他被总统认为好得可以在白宫饮茶，他当然相当有资格被赋予选举权”。^[41]

这次会议刚开始时，赞成给予黑人平等权的代表并不占多数。当《独立报》白人编辑西奥多·蒂尔顿与道格拉斯手挽手地走进会

场时，连许多激进派共和党人也担心这样就会使共和党失去一部分选票。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就十分恼火，他说：“这里许多人会被蒂尔顿与道格拉斯以手拉手的形式展示社会平等感到苦恼。像我们这样的激进派倒不会特别反对，但在这种场合这样做肯定是不幸的。现已复活的旧有偏见将使我们失去一些选票。我认为这样做除了是愚蠢的虚张声势外别无他用。”^[42]

但是，史蒂文斯估计错了。道格拉斯的到来非但没有使共和党，乃至激进派失去选票，反而使这次会议成了争取平等权的一场运动。道格拉斯成功地使“政治感情的浪潮转向黑人投票权”，并把会议从“反动和非进步的影响中”拯救出来，这是 4 年后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前奏。^[43]

由于道格拉斯的宣传活动卓有成效，也由于包括白人废奴主义者在内的共和党人的积极工作，1866 年选举结果，共和党激进派取得胜利，在国会中取得 2/3 的多数。这样就使得给予黑人公民权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之前，国会已越过约翰逊总统的否决，通过了民权法案，宣布给予被解放的黑人一切公民权，包括拥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权利。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就是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它于 1866 年 6 月 13 日由国会通过，1868 年 7 月 28 日被批准生效。

1868 年总统选举，道格拉斯继续支持共和党。他对黑人们说，民主党的历史只是一部“为南部特权服务的历史”，如果它获得胜利，那么黑人会继续处在奴役之下，如果选举共和党的格兰特，那就会打消叛乱分子奴役黑人的一线希望。道格拉斯的这个策略非常正确。因为格兰特虽然获得 214 张选举人票（民主党获 80 张），但在普选票中，格兰特只得 300 万张，民主党得 270 万，如果没有黑人的 45 万选票，格兰特将会被击败。^[44]当时在南部 10 个州黑人选民总共有 70.3459 万人，白人选民只有 66.181 万人。^[45]

因为从 1868 年选举中，共和党看到：正是由于黑人的选票，

在一些与民主党争夺激烈的州里，共和党才取得了优势，所以，为了回报黑人的支持，也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共和党国会再一次抛弃种族偏见，在激进派的主持下，于 1869 年 2 月 26 日通过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46]这一宪法修正案不仅保证了在激进派重建时期，南方各州被解放的黑人所赢得的选举权，也使北方二十多个州的黑人得到这个权利，从而至少为共和党赢得 90 万张选票。1870 年 3 月和 1871 年 2 月，国会先后通过了关于禁止干涉公民行使选举权或其他民主权利的两个强制执行法案，1871 年 4 月，国会通过了取消三 K 党法，1875 年国会通过了民权法。这一系列法案还为保障黑人行使选举权等民主权利提供法律后盾。

这样经过艰苦的斗争，道格拉斯梦寐以求的黑人选举权终于获得，政治平等权取得了初步胜利。道格拉斯的黑人解放战略——合法主义改革思想再次得到历史的验证，被证明是正确的，适合当时黑人解放的斗争实际和美国的客观环境。道格拉斯制定的黑人解放的正确策略保证了共和党的胜利，使重建沿着有利于黑人解放的方向发展。

1869 年，真正意义上的黑人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道格拉斯被选为永久主席，大会决定继续支持共和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的肯定，黑人愿意道格拉斯继续领导他们去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斗争。

注释：

[1] 关于政府在重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可以参考威利·李·罗斯著：《重建的预演：选择最优实验方案》（Willie Lee Rose, Rehearsa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Royal Experiment, Indianapolis, 1964），第八章。

[2] 顾学稼、陈必丞、姚波、吴文嘉编著：《美国史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9—180 页。

[3]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

洛伊希滕堡合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59 页。

[4] 同上书，第 960 页。

[5] 曼宁·马拉堡著：《种族、改革与造反》（Manning Marable, Race, reform and rebelli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5），第 4 页。

[6] 亨利·S·康马杰主编：《美国历史文献》（Henry Steele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58, Vol.2），第二卷，第 7—8 页。

[7] J·布卢姆、S·摩根、A·施莱辛格、K·斯坦普等合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609—610 页。

[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282 页。

[9]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01 页。

[10] W·E·B·杜波依斯著：《黑人的重建》（W.E.B.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35），第 207—208 页。

[11]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第 503—505 页。

[12] 马克思：《国际工人联合会致约翰逊总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09 页。

[13]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5 页。

[14] J·布卢姆、S·摩根、A·施莱辛格、K·斯坦普等合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上册），第 621 页。

[15]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合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中译本，上册），第 978 页。

[16]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295—299 页。

[17] 曼宁·马拉堡著：《种族、改革与造反》，第 5 页。

[18]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第 257 页。

[19] 曼宁·马拉堡著：《种族、改革与造反》，第 5 页。

[20] 顾学稼、陈必录、姚波、吴文嘉编著：《美国史纲要》，第 179—180 页。

- [21] 曼宁·马拉堡著：《种族、改革与造反》，第 5 页。
- [22] 乔治·M·弗雷德里克森著：《白人头脑中的黑人形象》（George M. Frede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 178 页。
- [23] 同上书，第 179 页。
- [24]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第 258 页。
- [25]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22 页。
- [26] “黑人的事业”，1864 年 10 月 7 日（“The Cause of the Negro People,” Oct. 7, 1864）。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三卷，第 418—420 页。
- [27] “黑人要求什么”，1865 年 4 月在马萨诸塞反奴隶制协会年会上的讲话（“What the Black man Wants,” Speech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 at Boston, Apr., 1865）。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158 页。
- [28]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38 页。
- [29] 同上书，第 237 页。
- [30] 1865 年 5 月 9 日在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第 30 届年会上的讲话（Speech at Thirty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May 9, 1865），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167 页。
- [31] “选举：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波士顿的讲话”（“The Vote: Speech of Frederick Douglass in Boston”, 25 Jan. 1865）。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77—78 页。
- [32] “纽约州平等权利大会”，载于 1866 年 12 月 21 日《纽约论坛报》（“Equal Rights for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Tribune, December 21, 1866）。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79 页。
- [33]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87—88 页。
- [34] 同上书，第 89 页。
- [35]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90 页。

[36] 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87 页。

[37] “妇女权利大会”，载于 1873 年 1 月 23 日《新国民时代报》（“The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New National Era, 23 Jan.1873）。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论妇女的权利》，第 102—103 页。

[38] 安吉拉·Y·戴维斯著：《妇女、种族和阶级》（Angela Y.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1981），第 137—138 页。

[39]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第 156 页。

[40]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40—243 页。

[41] 同上书，第 249 页。

[42] 同上书，第 247 页。

[43] 同上书，第 252 页。

[44] 同上书，第 260 页。

[45] W·E·B·杜波依斯著：《黑人的重建》，第 371 页。

[46] 乔治·M·弗雷德里克森著：《白人头脑中的黑人形象》，第 186 页。

第五章 前进中的挫折

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在道格拉斯的领导和推动下，经过黑、白人民的共同奋斗，美国的黑人终于获得人身自由、公民权和选举权，并得到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的正式确认。这一切都是黑人解放事业的重大进展。但是，黑人解放事业并不一帆风顺。选举权的取得并未使黑人取得相应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相反，随着重建在 1877 年以妥协而告终结，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重又抬头，并很快取得统治地位，种族隔离和歧视日益盛行，黑人的公民权，人身自由和选举权等受到严重的侵害，甚至被剥夺，南部形成种族歧视和隔离制社会，并得到法律的认可。北部也在逐步向南部看齐。对此逆流，道格拉斯进行了坚决斗争，但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在他于 1895 年 2 月去世之前，这种局势未能被扭转。

第一节 激进重建半途而废

一、白人至上主义的复苏

对于奴隶制被摧毁后黑人的处境，道格拉斯曾经有过预测。他认为，奴隶制在美国存在的时间太久，已经把它本质深深而永久地嵌入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在一天或一年，甚至在一个世代中被清除掉。在奴隶肢体上的锁链被解除之后很久，他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奴隶，他的主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保留由于主仆关系而遗

留下来的骄傲、怠慢、专横，以及本能的优越感和对权力的热爱。因此，要想使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恢复和睦和自然，需要时间和教育。道格拉斯还认为：“法律和刀剑将最终消灭奴隶制度，但是法律和刀剑不能消灭恶毒的奴隶制的情感，这种情感已在美国存在了两个世纪，种族骄傲和肤色偏见将激发起压迫黑人的令人憎恶的欢呼。在奴隶不再成为他主人的所有物后，他的敌人将竭力使他成为全体社会的奴隶。”^[1]

这一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虽然经过内战和重建，黑人取得了人身自由、公民权和选举权，黑人也曾短暂地赢得了参与管理南部社会的权利。尤其是在激进重建时期，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谈到过。但是，正当黑人朝向自由平等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南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发动了反扑，他们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在各个方面剥夺黑人业已获得的权利。

白人至上主义者这种反扑从总统重建时期即已开始，在林肯和约翰逊二位总统允许某些南部白人重建时期，白人决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对黑人部队的出现感到愤怒，他们向总统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希望迅速撤去这些部队。约翰逊总统曾满足了这种要求。当激进重建开始后，他们更是怒不可遏，发誓要复兴民主党，控制住黑人。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大肆攻击激进派的重建纲领。在 1866 年，诺特出版一份小册子重新宣扬“黑人天生低劣”的“科学结论”，作为攻击北部提出的自由民局和其他解决南部种族问题的努力的依据。1868 年，里士满一个名为爱德华·A·波拉德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名为《重振失去的事业》的小册子，认为“南部捍卫奴隶制的真实而唯一的目标是让黑人永远处于低下地位”，他对南部由于在其他问题上的争论而浪费时间深表惋惜。他同意卡尔霍恩等人早已提出的观点：白人的民主建立在黑人处于绝对从属上，“低下是黑人的恰当位置”。^[2]其他白人至上主义的鼓吹者也纷纷加入附和者行列。一位名叫林德利·斯普林的作家

在 1868 年月长篇大论来细说黑人在非洲的野蛮和落后纪录；1869 年，J·R·海斯博士以所谓生物学上的“论据”痛骂拟议中的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力图证明黑人的低下无能。

在总统重建时期，白人至上主义者得到根据总统重建法案而重新建立的各州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急先锋和组织要数 1866 年后成立的三 K 党等恐怖组织，一共有数十个，其中包括白茶花骑士团、立宪联盟保卫队、白脸人、白人兄弟会、安全会议、1876 年协会和三 K 党骑士团等组织。它们名为白人自卫组织，而实际上，它们都是对付黑人自由民及其同情者的恐怖组织。当南方领导人颁布黑人法规时，他们则从事“使黑人安分守己”的活动和伏击来自南部的北方人。白茶花骑士团和三 K 党是秘密团体里力量最强大的两个。他们的成员配备着枪、刀剑或是其他武器，在南方某些地区日夜巡逻。分散在南部各地的联邦部队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一则因为这些恐怖组织的成员不仅都曾宣誓保守秘密，用多种方式掩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而且他们还受到当地白人居民的尊敬和支持；¹³二则联邦部队人数有限，在整个南部当时驻扎的联邦军队不到两万，每州实际分不到 2000 人。¹⁴黑人民兵组织本来可以作为联邦军事力量不足的补充，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有时甚至还受到联邦军队的弹压。

在数目众多的地方组织中，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联盟、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战线和南卡罗来纳的步枪俱乐部最为有名。

南部白人希望借助于不受法律约束的或者明目张胆的非法手段来做到法律不允许做的事：对黑人实行绝对的控制，把黑人和他们的团伙赶下台去，建立“白人至高无上”的统治。南部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激进的重建运动，而恐怖主义团体所使用的战术是南方领导人为达到这个目标所走的第一步。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在商业和社交中采取恐吓武力排斥对方，在选举中行贿，并以纵火、甚至谋杀手段来完成他们的事业。对他们来讲，剥夺黑人的政治平等权

利，已成为一种神圣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建立白人至上的“高尚”的目的使任何手段都成为合理的。黑人如果违背不参加投票的命令就会被赶出居住地。态度比较坚决因而进行反抗的黑人就遭到鞭打、被弄成残废或被绞死。1871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几位黑人官员被限期在15天内辞职，并受到警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就像白天过后一定是黑夜一样，他们肯定会受到审判和惩罚”。^[5]

对三K党肆无忌惮的活动，国会和联邦及各州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制止。例如1868年亚拉巴马州通过了一条法律：抓到任何外出戴假面具或任何犯有破坏财产或骚扰人民等罪行的人，都要加重罚款或判处长期徒刑。前面在第四章也提到，国会在1870年和1871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取缔三K党及类似的团体。任何人通过贿赂、武力或恐吓阻止他人投票都是犯下该受惩罚的罪行。国会议员们经过广泛调查后，确信三K党仍在活动，于是在1871年4月颁布了旨在制止三K党活动的法律，总统被授权中止执行人身保护令以便镇压各种“武装团体”，宣布密谋行为等同于叛乱，并将相应地受到惩罚。结果，有数百人被捕，许多人犯有密谋罪。仅在南卡罗来纳，一年之内就有近一百人被判刑和罚款。^[6]

不过，总的说来，这种镇压活动似乎并不成功，很多保护黑人的合法权利的法律被置之不理。尤其是激进重建的末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例如在1870—1876年间，南部各州被定罪的二K党分子只有1208人，而有2350人的案件被撤销，280人被宣布无罪释放。^[7]前邦联骨干分子在被赦免重返政治舞台后，南部政治重新被南部白人控制，保护黑人的法律就更难以执行，相反，倒是打击黑人的法律纷纷出台。黑人在激进重建中获得的许多权利不是化为乌有，就是名存实亡。

二 南北妥协及其后果

南部重建最终以南北妥协而告终，实在有点令人扼腕叹息，但

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早在 1865 年，许多南方前邦联分子就以本地区受尊敬的公民身份恢复了他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并在效忠宣誓后参加了公共事务。甚至在激进重建时期，他们也仍然在老家发挥影响，帮助恢复地方自治，恢复南部失去的白人天堂。

从 1869 年田纳西州前邦联分子获得选举权开始，12 个月之内，各州的前邦联分子纷纷通过赦免令而获得公民权。到 1872 年大赦之后，除 600 名左右前邦联官员外，其他人的公民权均已获得。臭名昭著的前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也被赦免。南北初步妥协。这样，从 1870 年开始，民主党在南部重新恢复势力，开始掌权。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首先落入民主党手中。1871 年，佐治亚也落入民主党之手，在共和党控制的各州，民主党也部分掌权。尤其是在所谓白人县。1874—1875 年，民主党把得克萨斯、阿肯色、亚拉巴马也纳入掌握之中。到 1876 年，共和党只能在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这三个州勉强维持，实质上与民主党是势均力敌，1877 年南北妥协就是以这三个州为砝码的。

重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南方有组织的白人为一方，和以联邦联盟、自由民局、联邦军队和黑人为另一方的斗争过程，斗争的实质是争夺南部的政治控制权。从北方的观点来看，这一斗争关系到战争成果是否被那些在 1861 年把国家推到战争灾难中的叛逆们葬送掉的问题。从南部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他们要捍卫到底的自治权问题，也是一个应该由谁来统治本地区的问题。南部一直把地方自治权看做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当年的关税之争，还是内战，无一不因此而起，重建只不过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延伸而已。

随着民主党在南部重新得势，它很快便进行了反攻倒算，采取一切手段推翻包括自由黑人、南北战争后加入共和党的南方白人及北方“毛毡提包客”在内的激进派联盟在南部的统治。曾经有一度形势十分紧张，大有内战会重新爆发之势。

1875 年密西西比就几乎处于战争边缘。当时该州由阿德尔伯

特·艾姆斯当州长，他保持有一支黑人民兵，并且专门为黑人民兵买了 100 本《步兵战术》。南部复兴的民主党人对此十分憎恨，双方都输入武器，举行阅兵。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出现骚乱和残杀，最后，艾姆斯州长答应解散黑人民兵，民主党在该州的选举中以 3 万多选票上台执政，共和党则在随后的两个月内解散了。在路易斯安那州，保守派组织了“白人联盟”，在 1874 年试图以暴力推翻激进派政府。激进派企图夺取白人联盟的武器，结果在新奥尔良引起一场暴动，有 40 人被杀，一百多人受伤。在 1876 年选举中，暴力行动仍未停止，直到 1877 年南北妥协后，海斯总统从这里撤走联邦军队，和平才出现。在南卡罗来纳州，“红衫党”主宰了竞选会议，并公开携带武器作为反对激进派“暴政”的一种“保护性”措施。劳工民主协会成立了，它力促白人只雇佣民主党人。州内许多地方处于骚乱之中，汉堡镇发生了一场最残酷的种族冲突。1876 年 7 月 4 日黑人民兵在举行阅兵式时，有几个黑人在妨碍交通的罪名下被逮捕。在推迟对他们进行审判时，估计有几百人的白人武装分子来到该镇，要求严惩这些黑人犯法者。一个前南部邦联军官命令黑人道歉并交出他们的武器，黑人拒绝了。之后，白人就从外面运进重型武器和更多的弹药。接着就发生了枪击。黑人试图逃走，但已为时太晚，有几个人在试图逃跑时被杀死，还有 5 个人是在被抓后被杀死的。在 1877 年韦德·汉普顿接替丹尼尔·张伯伦担任州长以前，南卡罗来纳连表面的和平也没有。^[8]

在重建过程中，民主党之所以重新得势，而共和党失势，主要原因除了南部白人重新参加政治活动，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随着前邦联分子被赦免，支持民主党的中坚人数在增加，例如 1872 年大赦结果，就有近 16 万前邦联分子被解除了不准担任公职的禁令，^[9]这些人在南部白人一向是很有号召力的。与民主党的蓬勃兴旺相比，共和党则日渐没落、萎缩。这是因为南方白人在被赦免后，他们对黑人进行了有效的恐吓，即使在没有发生骚乱的地方，

白人也通过恐怖主义手段阻止黑人投票，这就保证了民主党的胜利。在 1869 年三 K 党被正式解散以后，白人又采取了其他恐吓手段，使黑人在政治上等于零。恐吓在 1870 年起的作用非常大，黑人的庄稼被毁坏，粮仓和房屋被焚毁。由于选举共和党人，黑人挨鞭打，被私刑处死。有组织的白人在投票地点进行巡逻，以保证“公正、和平与民主地”进行选举时，白人的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黑人呆在家里，政治权力从共和党转到了民主党手里。共和党保护不了它的战时盟友——黑人的政治权利，不仅使它失去部分黑人和部分白人群众的支持，而且使它自己也身受其害，共和党内部分裂，影响大不如从前。一些黑人工人被他们的种植园主带到投票箱前，“让他们像一群浑浑噩噩的牲畜一样跟着投票”。^[10]

共和党的失势，还在于当时对共和党重建政府腐败情况的揭露。民主党由于对共和党政府受贿、贪污、盗用公款和其他腐败行径等管理不当的强调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使激进的重建运动名誉扫地，人们对激进运动的真诚幻想也随之破灭。尽管南部白人在战前当政时也一样腐败透顶，在约翰逊重建临时政府里也相当铺张浪费，但这些均无关紧要。1874 年民主党没有当政，它占尽了一个“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一切方便条件。

激进重建运动难以为继除了共和党的影响降低，民主党的势力上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当时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随着史蒂文斯、萨姆纳、巴特勒和一些老的反奴隶制领导人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一些更为年轻的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这些人是忠诚的共和党员，但他们更关心南北方的工业利益，而不是南方的激进重建运动。由拉瑟福德·海斯、詹姆斯·布赖恩、罗斯科·康克林和约翰·洛根等人担任共和党领导人，是共和党更加追求实利和更加实际的一种信号。

共和党代表的北方大资产阶级，主要是那些转向垄断的大银行家和大工业家，通过内战和重建已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保存并

控制联邦，摧毁奴隶制度，消除奴隶主复辟旧制度的危险，从而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11]而南部经过重建，前奴隶主控制南部政治的基石已经被摧毁。在重建过程中，北部大资产阶级向南部派遣了大批人员，提供了大量资本，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种植园经济因而被相对削弱，旧种植园主的经济地位即将被金融资本所取代。据统计，1870年以后，至少有半数种植园主是北部人，或是被组织在公司内和接受银行经济支持的人；1881年，在密西西比流域的棉花种植园中属于内战结束时旧种植园主的还不到1/3。^[12]新种植园主同旧种植园主虽有一定的瓜葛，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不深，而他们的愿望同北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却是一致的，另外南部也产生了一批新兴种植园主，他们是农村的商人和以前的监工。因为旧奴隶主急需现金，急于出售土地，而地价又落得很低，商人和监工们便购进地产，实际上他们是农业资本家，他们的要求逐渐和北部工业资本家趋于一致。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发现他们与前种植园主的共同利益比贫穷的黑人要多，他们不必对南方的黑人权利承担义务就可以发展资本主义。正如历史学家劳伦斯·古德温所说：“控制共和党的银行家、制造商、船主和商人不久对以黑人投票权为基础建立南部共和党的企图感到厌倦。因为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选举已经证明：共和党人只依靠北部的黑人选民就可以取得统治地位，他们的热情便下降了。另外，加上白人激进废奴主义者的数量减少，在共和党内关于南部政策的辩论亦不复存在。”^[13]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人对为黑人进行的改革运动已感到厌倦，南北妥协的条件成熟了。

1876年总统选举，民主党与共和党竞争非常激烈，几乎是不分上下，在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三州，双方都宣布自己获胜。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南北达成妥协，即联邦政府结束对南部的军事占领，放弃重组南部社会的努力，并且承认白人在这个地区享有至上地位的事实。作为回报，南方各州保证支持合众

国，接受国家至上主义原则，民主党候选人塞繆尔·蒂尔顿把在有争议的三个州获得的选票给共和党，同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就任总统。

海斯就任总统后，立即从南方撤军。在这之后，联邦对南部的其他限制也陆续取消。1878年，为保护黑人选举而动用武装部队的规定被取消，1894年，给特派联邦法院执行官和选举监督人的拨款没有了。1898年，在最后一次大赦中撤销了对最后一批不忠和叛变的南方人参加选举的禁令。这样，南部完完全全地由民主党控制了，南方白人终于可以在没有北部的干涉或黑人的影响下自己进行统治了。

民主党在南部重新掌权后便设法使黑人丧失政治影响，或者完全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开始，民主党只是采取一些办法阻止黑人参与政治活动，三K党之类的私刑恐吓仍然是首先选择的方法，虽然在过去为了从共和党人手里取得政权，这样做被认为是合法的，但一旦取得政权后，再依靠夜间蒙面骑马搞恐怖活动，在某些敏感的白人看来，就很不负责任了。尽管如此，对许多南方白人来讲，暴力仍然是使黑人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最有力、最可靠的手段。当然，除暴力外，南部白人也玩弄了许多花样。在很多地区，他们不准黑人在选举日到市镇上露面，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报复性惩罚；投票地点经常设在远离黑人居住的地方，对那些不怕长途跋涉的黑人，他们则采取在选举日那天阻塞道路，停止摆渡等手段，使其无法到达投票地点；有时改变了投票地点也不通知黑人投票者，或者，假若通知黑人已改变投票地点，负责选举工作的官员在最后一刻满不在乎地宣布根本不改变投票地点；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南卡罗来纳州在刁难黑人投票方面做得很巧妙，1882年法律规定要求每一个投票地点都为各个投票办事处设立专用的选票和专用票箱，投票人必须把他们的选票准确无误地投进规定的票箱里。禁止任何人同投票人说话，如果他找不到正确的票箱，他的选票就会被

扔掉。这一规定很显然使不少文盲黑人选票作废。虽然白人也有一部分人是文盲，他们也身受其害，但白人文盲毕竟比黑人少得多。南方各州为使黑人选票无效的方法还有重新划分选区等，如弗吉尼亚为使聚居黑人选区选票无效，在 17 年内重新划分或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达 5 次之多。

有关选举的法律极不完善，以致在许多地区并不要求有统一规格的选票。民主党党员除了发给他的那张选票外又另外假造几张选票，并把它们一起投进票箱，负责选举的官员则假装没看见。以伪造的选票充塞票箱的做法非常普遍。这可以从一个狂热的民主党党员的下面一段话中得到佐证：“白种和黑种共和党人投的选票可能超过我们，但是就数出来的票数来看，我们能够超过他们。”南部的这些方法都非常有效，以致亨利·格雷迪在 1889 年时可以这样说：“已经不必把黑人当一支政治力量来认真考虑了。”¹⁴

三白人至上主义的胜利

把黑人赶出政治舞台的最初结果一度出人意料。到 19 世纪 80 年代，黑人共和党主义危险是消失了，但白人之间的团结也出现动摇。贫穷的白人既然已经不再担心“黑人统治”，那么他们就更关心自己的生活境遇。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生活得很不开心。由于 1870 年以后，主要是由于棉花的过度生产和增长而造成的农业萧条落到了南部头上。许多小农场主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们在痛苦之余把矛头指向取消他们抵押品赎回权的金融势力，指向对他们收取过高运费但却得到州和联邦政府补贴的铁路，指向要求提高关税并抬高农业机械价格的公司，还指向不断提高税收的政府。因为南部民主党领导机构现在已经不再是由代表农场利益的种植园主把持，而是由新兴的实业家和商人领导，所以白人农民对他们也感到失去信心，不再像以前那样依顺，反而认为这些领导人应为自己濒临破产负责。

在饥饿和贫穷的相同处境下的白人农民和黑人逐渐由以前的相互敌对而趋向和解，甚至走在了一起。在成立于 1870 年的激进农民组织——格兰其或称农民协进会的支持下，全国有色人种农民联盟与合作协会在 1886 年诞生，并迅速发展。到 1891 年，该组织声称在 12 个州的组织里共有一百多万会员，凡是黑人农民达到一定数目的地方均有分会。在 1888 年后，黑人和白人农民组织曾有一段时间的密切合作。在像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这样的激进领导人教导下，白人穷人不再把黑人当作敌人，而当作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盟友。沃森教导贫穷白人和黑人说，人们有意把他们分开进行剥削，他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他还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反对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并期望黑人和白人农民联合起来，把民主党极端保守派政府赶下台去，这样才有可能通过特别有利穷人的进步法律。^[15]

人民党是在 1892 年选举中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为了赢得南部黑人的选票，它采取种种措施，力争让黑人在习俗和惯例已阻止他们投票十多年的地区取得选举权。惊慌失措的民主党人提出反建议，但被拒绝，于是，民主党也转而去拉黑人的工作，去拉他们的选票。在有的地区，几年前还对胆敢试图行使“白人特权”的黑人选民进行威胁的那些人，现在又强迫黑人去投民主党的票了。黑人被装进货车运到城里，让他们重新投票。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甚至从南卡罗来纳运来黑人去投民主党人的票。

但是，黑人大都还是宁愿去投人民党的票，他们把它看做是旧共和党组织的新生。许多旧的共和党人也的确加入这个新兴政党。这种联合在 1894 年选举中成功地夺得对北卡罗来纳州的控制权。民主党的选举机构立即被解散，投票比较容易了，很多黑人得以参加投票并使人们一再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在该州东部黑人居住的地带，黑人担任公职的现象也出现了。1895 年，州议会任命了 300 名黑人地方官员。很多县都有黑人警察局副局长，威尔明顿有 14

名黑人警察，新伯恩有黑人警察也有黑人高级市政官。一位知名的黑人詹姆斯·扬当上了肥料检查员和州盲人院负责人；另一位知名黑人约翰·丹西被任命为威尔明顿港口的税务员。^[16]白人保守派眼见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南方其他各州黑人政治上的复兴，对于黑人在他们无法加以控制的时候掌握权力十分憎恨。控制不了黑人选票的民主党人哀叹黑人共和党主义的卷土重来。甚至在他们控制了黑人选票的地方也说黑人导致了政治腐败。黑人选举权重又成了民主党的心头之患。1896年人民党运动失败后，民主党乘南方贫穷白人理想幻灭之际，积极渲染黑人共和党主义的复活危险，使之重新又回到民主党的怀抱。南部白人在彻底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贫穷白人的思想和行动又归于老一套习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黑人统治这种保守想法，使他们安于贫困，他们认为黑人问题妨碍了白人进步。

彻底剥夺黑人选举权一直以来就是民主党人的梦想。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密西西比州，早在1886年就有人倡议修改州宪，从法律上剥夺黑人选举权。1890年终于获得成功。这一年的制宪会议通过的州宪法对选举权特别规定，对选举人征收人头税2美元；犯过行贿、抢劫、偷窃、纵火、作伪证、谋杀或重婚罪的人不得拥有投票权；禁止所有不能阅读州宪法的任何章节，或在宣读州宪法时听不懂或者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人投票。为了防止黑人阻止修正案的批准，该修正案在制宪会议通过后立即予以颁布，并宣告生效。

紧随密西西比州之后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是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在本·蒂尔曼州长领导下，从1890年起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1895年该州制宪会议召开时，蒂尔曼虽然在1894年已入选国会参议院，但他仍然赶回来担任会议选举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的选举条款与密西西比州如出一辙。它规定选举人须在当地居住两年，交纳1美元人头税；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宪法任何章节，或在朗读宪法时能够听懂；或者拥有价值300美元的财产；罪犯无投票资格。

黑人大多数都穷得叮当响，无力交付人头税，尽管黑人在重建时期受到教育的人数大大增加，但绝大多数黑人依然是文盲，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做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就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

第三个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它在 1898 年除了规定财产和教育资格外，还搞了一个新花样，即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它规定把 1867 年 1 月以前其祖父或父亲拥有选举权的男子都列入永久选举人名单。由于该州黑人在 1867 年 1 月前几乎无人拥有投票权，这样财产和教育上资格规定只适用于黑人，而不适用于白人。

在以上三州的带领下，到 1910 年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弗吉尼亚、佐治亚和俄克拉何马都以法律条款有效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结果，黑人选民人数锐减。据密西西比州制宪会议唯一的黑人代表艾赛亚·蒙哥马利说，交纳人头税和要求受过教育这两项规定会剥夺该州 12.3 万名黑人的选举权，白人因此被剥夺的只有 1.1 万名。^[17] 1896 年路易斯安那州在选民簿上登记的黑人有 130344 人，在 26 个教区占多数，白人选民登记数则有 160088 人；到州新宪法通过后的 1900 年，登记簿上只剩下 5320 名黑人，在哪个教区也不占多数。至 1904 年黑人选民登记数下降至 1718 人，白人则为 106360 人。这说明黑人下降了 96%，而白人仅下降了 4%。其他各州也是如此。1883 年，亚拉巴马州黑人选民登记从以前的 14 万人下降至 3742 人。南卡罗来纳州由 1876 年的 92087 人降至 1898 年的 2823 人。密西西比州则由 1876 年的 52705 人下降至 1898 年的 3573 人。1920 年至 1930 年间佐治亚应参加选举的黑人选民为 369511 人，而实际参加选举者仅 1 万人。此 10 年中，弗吉尼亚州任何一次选举中黑人选民都在 1.2 万至 1.8 万人之间，而已届选举年龄并有文化的黑人人口为 248347 人。^[18] 正如卡特·格拉斯在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上指出的那样，代表们被选出来“是在联邦

宪法的限度内采取所允许采取的极端歧视行动，以便在不严重有损于白人选民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地除掉每一个可以除掉的黑人投票人”。^[19]在这一点上，南部可以说是顺遂心愿。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名存实亡。

与黑人选举权被剥夺相应的结果是种族隔离制的确立。在重建初期，种族隔离制的法律就一度出现过，1868 年被激进派取消。到保守派重新掌权时，各州又相继恢复了种族隔离制。1870 年，从田纳西州开始，各州相继通过禁止种族通婚的法律。1875 年，又是田纳西州领头通过了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在车站、码头、火车上、船舱里把黑人与白人分开。最高法院支持南方各州的立场。在 1877 年的赫尔诉德·科伊尔案中，它公然宣称任何州不能禁止在公共交通中实行种族隔离；在 1883 年的一起著名民权诉讼案中，最高法院判决，国会无权保护黑人不受歧视，从而为南方各州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铺平了道路，1875 年的民权法成为一纸空文。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方白人在公共交通、住宅、教育和就业等几乎所有公共和私人领域都强制推行种族歧视的制度。

1881 年，田纳西州再次制定铁路运输中的种族隔离法律，规定铁路公司要为黑人另设车厢，黑人必须在指定车厢就座，不得进入白人车厢。这一规定比 1875 年的规定更为明确，如果说 1875 年只是规定原则，这一次则是具体操作办法了。田纳西州为南部各州树立了榜样，各州便群起效尤。1887 年佛罗里达、1889 年得克萨斯、1891 年亚拉巴马、1898 年南卡罗来纳、1900 年弗吉尼亚、1907 年俄克拉何马等州都制定了类似法律。种族隔离制在南部建立起来。

在电车上率先推行种族隔离制的是佐治亚州，它在 1891 年的一项法律中规定，黑人必须乘坐专门为黑人准备的电车。接着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路易斯安那等州也施行了同样的法律，黑人在城市交通中也受到种族隔离。

到 1896 年，在普莱塞诉弗格森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对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予以正式的法律承认。该案的起因是这样的。1890 年，在路易斯安那州，仅有 1/8 黑人血统的 78 岁老人荷马·普莱塞，因为坐入白人车厢并拒绝移入黑人车厢而被捕判罪。普莱塞拒绝接受对他的无理判决，并上诉到最高法院。1896 年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路易斯安那州在铁路运输中实行“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并不违反宪法。普莱塞的上诉被驳回。法官布朗在判决中甚至公然宣称：“如果一个种族在社会上低于另一种族，美国宪法则无法平等对待。”^[20]这一判决无异于宣布了黑人在美国宪法上的卑下地位，从而为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制提供了宪法依据，它使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公平保障条款失去效用。所谓“隔离但平等”只不过是一块欺压黑人的遮羞布，是骗人的鬼话。任何人只要看一看黑人车厢的拥挤、肮脏，白人车厢的宽敞、整洁，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继公共交通之后，其他方面也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在教育领域，从 1877 年最高法院承认公共交通中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原则时起，到 1885 年，南部大多数州都制定了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在 1895 年，佛罗里达州更制定法律，要求在私立学校中也实行种族隔离，并规定要对实行黑人、白人合校的校方和教师实施惩罚。这一法律的实质旨在剥夺黑人小孩受教育的权利，因为黑人小孩既不能进入白人学校，而为他们建立的学校数量又少得可怜，而且师资不足，设备简陋，根本不能满足黑人孩子接受教育的需要。1908 年，最高法院在一次判决中，对在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也予以认可，判定其符合宪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铁路、教堂、学校、图书馆、电车、候车室、售票处、剧院、旅馆、公园、饭店、居住区及公共娱乐场所，甚至河湖渡口都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对黑人的歧视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南部的法律、法院、学校及几乎所有公共机

构全都有利于白人。这就是白人至上。

第二节 道格拉斯的反击及其失败

一 道格拉斯的反击

对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的复活，激进派和道格拉斯迅速作出反击。史蒂文斯就曾以道格拉斯为例反驳白人至上主义者所谓黑人天生智力低下的谬论。1871年4月，道格拉斯对三K党的危险发出警告，他认为，由亨利·A·怀斯领导的三K党是另一种形式的叛乱，它企图在联邦内发动战争，比正面的公开战争更为可怕。^[21]1871年全国有色劳工联盟召开大会，黑人工人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有力行动，反对三K党的恐怖活动，保护黑人的选举权，迫使国会通过萨姆纳提出的补充民权法案，把旅馆、法院、学校及其他公共设施向所有人开放，而不问其肤色如何。会议一致推选道格拉斯为这场斗争的领导人，道格拉斯承担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道格拉斯领导下，黑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国会在1875年勉强通过了民权法案，保证黑人在旅馆、剧院等公共场所的平等待遇，禁止将黑人排除在陪审团之外，不过萨姆纳原先提出的禁止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条款却被不声不响地删除了，也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保证措施。

1877年5月，道格拉斯尖锐批评首都华盛顿的黑人法典，宣称这个城市“与全国其他各地文明进步的步伐相比形成最可耻、最丢脸的对照”。^[22]他还认为把首都放在两个历史最久的奴隶制州之间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这两个州都是奴隶制度的卫道士和温床。这段话引得华盛顿商界头面人物大为不满，他们征集请愿签名要求海斯总统解除道格拉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执行官的职务，但总统拒绝这样做。

1888年6月，道格拉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发出警

告，如果共和党不能保证黑人的选举权，那么黑人就会支持任何反对它的力量。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虽然不是代表，但他在开幕式上仍然发表了讲话。^[23]在选举中，道格拉斯也不遗余力为改善黑人的政治、经济状况而呼吁。

随着南部对黑人私刑的可怕升级，道格拉斯也加入到反对私刑运动的行列。在 1882—1902 年间，共有 2060 名黑人被处以私刑，其中很多是儿童和怀孕的妇女。许多黑人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其他则被斧头或刀砍残，被火钳弄瞎，或杀死。^[24]

反对私刑这一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是人道主义者、黑人活动家艾达·B·韦尔斯，他领导了一场世界性反私刑运动，揭露私刑的罪恶，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在促进政府采取行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道格拉斯与他们一起要求政府制止这种种族暴行。

道格拉斯十分清楚私刑这种暴力的性质。他同其他黑人一样懂得，私刑盛行的根源在于白人种族主义的病态心理。他认为，这种种族疯狂意在反对有色人地位的提高，增强种族偏见，最终通过司法、立法方面的措施，剥夺黑人的公民权。私刑者和暴徒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头脑中已被奴隶制留下的那种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所灌满”。他们沉溺于一种幻觉中，即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必须以黑人被压迫才能获得。道格拉斯说这些人都是些疯狂的杀人犯，他们的罪行极不光彩，“野蛮史上也没有哪一件事抵得上针对有色人的血腥的恐怖与残忍的暴行，……这一切都是由所谓的文明与信奉基督教的南方人所干的”。^[25]

对动用私刑的借口，道格拉斯说他有一半都不相信。白人对黑人的指控通常都是黑人攻击白人妇女。道格拉斯认为这是白人害怕黑人优势的一个反映。当黑人成为公民和投票人后，白人这样做可以让黑人的朋友相信，白白改变了黑人的品格，使他成了一个道德恶魔。道格拉斯承认有这样的坏黑人，但同样到处也有这样的坏白人，犯有这样暴行的人应当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予以惩处，“不让罪

犯逃脱”^[26]。

可悲的是，道格拉斯注意到，对黑人的所谓“强奸”指控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不免让人怀疑，黑人男子的品格会变得这么快。有大量证据也证明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捏造的借口占绝大多数。事实显示，黑人男子是无辜的。尽管根本没有黑人男子强奸了白人妇女的证据，他还是被暴徒处以私刑。道格拉斯指出，这是白人惯用的伎俩。在重建初期，他们造谣说“黑人阴谋叛乱杀死所有白人，烧毁城堡，引发暴乱”。在这招不起作用后，他们又声称“阻止黑人占据主导和优势，确保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绝对统治”，现在他们又捏造了黑人男子进攻白人妇女的借口。^[27]

道格拉斯指出，这种对黑人实行私刑的逻辑反映出一种精心策划的反对黑人作为公民的反动运动。这一运动包括：1883年废除了1875年民权法案，日益增长的州权情感，日益强化的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共和党转变成一个金钱的党，而不再是一个人道和公正的党。白人对黑人最公正、最人道的待遇是把他描绘成一个“道德恶魔，残忍地侵犯妇女的神圣权利，破坏白人家庭”。黑人男子强奸犯的神话正好切中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性心理神经要害，因为这违背了黑人男子与白人妇女性接触的禁忌。由此而产生的歇斯底里使南部白人把他们反对黑人公民权的运动扩展到对黑人实行种族歧视，剥夺黑人选举权，把黑人降到非人地步。强奸指控——这是男人对女人犯下的最可恶的罪行，“一种引起人类最强烈憎恨，人人得而诛之的罪行”——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歇斯底里。结果，使黑人屈从的努力似乎就迫在眉睫了。^[28]

道格拉斯认为，强奸指控无可估量地加重了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它给每个有色人身上都罩上一顶臭帽子，给他打上引起公愤的记号，一种比头号杀手更令人痛苦的记号”。它把黑人列为被人们“怀疑、躲避和仇恨的对象”。它也把“令人作呕的、令人憎恨

的名声强加给黑人”，把整个种族都描绘成堕落者和罪犯。然而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相当多品行端正的黑人成为私刑的受害者，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对有才能的、成功的黑人进行暴力压制说明，白人决心采取一切手段把黑人打落到他们所期望的地位。^[29]

道格拉斯认为，设置强奸骗局除了为屠杀黑人男子的私刑制造借口外，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强奸黑人妇女的行为合理化。道格拉斯强调指出，奴隶制度是“一种可以对南部的黑人妇女完全合法侵犯的制度，没有一个白人男子因此受到枪杀、被烧死、或被处绞刑，因为奴隶制度给了他这样做的全权”。在奴隶制被废除后，白人男子继续强奸黑人妇女，但他们找不到法理上的根据，甚至在私刑法理上也找不到这样的根据。但是当黑人男子成为强奸犯时，黑人妇女就成为妓女了。^[30]

道格拉斯一方面和其他黑人一起谴责这样的凭空想象，一方面发起运动敦促政府采取措施阻止私刑及其根源种族主义蔓延。道格拉斯指出，对黑人的司法不公“不仅仅是一个黑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黑白之间的种族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它关系到共和原则能否实现的问题”。^[31]

三 道格拉斯的局限

虽然道格拉斯与其他黑人、白人同盟者一起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他们未能阻止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取胜，也未能阻止它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首先是客观方面的原因。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被通过后，许多黑人和白人，包括道格拉斯的朋友们都欢欣鼓舞，他们都相信“以种族或肤色为基准的差别将在美国永远被消除，所有试图确立差别的努力都是不恰当的、过时的、也是有害的”。更有人说，“在这个国家已没有有色人”。^[32]许多人建议道格拉斯不要再为黑人争取更多的东西，应该让国家有喘气的时间。

因此，1870年4月19日，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后解散了，这就使得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组织支持。

不仅如此，黑人与共和党一贯的坚固联盟也遭到破坏。由于共和党为其忠诚的支持者黑人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黑人内部对共和党存在相当大的不满。很多黑人，甚至是一些黑人领袖如乔治·T·唐宁等都表示要支持民主党。因此，黑人失去了共和党的有力的支持。而且共和党在1874年开始分裂，党内出现自由派运动。共和党内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萨姆纳参加了自由共和党运动，分裂共和党，并在1872年总统选举中号召黑人支持民主党与自由共和党共同的候选人霍勒斯·格里利，他告诉黑人说格里利是黑人的真正朋友，他改变了民主党。“他们将继续在名义上是民主党，而实际上都是共和党。”^[33]这两个人以前曾经是民主党最坚定的敌人，现在他们立场变了。当然，民主党不会忘记他们的过去，只不过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口标——“推翻黑人的优势”。道格拉斯严厉批评了萨姆纳等人的行径，要求黑人不要听从萨姆纳的建议，而应该支持共和党，这样黑人的安全才有保障。虽然由于道格拉斯的努力，黑人再次投了共和党的票，使格兰特当选，但是，共和党内再也没有像萨姆纳那样热心支持黑人事业的人了。道格拉斯的影响以前主要是通过共和党内的激进派如萨姆纳和史蒂文斯等人来施展的，现在失去了这一渠道，道格拉斯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也不如先前那么大了。共和党现在已被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金融寡头所控制，从此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心支持黑人的事业，已把主要兴趣转到如何保持对全国政权的控制和经济利益上来。如果能够同南部的寡头达成妥协，保持对南部的资源掠夺，就没有必要为黑人选票操心了。1877年妥协就是这样达成的。

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轻易获胜也有道格拉斯个人方面的原因。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道格拉斯尽管仍然是黑人最可信赖，

也是威望最高的领导人，黑人也仍然把他当作领导自己争取自由和平等斗争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道格拉斯并未能利用他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为黑人说话。虽然早在 1870 年 7 月 16 日，道格拉斯在给萨姆纳的一封信中表示，要完全实现宪法第十四条和十五条修正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消除有色人面临的新的苦难。^[34]他为此还承担起办一份新报纸——《新国家时代》的艰苦工作，要为有色人消除所遇到的困难和不公。它提出响亮的口号：“自由人、自由土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人人拥有选举权、人人拥有教育权、人人得到公平工资。”但是，道格拉斯远未能做到这一点。1874 年 9 月，《新国家时代》因得不到黑人支持而终于关闭。1891 年，道格拉斯写道：“黑人之所以不支持这份报纸，是因为它比白人办的报纸和出版物给读者（指黑人）的东西都要少，而花费却更多。”^[35]

土地是确保黑人经济独立的关键和基础，道格拉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 1867 年激进派重建时期，道格拉斯就曾对重建纲领中没有给黑人土地的缺陷提出批评。他指出，黑人如果没有土地，就只好依赖旧奴隶主，从他们的前主人那里租种土地，他们将不得不干最多的活，拿最少的工资。^[36]当时国外对此时期的很多评论，包括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对美国处理黑人土地问题的态度也持批评态度，他说他在解放俄国农奴时的所作所为，超过了林肯对黑人的作为，因为他不仅解放了农奴，而且还给他们以上地。1879 年沙皇对一位美国人沃顿·巴克顿说他困惑不解，“你们美国人怎能如此盲目行事，让黑人奴隶两手空空去拯救自己”。^[37]但是，道格拉斯并没有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瓜分前奴隶主庄园，发给黑人地块，只是要求国会给予黑人以较好的条件购买土地。为此，道格拉斯提出了“国有土地及贷款公司”的计划，准备给购买土地的黑人提供帮助。但就是这样一个计划在当时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共和党多数——金融和工业领导集团眼里也太激进了，因而被拒绝。从此以

后，道格拉斯对黑人土地问题再也没有提起过。

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道格拉斯与黑人逐渐失去了联系。从 70 年代开始，道格拉斯的主要收入来自演讲。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请他演讲要提前几个月预订。演讲费一般为 100 美元一场，要是连续几场，可得 500 美元。他曾经在 3 个月赚取 3700 美元。^[38]正是由于他不了解黑人的实际情况，他反对 70 年代末开始的黑人向北移民的运动。

由于有关黑白种族平等的民主试验事实上已经停止，为了逃避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得克萨斯州白人的恐怖主义和经济压迫，数以万计的黑人逃往堪萨斯，指望能在那里取得政治民主和经济独立。一位从事殡仪工作的黑人本杰明·辛格尔顿领导了第一次大迁移运动，他率领 7000 名黑人从肯塔基和田纳西到了堪萨斯。在 1879 年的第二次大迁移运动中共有 6 万名黑人农民从密西西比河河谷下游涌向堪萨斯。也有一些人到了俄克拉何马准州。^[39]这些人的苦难使人们大为震惊。大多数人认为移出是对南部压迫的合法反应。黑人领袖如加尼特、索琼纳·特鲁思、理查德·T·格林、约翰·M·兰斯敦、乔治·T·唐宁等人都赞成移民运动，只有道格拉斯一人表示反对。他后来承认：“在我 40 多年为我的种族的自由和福利思考和工作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发觉自己像这次这样与其他黑人领导人分歧这样巨大，这样惨痛。”然而，他同时又宣称：“我也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样基于理性与必要而更好地坚持自己的立场。”^[40]

对国内移民，道格拉斯自有一套理论。虽然他本人把为着冒险或提高自己生活目的移民看做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黑人也是具有“超常精力，富有进取心的民族”，但是当数以千计的南部黑人为了提高自身的生活和自由平等而移居堪萨斯时，道格拉斯却起来反对，认为这不明智，也不合时宜；虽然他也承认应由黑人自己决定是否移民作为解放自己困境的方法，但他还是反对大规模的移民，

他认为黑人遭受的苦难和压迫是“暂时的例外情况”。^[41]

道格拉斯这种看法表明他对黑人的苦难是多么无知。随着他对情况的了解，他也在转变对移民的看法。1886年，他认为，南部黑人如果想从他们的民权和政治权利受到侵犯的地方转到这个国家其他能得到更好保护的地方去，也许是可行的。道格拉斯为此还提出一个充满幻想的计划，要求政府或慈善团体动用大约100万美元帮助黑人离开劳动力过剩地区，把他们安置到需要劳力的地方去。1888年3月他到佐治亚实地考察了黑人的境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才改变了对移民的看法。他说那里的现实使他欢迎任何摆脱现在困境的方法。^[42]

第三个方面的个人因素在于道格拉斯过分的乐观主义，道格拉斯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黑人的事业是正义的、它随着文明和进步的进展而进展，总有一天，黑人会真正获得自由。他说：“革命有时好像在向后退，反动的倾向和力量也许会阻挡进步的车轮，南部的有色人也许还不得不忍受过去那种鞭打和刺痛，但仍然还有力量 and 影响在悄悄但却强有力地起作用以把他解放出来。”他还说：“南部各州是很强大，但全国更为强大，对公正、荣誉、自由以及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也许似乎在沉睡，但它们没有死去。”^[43]

道格拉斯认为，同过去黑人为争取自由所受的巨大障碍相比，他们就没有必要为眼前的进展不大而抱怨了。“被解放的自由民不是一点进展也没有，相反，他们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不仅能够站起来，而且能够站得很稳。”^[44]道格拉斯还援引独立战争为例说，被压迫人民从奴役奔向自由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苦难和艰辛使英裔美国人强大起来，苦难和艰辛同样也会使非英裔美国人强大起来”。^[45]

这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不仅使他淡化、甚至忽视黑人遭受的苦难，而且使他对南部白人种族主义的广度和深度严重低估了。虽然从长远来讲，道格拉斯的乐观主义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时过分的乐

观也使他削弱了眼前的斗志。他对共和党的过分迷恋也部分来源于他的过分的乐观主义。

道格拉斯总是相信美国总统及其他政治家会遵照宪法行事，保护其治下的任何地区人民的民权和政治权利，共和党是黑人的党。的确，曾经有一度，黑人与共和党合作得很好，正是由于这种合作，奴隶制度才被废除，黑人才得到公民权、选举权和 1875 年民权规定的权利。但是，随着共和党日益成为财富和大企业的工具，它对人道主义和道德的关心，尤其是对黑人利益的关心在削减。由于 1877 年的妥协，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政府听任南部肆意剥夺黑人已取得的权利。但是道格拉斯对此似乎是视而不见，他把改善黑人地位的希望仍一味寄托在共和党身上。直到 1886 年，道格拉斯仍然说，“虽然共和党并不完善，为黑人所做的远不够，但它仍然是我们最好的政治盟友”。^[46]正是由于对共和党的迷恋，他非但不敢起来作应有的斗争，反而不得不吞下许多难咽的苦果，其中最难咽的恐怕是 1877 年妥协这颗苦果了，他当时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虽然道格拉斯否认自己事先知道这一出卖黑人的计划，但是，有迹象表明他是知道的。因为海斯在 1877 年 2 月 18 日的日记中写道：“有迹象表明我要去华盛顿。昨天我与弗雷迪·道格拉斯和波因德克斯特先生就南部问题谈过了。他们俩都是有色人。我告诉他们我的观点，他们同意了。道格拉斯先生就这一问题给我很多有益的启示。我的方针是严格确保南部有色人根据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所取得的权利，并准备恢复南部所有人的权利，而不管其以前的政治行为如何，只要他们现在跟随我，并支持上述原则就行。”

为了能让海斯上台执政，道格拉斯没有公开批评 1877 年妥协。然而这一妥协给被解放的黑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道格拉斯晚年注重个人发展和提高，接受联邦政府职务，也是影响他作为黑人领袖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道格拉斯认为个人的开

迁荣辱与种族的升迁荣辱是一致的。他在支持俄亥俄州黑人彼得·H·克拉克竞选国会议员时说：“一些像彼得·H·克拉克这样的人升任国家的重要职位在摧毁有色人过去遭受而且还将继续遭受的可鄙的、令人憎恨的偏见方面，将比满车的宣称人类平等的高尚决议更有价值。”^[47] 基于这种思想，道格拉斯自己也积极谋求官职。1868年他就请萨姆纳帮他谋求驻海地公使一职，但没有成功。萨姆纳认为他留在国内更有利于黑人的事业，道格拉斯才放弃这一想法，从而专心致力于黑人选举权运动。在保障黑人选举权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后，道格拉斯又燃起当官的念头。1874年3月，道格拉斯终于被任命为自山民银行行长，1877年至1881年任哥伦比亚特区美国联邦法院执行官，1881年至1886年又担任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记录官，1889年至1891年任美国驻海地公使和圣多明各代办。

道格拉斯是美国有史以来取得地位最高的黑人，他的升迁也的确给黑人极大的自豪感。黑人们称颂他为“我们民族最杰出的，他是这个国家我们民族的最好代表”。在1877年春天的日子里，街上的黑人只要碰到道格拉斯，就会向他脱帽致敬；贺电、贺信如雪片般地飞来。道格拉斯的老朋友西奥多·蒂尔顿在纽约给道格拉斯的信中，兴高采烈地写道，“世界变化多大！你真不能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哪一个联邦法院执行官的职责不是以追捕逃奴为乐事！……对我而言，道格拉斯当选首都华盛顿地区的联邦法院执行官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伟大证据，它的意义比亚伯拉罕·林肯、以撒·基或是雅各当选为耶路撒冷市长更为伟大。你所受的荣誉当之无愧，上帝会保佑你！”锡拉丘兹市的哈蒙德则写道：“我认为参议院会是你更为恰当的职业。”^[48] 一位来自路易斯维尔的人则说，他的厅堂中悬挂有查尔斯·萨姆纳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画像，现在他要把道格拉斯的画像边框以桂冠装饰，“因为道格拉斯的任职是黑人解放事业的一个伟大胜利”。^[49] 有的历史学家说，道

格拉斯担任官职其意义“不仅在于他比其他美国人升到更高的位置，而且在于他最后在白人世界里以白人的条件获得了完全承认”。^[50]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它标志着黑人在担任官职上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但是他个人的成功并不代表黑人整体的成功，正是在他升迁的时期，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由于他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对黑人的事业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关心了，尤其是当他远在海外之际，对黑人的事业更是发挥不了什么影响。所有这些对他作为黑人领袖的角色都是极大的打击。

根据道格拉斯的一生的活动，到内战结束时为止，他一直是生气勃勃的废奴运动领袖，对于美国奴隶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内战结束以后，尤其是重建结束后，虽然他继续为黑人解放斗争奋斗不已，但他的斗争热情逐步衰退了。不过，他为黑人解放事业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依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注释：

[1] “值得作诗和歌唱的一天”，1862年12月18日在犹太教堂的讲话，见菲力普·S·方纳主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A Day, For Poetry and Song,” Remarks at Zion Church, Dec.18, 1862, Douglass Monthly, Jan., 1863. Philip S. Fone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Vol.3），第三卷，第311页。

[2] 乔治·M·弗雷德里克森著：《白人头脑中的黑人形象》（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white min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187—188页。

[3]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6页。

[4]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0页。

[5]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306页。

- [6]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306—307 页。
- [7]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160 页。
- [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308—309 页。
- [9]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160 页。
- [10]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313 页。
- [11]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162 页。
- [12] 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第 386—388 页，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163 页。
- [13] 曼宁·马拉堡著：《种族、改革与造反》（Manning Marable, *Race, reform and rebelli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第 7 页。
- [1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312 页。
- [15] 同上书，第 314 页。
- [16] 同上书，第 315—316 页。
- [17] 同上书，第 316—317 页。
- [18]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0—121 页。
- [19]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 321 页。
- [20]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 190 页。
- [21] “时代的需要”，1871 年 4 月 6 日《新国家时代》（“Demands of the Hour”，*The New National Era*, Apr. 6, 1871），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24 页。
- [22]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Philip S. 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4），第 324 页。
- [23] 同上。
- [24] 曼宁·马拉堡著：《种族、改革与造反》，第 8 页。
- [25] “黑人为什么遭私刑”（“Why is the Negro Lynched?”），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503—506、492—493 页。
- [26] “对黑人没有出席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的原因的一点说明”

(“Introduction to 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 Exposition”), 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474 页。

[27] “黑人为什么遭私刑”(“Why is the Negro Lynched?”), 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501—502 页。

[28] 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503—504 页。

[29] 同上书,第 495 页。

[30] 同上书,第 504 页。

[31] “致德·威特·米勒先生”, 1892 年 1 月 22 日(To Mr. De Witt Miller, Jan., 22, 1892), 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 477 页。

[32]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274 页。

[33] 同上书,第 304 页。

[34] 同上书,第 276 页。

[35] 同上书,第 312 页。

[36] 同上书,第 253 页。

[37]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斗争简史》,第 119 页。

[38]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313 页。

[39] 曼宁·马拉堡著:《种族、改革与造反》,第 8 页。

[40]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Frederick Douglass, 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2), 第 428 页。

[41] “本杰明·科兹的信”(“The Letter of Benjamin Coates, Esp.”), 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五卷,第 416 页;第四卷,第 322—334 页。

[42] “南部的野蛮”(“Southern Barbarism”), 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437—438 页。

[43] 沃尔多·E·小马丁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思想》(Wadlow E. Martin, Jr., The Mind of Frederick Douglass, London, 1984), 第 73 页。

[44]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第 503 页。

[45] “论黑人从三角洲地区各州的迁出”（*The Negro Exodus from the Gulf states*），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334—335 页。

[46] “南部的野蛮”（*Southern Barbarism*），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430—431 页。

[47]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 323 页。

[48] “政治对黑人是罪恶吗？” 1871 年 8 月 24 日《新国家时代》（“*Politics an Evil to the Negro?*” *The New National Era*, Aug. 24, 1871），菲力普·S·方纳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第 274 页。

[49]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Dickson J. Preston, Young Frederick Douglass, Baltimore, 1980*），第 181 页。

[50] 同上书，第 179 页。

第六章 先驱者之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取得了胜利，南部成了种族隔离制的社会。美国黑人解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虽然道格拉斯在 1895 年的逝世使他未能在有生之年扭转这一逆势，领导黑人继续朝向争取自由平等的目标前进，但是，继道格拉斯之后，一代又一代的黑人领袖和人民并没有停止斗争。相反，他们在道格拉斯黑人解放思想精神的指导下，前赴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同道格拉斯生前参加过的废奴运动一样，20 世纪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道路也并不平坦，同样历经曲折，也同样出现了黑人解放的道路之争。不过，最终，依然是道格拉斯开创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占了上风，占据主导地位。凡是合乎这一思想原则的理论和行动就能得到黑人群众的支持，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凡是不合乎这一原则的就得不到黑人群众的支持，因而归于失败，不能取得有效的进展或进展很小。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权运动中，合法主义改革原则指导黑人群众取得对白人至上主义的重大胜利果实，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终被废除，黑人在重建失败后被剥夺的权利基本得到恢复，并且有所扩大。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道格拉斯的思想不仅过去适应了道格拉斯自己那个时代的美国客观环境，指导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现在依然适合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在可预见的将来，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还将继续指导美国黑人把争取完全自由、平等的斗争深入下去。

第一节 20 世纪美国黑人的解放运动

· 从塔斯克基到尼亚加拉

当道格拉斯在 1895 年去世的时候，南部的种族隔离制的社会已基本形成，到 20 世纪初得到进一步发展，南部已不是敌视黑人的唯一地区，在北部的一些大城市，白人中的无赖、恶棍也经常成群结队地袭击黑人。黑人遭受的苦难愈益深重。20 世纪的头一年便是以发生一百多名黑人遭受私刑的惨案而悲惨地开始的，几乎每天都发生两个种族间的冲突，两个种族的人民都生活在紧张气氛之中。对黑人来讲，新世纪似乎意味着更多的暴力和更多的流血。

同道格拉斯在世时的情形差不多，对黑人处以私刑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黑人男子是强奸犯，他们玷污了白人妇女的贞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4 年里，共有 1100 多私刑案件，其中有 315 人被指控强奸或强奸未遂。^[1]其他理由有谋杀、抢劫、侮辱白人及其他违法行为。但是，对黑人施行私刑的理由实际上很多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目的只是想煽动起对黑人的种族仇恨，引发反对黑人的种族暴乱，为剥夺黑人选举权、自由迁居权等权利，把黑人永远置于低下地位，为白人服务。

以黑人是强奸犯为借口煽动对黑人的骚乱的例子最突出的有两个。一个发生在南部的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另一个发生在北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斯菲尔德市。1906 年 9 月，在亚特兰大市发生了南部最耸人听闻的暴乱。该市是南部黑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之一，1900 年已达到 35700 多人。黑人的生活十分悲惨，工资微薄，就业困难，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有的根本没有房子住，只好露宿街头或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子中。但是种族主义分子还是经常欺侮迫害他们。1906 年 9 月，佐治亚州议会扬言要修改州宪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引起广大黑人的不满。为压制黑人的反对，白人

种族主义者利用报纸煽动种族仇恨，发表加剧反黑人情绪的文章，一个编辑号召恢复三 K 党，另一个编辑竟然在亚特兰大悬赏搞“私刑聚会”。22 日，几家报纸制造谣言，刊登了黑人连续四次强奸白人妇女的消息，借以耸人听闻。在这样的煽动下，白人开始袭击他们见到的每一个黑人。他们甚至跑到亚特兰大市郊的布朗斯维尔的两所黑人大学——克拉克大学和加蒙神学院闹事。白人警察对此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以那里的黑人持有自卫的武器为名逮捕了他们，有一名法警在行动中甚至向黑人人群开枪，一名警官用枪托把加蒙神学院的院长 J·鲍恩打倒在地。暴徒受到鼓舞，他们胆大妄为起来，对黑人的财产进行了大破坏。四名黑人被杀死。许多黑人受伤，黑人的住房被抢劫和焚毁，一连几天，整个城市陷于瘫痪，工厂关门，交通运输陷于停顿。许多黑人变卖了财产，离开了此地。暴乱持续了六天，在冲突中，黑人在自卫时，打死打伤法警各一名。虽然有一些白人承认这是他们的耻辱，并且谴责了暴徒们，而且一批负责的黑人和白人公民聚集在一起，组成亚特兰大市民联盟，为改善社会状况和防止新的暴乱而工作，但对这次暴乱中的暴徒未作任何追究。

1908 年 8 月在林肯的故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北部骚乱。一位电车售票员的妻子说她曾被一个人从床上拖下来强奸了。她指证那个人就是在附近工作的一个黑人，名叫乔治·理查森。于是，理查森被逮捕入狱。但是在巡回法庭（即联邦上诉法庭）上，该白人妇女又宣称与理查森无关，她在特设的大陪审团面前承认，她曾被一个白人狠狠地打了一顿，但她拒绝透露那个人是谁。此案显然是一种诬告，但是，种族主义分子们仍无理取闹，阴谋杀害理查森。作为预防措施，当局把他和另外一个与杀害某个白人有关的黑人一起送到附近的城镇，他们在那里坐上到布卢明顿的火车。但暴徒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聚众闹事，持枪行凶。他们先是捣毁了一家饭馆，因为是用该饭馆老板的车运走

黑人的。然后，暴徒们开始横扫全镇。

他们袭击了旧货店，抢劫了枪支、斧头和其他武器。他们放火烧了一栋楼房，因为这个楼里有一家黑人开的理发店。他们把理发师带到理发店的后院处以私刑，然后拖着他的尸体游行。在准备焚尸的时候，从迪凯特来的民兵驱散了他们。第二天夜里，一个同白种女人结婚已经有 30 多年的 84 岁的黑人，在离议会大厦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被处以私刑。州政府出动了 5000 多名民兵在街上巡逻以后，才恢复了秩序。在整个事件中，许多黑人住宅、商店被捣毁，数名黑人被杀害，80 多名受伤者中大部分是黑人，2000 多名黑人被迫离开该城。^[2]不过，被指控为暴徒的首领们，却都逍遥法外。黑人被处以私刑的地点离林肯的故居不到半英里路，离林肯最后安息的地方不到两英里。白人种族主义者就是以这种邪恶的态度来迎接黑人的解放者——林肯的一百周年诞辰日的。

除强奸罪名外，杀人也是煽动对黑人施行种族暴行的一个很好的借口。1904 年 8 月，在佐治亚州的斯特茨博罗镇，有两个黑人被指控残酷地杀害了一个白人农民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这两名黑人在萨凡纳被“监护”两周以后，被带回斯特茨博罗受审。结果，他们被定罪并被判处绞刑。在对这两名黑人进行宣判的时候，已经聚集起来的暴徒涌上楼去，一队萨凡纳民兵“慎重地照顾到他们的情绪，步枪没有上子弹”。暴徒们在压制住民兵后，闯进法庭，把两名黑人拖了出去，活活地烧死了。这只是对黑人实施恐怖主义的一个信号。暴行很快蔓延全镇。一名黑人因为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而受到重重的鞭打。另一名黑人“按一般原则”挨毒打。一个刚生下婴儿三天的母亲受到拳打脚踢，她的丈夫被杀。黑人的房屋被捣毁，无数吓坏了的黑人离开了该地。虽然听说要惩办为首的暴徒，但却不见行动。^[3]在北部的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1904 年，由于一名黑人在口角中杀死一个白人军官，也发生了一起大肆迫害黑人的骚乱。一群暴徒先是聚集起来，闯进了关那个黑人的监狱，

并在监狱门口杀死了这个黑人，把他吊在一棵电线杆上，还用枪把他的尸体打得全身是洞，然后，他们就开始捣毁该城整个黑人居住区。他们干完之后，有八座建筑物被焚毁，许多黑人挨了打，其他人逃走了，而且一去不复返。

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暴行，联邦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但对黑人反对种族暴行的行为却严厉惩罚。1906年8月，由黑人组成的第二十五团的三个连卷入了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的一次暴乱中。西奥多·罗斯福根据一个视察员关于黑人杀死了该城的一些公民，并使另一些人致残的报告，便不留情面地解散了整个营，还取消了该营成员在美国军队和文职机关中任职的资格。此举被参议员蒂尔曼称之为“行政上的私刑”。^[4]罗斯福的决定得到参议院的支持，不过罗斯福在少数参议员的要求下，在1907年1月撤消了不许被解职的士兵担任文职的命令。直到1972年，在事件发生将近66年以后，国会才取消了不光彩的解除黑人士兵职务的指令，并且恢复该团黑人成员在军中的名誉，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已经死了。

在白人至上主义肆虐，种族压迫之下，黑人毫无政治权利，也没有社会地位。在经济上，黑人取得的成就也少得可怜。在南部，由于没有钱购买土地，大多数黑人仍然以重建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租佃制和谷物分成制等形式从事农业活动。1880年时他们占全部黑人的75%以上。事实上很多人不过是劳动力而已，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更大的本钱。他们的劳动只换得微不足道的工资。190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农业工人每月收入10.79美元，纽约州的农业工人每月收入则为26.13美元。有些人是每周或每月拿工资，另外一些则是按季度来拿工资。后一种做法是为了把工人留在农场里，直到他们把农作物收割完毕后才让他们离开。^[5]黑人即使有钱也难买到合意的土地。奴隶制被摧毁以后，白人把土地看做是他们唯一的重要资本投资。他们不愿把土地卖给黑人，不愿意让黑

人在南部享有土地占有者的权利。1914 年以前，黑人农场主数目一直很小。在南部，1900 年黑人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50%，拥有 158479 个农场，而南部白人拥有 1078635 个农场。而且，在 1890 年前，对黑人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采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方法的教育。其结果导致黑人的生产力低下，对于出售农产品和购买必需品问题一般都很无知。尽管黑人农民努力让自己适应农业经济，但对很多人来讲，农场仍然失去了吸引力，前邦联分子重新掌握权力，间隙性的农业萧条，受到地主和富人不公平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对待，以及在城市和国内其他地区有很多机会的谣言，都鼓励黑人从南部农业区大量迁出。成千上万的黑人离开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和佐治亚州，到北部和西部去。有些则迁入南部的城市。这种迁移在 1879 年就已开始，曾引起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内的黑人领袖之间的争论。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及黑人在城市聚集区的扩大，黑人工人的数目也有了扩大。据统计，在 1900 年，美国有 2 万家黑人企业，到 1914 年，增加了一倍，达到 4 万家。同时期黑人殡葬业从 450 家增加到 1000 家，药店从 250 家增加到 695 家，零售商从 1 万家增加到 2.5 万家。黑人银行业也发展起来，自 1880 年第一家黑人银行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以来，到 1900 年全国已有 4 家黑人银行，1914 年增加到 51 家。^[6]不过，黑人企业，由于资金量较少，在大型工业、百货商店和托拉斯的挤压下，每年都有许多这样的企业破产，另外一些为了不致破产，只好依附于白人垄断资本，充当承包者，代销店或业务中间人。黑人的银行大部分寿命都很短暂，因为黑人的存户和借户所从事的贸易、工业和商业活动的规模都不够大，不足以维持这些金融机构。

黑人工人人数的增加，对他们处境的改善也并没有多少好处。例如，1891 年，南部有 196 个工厂主使用了 7395 个黑人，20 年后，这个数字大大增加，棉籽油榨厂、锯木厂、家具厂，还有铸铁

厂、机械厂和锅炉厂之类的工厂都雇佣了一些黑人。到 1910 年，黑人工人增加到 35 万人以上，但一般都是干人们最不愿干的活。^[7]即使是这些最不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有白人反对雇佣他们。由于白人工人把黑人看做是他们工作的竞争对手，也由于黑人本身也缺乏加入许多行业工会的技术先决条件，使黑人不能进入工会组织。这样，黑人就很难进入那些工会组织发达的“封闭”工厂（即不雇佣非工会成员）工作，在“开放工厂”中，他们也缺乏在工资等经济谈判中与工厂主讨价还价的力量，难于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此外，有些人还坚决认为，黑人从气质上来看不宜于从事技术性的机器工作。1893 年，巴尔的摩《制造商档案》报道，从一份关于雇主对黑人工厂工人的反映的研究报告中可以发现这样的看法：黑人不宜在制造业工作。这些观点虽然并没有确凿的证明作为根据，却使一些制造厂商相信雇佣黑人是不稳妥的。^[8]住在南方城市里的黑人发现，城市生活几乎与农村生活一样令人沮丧。北部城市的黑人工人与此相比也好不了多少。

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成就相比，黑人似乎只在教育方面成就相对大一些。这表现在战后创办起来的学校仍然兴旺发达，不像在政治方面黑人获得的权利只是昙花一现，虽然南方许多白人也反对开办黑人学校，但同黑人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建立的任何其他机构相比，他们似乎更愿意容忍正在发展中的教育机构。同在重建时期一样，教会和慈善家仍然是黑人学校的主要财政支持者。

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这段时期，设立了好几个直接促进南方黑人教育事业的庞大的教育基金会：皮博迪教育基金会、约翰·斯莱特基金会、普通教育基金会、安娜·珍妮特基金会、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会和费尔普斯—斯托克斯基金会。其中，皮博迪基金会，从 1867 年到 1914 年间，为促进南方教育事业拿出 350 多万美元。斯莱特基金会拿出了 100 万美元帮助了 100 多所训

练黑人教师的机构，安娜·珍妮特基金会也拿出了 150 多万美元，派教师到农村去从事工艺劳作教学，并委派专职教师到学校附设部分去教学，还委派了县工作人员，去改进农村的住宅和学校，为改善黑人学校的条件制造舆论，基金会的工作也吸引了其他几个慈善机关拨出捐款。

无论教会一慈善事业和大的教育基金会的目的是什么，不管它们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还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如培养适合工业化生产的合格劳动者，或是为了“让新近获得解放的南方各州人民及其后裔有幸受到基督教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崇高目的，总之，黑人从它们的慷慨捐赠中还是受益匪浅的。^[9]到 1900 年，已有 28560 名黑人教师，同时在校黑人儿童达到 150 万以上，有 34 所黑人院校培训大学人才，更多的黑人进入北部的大学和学院，开始由各私人团体或个人办起来的其他教育机构，后来也被各州接管。到 1900 年有 2000 多名黑人从高等院校毕业，700 多人在学院学习。^[10]到 1910 年统计，在全国 317.85 万多名在职黑人中，知识分子约占 4 万人，包括牧师 17452 人，医生 3077 人，律师 796 人，教师 29485 人，作家、记者 247 人，建筑师 59 人，化学技师 123 人。^[11]

也许正是由于黑人在政治上被剥夺，在经济上成就有限，只有在教育方面获得一些令人满意的成就，鼓舞了一些黑人领袖，所以他们主张，黑人在自己发展的现阶段，要接受一种能够最快地帮助他们在美国社会制度中找到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的教育，才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最有利。布克·T·华盛顿就是这种主张的突出代表。

布克·T·华盛顿（1856—1915 年）是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后第二代全国性的黑人领袖。1856 年布克·T·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种植园，他生为奴隶。获得解放后，全家迁至弗吉尼亚查尔斯顿附近。1872 年，华盛顿在他只有 16 岁的时候来到汉普顿学

院学习。在此就学的三年，他深受该校创办人塞缪尔·阿姆斯特朗将军的思想的影响，深信通过职业教育和体力劳动，黑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

1881年，他被阿姆斯特朗选中，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克基城创办一所黑人职业学校——塔斯克基师范学院，并建立了“塔斯克基社”，这就开始了美国黑人运动历史上的塔斯克基运动，长达30多年。

在塔斯克基运动中，布克·T·华盛顿形成自己的黑人解放思想，并于1895年9月，也就是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去世后半年，在亚特兰大棉业博览会上作了全面的阐述。也就是在这次演讲后，他填补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逝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逐渐成为黑人的代言人，也为白人社会所接受。在他1915年去世之前，白人几乎很少有敢于不征求他的意见而干预种族关系的，而黑人内部对他解放黑人的计划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反对意见，但也未能动摇他的领袖地位。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认为，南部重建最大的失误是经济上的。布克·T·华盛顿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白人至上主义在南部重新崛起，种族压迫日益严重，黑人解放事业出现了似乎不可逆转的挫折时期，主张转向致力于黑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改善，谋求不动产和工业技术，而不要去追求从上面获得更多的国会和州议会的议席，也不要去争取民权斗争。他认为倡导社会平等是错误的，权利和特权尽管很重要，但为行使特权和权利作准备更重要。黑人要作为一个种族在美国站得住脚，首先必须奠定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且一般从合理耕作和占有土地做起。为此，华盛顿认为暂时牺牲政治权利和民权是值得的。他认为黑人站着生活和跪着生活是一样的，种族隔离不算什么，他对此予以认可。他说：“在一切纯属社会性的事务中，我们能够像五个手指那样分开，但在一切对我们的相互进步不可缺少的事务上，我们像一只手一样成为一个整体。”

虽然他承认一个种族如果长期在某种程度上离群索居，“则不能对世界市场有所贡献”，但他还是说，“对社会平等问题进行煽动是极为愚蠢的”。他鼓吹白人应支持黑人获得隔离教育体制。他反对黑人移民，要求他们“就地取水”，投入到农业、机工、商业、家务劳动和各行各业中去获得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要提什么政治权利和民权，“此刻在工厂中有机会挣得一块钱，比起在演讲的剧场花一块钱有价值得多”。^[12]

布克·T·华盛顿根据他在开展塔斯克基运动中取得的经验，认为黑人通过职业培训，掌握一门在南部生存的技能，养成勤俭、耐心和坚毅的习惯，培养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举止，尊重法律并同白人合作来维护社会秩序，终有一天，黑人会用自己经济地位的提高来改变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偏见，从而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布克·T·华盛顿在当时黑人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经济权利的情况下，想从职业教育上入手，使黑人掌握一定技能，在经济方面先行作些改善，为以后在政治、民权方面的改善做准备。这在当时是“唯一能使北部白人、南部白人和黑人这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而这一方案也确实给南部 100 多万黑人佃农带来了好处，改进了整个南部的耕作方法，减轻了体力劳动，相对地提高了生活水平”。^[13]但是，华盛顿以默认黑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屈从地位和二等公民的现实来换取南部白人的宽容和北部大资本家的资助和支持，从长远来讲是不利于黑人自由平等的解放事业的，没有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也很难平等，过去黑人之为奴隶并非他们不劳动。华盛顿的计划充其量也只能是解决黑人现实问题的权宜之计。

到 20 世纪，这一权宜之计显然已越来越不合时宜。比如，华盛顿所倚重的工艺技术教育的类型是非常注重造就一个工匠阶级，但是就在他提倡的时候，这种教育已经过时，他没有理解工业革命对多少世纪以来以工人通过手工劳动所完成的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诚然，砖瓦匠、木匠、铁匠等还是需要的，但他们的作用在工业化

时代已被降低至最小程度。他也认识不到在现代工业中雇佣劳动者的特殊问题。他在谈到有组织的劳动时甚至说，黑人不喜欢“那种似乎建筑在对雇主的一种非个人的敌意上的劳动组织”，他建议对劳工问题采取一种会使主奴传统关系保持下去的做法。^[14]

再比如，布克·T·华盛顿劝黑人留在农村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昂贵的农业机械的出现使贫困的黑人农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也看不到工业城市地区如同对白人一样对黑人也产生了无比的吸引力。而且城市对于发展智力和文化也比在农村有更好的条件。如果华盛顿希望他的黑人同胞得到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机会以便他们被同化和被接受，那么城市似乎更是绝望沙漠里的绿洲。

此外，布克·T·华盛顿学说的理论基础在 20 世纪也不合时宜。他坚持认为，每个人可以掌握他自己的未来，“成功会来到当之无愧的人头上，障碍越大，取得的胜利也会越大”。他在 1900 年组织黑人商业联盟时所持的理论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创造出更好的物品，并以更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他就能支配世界市场；如果一个人生产出有人需要的东西，买者是不会问卖者是谁的。此外，再加上足智多谋、良好的态度、坚定的意志和不倦地辛勤工作的能力，就会得到生意兴隆的报偿。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所讲的自由竞争和政府对企业自由放任主义理论的翻版。到 1900 年，它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站不住脚。“投资数以亿计的纵向和横向的企业联合组织”的发展，“使小木经营者能通过艰苦劳动、勤俭节约而发财致富的思想已不可信了”。华盛顿在制定经济上救援黑人的计划时，对这些现实情况几乎毫不了解。^[15]

正是因为华盛顿的计划有以上的一些缺陷，在 1903 年它就遭到黑人青年代表、学者 W·E·B·杜波依斯（1868—1963 年）的批判。杜波依斯在 1903 年出版的《黑人的灵魂》中对华盛顿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公正的批评，他指责华盛顿的口舌过分偏重经济方面，把人生的更高目标完全遮蔽住了。按照华盛顿的计划培养出来

的黑人即使成功也只是赚钱的工具和工匠，而不是人。杜波依斯认为，华盛顿向南方白人伸出橄榄枝的结果使黑人成为法定的劣等公民。杜波依斯还指出，在现代竞争法则下，无论黑人成为有产者的工匠、商人，还是无产者，没有选举权就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利和生存。华盛顿规劝黑人默默屈服于劣等公民地位长久下去会损害黑人种族的人性，与其劝导黑人自尊勤俭是相矛盾的。华盛顿主张公立初级职业训练而轻视高等教育，但假如没有高等院校的黑人毕业生或老师训练出来的学生，则无论是黑人小学或塔斯克基学院一天也办不下去。

杜波依斯认为，对华盛顿宣传节约、忍耐和对群众的工业训练，黑人应支持他，但对他为南部和北部的不公正行为所作的辩解，对黑人投票权和义务估计不当，对种族等级制度给黑人精神上的损害轻描淡写则必须予以坚决的斗争。^[16]

布克·T·华盛顿放弃政治权的主张也遭到全国黑人委员会的批评，委员会在它 1910 年给英国和欧洲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对布克·T·华盛顿在英国和欧洲散布美国黑人对现状是满意的谬论予以驳斥时说：“我们的人在人们一阵感情冲动中获得了解放，接着仍然是手无寸铁，任凭被惹恼的、一度衰弱的前主人摆布。我们唯一的防卫手段是我们获得选举权，我们运用它以获得内战的真正果实。没有它，我们就要再受奴役，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为自由而奋斗。然而，我们刚要使我们近 2/3 的人摆脱愚昧无知，我们这一代人则刚积累起价值 6 亿元的财富，我们手中的这一选举权在保卫我们民权和财产权已成为愈益必需时，即被武力和阴谋诡计夺走了。”^[17]

到 1905 年，杜波依斯终于与布克·T·华盛顿的黑人解放思想公开决裂，他率领激进的年轻一代黑人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城附近发起“尼亚加拉运动”。从此，杜波依斯成为人数越来越多的黑人的最雄辩的代言人。杜波依斯于 1868 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大巴

林顿的一个黑人村落，其祖先为自由黑人。1888年他毕业于菲斯克大学，189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获得该大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黑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加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参加了由威廉·特罗特和乔治·福布斯于1901年在波士顿创办的《卫报》社团，并成为其实际领袖。《卫报》社团反对华盛顿的投降主义，主张黑人的政治权。《卫报》社团成员成为尼亚加拉运动的核心。杜波依斯为运动的总干事。

在尼亚加拉会议上，与会者制定了一个采取积极行动的纲领。他们要求言论和批评自由，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公民权、经济平等权，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做法，承认人类皆兄弟的基本原则和尊重劳动者。^[18]这一纲领在第二年的哈泼斯渡口会议后发表的宣言中得到重申。由杜波依斯起草的这份宣言中有一段说：

“不得到充分的人权，我们决不满足。我们为我们自己要求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公民权和选举权，除非获得这些权利，我们将不断地抗议，并把美国对付我们的可耻行为告诉给所有的美国人。”^[19]

尼亚加拉运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早在1903年由他写的批判布克·T·华盛顿的《黑人的灵魂》一书中已得到阐述。尼亚加拉运动与塔斯克基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主张权利平等，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积极争取黑人各项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的政治斗争，反对单纯的职业教育。尼亚加拉运动向二十多年来统治黑人解放运动的华盛顿思想提出了挑战，对提高黑人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作用，标志着黑人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尼亚加拉运动得到新英格兰选举权联盟和佐治亚州平等权利联盟这类组织的支持。

杜波依斯把黑人解放的目标又拉回到道格拉斯所指出的争取黑人全面自由平等上，但是杜波依斯主要停留于把注意力放在发展黑人教育上，并且主要在黑人上层，即他所说的“十分之一精英”中活动。他认为一批杰出的受过教育的人才是种族地位提高的关键。

他的运动缺乏群众基础，因而成绩平平。

尼亚加拉运动只存在了短短的五年。为了使黑人解放运动更广泛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在反对以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暴行为蓝本的种族主义高潮的斗争中，获取更大支持，包括杜波依斯在内的尼亚加拉运动的黑人青年激进派、黑人运动活动家响应一些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号召，于 1910 年与他们共同组成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些白人自由主义者由一批知名教育家、教授、时事评论家、主教、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组成，他们中有简·亚当斯、威廉·迪安·豪厄尔斯、艾达·韦尔斯、约翰·杜威、约翰·米尔霍兰和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孙子——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该组织吸收了尼亚加拉运动的主要思想，保证要为取消一切强迫的种族隔离，使黑白儿童受到同等教育，给黑人完全的选举权和实施宪法第十四和十五两条修正案而努力工作，“重新发动为争取民权和政治自由的斗争”。^[20]

会长由波士顿的穆尔菲尔德·斯托里担任，新英格兰著名作家威廉·沃林担任执委会主席。杜波依斯担任宣传和研究部主任，负责协会的机关报《危机》杂志的创办工作。这份杂志 1910 年 11 月首次发行，其销售业绩增长很快，到 1918 年每月发行 10 万册。这份杂志对私刑和暴民的法律进行了猛烈抨击。“它处理黑人的迫切问题之得力与它在发行方面的成绩不相上下。”^[21]

在《危机》创刊号上，杜波依斯声明《危机》主张“美国民主的最高理想，主张理智而热情地坚持努力以获得这些权利并实现这些理想”。《危机》成为忠于美国黑人的头号刊物，并且在二十多年时间保持了这一地位。它辟有多个栏目报道黑人的情况，它在“一月人物”中介绍杰出的黑人，在“肤色界限”中刊载全世界种族问题和运动进展的消息。它也刊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每月活动的要闻，同时每年以图片做综述、报道黑人大学毕业生的情况，如获得高等学位的纪录、因成绩优秀而被选为由美国大学优秀生组成

的全国性荣誉组织——PRK 联谊会的成员，以及其他学术成就。有关黑人生活和戏剧的评论也是该刊的重要内容。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改善黑人的状况和反对私刑作了大量工作。在 15 年里，它在最高法院为黑人打赢了三场重要官司。在 1915 年温格诉美国案中，最高法院宣布：马里兰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宪法中的老祖父条款与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相抵触，因而是无效的。在 1917 年布坎南诉沃利案中，法院判定路易斯维尔要求黑人只能住在该城的某些地区的做法违反宪法。在 1923 年穆尔诉登普西案中，法院命令阿肯色州法庭重新审理一起把一个黑人定为杀人罪的案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律师提出的理由之一是：黑人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法庭斗争成为协进会为黑人争取公民权的有效武器，这一斗争一直持续到 40 年代。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后，组织不断扩大，两年之内，它就组建了 9 个分会，到 1913 年更增加到 24 个，1915 年达到 50 个。在 1921 年时已达 400 个。这些分会遍布全国各地，其职责是：一方面为协进会搜集情报，一方面在地方上实现协进会的宗旨。

同尼亚加拉运动一样，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也扩展到了国外。杜波依斯被派到伦敦去参加国际种族大会。在会议期间，杜波依斯广交朋友，澄清了布克·T·华盛顿 1910 年在欧洲所散布的美国黑人对现状很满意的说法。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

在尼亚加拉运动被吸收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之后，1911 年布克·T·华盛顿也与一些白人自由主义者一起，倡议成立了全国都市黑人状况联盟（该组织亦即人们所熟知的后来的全国都市联盟的前身）。哥伦比亚大学一个黑人研究生乔治·埃德蒙·海恩斯和尤金·金克尔·琼斯担任负责人。联盟主要为黑人在工业社会中开辟新的就业机会，并且帮助新来的黑人适应都市生活。联盟在各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负责接待新移民并指导他们寻找工作和住处，向他们

提供有关如何在城市生活的知识。联盟在调整劳资关系、培养从事黑人社区工作人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杜波依斯和布克·T·华盛顿与白人自由主义者的联盟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们的思想，弥补了他们各自的缺陷。但是，他们都只联系了黑人和白人中的一小部分，未能抓住广大黑人群众的思想，赢得他们的支持。倒是这一时期兴起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吸引了许多黑人的注意力。

二 黑人民族主义运动

正当黑人在争取他们的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迎来了一个极好的机遇。首先，威尔逊总统为了骗黑人踊跃参军，向黑人许下甜蜜的诺言，说什么“从这次战争中你们一定能指望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充分的公民权利”。^[22]听了总统的话，黑人一个个精神振奋，他们纷纷参军去保卫“自由和民主”。其次，由于战争造成劳力短缺和经济繁荣，一批又一批的黑人离开了让他们伤心的南部，来到北部“希望之乡”。1920年前有30万黑人迁到北部。20年代后人数更多，仅在1923年头8个月就有47.8万人离开南部。黑人的迁移也的确给他们提供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在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到1930年，北部就业的黑人有1599912人，其中69%在制造、机械和采矿工业部门。黑人产业工人数量突破100万。在南部的250万工人中，产业工人也占有25%。^[23]劳工部也开始重视黑人工人，成立了一个黑人经济司，由乔治·埃蒙德·海恩斯任司长，负责制定计划和政策，以改善黑人工人的状况，并确保他们同白人工厂和雇主充分合作，以取得更大效益。

但是，黑人的希望很快破灭。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也无论是在南部还是北部，黑人没有找到他们的“希望之乡”。黑人不会忘记，在美国国内，正是允诺给黑人平等公民权的威尔逊总统通

过行政命令，在联邦雇员的食堂和厕所设施方面实行了隔离，并且还把黑人从大多数联邦岗位上淘汰掉。在威尔逊总统大叫“新自由”赞歌的时候，针对黑人的私刑和其他暴力活动增加了。三 K 党在 1915 年复兴后，迅速蔓延到南部和北部。三 K 党的暴行主要有鞭笞、用强酸打烙印、涂焦油后粘羽毛、上绞架和用火烧。1916 年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杰西·华盛顿在成千上万的男女的注视下被烧死；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富裕农民由于不同意白人给他棉籽的定价而惨遭毒打，最后被杀害；1917 年，在东圣路易斯城，由于一所罢工工厂雇用了一批黑人工人而引发暴乱，黑人伤亡 175 人，6000 人无家可归；1919 年夏天，在芝加哥、得克萨斯的朗维尤城、阿肯色州的莱因城等地，均发生了大规模的暴行，这些暴行的缘由或因黑人搬入白人聚居区，或因白人嫉妒黑人所取得的经济成就。1919 年夏天的暴乱如此频繁，以至这个夏天被叫做“血红的夏天”。

在国外，美国黑人士兵得到了法国战友和人民的友好对待，他们对自由和平等有了全新的体验。但是，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对此却不高兴。他们自己不给黑人平等倒也罢了，他们还干涉法国人同美国黑人士兵的交往。美国人告诉法国人说：“对黑人是不能以普通礼节相待的，他们是强奸犯，美国人为了使他们规规矩矩才不得不对他们实行私刑，把他们烧死。”1918 年在法国人中流传着一个文件——《有关黑人部队的秘密情报》。文件断言，使黑人和白人保持隔离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黑人就会污辱和强奸白人妇女。如果法国军官在军事交往之外同黑人士兵有任何接触，就会带来不幸事件。^[24]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种族主义者害怕黑人回国后要求在法国享受的平等权利，赶紧派布克·T·华盛顿塔斯克基运动的继承人罗伯特·莫顿于 1918 年 12 月到法国去劝诫黑人，说黑人不要指望在战后能享受在法国那样的自由和平等，黑人应该满足于在国内一直所处的地位。^[25]

美国黑人被号召去保卫世界民主，然而民主却未降临到他们身上，幻灭和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他们。芝加哥《挑战》杂志在描述了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把一个年轻黑人活活烧死后的情况时惊呼：“德国蛮子已经被打败了，但是世界并没有使民主更加有保障。人类得到了捍卫，但是没有提高……我憎恨每一个野蛮人。就我所知，最可恶的是在美国的自由制度下茁壮成长起来的野蛮人。”^[26]不过，黑人也知道，要使美国黑人在美国社会赢得受人尊敬的地位，光靠发泄几句牢骚是不够的，光靠黑人在危机时进行激烈的抵抗也是不够的。必须有明智的计划和切实的行动，必须在政治上发挥影响。为此，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拯救黑人的计划层出不穷、多种多样。这种思潮在文化上表现为“新黑人运动”，政治上表现为“加维运动”，宗教表现为“圣父运动”和“黑色穆斯林运动”。

新黑人运动亦称哈莱姆文艺复兴，或黑人文艺复兴。它在 19 世纪末已初露端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所谓新黑人，是与旧黑人相比较而言的，其区别在于：第一，他们受过教育，有文化素养；第二，生活富裕；第三，具有种族或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已意识到本身存在的价值；第四，时刻准备以自己的知识、财富和教养参加到美国社会中去，坚持已获得的权利，努力获取应得公民权。^[27]

新黑人运动的出现反映了黑人的新觉醒。在他们已经能够用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采取了行动。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们中有的人从事写作以逃避现实，更多的则是为了表达和激发黑人的种族自豪感和尊严，谴责种族歧视。他们并不谋求推翻美国政府，只是抗议这个制度执行得不公正。在新黑人运动中，以哈莱姆为中心，遍及全国，涌现了一大批深孚众望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画家、雕刻家、歌唱家、舞蹈家等。在诗人中，最有名的有兰斯顿·休斯、克劳德·麦凯、詹姆斯·维尔顿·

约翰逊，以及琼·图默等。歌唱家有伯西·史密斯，爵士音乐家有路易·阿姆斯特朗，作曲家有杜克·艾琳顿，舞蹈家有约塞芬·贝克，漫画家有恩奈斯特·克里契楼，雕刻家里奇·巴特。真可谓群星灿烂，盛况空前。

在文艺创作中，最繁荣的当数诗歌。詹姆斯·维尔顿·约翰逊在 1917 年出版了他的《五十年及其他的诗》。这部以签署解放宣言纪念口为主题的诗集首次以诗歌形式表达黑人的民族自豪感，清楚表明黑人决心留在美国并且享受他们的全部劳动果实。约翰逊因此成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先驱。克劳德·麦凯则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第一个重要作家，他以 1922 年发表《哈莱姆的阴影》而闻名全国。他的《非洲》一诗尽情地歌颂了古代非洲灿烂的文化，打发了黑人对往昔的怀恋和民族自豪感。他在《私刑》、《如果我们必须死》和《致白人朋友》等诗歌中，以意味深长的诗句表达了对种族隔离制的仇恨和坚持斗争、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他在《如果我们必须死》中写到：

如果我们必须去死，就不能像猪一样，
被人追赶和圈定在肮脏的地方；让饥饿的疯狗围着我们吠叫，嘲笑我们的命运遭殃。
如果我们必须去死，啊，就让我们死得高尚，
使我们宝贵的鲜血不致白白流溢；
我们虽然死去，哪怕我们蔑视的魔鬼也不得不向我们致意！
啊！亲人们！我们必须抵抗共同之敌！
虽说是寡不敌众，我们要拿出勇气，
以一个致命的打击还他们的一千击。
我们的面前就是打开的坟墓，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勇敢地面对这群嗜杀成性的胆小鬼，

背城而战，垂死也要抵抗到底！^[28]

新黑人运动在提高黑人对自己、对自己的祖先和文化发生兴趣方面，在促进黑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方面，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在新黑人运动中，黑人的形象遭到歪曲，在怒吼的 20 年代，黑人聚居区似乎只看到“欢乐”、“愉快”、“大笑”、“纯朴”的形象。对黑人的现实苦难似乎重视得不够。

在新黑人运动进行的同时，北部一些大城市黑人聚居区的居民在加维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黑人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这就是加维运动。

同新黑人运动一样，它也渊源于黑人的种族自豪、尊严和美感。加维运动的政治组织为“环球黑人进步协会”，是马库塞·加维（1887—1940 年）于 1914 年在其故乡牙买加成立的。1916 年他来到美国。他的政治目标是灌输种族的自豪感，在非洲发展独立的黑人王国，在美国黑人社会中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加维颂扬任何黑色的东西，他认为黑色代表美和力，而不是卑贱，他断言非洲人有崇高的历史，声称黑人应为他们的祖先自豪，不要泄气。^[29]在他的报纸《黑人世界》中，他告诉黑人，种族偏见是白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求助于白人的正义感和白人高唱的民主原则是徒劳无益的。加维认为美国黑人的唯一希望是逃出美国，到非洲去，建立自己的国家。

加维运动借助于民族自尊心，使处于普遍自卑和自馁，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黑人为之一振，尤其是对那些刚刚从农场迁移出来，既未受过教育，也无经验的黑人城市居民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他们追随加维，狂热地称之为自己真正的领袖。到 1920 年的时候，加维号称自己拥有 400 万信徒，三年之后又说增加到 600 万。这无疑是夸大了的数字，据估计，环球黑人进步协会可能

拥有 50 万会员。^[30]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加维积极活动，他呼吁国际联盟准许在非洲开拓一个殖民地，并且同利比里亚展开谈判。他组织了环球非洲人军团，准备以武力返回非洲，赶走白人殖民者。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些辅助性的组织，如环球黑十字护士会，环球非洲人汽车队，黑鹰航空队和黑星轮船公司。加维在 1921 年宣布正式成立非洲帝国，并自任临时总督，由一个君主和君主的最高副手帮助他进行统治。他还册封了一些贵族封号，如尼罗河骑士、埃塞俄比亚卓越服役勋章骑士、尼日尔公爵和乌干达公爵等。非洲帝国崇拜黑上帝和黑天使，以黑（代表种族）、红（代表血统）、绿（代表希望）三色旗为国旗。

加维运动持续时间很短，1925 年加维被以利用邮件进行诈骗罪被捕以后，这一运动像昙花一现般地结束。柯立芝总统于 1927 年赦免了他，但把他当作不受欢迎的外侨驱逐出境。加维后来在牙买加、伦敦等地力图恢复他的“帝国”，但黑人复国主义注定会失败，因为这是不合时宜的。早自废奴运动时代起，美国有色人移民协会就一直在从事这一工作，但一直没有什么成效。无论如何，黑人是不回，也无力离开美国的。这里才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和祖国，这里洒有他们的汗水和心血。加维运动之所以引起广泛注意，与其说是黑人欣赏他的空想计划，不如说是对战后美国国内针对黑人的反动情绪的一种抗议。

在文化、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展开的同时，黑人宗教民族主义运动也出现了。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圣父运动和黑色穆斯林运动。

圣父运动由乔治·贝克领导。1919 年贝克在纽约州塞维尔成立第一个组织。他以上帝之子自居，自称是使徒，后来又自称为圣父，所以他领导的运动也被称为圣父运动。圣父运动本来要致力于消除白人种族主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宣扬黑人优越论。贝克对黑人说：“我是一个黑人，上帝就在我这里，你是一个黑人，

上帝就在你那里，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黑人比白人优越。”他对白人说，只有摆脱了肤色界限和种族偏见，摆脱了种族主义思想，才能在上帝的治理下获得充分自由和正义。^[31] 圣父运动既是宗教运动，也是社会运动，贝克不仅在中西部的某些地区，而且在东部的一些城市都建立了“天堂”——即和平传教区。他在一些富有的白人信徒的支持下，还建立了许多施舍食品、衣物、收容难民、介绍职业的机构，帮助穷苦的黑人。圣父运动在 30 年代最鼎盛时期时，其徒众达 10 万之众。

黑色穆斯林运动始于 1913 年。其发起者为蒂莫西·德鲁（1886—1929 年）。他自称为伊斯兰的“先知”。这一年，他在纽瓦克建立了第一个摩尔人—美国人科学礼拜寺，以后在匹兹堡、底特律、芝加哥等地又建立了礼拜寺，开办一些由教徒集体所有的企业。德鲁宣称，美国黑人是北非摩尔人的后代，北美洲是非洲大陆的延伸，是黑人的土地。1929 年德鲁死后，其门徒之一华莱士·法德发展了他的组织和教义，宣称白人是魔鬼，黑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人类，理应统治世界。它建立了伊斯兰国、军事自卫组织“伊斯兰之子”及伊斯兰大学。在大萧条的时代，法德吸引了大约 8000 名信徒。^[32] 1934 年法德突然失踪，门徒伊莱贾·穆罕默德（本名伊莱贾·普尔，1897—1975 年）取得领导权，他奉法德为真主，自称先知，主张建立单独的黑人国家，以摆脱白人的统治。他还建立了黑人自己的企业，满足黑人自己的需要。其成员主要是城市贫民和不久前刚刚从南部迁来北部城市的黑人农民。黑色穆斯林运动为秘密组织，直到 1954 年才公开。公开后一度有所发展，马尔科姆·埃克斯成为其最有才干、最雄辩的发言人，在民权运动中名噪一时。

圣父运动和黑色穆斯林运动同新黑人运动一样，都是黑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渴望解放的迫切心情，极大地激发了黑人的民族自豪

感，增强了他们反抗民族压迫和歧视的自信心。不过，圣父运动和黑色穆斯林运动的空想主义、分裂主义和黑人种族主义，加维运动的逃跑主义对美国黑人在国内的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并无多大裨益，反而有害。

三 黑人民权运动

在三四十年代，留在美国的黑人，除一小部分被圣父运动和黑色穆斯林运动所吸引，希望把现实很快变成天堂和黑人的乐园外，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利用正常渠道，或者通过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组织，争取改善自身的条件，他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在 30 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由于失业工人增多，全国许多地方黑人加入了“失业联合会”，其首要目标是争取立即救济，其次是争取失业救济法案；此外，联合会还宣扬种族团结。黑人工人也加入产联——即产业工人组织代表大会。这是一个以产业为基础组织的工会，向所有黑人工人敞开大门，改变了过去劳联排斥黑人的现象，黑人又有了一个新的活动舞台，成千上万的黑人加入工会。1945 年，黑人工会会员人数达 125 万人。^[33]另外一些黑人加入了共产党，除在经济领域活动外，还积极发动保卫南部法院中受害者的运动，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审判的斗争做出了有力的贡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继续斗争，又赢得几个与黑人选举权有关的法院审理案件的胜利，开辟了黑人大规模选举权登记运动的道路。其中，1944 年奥尔赖特案最为有名。在这一案件中，法院宣布：把黑人排除在外的民主党“白人初选制”为不合法。在这些胜利的鼓舞下，在 40 年代，黑人进行了广泛的选民投票登记活动。在南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迅速行动，建立了数十个“选民同盟”，他们举办选民教育训练班，带领黑人去法院登记。1940—1947 年间，在南部 12 个州中，黑人选民人数增加了 26%。登记工作做得好的是城市。1946 年，在一些城市，黑人和白人选民数已取得均势。

不过，选民人数的增加依然只是潜在选举力量的一部分，仅仅两个州有 25% 的合格黑人选民参加了登记——俄克拉何马为 29.6%，田纳西州为 25.8%。三个偏远州的比例很低：路易斯安那为 2.6%，亚拉巴马为 1.2%，密西西比为 0.9%。

不过，到 1944 年，虽然在南部黑人选民所占比例很低，但在全国，黑人却取得均势。1944 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布朗内尔说：“南部以外十五个州若有 303414 张选票易帜，就能够使托马斯·杜威州长多获得 175 张选举团票，并以八票多数当选总统了。”布朗内尔所列举的十五个州中，至少有八个州的黑人选票超过了将这八个州转入共和党一方所需票数。

亨利·李·穆恩评论说：“黑人对全国的政治影响，与其说是人多势众，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两党势均力敌或争夺选票的州中的战略分布，因为这些州普选中若有 5% 或更少的选票易帜，就会扭转选举人的投票结果。这些州中，有十二个州的选举团票为 228 张，但可能达到的黑人票数，超过了从这个党转向另一个党所需的票数。在两党极力争夺的各州中，有两个州投了共和党的票——25 票的俄亥俄州和 13 票的印第安那州。其余十个州，即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密执安、密苏里、特拉华、马里兰、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 190 张团票对罗斯福获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势均力敌的州中，普选票数的接近，突出了黑人选票的决定作用。”^[34]

像过去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黑人再一次争取到为国家服务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好机会。在压力之下，罗斯福总统取消了联邦拥有的厕所、自助餐厅、游泳池等设施中的种族隔离，杜鲁门总统则发布行政命令，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黑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许多黑人受雇于国防工业，志愿参加军队。当然，也跟过去一样，他们一开始

遭到拒绝，但战争造成的劳力短缺使那些过去对黑人闭门的企业也不得不敞开大门。1940年冬，75%的国防企业不接纳黑人。但在二战中，仍然有200万黑人工人在国防工厂工作。^[35] 麦克威廉斯在1946年这样说：“尽管继续抵制增加黑人，但是受雇充当熟练技术和领班的人数，1944年比1940年增加了一倍；半熟练技工人数亦增加了一倍。战争开始以来，企业中的黑人女工增加了1/4。”^[36]

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最高法院也一改以往处处袒护白人种族主义的保守做法，在一系列的判决中做出对黑人有利的判决。1954年5月17日的布朗诉教育局案判定在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这实际上废止了它在1895年提出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这一判决对白人种族主义者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对黑人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到5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首都的公共设施方面，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1951年春季以前，华盛顿的戏院、电影院、旅馆和餐馆仍然把黑人排除在外，1952年廉价商店的午餐柜台向黑人开放，1953年游泳馆向黑人开放。这一年也宣布了一项在就业、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1954年，在布朗判决后，特区教育局立即命令学校取消隔离。不过，同北方许多城市一样，白人居民纷纷迁入郊区，并进白人的郊区学校。因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种族隔离的学校仍在增加。

虽然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全国范围内，在所有领域中，这一任务依然是任重道远。也许是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要以向法院起诉的斗争方式感到不耐烦，也许是受到了首都等地争取自由、平等斗争胜利的影响，黑人开始更多地以直接对抗的方式来表示抗议。尽管依然是非暴力，但与以前相比更激进。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

这次运动最杰出的黑人领袖是马丁·路德·金牧师，但引发这次

运动的却是一位普通的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夫人。1955年12月4日，帕克斯夫人从裁缝店下班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因为太累，她拒绝像往常一样把座位让给一个白人男子。结果，她被警察以“擅占白人座位”的罪名逮捕。5日，法院判处她罚金14美元或监禁14天。帕克斯夫人提出上诉，成衣铺将她解雇。此事激起了黑人的极大愤慨。当日晚上，有5000黑人聚会，一致通过抵制公共汽车的决议，并成立“蒙哥马利市协进会”来领导斗争。马丁·路德·金是协会的总指挥。在该市官员和白人民众领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4.2万名黑人男女每天走路上班，傍晚走路回家，或租赁汽车代步。蒙哥马利市总人口才12万，黑人便占了40%，而黑人是公共汽车的主要乘客，约占2/3。公司为了维持下去，只好提高票价，减少班次，裁减雇员，每天损失达2000多美元。与此同时，抵制者还向公司提出要求，公共汽车管理员应保证有礼貌地对待黑人，做到先来者先坐好位子，黑人从后向前坐，白人从前向后坐，在主要是黑人乘客的线路上，应雇用黑人司机。

在抵制运动中有90多人被捕，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牧师和“蒙哥马利市协进会”主席以及抵制运动发起人E·D·尼克松。运动开始后一年，在1956年12月，最高法院判决在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为非法，市公共汽车取消种族隔离，黑人于12月20日召开群众大会，决定停止抵制运动。次日，罗莎·帕克斯夫人搭乘了该市的首班汽车。从此，已经就座的黑人再也不用担心有白人来迫使他们让座了。至此抵制运动方告结束。帕克斯夫人成为“民权运动之母”，由于其在民权运动中的特殊作用，1999年11月29日，美国副总统戈尔授予罗莎·帕克斯夫人国会金质奖章——这是美国平民所得的最高奖赏，底特律交响乐团为已届86岁的她举行了专场音乐会。

在蒙哥马利事件中，马丁·路德·金牧师声名大震，闻名全国，成为新的全国性的黑人领袖。他所倡导的非暴力哲学成为五六十年

代的民权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哲学可以归纳为五个特点，也可以说包含五个方面的含义。首先，非暴力抵抗并非一种懦夫的手段，它是一种抵抗。他认为，非暴力的抵抗方式并非一种消极抵抗。“虽然从对敌人不作肉体上进攻的这种意义说来，非暴力抵抗者是消极的，但是他的思想与感情却总是积极的，持续不断地争取使敌人认识到错误。这一手段在肉体上是消极的，但在精神上是非常积极的，它不是对恶势力的消极不抵抗，而是对它积极的非暴力抵抗。”第二，非暴力的特点并不是谋求击败并侮辱对方，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了解。非暴力行动者以不合作或抵抗表达他们的抗议，以启发敌人的羞耻心，“而目的是拯救和重归于好”。非暴力的后果是创立一个博爱的社会。第三，进攻指向的是恶势力，而不是指向犯罪的人。“如果非暴力抵抗者想要击败的不是罪恶，而是为罪恶所害的人，那也是罪恶的。”如果非暴力抵抗者要反对种族歧视，他应高瞻远瞩，要看到白人和黑人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两个种族间的矛盾，而是由于正义与非正义、光明势力与黑暗势力之间的矛盾。第四，非暴力运动者要宁愿受难而不实行报复，忍受敌人的打击而不进行反击。因为“受难存在一种使人们获得巨大教育和转变思想的可能性”，对改变敌人，对启发他们不闻真理之音的心灵来说，比起弱肉强食的法则来，肯定具有更大的力量。第五，非暴力手段不仅避免对外部躯体的暴力行为，而且也避免对内在精神的强暴行为。非暴力抵抗者不仅不消灭敌人，而且不憎恨他，因为“非暴力抵抗者坚决认为，在为人类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中，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不应受惑于抱怨寻仇，不应沉迷于结冤怀恨。采取种种报复行动除了在人世间加剧已有的仇恨之外，毫无用处”。^[37]

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的事件还一下子点燃了最近数年发展起来的此类行动的烈火，全国的黑人因此行动起来了。

首先，在教育领域，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继续鼓动黑人把孩子送

到公立学校去。在 1957 年 5 月 18 日，布朗案判决一周年纪念日，由北部和南部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发起争取黑白混合学校的“香客朝圣”行动，约有 3.5 万人参加。此为第一次群众性示威的联合行动。此后两年，还举行了多次争取黑白混合学校的青年进军。1959 年，一份有 40 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到众议员查尔斯·迪格斯手里，要求总统和国会制定一项保证有步骤地加快进行黑白混合学校的计划。

其次，学生由“沉默的一代变成愤怒的一代”。1960 年 2 月 1 日，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工艺学院的 4 名学生，到沃尔夫百货商店的饮食部用餐柜台前坐下来，要求买杯咖啡喝，但白人服务员拒绝提供服务，并命令他们走开。黑人学生们驳斥了这种无礼要求，继续坐在柜台前。以后每天如此，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静坐反抗运动很快得到南部广大黑人学生的支持，在几个月之内便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扩展到有大学的十几座南部城市。在田纳西、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等州，成百的黑人青年仿效格林斯博罗的榜样，涌入当地白人开设的饮食店，要求享受和白人一样的待遇，不然就坐着不走。为了使静坐有序进行，学生们还设置了纠察，建立了从上到下的指挥系统，利用步话机在市区各静坐的抗议小组和黑人区指挥所之间进行联络。

学生静坐运动遭到当局用警犬、水龙头、逮捕来对付。从 1960 年到 1963 年，在南部各地，近两万人在历次直接的示威运动中被捕。这一形势激发了北部人民的支援行动——在与种族隔离的南部各联络点挂钩的北方分会和指挥部前设置了纠察线，并筹集资金以保释被捕人员。北部学生也卷入到运动中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 1960 年 4 月开始工作，它由南部十几个抗议地区的代表组成，它是许多北方学生组织和抗议行动的先驱。

静坐运动的目标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如公共图书馆的“静读”示威、剧院中的“静站”示威、汽车快餐店的“停车”示威、

游泳场所的“涉水”示威、教堂的“静跪”示威，以及海滩上的“静浴”示威等。

群众性是这次运动的特点。在南部 12 个州，参加的人计有 20 多万。^[38]在许多地方，成立了全市范围的委员会。例如在纳什维尔，在 1963 年春天，该市组织了多次群众性的示威活动，要求该市成为开放市，即在全市一切公共设施中取消种族隔离。^[39]成年人加入这一由学生发起的运动，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们被学生在受辱骂、遭棍打、被催泪弹射击、被囚禁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所鼓舞。二是“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SCLC）的组织和领导。该组织成立于 1957 年，当时是作为在交通领域争取取消种族隔离斗争的领导机构而组建的。马丁·路德·金为其主席，非暴力哲学为其指导思想。它的出现，正如 L·D·雷迪克在《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历史》中所写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是蒙哥马利市协进会的后裔，”“在另一种意义上，‘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是马丁·路德·金在蒙哥马利市抗议运动中闻名全国之后，在组织上必须的推进手段。为了不挫伤公众的热情，以及为了不限制这位新的发言人只对一个地区起作用，出现一个全南部的机构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40]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最强大的基地是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市等。

马丁·路德·金一直很关心学生静坐示威运动。早在其 1960 年兴起之际，金博士就在“学生非暴力临时协调委员会”会议上与学生们进行商讨，并向学生抗议运动的领袖们演讲。这个委员会由“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执行书记伊拉·J·贝克于 1960 年 4 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组织起来的，它接受金博士的非暴力哲学为指导思想。1960 年 10 月，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它发表声明指出：“我们确认，非暴力哲学或宗教的理想是我们目标的基点，是我们信仰的前提和我们行动的方式。”^[41]

除了静坐示威外，学生们还对长途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组织“自由乘客”运动。南部各州在长途汽车上、候车室、检票口、厕所等地都实施了种族隔离。1961年5月4日，7名黑人和6名白人从华盛顿分乘两辆长途汽车南下，他们声称此行的目的是向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挑战。他们在汽车上实行黑白混坐，并使用专为白人准备的候车室和厕所。自由乘客的人数沿途不断增加，引起南部恐慌。当汽车到达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的时候，立即有3人被当地警察以“行为不轨”的罪名逮捕。14日，当自由乘客到达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时，200个白人暴徒手持锁链、铁管、棍棒、匕首等凶器围住汽车，狂呼乱叫，让自由乘客下车。因为自由乘客在车内静坐不动，所以暴徒便向车内投掷一枚燃烧弹，迫使自由乘客下车。他们一下车，暴徒们便上前行凶。一个黑人被打倒在地，12个自由乘客因重伤被送往医院。当自由乘客到达蒙哥马利的时候，7名乘客和4名当地黑人运动领导人被捕。24日，自由乘客进入密西西比州，即由大批警察“作送”，但到达终点站杰克逊车站时，这些警察却一个也不见了。暴徒们乘机行凶。自由乘客有27人被捕，法院以破坏秩序罪判处每人监禁66天，罚款200美元。从5日到12日，仅密西西比州就逮捕了300名自由乘客。^[42]

学生们也为黑人选民登记工作作了大量的努力。“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种族平等大会的青年们离开大学校园，深入南部黑人居民区工作，努力说服那些被慑服的黑人走上白人的法庭，进行选民登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动有1964年发起的“密西西比之夏”和组织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等。这些活动配合了“南部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工作，促进了黑人的政治觉悟，并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教育和职业训练，从而为他们能顺利地投身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北部的一些基金会为这两个组织，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几个地方选民同盟的选民登记工作提供资金。

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制的斗争在1963年到达顶点。这一年4月

3日，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首先点燃斗争的烈火。伯明翰市有黑人24.2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4%，但该市除公共交通外，各方面都对黑人实施歧视。黑人在斗争中提出要求：取消在餐厅、学校、公共场所以及招雇职工、工资等方面的歧视，成立黑白混合委员会解决这些问题。黑人们在5月2—3日，6—7日，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当局进行镇压，逮捕2000多人。州政府向伯明翰市派出配有催泪瓦斯、轻机枪和卡宾枪的骑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派出代表，要求与黑人进行谈判。8日，伯明翰市政当局在与示威者进行谈判的时候，竟然逮捕了马丁·路德·金等20多名黑人领袖。此举更激怒了广大黑人群众，他们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在黑人斗争的压力下，白人种族主义者被迫于9日同意了黑人的三点要求：闹市区的商店向黑人开放；向黑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成立黑白混合委员会，研究消除各种公共设施中的种族隔离。但是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不甘心失败，他们在11日向黑人的商店投掷炸弹，再次引发黑人的抗议集会，警察出动镇压，历时5个多小时，直到12日凌晨才停止。肯尼迪总统闻讯后，指示国防部长命令“受过控制骚乱训练的武装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同时派遣2000人的武装部队前往伯明翰市郊待命。^[43]

伯明翰黑人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黑人的响应和支持。5月5日，华盛顿500名黑人在白宫前示威，抗议伯明翰警察的暴行；13日，费城、纽约州新罗切尔、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等地的黑人纷纷举行示威，声援伯明翰黑人的斗争。据司法部统计，仅19日到25日一周内，在黑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就爆发了40多次示威。示威运动在8月28日向华盛顿进军中达到高潮。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黑人共计25万人，从华盛顿纪念碑出发，分成两路游行到林肯纪念堂。一路上“立即自由”、“我们要工作”等口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肯尼迪政府如临大敌，除派大批军警监视外，还指派30架直升飞机作为空运“增援部队之用”。同时，肯尼迪还接见了发起

这次示威的 10 个黑人组织的代表，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

黑人抗争的声势和力量、黑人选票的重要性使得民主党政府对黑人的问题比以前更关心。黑人选票的重要性在 1944 年的选举中就已显现出来，这点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在 1960 年的大选中，肯尼迪以微弱多数当选，黑人投民主党的百分比是很高的。这一比率在芝加哥的黑人选区是 80%，在费城是 82%，在哈莱姆是 77.7%。

联邦政府对黑人问题比以前更关心还有一个原因是：数以千计的黑人青年唱着歌拥挤在南卡罗来纳州奥林吉伯格扣留营的景象通过电视迅速传遍全世界，使得美国黑人不仅成为美国国内注意的中心，而且为全世界所瞩目。美国急于修补自己的形象。

1963 年 6 月 11 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一次讲话中宣称，歧视黑人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说：

“为了促进和保护所有希望自由的人们的权利，今天，我们承担着世界范围的斗争。在美国人被派往越南或者西柏林的时候，我们并不光要白人到那里去。

“因此，无论属于何种肤色的美国学生应该有可能进入他们选择的任何公立学校而无需军队为其后盾。无论属于何种肤色的美国消费者，应有可能在一切公共设施如旅馆和餐厅、剧院和零售店中，受到平等的对待而不致被迫诉诸街头示威。

“无论属于何种肤色的美国公民，应有可能在一次自由的选举中登记和投票而不致受到干扰或要对其进行极度的威胁。”

肯尼迪呼吁国会“作出其在本世纪尚未完全做出的承诺，使种族差别在美国的生活和法律中不占任何地位”。⁴⁴

经过黑人的抗争，民权运动取得丰硕成果。到 1961 年有 200 个城市取消了种族隔离，1962 年 9 月州际运输中的种族隔离被禁止，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民权法案以取消种族隔离，保障黑人的选举权等公民权利。

1957年的民权法案是重建结束以来第一个民权法案，它授权司法部用禁令对付那些干预黑人投票的行为，并为此设立一个民权委员会来调查民权问题；1960年的民权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派出审查员保障公民的选举权；1965年民权法案授权司法部长在他认为当地负责选民登记的人不能履行职责时，可以派出联邦检察员对符合选民资格的黑人进行登记；废止文化测验及其他类似做法；1964年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禁止在选举中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由剥夺公民选举权，1966年最高法院首次援引这一修正案。通过这些民权法案，南部黑人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从1964年的100万人增至1968年的310万人。^[45]1964年，黑人在许多市政会议中获得席位，1966年有97名黑人州议会议员，16名国会议员，克利夫兰、洛杉矶、加里和纽瓦克等城市的市长和塔斯克基等十几个南部小镇的负责官员都由黑人担任。^[46]黑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64年民权法废止了大部分公共膳宿场所的种族歧视，要求在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中取消种族歧视，对不照办者将终止计划或撤回联邦资助经费，禁止雇主和工会实行种族歧视，设立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授权教育局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帮助各个社区取消学校中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1964年，南部公立学校中的黑人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9.2%，1968年上升到40%，两年后，有300万黑人学生在黑白混合学校读书，占黑人上学人数的84.4%。^[47]1968年民权法案则禁止在住房中实行种族隔离。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认定这些法律符合宪法。

至此，由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开创的黑人解放事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而漫长、反复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还不能说是完全的胜利。自由平等的原则在法律上的障碍已经被扫除，在道义上已经站住了脚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由于几百年的奴隶制度和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造成的伤害和对白人的消极影响，

种族不平等的幽灵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而且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俗、心理意识、道德等各个领域。制度上的种族歧视可以一举消除，但是，想要消除心理上的偏见却很难一蹴而就，既需要时间的磨合，也需要黑人与白人两个种族共同的适应、努力、宽容和谅解。黑人争取真正的完全自由和平等的路程依然将是长远而艰难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立法障碍被清除后，马丁·路德·金仍然必须领导像 1964—1965 年间的塞尔马黑人选民登记斗争。这种斗争同 1964 年选举法通过前一样遭到镇压，在 1965 年 1 月 19 日后的两周内竟有 1800 名黑人被捕，到 2 月 14 日止，被捕的黑人达 3500 人。马丁·路德·金本人一贯倡导非暴力，但是他本人却在 1968 年 4 月 4 日被暴力的子弹夺去了生命。对许多黑人来说，这一暴力行动意味着白人的美国拒绝了他们对平等的强有力的但又是和平的要求。

在金博士去世前，他也认识到消除事实上的种族歧视和改善黑人贫民的经济状况，应该成为民权运动的下一个目标。1964 年哈莱姆地区黑人暴动后，金虽然不赞成这种斗争方式，但他写到：“只要黑人发现自己还在富裕社会密封的贫困之笼中苟延残喘，只要黑人发现象征主义的逆风和白人权力结构的小恩小惠还在阻挠他飞往自由，那么暴力和动乱的危险就迫在眉睫。”^[48]正是如此，金博士在塞尔马进军后，开始把民权运动推向新的方向。1966 年，他领导并参加了芝加哥开放住房的运动；1967 年，他筹划在华盛顿发起大规模的贫民运动；1968 年，他支持孟菲斯清洁工人的罢工，并在那里为黑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 黑人民族主义与黑人权力运动

由于对非暴力主义运动所取得的进展有限，或对其所取得的法律成果转变为现实成果时间太长越来越丧失信心或失望，黑人内部

对非暴力主义越来越不满，一部分人便转向暴力主义。于是黑人民族主义和黑人权力运动应运而生。

黑人权力一词最早出现在 1966 年夏。那时，在参加了 6 月份的密西西比“反恐怖进军”之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新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认为，游行示威和进军等传统办法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黑人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褫夺公权的处境。他和其同事认为从黑人政治权利这个想法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干部威廉·里克斯把这个概念概括为“黑人政治权力”，简称“黑人权力”。新闻界抓住了这个新口号。于是，“黑人权力”一词迅速传遍美国各地。后来更形成一场震撼美国的运动。

黑人权力运动源于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的再次复兴，其先驱者主要为罗伯特·威廉斯，其意识形态鼻祖是马尔科姆·埃克斯。罗伯特·威廉斯曾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尤尼恩县分会主席，在 50 年代末期组织了北卡罗来纳门罗城黑人米复枪会，主张暴力革命，他因使用暴力保护“自由乘客”而与当局严重对立，后被迫离开美国，先后在加拿大、古巴和中国居住。埃克斯本来是黑人穆斯林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 1952 年已成为伊斯兰教“真主的使者”伊莱贾·穆罕默德的信徒。1954 年被任命为哈莱姆区第七号清真寺的教长，1963 年成了第一个全国性教长。但是，他与黑色穆斯林组织拒绝参与一切政治或社会方面的实干活动、光说不做的政策不同，他是主张行动的。因此在 1963 年 12 月他被穆斯林停职。马尔科姆·埃克斯自称是黑人民族主义的门徒，他谨慎地把黑人民族主义解释为组织一个黑人争取自由、公正、平等而战斗的运动。他说，黑人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这样一种设想：黑人应当控制自己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因此，他把黑人民族主义与通常的民族自决概念相提并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手段是暴力革命。

1964 年 3 月 12 日，马尔科姆·埃克斯提出以暴制暴的主张，

并于 1965 年成立“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以一切手段为非洲裔美国人赢得自由、正义、平等和尊严。埃克斯认为，要有效地打击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剥削制度，黑人必须团结一致。

埃克斯认为，种族合一主义是对黑人的欺骗，黑人并不比白人低劣。他主张由黑人来控制黑人社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但他又认为，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下，白黑人来控制黑人社区，并不意味着能摆脱压迫。所以，黑人必须脱离美国而独立。

1965 年 5 月，埃克斯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这个国家的制度不可能给非洲裔美国人以自由。这个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这个政治制度，总之，这个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要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黑人在这个国家里现在就不可能得到自由权利。”^[49]埃克斯主张改变美国整个制度，并且声称“革命从来就不是用左脸也送上去挨打的办法来进行战斗的。革命从来也不是以爱你的仇敌以及为那些恶意利用你的人祈祷等等为基础的。革命从来不只是空喊‘我们将征服敌人’就行的。革命只能立足于流血的战斗”。^[50]这一思想的矛头所向明显是对准金博士的非暴力思想的。

埃克斯把激进的白人当作可能的同盟者，但又对他们有很大的疑虑。他把非洲黑人当作最大和最可靠的盟友。由于他把黑人看成是美国国内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主张把美国黑人的斗争国际化，和世界上大多数被压迫、被蹂躏的人民打成一片，把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提高到争取人权的国际斗争的水平。他还认为国际资本主义正在被逐渐击败，并正在为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他不仅在美国，而且在非洲许多国家宣传其思想。他的思想对美国城市聚居区的黑人很有影响。60 年代美国黑人城市造反运动与此不无关系，埃克斯实际上可以说是城市黑人造反运动的精神领袖。

1965 年 2 月 13 日，他被人暗杀。埃克斯去世过早，以至于他没有来得及构想出一个更为完整的行动纲领，组织起一批能干的、可以继续干下去的骨干队伍。这一任务是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

会、种族平等大会、黑豹党等组织来完成的。

埃克斯的思想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所继承。学生们认为有些黑人领导人的态度不够强硬，可能安于不完全的平等状态。他们对大多数官方人员也失去了信心，而且看到联邦人员与地方领导人互相勾结起来损害黑人的利益。他们感到法律软弱无力，而当法律强硬有力时，官员们又不会去实施。由于对平等的理想幻灭，学生们感到悲观失望。大学生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按照传统的斗争方式争取平等是徒劳无益的。1966年新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表达了与埃克斯同样的思想。他认为，种族合一只不过是白人至上的一种托词，黑人是作为一个集团受到压迫的，要摆脱这种压迫，黑人也必须作为一个集团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卡迈克尔认为，黑人权力在政治上的含义是黑人作为一个集团而不是作为个人合一到美国社会中去，这意味着黑人集合起来选举代表，并迫使这些代表为黑人说话。在经济上，黑人权力意味着独立的自给自足的黑人企业制度，意味着黑人同心协力，让黑人的钱流到黑人社会里，造福于黑人社会。同埃克斯一样，卡迈克尔也强调黑人应当保持自尊和自信，黑人也可以用枪支来保卫自己，甚至可以展开游击战。他也把黑人社会看成是受美国剥削的殖民地，把黑人的斗争视同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地运动。但他并没有埃克斯走的那么远，卡迈克尔只是用谨慎的语言表达出含蓄的革命思想，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而提倡社会主义，他也不如当时流亡在中国的罗伯特·威廉斯所鼓吹的暴力革命的立场。

卡迈克尔坚持黑人必须根据“黑人权力”来思考问题，并运用“黑人权力”同镇压他们的“白人权力”作斗争。但同埃克斯一样，卡迈克尔对在国内寻找同盟军的问题上感到迷惘。他希望能找到数量上重要的一部分白人成为黑人同盟者，他认为穷苦的白人也许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希望看到穷苦黑人和穷苦白人终于联合起来。”但在他的文章隔了几行以后，他又

写道：“穷苦白人到处变得更加（不是少一些）敌视黑人了，部分地由于他们看到国家的注意力集中到黑人的贫困，而没有人注意他们。”^[51]

卡迈克尔的思想体现出革命和改良兼而有之的特点，这反映出黑人中产阶级的信心不足和态度暧昧。不过卡迈克尔思想的模棱两可反而让他有了更多的追随者，无论是城市黑人造反者还是暴力革命家，无论是黑人文化民族主义者还是黑人民族资产阶级都被他的黑人权力学说所打动，并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解释。

黑人权力的思想为种族平等大会所认可。1966年种族平等大会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举行全国会议，表示赞同黑人权力。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有一部分指出：“黑人权力就是有色人种在自己区域里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自决。权力是指对我们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从上到下的完全控制。”^[52]1966年种族平等大会通过黑人权力的决议，表明它不再把种族合一作为这个组织的目标，而以“通过黑人权力达到种族共存”作为目标了。不过，虽然这次大会决议中还有这样的词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历史上只有在围绕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才曾经把大量黑人动员起来，如马库斯·加维和穆斯林那样。”⁵³但种族平等大会所坚持的民族主义与正统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罗伊·英尼斯所鼓吹的新民族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它只能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左右摇摆。正统的民族主义者要求黑人掌管一块分开的黑人领土，而英尼斯却设想出一个由分散在全美国各城邦所组成的黑人国家。但这种骑墙态度没有能维持多久，1968年种族平等大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而分裂。对于暴力问题，种族平等大会也试图采取骑墙态度，巴尔的摩决议敦促“种族平等大会继续坚持直接的非暴力行动的策略，认为非暴力的概念和自卫的概念并不是互相对立的，非暴力意味着不好斗，但是它并不排斥自然的、合乎宪法规定的、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力”。^[54]

在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的发展中，暴力革命似乎更多地占据黑人

权力思想的主体。1967 年就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拉普·布朗就更明确指出：暴力是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美国给予黑人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黑人可以为了自身的权益，用它来结束压迫。^[55]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拒绝白人的帮助，决心在黑人的领导下达到黑人的目的。到 70 年代，一些黑人团体拒绝白人提供支持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过，摒弃白人支持者并没有使它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过于激进反而使这个中产阶级的组织发生动摇。到 60 年代末，“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许多成员离开了这个组织。他们或重返学校，或参加政府组织的向贫困宣战计划，或消极遁世，极少一部分变成了激进暴力主义者。

1967 年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召开黑人权力大会，正式提出黑人权力运动的纲领，要求“把美国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白人的祖国，另一个是美国黑人的祖国”。^[56]黑人权力运动引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名言作为自己行动的理论依据：“那些表示爱好自由却蔑视鼓动的人，是想收获庄稼却不想耕耘；他们想要雨水却不要雷鸣和闪电。他们想要大海却不要汇成大海的众多水流的狂野咆哮。……这一斗争也许是道德上的；也许是物资上的；也许两者都包括；但必须要斗争。……没有要求权力就不会让步。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看一看那些默默屈从的人吧，你会发现他们身上被强加了多少何等严重的不公与屈辱。除非他们奋起用言语和行动或两者一起抵制或还击，这些不公正和屈辱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暴君的暴虐程度是受他们所压迫的人们的忍耐限度所决定的。”^[57]

把黑人权力的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的组织是黑豹党。黑豹党是黑人权力运动中带枪的黑人组织，于 1966 年 10 月成立。它由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梅里特学院两个黑人学生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领导的一个加利福尼亚青年激进派组成。牛顿任主席，西尔任保卫

部长。该党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确定其意识形态是“通过马列主义来阐释”“美国黑人的经验”。^[58]

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种族平等大会等组织相比，虽然黑豹党的领导成员也多是中产阶级，但其成员则大部分是来自造反的黑人区的下层阶级。在某种意义上，黑豹党的领导代表着激进的大学生与黑人区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间的结盟。

黑豹党把自己当作是黑人革命的先锋。它的政见表述在其政纲中。1966年黑豹党提出10点纲领。(1)要自由，要有决定黑人社会命运的权力；(2)要求黑人的充分就业；(3)要求结束白人社会对黑人社会的掠夺，并偿还40英亩地和两匹骡子的过期债务，作为对以前黑人奴隶劳动和大批被杀害黑人的赔偿；(4)要求给黑人适合人居住的像样的居住条件；(5)要求给予黑人那种揭露颓废美国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黑人真实历史和现在地位的教育；(6)要求所有黑人免服兵役；(7)要求立即刹住警察对黑人的暴行和杀害；(8)要求所有关在联邦、州、县、市监狱里的黑人都获得自由；(9)要求所有黑人在交付法庭审判时，像美国宪法规定的那样，在法庭中应由和他们地位相近的团体或者来自黑人社会的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起进行审理；(10)要土地、面包、住房、教育、衣着、正义以及和平。黑豹党的主要政治目标是要在整个黑人殖民地内举行一次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在这里只有黑人殖民地人民才允许参加投票，以便按照黑人的意志决定黑人国家的命运。^[59]黑豹党最能言善辩的发言人、宣传部长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宣称：黑人面临的问题是美国资本主义造成的，同时也是种族主义的结果，因此，黑人在斗争中不能忽视任何一方。黑人是被殖民化了的民族。黑人要在白人的母国里爆发革命而且为黑人殖民地获得民族解放。美国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黑人彻底自由，要么美国彻底毁灭。

黑豹党由于休伊·牛顿率领一群带枪的示威者进入加利福尼亚议会而闻名全国。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出现黑豹党的支部。黑豹党

人组织起武装巡逻队，携带来复枪和滑膛枪，保卫黑人社区免受警察的骚扰，成效显著。由于黑豹党人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警察把注意力日益转向黑豹党人本身。有几个黑豹党人被以谋杀、企图谋杀以及其他较轻的罪名被关进监狱。联邦调查局把黑豹党列为头号危险分子和颠覆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到了 1980 年，黑豹党只剩下以往显赫一时的幻影。休伊·牛顿成了一个作家，博比·西尔和其他几个领导人则从事正统的政治活动。同时，埃尔德里奇·克利弗从流亡在外回到国内，为某些过去的指控接受审判。他已变成一个再生的基督福音传教士，从而博得了过去对手们的同情。

在埃克斯、黑豹党等激进领袖和激进组织的鼓动下，也由于把非暴力手段取得的法律成果变为现实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黑人的经济地位尤其没有什么改变，北部城市的黑人在 60 年代中期以后采取了暴力骚乱的抗议形式。在金博士被杀后，就有 100 多个城市发生了骚乱、纵火和抢劫。这是许多黑人对他们的年青领袖被肆无忌惮地杀害所做出的重大反应。在这次事件中，黑人死 48 人，20 万人被捕。不过，骚乱这种自发的、无组织的暴力行动仅仅只是发泄一下黑人心中的愤懑而已。虽然它也震撼了美国社会，但并不能解决黑人所面临的问题，反而给当局镇压提供口实。到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城市黑人造反在美国统治阶级的镇压和软化之下，逐渐偃旗息鼓。

到 60 年代末期，由于民权运动的基本目标都已经实现，民权运动就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加上金博士等民权领袖的遇害，一些组织脱离了美国黑人解放道路的主流，各大民权组织的联盟趋于瓦解。到 70 年代以后，民权运动进入一个低潮期。那种波澜壮阔的斗争景象至今没有再出现过。

不过，黑人对于自己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还是有着充分认识的。1979 年，“人民联合拯救人类组织”负责人杰西·杰克逊就发起“人民联合拯救人类组织争取最佳成绩”运动，竭力施加压

方，以便让黑人在整个社会中得到平等机会和控制黑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72年，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召开了全国黑人政治大会第一届会议，这次会议在诗人勒鲁瓦·琼斯等人的领导下，吸引了2700多名代表，4000名候补代表和观察员。大会集中讨论了对于主要政党的政策，黑人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以及在其中的代表地位问题，汽车接送儿童问题，美国对南部非洲、葡萄牙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以及面临这些问题时该组织应如何处理等意见。会议事项涉及的问题很广，其中包括建立穷人讲坛、为寻求政党代表大会支持的黑人或非黑人候选人提供可靠的保障、选民登记法案大纲、黑人区自治法案等。这次大会是在种族平等的法律障碍被消除后，黑人力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美国政治框架内，在争取平等的运动中采取更为独立、更为鲜明的态度，以便把这些法律上的成果变成现实的一种尝试。它标志着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解放斗争已进入一个更有理性、更有组织的新时期。至今为止，黑人已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日益成熟，成为美国政坛一支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忽视的集体力量。据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说，1992年，克林顿竞选的时候，黑人有82%支持他，约等于克林顿·戈尔所获选票的15%。^[60]黑人的政治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90年代在美国国会山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与黑人议员团商量。1994年由38个民主党众议员和一个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黑人议员团，成为国会中的主要权力经纪人之一，在内政和外交等许多重大事务上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议长助手说：“他们代表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也是严肃的政治游戏参与者。”^[61]

第二节 道格拉斯思想的意义

道格拉斯合法主义改革思想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合法，在宪法范围内行动；二是团结大多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二是积极展开斗争。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它不仅适合道格拉斯生前的美国实际，指导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取得胜利，而且它也适应道格拉斯身后的美国客观环境，对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始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凡是不合乎这一思想的理论和派别，都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因而归于失败；凡是合乎这一思想的理论和派别，则就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取得胜利。

在道格拉斯之后，黑人解放运动到如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思想和理论，每一代黑人为了自己民族的彻底解放都在苦苦探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有的抛开了道格拉斯的思想，寻求另外的道路；有的则部分坚持道格拉斯的原则；还有的则不仅继承道格拉斯的思想，而且还把它发扬光大。由于理论和指导原则的不同，其结果也就各不相同。结果表明，部分坚持道格拉斯思想原则的派别得到了部分群众的支持，取得了部分进展；继承并发扬光大道格拉斯思想原则的派别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支持，取得的成效也最大；那些抛开道格拉斯思想原则的派别则因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最后失败了。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把道格拉斯的思想与其后的黑人解放运动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对道格拉斯的思想的继承与偏离，都是一种事实上的继承与偏离。有的派别虽然引用了道格拉斯的理论语言，但并不是一种继承，如黑人权力运动。它虽然引用了道格拉斯积极行动的理论依据，但却为其暴力革命思想服务，而这是道格拉斯所不赞成的，也违背了道格拉斯所主张的合法原则。因而这不是一种继承；有的虽然并没有引用道格拉斯的理论语言，却仍然是一种继承乃至发展，如民权运动。金博士的非暴力主义抵抗理论语言从字面上来讲，似乎更多的是从印度的圣雄甘地那里得来的，但实质上却是美国的上特产，并非舶来品，因为道格拉斯早已宣扬过这种思想，并且曾经身体力行过，只不过多属个人行为，没有像金博士那样把它发展成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像金博

上这样把它明确地加以归纳整理，作出系统的理论表述。金博上的理论实际上源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的传统理念，在本质上是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继承。

在道格拉斯之后展开的第一个黑人解放运动是布克·T·华盛顿领导的塔斯克基运动。作为道格拉斯之后的又一位全国性黑人领导人，布克·T·华盛顿虽然在战略上仍然属于合法主义改革的范围，但只是部分继承了道格拉斯的思想，因为华盛顿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主张退让、调和，屈从南部白人统治者的意志，要求用沉默或至少不公开鼓动的方式去争取黑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这与道格拉斯思想中的第三项原则——积极斗争主张不符。另外，他要求黑人专注于先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他把重点放在黑人群众的节俭、忍耐和职业教育上。黑人应在政治权利要求上有所节制，应依靠在财产拥有、智力、更高品德的基础上达到其政治权利。只要在这几方面取得进展，无论是文化测验，还是财产资格限制，都不能对黑人有什么不利。很显然，这与道格拉斯主张的争取黑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平等的目标相比也是一个倒退。实际上，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也很难取得平等，即使经济上取得成功，没有政治上的保证，经济成功也是不安全的。一纸法令就可能让一个人一生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对布克·T·华盛顿的这种退让，奥利弗·C·柯利斯教授批评道：“他（华盛顿）不是一个群众的领导，……他的作用更在于控制群众。他削弱、抛弃了他们的共同事业。他为黑人争取的东西比统治者答应过的东西还要少。……像华盛顿这样的领导人是南部统治阶级的奴仆。他们在阻碍黑人民主运动效果方面比白人发言人更好。”^[62]

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差异，两位领导人在回答一个黑人青年的同样一个问题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 1895 年早些时候，住在新英

格兰的一位黑人青年赶到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拜访了正在那里访问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政治指导。在会谈结束时，他问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先生，您经历了新旧两个体制，您有什么话要对一个刚刚开始生活的黑人青年讲吗？他应该怎么做？”道格拉斯抬起头来，回答道：“鼓动！鼓动！鼓动！”在 1899 年，这个青年带着同样的问题去问布克·T·华盛顿时，得到的答案却是：“工作！工作！工作！忍耐，靠优良的服务取胜！”^[63]

布克·T·华盛顿认为，道格拉斯作为另一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也属于另一个时代，不能拿来指导他这个时代的黑人解放运动。华盛顿的这种思想也代表了一部分黑人的想法。1926 年 3 月首都华盛顿的一位著名的黑人牧师弗朗西斯·J·格里姆凯就写道：“坚持我们的权利，坚持道格拉斯倡导了 50 多年，要求其种族得到公正待遇的路线，在当今这个堕落的时代有点吃不开——在我们的一些白人朋友中吃不开，同时也在一些黑人阶级中吃不开。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鼓动的罪恶，说它于事无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损害。”不过，格里姆凯本人认为，道格拉斯的思想并未过时，它依然在指导黑人进行争取自己与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平等权利而斗争。他说道格拉斯曾经指出了黑人解放的道路——即通过不断的努力提高黑人自己，通过对所有限制黑人机会、剥夺黑人的权利的企图进行英勇抵抗。黑人应该坚持这条道路，直到最后胜利。^[64]

当然，道格拉斯本身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做得不够，但他并没有放弃斗争。华盛顿强调经济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放弃了政治、社会平等的要求，一味屈服退让，指望白人的良心发现，而不作积极的斗争，因为他认为道格拉斯那种鼓动和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正如道格拉斯曾经所说的那样：“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那些表示爱好自由却蔑视鼓动的人，是想收获庄稼却不想耕耘；他们想要雨水却不想要雷鸣和闪电；他们想要大海却不想要汇成大海的众多水流的狂野咆

哮。……这一斗争也许是道德上的；也许是物资上的；也许两者都包括；但必须要斗争。……没有要求权力就不会让步。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看一看那些默默屈从的人吧，你会发现他们身上被强加了多少何等严重的不公与屈辱。除非他们奋起用言语和行动或两者一起抵制或还击，这些不公正和屈辱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暴君的暴虐程度是受他们所压迫的人们的忍耐限度所决定的。”^[65]

在与布克·T·华盛顿的退让妥协作斗争的过程中，一场新的黑人解放运动应运而生。这就是杜波伊斯领导的尼亚加拉运动。

W·E·B·杜波伊斯是继布克·T·华盛顿之后的又一位重要黑人领袖。同道格拉斯一样，他也是一个出色的编辑。他倡导黑人的全部权利，并主张为此积极抗争。他说他要用“一切文明与和平的手段”，去“为世界赋予人类的权利作斗争”。^[66]

同布克·T·华盛顿一样，杜波伊斯也认为教育是医治黑人问题的万应良药，只不过他相信第一步不是发展群众职业教育，而是发展黑人精英教育，培养黑人中 1/10 的精英阶层。他说：“黑人种族像其他种族一样，要有它的特殊人物来拯救。那么教育问题在黑人中必须考虑天才的 1/10，这是发展他们种族才干的问题，这些人可以在他们自己和其他种族中指导群众避开毒害和痛苦的死亡。”^[67]杜波伊斯这里也走上了一个极端，脱离了广大的黑人群众，使得他的影响主要在黑人上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里存在。这样便削弱了他的领导力量。这就背离了道格拉斯合法主义改革战略中团结大多数的原则。连黑人解放的主体——中下层黑人群众他都不争取，谈何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尼亚加拉运动取得的成绩甚微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同道格拉斯相比，杜波伊斯行为也有一点倒退，他主要停留在宣传鼓动上，就跟当初废奴运动中的道德说教派一样，说的多，做的少，缺乏具体的行动。另外，尼亚加拉运动存在的期限又太短，他也不可能足够的时间来推行他的计划。

紧接尼亚加拉运动的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运动。这是一个以白人及上层黑人为主要力量而进行的为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杜波伊斯也参与了它的组建和以后的日常工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要进行法庭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分别在 1915 年、1917 年、1923 年赢得三场重要官司的胜利，维护了黑人的选举权、自由居住权和自由平等受审判的权利。同时它也进行为黑人争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权利的宣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它比尼亚加拉运动要前进一步，至少它采取了行动——法庭斗争。

不过同尼亚加拉运动一样，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也只是联络了黑人和白人中的一小部分群体，未能抓住广大黑人的思想，取得他们的支持。这一运动也只是部分地合乎道格拉斯的战略，它虽然有行动，但没有贯彻其思想中第二项原则——团结大多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原则。所以它取得的成绩也不大。虽然它也积极促成了一些诉讼斗争，但毕竟只是法庭斗争，没有把黑人组织起来。没有黑人群众运动作后盾，单纯的法庭斗争解决不了黑人自由平等的根本问题。

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是黑人探索自身解放的有益尝试，但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其中，新黑人运动主要在文化领域进行。在希望“合法斗争”这一点上，它与道格拉斯的战略是一致的，但是它只停留在宣传上，它的弱点在于使黑人沉溺于精神上平等的自我陶醉之中，而不去采取切实的行动，以实现社会生活中的真正平等。新黑人运动本身并不能改变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必须配以其他的行动才有功效。这与道格拉斯的要求显然有一段距离。

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加维运动宣扬逃跑主义，与道格拉斯的思想格格不入。这与黑人主体一直反对的向非洲殖民的运动一样，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其得不到黑人的多数支持，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圣父运动用黑人民族优越论代替白

人优越论，以黑人种族主义代替白人种族主义，也违背了道格拉斯的思想，因为它违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种族合一等原则，没有这些原则，合法主义改革就无从谈起。这一理论必然失去大多数白人的支持，而没有白人的支持，要想在一个白人占主体的社会实现黑人的自由与平等，只能是空想。形形色色的种族优越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是一个毒瘤，都是非常有害的。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和睦共处，吸收别的民族文明的长处，才能获得共同发展。从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人的历史、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人类必须时时牢记在心，永远不忘。

黑色穆斯林运动企图建立黑人独立国家，这同南部分裂国家的举动一样，是违法的，不合乎道格拉斯的黑人解放战略。另外，它也只是谴责白人“魔鬼”而不诉诸政治和社会行动，这也不合乎道格拉斯的第三个原则。它比南部脱离联邦更无成功的希望。

领导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马丁·路德·金既继承了道格拉斯的原则，又保持了道格拉斯的斗争精神。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完全符合道格拉斯合法主义改革思想实质的三个方面。首先，它是在现行制度下的行动，并不谋求推翻美国政府，建立黑人的独立王国，是合法的。其次，团结大多数，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有黑人多数，也有白人同情者。金博士还发展了道格拉斯的战术——这就是非暴力大规模的群众直接斗争，把道格拉斯曾经参加过的“静坐示威”、“自由乘客”等个人行为发展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得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有声有色。事实上，道格拉斯早在 1840 年 9 月 28 日就曾反对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号召非暴力抵抗主义；道格拉斯也曾表示反对的是恶势力，而不是犯罪的人，对于像奴隶主这样的恶人要去爱他、改造他，而不是消灭他。马丁·路德·金对于这些原则与具体做法都给予了继承，使之发扬光大。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既显示了黑人的力量，又能博得一般白人

群众的同情。第三，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是一种积极的斗争形式，并非消极的抵抗。正是因为民权运动的指导原则完全合乎道格拉斯黑人解放思想的战略原则，所以它取得的成就在所有争取黑人民权的运动中最大。民权运动的结果最终打破了种族隔离制的藩篱，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完成了道格拉斯在世时未竟的事业。黑人至少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白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黑人迈向实际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的法律障碍不复存在。道格拉斯开创的黑人争取黑人自由与平等的事业从而被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6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脱胎于2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潮，只不过它把思潮变成了行动。这一时期的黑人民族主义者虽然引用道格拉斯的语言作为其行动的理论依据，但却抛弃了道格拉斯思想的核心部分——合法主义改革原则，主张黑人的独立，分裂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所以，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并不是道格拉斯思想的继承者。

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对于宣泄黑人的不满情绪有一定作用。这一运动违背了道格拉斯思想的第一个原则——合法原则，它想把美国分裂成黑白两个国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是黑人民族至上论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同2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无论是白人种族主义，还是黑人种族主义，都是错误的。白人不应该是黑人的主要敌人，只有白人种族主义才是黑人的主要敌人。黑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分裂国家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被美国人所接受，即使是黑人，大部分也认同美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要在这个国家争取自由与平等权利。美国的民族主义坚持联邦是永恒的，是不可分割的，南部邦联因为冒犯了这个原则而被摧毁。当时南部就是因为奴隶制文化而觉得自己与北部不同，已成为另一个民族，因此，它想脱离联邦，另立国家。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在内战之后，国家的统一更成为一个不可争辩的原则。在六七

十年代，国家统一的原则在美国同样不可争辩。黑人想走南部失败的老路，其结果可想而知。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也一般反对与白人工人阶级结成同盟，并视之为黑人最可恶的敌人。这与道格拉斯的第二个原则也不符合。这一运动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暴力革命论的失败为道格拉斯合法改革主义思想的正确性提供了反证。

在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之后，黑人解放运动在杰西·杰克逊等人的领导下，又回复到道格拉斯合法主义改革思想所指引的正确道路上来。至今依然这样。所以，黑人在近几十年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政治地位，都在不断地提高。

金牧师曾经于 1963 年 8 月 28 日在林肯纪念堂举行的“为工作和自由进军”的集会上，代表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发表了一个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金博士在演讲中期待将来某一天，从前奴隶主的儿子与奴隶的儿子像兄弟般一样坐在同一桌旁，黑人在这个国家受到的评价标准将是他们的品德，而不是肤色。虽然金博士梦想中的乌托邦并未变成现实，但是，他在其中所列举的各种法律障碍在六七十年代被美国总统、政府和法院解除了，美国社会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最后残余被清除。美国黑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如今，美国黑人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水平、工资和总的预期寿命最近几年都明显提高了。往日奴隶的子孙们现在作为医生、律师、参议员、电影和电视明星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实力和影响。其中的许多人作为偶像而受到黑人和白人的崇拜。如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高尔夫神童蒂格尔·伍兹、篮球传奇人物迈克尔·乔丹等。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已经形成。据报道，70 年代以来，美国有 1/3 的黑人成为中产阶级，其中不少是百万富翁。1999 年 6 月 7 日出版的《新闻周刊》认为，现在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黑人从未有过的“黄金”时期：就业率上升、拥有住房和

上大学的人数在增加、受教育的程度在提高、犯罪率下降、领取救济金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在减少。1985年，美国20—24岁的黑人的失业率为24.5%，1998年则下降到了16.8%。在拥有财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黑人在美国政坛上崭露头角。自70年代以来，就任美国政府官员的人数增加了6倍，达9000人。^[68]几个大城市如洛杉矶、芝加哥、费城、亚特兰大、底特律都曾有过黑人当市长。在黑人政治家中，纽约州的国会众议员雪莱·济泽姆曾参加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选，来自芝加哥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曾于1984年和1988年两度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除了有更多的黑人众议员和参议员外，在美国最高法院还出现了两个黑人大法官，他们分别是60年代由约翰逊总统提名的瑟古德·马歇尔和90年代由布什总统提名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在政坛上享有声誉的还有布什时代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他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表现卓越，出尽了风头。

美国黑人运动的胜利的历史证明：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不仅适合他生前的美国客观环境，而且也适合其身后的美国的现实。

当然，迄今为止，我们尚不能说黑人在各个方面与白人已取得真正的完全平等，主流社会的白人的种族主义偏见也没有完全禁绝。白人种族主义者对于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黑人所取得的成果一直心怀不满，例如，对于给予处于竞争劣势的黑人的肯定行动，白人种族主义者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因为“以肯定行动形式给了黑人几乎每一个机会和配额。他们要的不是机会，而是控制整个国家”。白人种族主义者还发出煽动性宣传：“白人由于肯定行动而失去了安全感。它们会拿走一份工作，把它交给黑人。但最合格的人应该得到工作，这是天经地义的。”“每个种族都应有它的权利，但哪一个种族也不能剥夺其他种族的权利并把他们往后推，目前白人

就面临着这种情况。”由这种宣传引发的种族主义情绪在 1995 年前后导致美国南部发生多起针对黑人教堂的纵火事件。^[69]黑人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也同样不满。1995 年 10 月 16 日，马尔科姆·埃克斯的学生、激进黑人组织“回教之国”的领袖法拉甘 (Farrakhan) 号召发起“百万人大集会”，向华盛顿进军。虽然大多数黑人组织并不认同法拉甘的思想，并尽量和这个激进组织划清界限，但结果还是有包括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在内的 40 万黑人从美国各地赶来华盛顿，参加这次集会。这一事件至少说明黑人的不满已到极限，因为黑人的失业率高达 12%，20—29 岁之间的黑人男子有 1/3 因犯罪坐过牢，32% 的黑人高中学生念不到毕业就辍学，49% 的黑人孩子出生在支离破碎的家庭。占美国人口总数 12% 的黑人总于引起美国的注意。^[70]在美国，现在有 33.1% 的黑人处于贫困线以下，39% 的黑人家庭生活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一比例相当于白人的 3 倍。黑人的死亡率和发病率都远远高于白人。有 22% 的黑人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黑人的收入普遍低于白人，黑人的失业率一直是白人的 2—3 倍。在监狱中的黑人远远多于白人，每年自杀的黑人比白人多。尽管目前黑人的收入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失业率也是近 25 年来最低的，但黑人的失业率仍达 8.9%，比白人的 3.9% 的失业率高出很多。尤其是在 20—24 岁的黑人青年中，黑人的失业率为 16.8%，而白人只有 6.5%。一位名为亨德森的社会学家说：“在美国目前高就业的经济中，黑人的失业率还是那么高，说明这个社会还存在严重的问题。”种族歧视的确是美国的痼疾，80 年代以来，因美国黑人受歧视而引发的种族大冲突至少有 6 次，1992 年洛杉矶发生的种族冲突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日常生活中，黑人被歧视、其权利被践踏的事件屡屡发生，黑人经常成为警察施暴的对象。一位社会学家说得好：“对美国来说，以黑人和白人为核心的种族问题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在法律上规定种族平等相对容易，但要在人们脑子中消除种族歧视却谈何容易！”^[71]

但是，黑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取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主流社会得更加开放、更加容忍之外，黑人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努力，促进这种互相包容的精神呢？遗憾的是，黑人似乎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比如，随着黑人地位的上升，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目前这种新现象还是人们忌讳讨论的话题，即黑人的种族主义。它的表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一是从居住区开始划清界限。在首都华盛顿，黑人现在在与白人豪华居住区相对的城市另一端也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高级住宅区；二是有的黑人要求文化上的主权，他们要求把黑人街头英语提升为独立的语言，并且要在学校课堂、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得到应用；三是有的黑人团体甚至号召打内战，建立黑人独立国家。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的一个黑人组织的头目乔克韦·卢蒙巴威胁说：“我们是不会停下来的，直至我们实现对白人美国的独立，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国家。”法拉甘也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在 1995 年 10 月 16 日的集会中，就号召黑人自尊、自立，向白人社会争权益，不惜反抗。他也大骂黑人的解放者林肯，骂历任总统。虽然连黑人也不认真看待这种战争叫嚣，但这种粗暴的语气反映了社会上被煽动起来的一种情绪。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伦唐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裂痕是如此之深，好像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行星上。”而黑人中那些同白人交往过多的人很快被看成叛徒，被看成“汤姆叔叔”（逆来顺受的黑人）；四是黑人依然没有摆脱奴隶制的羁绊和阴影。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0% 黑人要求美国政府为他们祖先受到的不公道道歉。国会中大多数白人议员认为这种要求毫无意义。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这无非是一种纯象征性的东西。”即使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也说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纯姿态”。^[75]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确应该为他们祖先对黑人犯下的罪恶道歉。但是，在黑人这一方，如果老是摆不脱奴隶制的阴影，黑人自己就会把现实中的苦难永远归咎于别人，而不从自身方面去反思。例如，一部分黑人

看到领取救济比他们工作收入还高，他们就宁愿领取救济，而不愿去工作或去接受培训。他们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心安理得，认为这是白人由于不公正对待黑人祖先而对其后裔的应有补偿。这一陋习并且代代相传，陷入一个怪圈。这给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攻击的靶子。南卡罗来纳的基督教骑士团的大龙头霍里斯·金就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抱怨说，非洲裔美国人“把福利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三 K 党员赫伯特·罗威尔告诉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州报》说，黑人教堂教会他们如何领取救济。“你知道什么时候有免费奶酪或牛奶和食物吗？我们是一无所知。但他们总是第一个排队去领。”^[73]五是在涉及黑人的事务中，一味地维护黑人，而不管是否公正。例如，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害自己的白人妻子，在证据俱在的情况下，被一个绝大多数成员为黑人的陪审团宣判无罪。此判决在白人引起强烈反弹，从而加深了黑白两族之间的裂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白人种族主义还是黑人种族主义都是错误的，与现代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地位上升的黑人对始终生活在贫穷、吸毒和犯罪的恶性循环的多数下层黑人缺少同情心。亚拉巴马大学一位黑人学生斯坦·格林伯格说：“对于那些关于奴役和所谓对黑人搞阴谋的没完没了的抱怨，我再也听不进去了。”^[74]

迟至 20 世纪前期，大多数黑人领导人及第一代受过教育的黑人都是很骄傲地标榜自己是“种族人”，他们最关心的是重建他们种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但如今，这种倾向不断被抵制，而且还被诋毁。黑人中产阶级与其种族的认同日益脆弱、无力。他们似乎不再寻求其种族在美国的尊严与融合，只是追求黑人作为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这当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但毕竟只是黑人在美国生活和众多目标的一方面而已。把他们与广大黑人群众连结起来的种族纽带已变得日益宽松，越来越成为一种非自觉的行动。他

们已不再是黑人的领袖，因为他们已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会”。这些黑皮肤的“白人中产阶级”拒绝与黑人大众为伍。而黑人大众由于文化、经济水平低下，无法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会，白人一向也是不愿意他们加入。这样，黑人大众就被美国整个中产阶级所抛弃，只能生活在城市中心的贫民窟，并身陷其中，不能自拔。^[75]黑人社会的分化比以前加剧。如何加强黑人自身的团结，协调其内部本身共同发展，这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这里指出黑人的一些不足之处，并不是为白人主流社会应付的责任开脱。黑白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还有赖于这两个民族的共同努力，怎么才能既照顾处于弱小地位的黑人种族的利益，又能避免其弊端，还能不伤害到白人应有的权利，体现公平原则，做到两全其美。这确实需要好好探讨。

无论如何，尽管黑人已在通向自由与平等的大道上比以前有进展，并且这种进展还在继续向前，但是，黑人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斗争并没有完结，黑人依然要在道格拉斯合法主义改革战略的指导下，把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斗争继续下去。

总之，道格拉斯关于黑人解放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思想在他逝世后一百多年来，为其后来的主要黑人领袖所继承和发展，成为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主流。无论是布克·T·华盛顿和 W·E·B·杜波依斯，还是马丁·路德·金，乃至当今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他们和道格拉斯一样，都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坚定信奉者，都相信人道主义和社会向善论，都相信黑人可以在美国现行制度下获得与白人一样的自由、平等地位，并且把希望寄托在白人的良好愿望上。因此，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无论是华盛顿的塔斯克基运动，还是杜波依斯的尼亚加拉运动，亦或是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都是在赞成现行制度下的行动，而不是诉诸暴力去推翻它。他们既不想把黑人解放运动引导到“回到非洲去”的逃跑主义或在美国建立一个黑人的独立王国的乌托邦幻想道路上去，也不赞成解决黑人问题的温

和而渐进的方法。虽然回到非洲去的加维运动、黑色穆斯林运动、鼓吹黑人革命的黑豹党运动等也都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史上名噪一时，掀起过一阵波澜，但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淹没在合法主义的改革战略的主流之中。它们的功绩在于从反面证明了合法主义改革战略的正确性，同时也从其他方面推动了合法主义改革战略的实现。比如，黑豹党运动就同废奴时期的布朗暴动一样，给美国社会和统治阶级以警醒，迫使其作出代价较低的选择，进行社会改革，满足黑人的正当要求，解决美国黑人自由与平等这一长期困扰美国的社会问题。合法主义改革战略想让黑人融入到现有社会中去。就这一点而言，合法主义改革战略是保守的。但是，就美国具备比较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现实，以及美国统治阶级面对压力和挑战而对其社会做出不断调整改革的可塑性而言，合法主义改革战略对美国黑人解放事业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这已经在美国黑人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斗争历史中得到验证，并且可以预料在将来一定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注释：

[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75页。

[2]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5页。

[3]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375页。

[4] 同上书，第377页。

[5] 同上书，第337页。

[6]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200页。

[7]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340页。

[8] 同上书，第341页。

[9] 同上书，第326页。

[10] 同上书，第329—330页。

- [11]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201页。
- [12]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6页。另见路易斯·R·哈兰著:《布克·T·华盛顿》(Louis R. Harlan, Booker T. Washington, New York, 1927),第218—220页。
- [13] 黄颂康著:“美国对布克·华盛顿的再评价”,见《世界历史》杂志,1981年第4期,第73页。
- [1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336页。
- [15] 同上书,第335—336页。
- [16] W·E·B·杜波伊斯著:《黑人的灵魂》(W. E. B. DuBois, The Soul of Black Folk, New York, 1964),第48—53页。
- [17]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221页。
- [18] 同上书,第224—228页。
- [19] 哈利·海伍德著:《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20页。
- [20]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230页。
- [2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382页。
- [22]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214页。
- [23] 同上书,第222页。
- [24]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402页。
- [25] 同上书,第403页。
- [26] 同上书,第419页。
- [27] 奥古斯塔·迈耶著:《美国黑人思潮,一八八零——一九一五》,1963年安阿伯版,第259页。转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228—229页。
- [2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417—418页。
- [29]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219页。
- [30]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423页。
- [31]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245页。
- [32] E·U·埃森尤顿著:《黑人民族主义》(E. U. Essien - udom, Black

Nationalism, A Search for an Identity in Ame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第 4 页。

[33] 哈佛·斯蒂柯夫著:《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 1954—1980》(Harvard Stikoff,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80, New York, 1981), 第 12 页。

[34] 亨利·李·穆恩著:《力量均势: 黑人选举》(Henry Lee Moon, Balance of Power; The Negro Vote,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48), 第 35 页。另见前引书《美国黑人斗争史》, 第 238—239 页。

[35] 哈佛·斯蒂柯夫著:《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 1954—1980》, 第 12 页。

[36]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 第 236 页。

[37] 同上书, 第 307—309 页。

[38]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 第 328 页。

[39]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 第 278 页。

[40] 同上书, 第 279 页。

[41] 同上书, 第 317 页。

[42]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 第 330 页。

[43] 同上书, 第 331 页。

[44]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 第 7—8 页。

[45] 哈佛·斯蒂柯夫著:《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 1954—1980》, 第 194 页。

[46]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 第 574 页。

[47] 顾学稼、陈必录、姚波、吴文嘉编著:《美国史纲要》,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69 页。

[48] 威廉·米勒:《小马丁·路德·金》, 纽约, 1968 年, 第 206—207 页。转引自刘绪贻、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 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03 页。

[49] 罗伯特·艾伦:《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第 35 页。

[50] 同上书, 第 37 页。

[51] 罗伯特·艾伦:《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第59页。

[52] 同上书,第69—70页。

[53] 同上书,第74页。

[54] 同上。

[55]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第343页。

[56]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中译本),第571页。

[57]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查尔斯·汉米尔顿合著:《黑人权利》(Stokely Carmichael & Charles V. Hamilton, Black Power, Alfred A. Knopf, Inc. and Random House, 1967),前言第10页。

[58] 《黑豹》周刊,1969年11月8日。转自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译本),第566页。

[59] 罗伯特·艾伦:《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中译本),第89—91页。

[60]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11月9日,第27版。

[6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94年5月23日,第36页。

[62]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Philip S. 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1964),第372页。

[63] 同上书,第371页。

[64] 同上书,第373—374页。

[65] “关于西印度的解放”(West India Emancipation Speech, August, 1857)。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查尔斯·汉米尔顿合著:《黑人权利》,前言第10页。

[66] 菲力普·S·方纳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传》,第372页。

[67] 吴泽霖著:《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68] 《环球》半月刊,1999年第14期,第10页。

[69] 吴金平编译:“傲慢与偏见”,载于天津日报编辑部主办《新闻探索》,1996年第六期,第34页。

[70]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10月19日。

[71] 《环球》半月刊,1999年第14期,第12—13页。

[72] 《参考消息》,1997年8月7日,第三版。

[73] 吴金平编译：“傲慢与偏见”，载于天津日报编辑部主办《新闻探索》，1996 年第六期，第 34 页。

[74] 《参考消息》，1997 年 8 月 7 日，第三版。

[75] E·U·埃森尤顿著：《黑人民族主义》，第 2 页。

结 语

道格拉斯不仅是美国黑人的杰出领袖，而且也是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优秀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他总是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1854年7月他在一次讲演中就曾指出，美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是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这句话击中了要害，因为他所说的黑人与白人关系问题主要是指奴隶制问题，而奴隶制问题的确是影响到美国各个方面的决定性问题。第一，它直接牵涉到400万黑人奴隶的命运。第二，它使得南方奴隶主有可能控制南方的政治经济，从而控制全国的生活。第三，它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发展，特别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第四，它使得白人劳动人民的自由遭到不断的进攻。第五，它推动奴隶主贪得无厌地对外侵略扩张。第六，它败坏了美国的科学、文化、道德等。

道格拉斯不但看出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是当代美国最重大问题，而且也为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建议。在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中，他善于针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斗争形势，提出具体的任务。在内战前的历史阶段他提出团结一切反奴隶制力量作为斗争的首要任务。在内战爆发后他提出应该把宣布解放奴隶作为内战的首要任务。在内战胜利结束后，美国面临着被打倒的种植园主集团复辟的危险，他早在1864年10月就提出防止的办法——授予南方黑人以公民权利和选举权。因此，道格拉斯不愧为一位超群出众的战略家和战术家。

不仅如此，道格拉斯也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和演说家。在他的思想里有一定程度的辩证法因素，他的演说雄辩有力，扣人心弦。他在分析和观察事件时，往往能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制约的关系。1865年他在一次演说中说道，剥夺一部分人民法律上的保护，就可能会危及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人们如果把锁链缚在奴隶的踝上，那么就一定发现这条锁链的另一端绕在自己的脖子上。

他还能通过表面现象洞察事物的内在本质。19世纪90年代“三K党”暴徒蹂躏黑人的暴行有加无已，当时有些人把这些罪行的责任完全推到“无知的暴徒”身上，有意给南方种植园主开脱罪责。针对这种情况，道格拉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暴徒只不过是绞刑吏而已，他们只是服从南方舆论，亦即财富和有身份的人、报纸和教唆者一手制造的舆论。

道格拉斯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改革家，他参加了禁酒运动，反对死刑运动，女权运动等诸多社会改革运动，尤其是在女权运动史上，他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在1848年7月间，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召开的妇女平等权利大会进程中，他是唯一起重要作用的男子，此会为美国女权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道格拉斯虽然去世一百多年了，但是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他为黑人解放所定下的合法主义改革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黑人解放斗争的战略原则。因此，我们研究与反思道格拉斯留下的这笔遗产无疑还是十分有意义的。

附录^[1]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年表

1818年2月，出生于马里兰州东海岸的塔波特县，生下来即为奴隶，取名为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华盛顿·贝利，父亲据说是其白人主人艾伦·安东尼，母亲为安东尼的女奴哈丽特·贝利。

1824年8月(?)被送到安东尼的居住地——位于迈尔斯河边的劳埃种植园，安东尼在那儿当监工。

1825年2月14日(?)与母亲最后一次相见，年底或1826年初母亲就去世了。

1825年8月27日，珍妮姨妈和诺亚叔叔逃奔自由，道格拉斯首次意识到逃跑是可能的。

1826年3月，被送到巴尔的摩的菲尔斯岬去休·奥德家做家童。

1826年11月14日，艾伦·安东尼去世。

1827年10月18日，安东尼的奴隶在其儿子与女儿之间被瓜分，道格拉斯被划给了其女儿卢克丽霞，之后，道格拉斯又回到巴尔的摩。不久，卢克丽霞去世，其丈夫托马斯·奥德继承了对道格拉斯的所有权。

1827年，索菲亚·奥德教道格拉斯字母，后来他便学会了拼写并会做一些算术。

1831年(?)，道格拉斯加入了卫理公会，买了平生第一本书

《哥伦比亚演说家》。

1832年7月18日，姐姐萨拉被卖到密西西比，在他童年共有15个至亲被卖到南部腹地。

1833年3月，被送到圣米切尔与托马斯·奥德生活。

1834年1月1日，被送到爱德华·科维那里做田间劳力，其间挨了许多鞭打。

1834年8月，与科维打了一架，以后就再也没有挨打。

1835年1月1日，被雇给威廉·弗里兰做田间劳力。

1836年2月，逃跑失败，道格拉斯与其他密谋者被监禁在伊斯敦。

1836年8月中旬，托马斯·奥德又把他送回到巴尔的摩的休·奥德家。

1836—1838年，在巴尔的摩学做填船缝的手艺，与其未来的妻子安·墨里相识。

1838年9月3日，化装成一个水手逃到北部，安与他于9月15日在纽约结婚。

1838年9月18日，到达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不久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839年3月12日，在新贝德福德黑人会议上演讲反对向非洲殖民。

1839年7月24日，女儿露西塔出世。

1839年，第一次遇见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以及其他废奴主义者。

1840年10月9日，儿子刘易斯出世。

1841年6月30日，主持新贝德福德黑人大会，反对马里兰殖民协会。

1841年8月9日，加里森聆听了道格拉斯在新贝德福德反奴隶制会议上的演讲，为他的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840年9月28日，反对乘坐公共交通中的隔离车厢，倡导非暴力抗议运动。

1841年秋，从新贝德福德搬到马萨诸塞州的林恩。

1841年10月，在林恩第一次演讲中就对南部的奴隶制和北部的偏见同时发动攻击。

1842年1月，在3500英里的旅行演讲后被雇为永久的反奴隶制演讲人，他的演讲吸引了大批听众，他们无不为了他的才能折服。

1842年，儿子弗雷德里克出世。

1842年至1843年，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旅行，多次成为北部种族偏见的受害者。

1843年9月16日，在印第安那州的彭德尔顿遭到亲奴隶制暴徒的毒打，致使右手骨折，但他仍然坚持旅行演讲。

1844年10月21日，儿子查尔斯·雷蒙德出世。

1845年5月28日，出版《道格拉斯自述》，展示了他在塔波特县当奴隶的情景，从而暴露了他的身份。

1845年8月16日，乘坐“冈比亚”号轮船前往英国，被迫乘坐下等舱。

1845年8月27日，当他试图发表废奴主义演讲时，“冈比亚”号上的乘客威胁把他扔到海里去。

1845年8月27日，抵达英国的港口利物浦。

1845年8月31日，前往爱尔兰的都柏林、科克、利麦克、贝尔法斯特作三个月的旅行演讲，宣传反奴隶制和禁酒。

1845年9月底，《道格拉斯自述》在英国发售，销路极佳，大大缓解了在英国旅费困难。

1845年10月25日，托马斯·奥德以100美元把对道格拉斯的所有权卖给了他的兄弟休·奥德。

1846年1月至5月，在苏格兰旅行，反对苏格兰自由教会接受美国南部的资金。

1846年5月至12月，把反奴隶制斗争推进到英格兰，许多英格兰人把他当作名流来欢迎。

1846年10月6日，英国崇拜者集资150英镑（合710美元）从休·奥德手里赎买了道格拉斯的自由。

1846年12月12日，巴尔的摩县法院签署解放文书，正式成为自由人。

1847年4月20日，回到波士顿。

1847年9月底，宣布创办报纸《北极星》报，费用由英国朋友资助。此举受到加里森、菲利普斯等人的极力反对。

1847年12月3日，第一期《北极星》报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发行，以后的20年他一直住在那里。

1848年2月1日，与约翰·布朗相见。对布朗的个性和坚持奴隶制度非以暴力不能废除的言论印象十分深刻。

1848年7月19—20日，参加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是在大会上起重要作用的唯一男子；从此便开始终身为妇女投票权斗争的历程。

1848年9月8日，在《北极星》上发表文章谴责其旧主人托马斯·奥德，说他在自己的外婆柏西·贝利年老时抛弃了她。

1849年3月22日，女儿安妮出世。

1850年5月，在纽约市巴特里大街与两位英国妇女朋友朱丽亚·格里菲思和埃利查·格里菲思并肩行走时遭到一伙歹徒袭击。

1851年5月9日，在政治行动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与加里森发生公开分裂（加里森反对政治行动），以后两人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1851年6月26日，把报纸的名称改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接受富有的、反加里森派政治活动家格里特·史密斯的资助。

1851年9月，帮助3个马里兰逃奴逃往加拿大。道格拉斯作

为“地下铁路”罗切斯特站站长，救助了几百名逃奴。

1851—1858年，日益卷入到政治活动中去，开始与格里特·史密斯的废奴主义自由党联盟，后又支持共和党，1856年支持共和党人约翰·C·弗里蒙特作总统候选人。

1855年8月，出版《我的奴隶与自由生涯》一书，比以前的自述对早年的生活有了更为客观的评述。

1858年2月，约翰·布朗在罗切斯特道格拉斯的家中策划鼓动奴隶暴动的计划。

1859年8月20日，与布朗在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堡一个采石场会见，了解到进攻哈泼斯渡口的计划后，拒绝参加布朗的部队。

1859年10月17日，了解到哈泼斯渡口袭击的消息后逃离费城，经过一个星期逃往加拿大，以躲避因被指控为布朗的同党而来的逮捕。

1859年11月12日，从魁北克坐船到英国，在那里呆了6个月。

1860年5月，在得知11岁的女儿安妮的死讯后返回美国。

1860年12月3日，波士顿纪念布朗被处死的集会被冲散，道格拉斯遭亲南部暴徒殴打。

1861年4月22日，对北部决心武力恢复联邦表示欢迎；预言战争的唯一结果是要么奴隶制被摧毁，要么联邦被摧毁；建议使用黑人部队拯救联邦。

1862年12月31日，参加波士顿特里蒙特圣殿举行的庆祝《解放宣言》午夜生效的集会。

1863年2月至7月，在北部征募黑人部队；儿子刘易斯和查尔斯·雷蒙德第一批应征，一起加入马萨诸塞州第54团。

1863年7月，拜会林肯总统，抗议对黑人部队的歧视。

1863年8月16日，停止出版《道格拉斯月刊》，15年的编辑生涯结束。

1864年8月25日，被林肯召进白宫讨论林肯竞选连任的问题；道格拉斯表示支持林肯连任。

1864年11月，在26年后重返马里兰；在巴尔的摩发表了六场演说。

1865年3月4日，出席林肯的就职典礼，受到林肯的私人致敬。

1865—1866年，在林肯遇刺后，谴责约翰逊的“软弱”的重建计划；带领黑人代表团谒见总统并批评他的计划；赞成激进共和党人计划（其中包括给南部在内的黑人投票权）。

1868年8月至10月，为尤里塞斯·S·格兰特竞选总统活动。

1869年5月，与女权主义领导人决裂，因为她们坚持如果不给予妇女与所有黑人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她们就拒绝支持批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1870年1月，加入《新国家时代》杂志社，任通讯编辑，后来成为编辑，12月12日买下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报纸和印刷厂。

1871年1月12日，任调查圣多明各事务委员会助理秘书；1月18日至3月26日到圣多明各游历；后赞成格兰特吞并圣多明各。

1872年5月12日，被平等党任命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1872年6月2日，罗切斯特的家遭一场无名大火烧毁，许多重要文献丧失；举家迁往华盛顿。

1874年3月，被任命为自由民银行总裁，当时银行已处于财政危机中，不久垮台。

1874年9月，《新国家时代》停刊。

1872年3月17日，被海斯总统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法官。

1877年6月17日，时隔41年后重返圣·米切尔，与托马斯·奥德相见，对黑白混合听众讲演。

1878年，买下位于哥伦比亚特区阿纳卡斯蒂亚的锡达山，面积达15英亩的地产。

1878年11月23—26日，访问伊斯顿，看了他的出生地。

1881年3月，由加菲尔德总统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记录官。

1881年6月12日，重访劳埃种植园。

1881年11月，第二本传记《道格拉斯的生平与时代》出版，1892年再版。

1882年8月，妻子安病故。

1884年1月24日，与从前的白人秘书海伦·皮兹结婚。

1885—1887年，与海伦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和希腊旅行。

1889年7月1日，被哈里森总统任命为驻海地的驻节公使与总领事以及驻圣多明各代办。这一职位一直保留到1891年7月30日，后与国务院发生意见冲突而辞职。

1892年至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做海地的代表。

1893年，宣布成立自由制造公司，主要生产纺织品，地点是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打算雇佣300名黑人。这一计划流产了。

1893年3月，第三次访问塔波特县，据说要在那里买地产安度晚年，但终于没有买。

1894年1月，发表最后的重要演说——“时代的教训”，对南部私刑的泛滥进行了强有力的谴责。

1895年2月20日，在一次女权会议上讲话后归家途中因心脏病去世。被安葬在罗切斯特霍普山公墓。

注释：

[1] 迪金森·J·普雷斯顿著：《年轻的道格拉斯：马里兰的岁月》（Dickson J. Preston, *Young Frederick Douglass*, Baltimore, 1980），第199—204页。

主要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

厄尔·康拉德著：《哈丽特·塔布曼》，三联书店 1979年版。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著：《道格拉斯自述》，三联书店 1988年版。

顾学稼、陈必录、姚波、吴文嘉编著：《美国史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何顺果著：《美国棉花王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卡尔·戴格勒著：《一个民族的足迹》，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三联书店 1978年版。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年），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罗伯特·L·艾伦著：《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

梅里亚姆著：《美国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美国历史文献选集》,1985年。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与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合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著:《约翰·布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亚伯拉罕·林肯著:《林肯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余志森编著:《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美国黑人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詹姆斯·M·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张宏儒、梅伟强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第三分册·近代部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英文参考书目

Allan Nevins, *The Ordeal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47.

Allen Weinstein and Frank Otto Gatell,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68.

Benjamin Quarles, ed., *Frederick Douglass*, Englewood Cliffs, N.J., 1968.

— *Black Abolitionists*, New York, 1969.

Bob Blauner, *Black Lives, White Liv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

C. Vann Woodward,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New York, 1966.

Charles E. Silberman, *Crisis in Black and White*, Random House, Inc., 1964.

Charles Grigg, *Racial Crisis in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1964.

David W. Blight, *Frederick Douglass's Civil War: Keeping faith in jubile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of Press, 1989.

Dickson J. Preston, *Young Frederick Douglass*, Baltimore, 1980.

Douglas T. Miller, *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fight for freedo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 1988.

Dwight Lowell Dumond, *Antislavery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9.

E. Franklin Frazier, *Black Bourgeoisie*, The Free Press, 1957.

E. U. Essien - udom, *Black Nationalism, A Search for an Identity 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Frederick Douglass, *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Written by Himself*, 1892. Reprint in New York, 1962.

— *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 1855. Reprint in New York, 1969.

—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 1845. Reprint in New York, 1968.

— *Frederick Douglass: autobiographie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4.

— *Frederick Douglass: new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 1993.

Frederic May Holland, *Frederick Douglass, the Colored Orator*, 1891. Reprint in New York, 1969.

George M. Frederickson, ed., *William Lloyd Garrison*, Englewood Cliffs, N.J., 1968.

—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vard Sticoff,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80*, New York, 1981.

Henry Lee Moon, *Balance of Power: The Negro Vote*,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48.

Henry Steele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2 volumes, New York, 1958.

J.R. Pole, ed., *Slavery, Race and Civil War in America*,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74.

James M. Gregory, *Frederick Douglass: The Orator*, 1893. Reprint in New York, 1971.

James M. Mcpherson, *The Abolitionist Legacy*, Princeton, N.J., 1975.

Jeanne Grant, *Black Protest*, Greenwich, Conn., 1968.

Joe R. Feagin & Melvin P. Sikes, *Living With Rac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John W. Blassingame, ed., *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

Ser.1, Vol.1 and 2, New Haven, 1979, 1982.

Kenneth M.Stampp,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 New York, 1956.

Leon F.Litwack, *Been in the Storm so Long* , New York, 1979.

Louis Filler, *The Crusade Against Slavery* , New York, 1960.

Louis R.Harlan, *Booker T.Washington* , New York, 1927.

Louis Ruchames, *Abolitionists* , New York, 1963.

Manning Marable, *Race ,Reform and Rebellion* ,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4.

Oscar Sherwin, *Prophet of Liberty,the Life and Times of Wendell Phillips* , New York, 1958.

Philip S.Foner, *Frederick Douglass* , New York, 1964.

—ed., *Frederick Douglass on Women's Rights* , Westport, Conn., 1976.

— *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s* , Westport, Conn., 1975.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 5 Vols., New York, 1950 —1955, 1971.

Stokely Carmichael & Charles V.Hamilton, *Black Power,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 Random House, Inc., 1967.

Vincent Harding, *There is a River* ,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1.

Waldo E.Martin, Jr., *The Mind of Frederick Douglass* , London, 1984.

W.E.B.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 New York, 1935.

——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1964.

William S. McFeely,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1.

W.Z. Foster, *The Negro Peopl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54.

后 记

本人从事美国史的研究始于 1991 年。那一年我有幸进入南开大学，拜陆镜生教授为师。1994 年硕士毕业后又投到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美国史专家刘祚昌教授门下，继续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书便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要取得成功，关键之一要选好题目。本书或者说本论文当初在选择题目的时候可以说费尽了心血。1994 年 6 月 19 日，在正式攻读博士学位前，杨生茂教授便给我提供了一个参考选题——美国在独立战争后是如何争取文化独立的。诚如杨生茂先生所言，“这是一篇大文章，但很有意思，很有啃的必要，其乐无穷”。如能做出，则对我国文化（特别是史学）发展将提供诸多借鉴的东西。我对这一题目很感兴趣，过去也曾读过像诺亚·韦伯斯特和拉尔夫·爱默生这两位倡导美国文化独立的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所以即刻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文献，尤其是 1860 年以前的《北美评论》。可惜得很，有关的资料十分稀缺。于是，只好忍痛放弃了这一选题。

后来，又先后选择了美国独立之初的邦联与联邦体制之争和民权运动作为方向，但都因故放弃。最后，业师刘祚昌先生也给我提出一个参考选题——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也就是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先生提出这个选题有两个考虑：一是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史上的地位特殊，十分重要，而国内对这个选题研究还比较薄弱，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史上的地位不相称；

二是刘先生自己曾经翻译过道格拉斯的传记，达 40 多万字。文稿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给搜走，下落不明。刘先生一直为此而抱憾，虽有心重做此事，但毕竟年岁已高，加之其他研究任务繁重，精力有所不济。所以，先生希望我能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这样既可以将道格拉斯的研究深入一步，又可以满足先生的夙愿。接到先生的提议后，我就开始坐下来阅读道格拉斯的文集和有关参考文献。刚开始，我对道格拉斯的了解并不多，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慢慢深入以后，我才发现这里也别有一番天地，并深深为道格拉斯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在写作过程中，业师刘柞昌先生自始至终都给予了细致而严格的指导。当初，接到先生的提议时，我还有些惶恐不安，深怕完不成任务，愧对先生几年来于我身上付出的辛勤和期望。直到论文答辩通过时，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略感宽慰。

我非常感谢博士论文指导小组的张友伦先生、杨生茂先生、陆镜生先生、李剑鸣先生，正是在他们的关心和多次指导下，本人才最终得以把这篇论文的主旨和线索理清楚，并顺利成文。他们给了我终身受益的教诲，无论是在做学问方面，还是为人处世方面，均是如此。论文通过后，在国外引起良好反应，美国纽约 Garland 出版公司就给列入该公司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丛书，准备出英文版。

我还必须由衷感谢北京外交学院的王德仁教授、苏格教授，厦门大学的王旭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黄安年教授和张宏毅教授等，他们在参加本人的论文评阅或论文答辩中，均提出了十分富有启发、中肯的意见或建议，对本文的修改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其中，苏格先生在评议意见中曾建议我把文稿出版，更使我感奋不已。

本论文最后定稿成书，要特别归功于中华美国学丛书评委会成员之一、南开大学的张友伦先生，他在本书稿中请出版资助的评议

意见中，提出了对本书的详尽而具体的修改意见。

我也要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曹宏举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罗莉女士，他们对本书的书名提出了有益的修改建议，对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此外，现在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工作的师兄弟李一文和韩召颖博士曾帮忙复印了一些资料；现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南开大学学友陈允锋博士也曾帮忙在北京图书馆查对过一些英文书目；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的师弟李晓岗博士曾慷慨惠赠资料。对他们的师兄弟之情和学友之爱，我将谨记在心。

我妻子何立群不仅做好家庭后勤保障工作，而且还分享我写作的辛苦与欢乐，鼓励我完成本书的修改。对她的支持，我无以言表，唯愿能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予以补偿。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华美国学会，它给予我这本书一个资助出版的机会，也感谢福特基金会对中华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赞助。另外，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所有给我支持、帮助和鼓励的良师益友，我也一并致谢。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成绩应归功于业师刘祚吕先生和博士论文指导小组的先生们的教导有方，书中所有的错误与缺失则皆由笔者负责。

吴金平

1999年12月20日

于广州暨南大学南湖苑寓所

序 言

美国社会运动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近年来这个研究室的博士研究生围绕美国黑人问题撰写了几篇博士学位论文，涵盖了美国黑人运动的大部分历史阶段，逐渐形成了一个系列。吴金平同志的这本书就是这个系列中的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所涉及的人物非同一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一位非常有影响、非常有魅力的黑人运动领袖。他的思想和言行成为美国黑人运动宝贵的精神财富。美国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杜波依斯称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在我国学术界，关于道格拉斯的论著实在太少。专门论述他的著作还没有见到。作者的这本书恐怕是创始之作了。凡事开头难，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是不难想象的。资料问题，参考书问题，都需要作者去摸索，去一一加以解决。

我不是吴金平同志的导师，只是在博士生指导小组审查博士论文撰写情况时参加过几次讨论，提出过一些想法和意见，在论文脱稿后，通读过全文，并参加了答辩会。作者离校后又花了近两年时间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终于写成这部书稿，在即将付梓之际嘱我写一篇序言。我对作者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分赞赏，很乐意为本书的出版说几句话。

这本书对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言行做了全面的、相当详细的评介，使用了一定的鲜为人知的材料，表述了作者自己的分析和见解。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知识，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新见解的启迪。对于广大读者和专业人士来说，这部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最初的构想是集中论述道格拉斯的生平、言行和思想，对于他在整个黑人运动中的地位 and 深远影响考虑不多。但在撰写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显示出道格拉斯的伟人和智慧，才能公正地评价这位杰出的黑人运动领袖。作者因此对全书的结构和侧重点都进行了调整。作者特别强调道格拉斯关于在宪法范围内行动，团结人数，积极开展斗争的思想是符合美国国情的，对黑人运动带有指导性的正确思想。其后的历史事实证明，遵循或者偏离这一思想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布克·华盛顿的塔斯克基运动，还是杜波依斯的尼亚加拉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道格拉斯的思想。杜波依斯忽略了团结大多数，致使运动失去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华盛顿不搞斗争，脱离群众，因而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只有马丁·路德·金才真正继承了道格拉斯的思想。他所领导的民权运动因而蓬勃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主不主张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不问一个国家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如何，把一切合法斗争都看成是妥协、不革命。道格拉斯因而也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作者详尽地考察了美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和黑人运动各派的主张和所导致的结果，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道格拉斯的思想不仅过去适应了道格拉斯自己那个时代的美国客观环境，指导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且现在依然适合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在可预见的将来，道格拉斯的合法主义改革思想还将继续指导美国黑人把争取完全自由、平等的斗争深入下去。”作者还列举了黑人运动中加维运动、黑色穆斯林运动、黑豹党运动等过激派别昙花一现匆匆走下历史舞台的事例，从反面证明道格拉斯合法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道格拉斯的思想博大精深，而且形成于 19 世纪上半期，距今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条件不同，文化氛围不同，深刻而又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内涵，以及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本书只是一个成功的、有益的尝试，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完成。

张友伦

2000年3月



作者简介

吴金平，男，1966年3月出生，1984-1988年在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获文学士学位。1991-1997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美国史，1994年、1997年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97年毕业分配到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工作。现为暨南大学副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曾与人合译著作两部，在美国出英文版专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黑人解放：美国黑人的北极星》，发表有关美国史和华侨华人史的学术论文多篇。

中华美国学会是全国性的非盈利的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于1988年12月中美建交10周年之际，其宗旨是联络和团结全国各地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协调国内各专业性研究美国的团体和机构的工作，发展中国的美国学研究，增进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了解，促进有关美国的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服务。

学会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组织出版中华美国学丛书。学会秘书处现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罗 莉
封面设计：王 华